编者按:

路遥在年仅43岁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三年准备、六年创作,完成三卷本《平凡的世界》这部"真正的大书"。这部书不仅为一代又一代迷茫的青春寻找灵魂的坐标,同时为读者留下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因此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回望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的写作,对今日之文学,均具有独特的意义。这里特邀思想型作家艾云,她对路遥作品深入而稳健的专论,具有罕见的新意;青年学人陈泽宇对"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的综述,集萃了国内文学界专家对路遥及其作品的最新解读。我刊特以此表达对作家路遥的敬意!

礼赞劳动与劳动者

——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艾 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在《平凡的世界》中,深谙下层民众生活真相的路遥,手拿真实刻刀,刻凿出真正的底层叙事。路遥是最早涉及底层叙事、打工文学的作家,是对穷人命运近距离也可以说是零距离的追踪、摹状者。其素朴、平实的叙事,有真实、稳健的生活细节支撑,又带着浪漫的笔调;现实主义中有古典主义的情怀,为一代迷茫的青春寻找灵魂的坐标。这部大书仿佛是路遥的自画像,必将留在中国文学那深邃浩瀚的史牍之中。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劳动者;底层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01-12

2019年下半年,广州市作家协会的"悦读经典"活动特意提出让我讲一下路遥《平凡的世界》。这部三卷本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过去我真还没有认真、系统地阅读过。为了讲述,我特意从图书馆借来这套书。

一旦进入,就放不下了。

我进入到路遥的创作文本,也进入到路遥的精神世界。我知道他在挖掘那卑微者的挣扎与奋斗。我总是望见那渺小的树叶正穿越田塍、陌地、沟壑,穿越柴扉、窑洞、山梁,穿越黑井、隧道、矿灯,直至进入无限的宇宙与永恒。

我在讲路遥《平凡的世界》时,有读者提问:该怎样看待陈忠实《白鹿原》和路遥《平凡的世界》?后者的分量是否比不上前者?

1992年下半年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陈忠实《白鹿原》,一下子被吸引住,整整看了一夜。我被陈忠实娴熟的叙事笔法、史诗般的故事情节震撼了。写那个大时代,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对族群、故里的人,以及风云激荡的民众群像进行如此细腻深刻的摹状,唯大手笔者可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很多都可能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能留下几本,但《白鹿原》可以留下,路遥《平凡的世界》也可以留

收稿日期:2020-04-25

作者简介:艾云(1957—),女,河南开封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曾任《作品》杂志副主编,多年来从事思想随笔、文学评论及散文创作,曾连续在《花城》《钟山》《作品》开设专栏,获"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广受业内和读者注目及称赞。

下。

初读路遥的作品，你会觉得那缓慢的、略显拙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无甚新奇；可读下去，你会觉察到在素朴、平实的叙事中，有真实、稳健的生活细节支撑；又同时带着浪漫的笔调。深谙下层民众生活真相的路遥，手拿真实刻刀，刻凿出真正的底层叙事。路遥是最早涉及底层叙事、打工文学的作家，是对穷人命运近距离也可以说是零距离的追踪、摹状者。

什么是底层叙事？这就是欲从贫困中走出，不任性、不怨恨，总是懂得争取，学习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懂得柔韧、隐忍、勤劳、报恩。这一切是中华民族中潜在的古风，也给写作者带来叙事的亢奋与推动。这部著作以基石般的稳定感，必将留在中国文学那深邃浩瀚的史牍之中。

路遥的书，厚重如斯。我只想选出形象最为丰满、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孙少平，截取书中几个片段和细节进行品读，试着说出我对路遥的理解与敬重。

一、阅读：抬高了他的心性和择偶标准

> “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边，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意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1]11

路遥在开篇几页就写到少平的阅读。少平周日放学，躲在打麦场的麦秸垛旁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直到听到家人的呼喊，看到父兄责备的目光，端起冰凉的高粱稀饭时，才回到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

2019 年 10 月，《花城》杂志创刊 40 周年的纪念晚会上，朗诵艺术家马莉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一段。当她朗诵到“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家的儿子保尔”时，台下分外寂静，每个人都被带到了那旷远的、幽广的乡野，带到了穷人的儿子保尔和富人的女儿冬妮娅那纯净得让人心碎的情愫之中。

路遥与《花城》有缘。当他写完第一部投稿时，仍是不顺。有的刊物觉得路遥文笔陈旧、叙事拖沓。那是个风行现代和先锋的时代。可《花城》正是现代、先锋的倡导者，它则刊发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这为路遥后来第二部、第三部的顺利发表，并结集出版，出版以后引发读者欢迎，随后又获茅盾文学奖等等，带来了契机与好运。

人们听着路遥的小说片段，无不沉入浓郁的乡愁和缤纷落叶的回忆中。

西北塬上的路遥，家里太穷。兄弟姐妹太多养不活，父母将他过继给了大伯。大伯家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平凡的世界》仿佛就是他的自画像。

上高中的少平在学校打午饭。直等到大家都打完饭了，才见一个脸色黄瘦穿着打了补丁衣衫的高个男子踽踽踱步，到空旷的院坝北头去拿他的两个黑高粱面窝头，然后用勺子舀上空荡荡菜盆里的一点残汤剩水。他看着馍筐里剩下的最后两个黑面窝头，不知道这正是和他一样贫穷的同班同学郝红梅的。

如此贫困中的人借助于阅读走出了低矮的屋檐。他想象了一个高地，一个比自己现在的生活高出很多的理想之境，他插上双翼，开始了自由的飞翔。

人在少年时期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为之奋斗的动力，一开始并不都是宏伟崇高，往往是一些很具体的事件，比如为挣脱贫瘠困窘的卑微环境，为改变自己压抑的受歧视的地位。少平的奋斗动力自然也包括了这些物质性需求，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他丰富的内心在感应着物的唤醒，比如当他看到一个身穿雪白的衬衫、一个习惯于早晨刷牙之人，一个讲究清洁爽适的外表，甚至一个人某种慵懒虚无的神情，这些细节都会是对他的唤醒。若是其中还包括男女之间那朦胧的爱，这更是从高处射来的光芒，把自己整个地照亮。冬妮娅之于保尔，她是如此良善、纯净；她是冬天的暖阳，山岗上的迎春花，是归途中那盏橘黄色的灯盏，也是灰暗绝望生活中的希望。

躲在麦秸垛阅读的少平，像被电击一样有种震颤。他开始疏离着一个现实的世界，重新打量自己的生存。他对新的场景和可能性怀抱了期待，期待脱离平淡乏味、阴暗粗鄙日子的掌控。一个人，通过阅读有了领会，这个人就有了力量，有了前程，也有了新的择偶标准。

有人说，一个男子在初年对异性的向往、对配偶的选择，足以看出他心性的高低。有的男子对异性的要求是低标准的、俯瞰的，他希望寻找比自己不如的女性，对教育程度、职业角色、秉性条件都降格以求。他以为这样的女性才可以对他俯首帖耳。孰不

知，当生活拉开烦冗残酷的幕布才发现，那低层次的女子更难对付。她们有太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会因想不开而陷入烦躁暴怒之中；她们因无法运用理性分析和判断会将事情搞砸，生活成为一团糟；再则，她们因受教育程度低下，不可能跻身很好的工作岗位。岌岌可危的生存压力，职业恐慌时时袭来，这让她们很难保持安之若素的好脾性。向来，女人是家庭、婚姻中的掌舵者和领航人，决定家庭的氛围，也决定男人的发展；甚至男人的健康也在她的手里。一个聪慧、高素质的女人，才是男人和家庭的福星、守护神。

在遇到晓霞之前，少平还曾有过短暂的恋情。

少平在同病相怜的境况中萌动了对郝红梅的初恋。他为她面庞与体态的漂亮强烈吸引。他们是最后取黑面窝头的两个人，因为惺惺相惜而靠拢。他们一起打篮球、投篮儿，那青春的笑声爽朗清脆。

可红梅却要为自己的生计未来着想，她不能嫁给穷人的儿子少平。红梅出身不好，贫穷又受尽歧视，她早熟，知道自己不幸的人生担当着一家人的使命。她和少平命运太过相似，他们在贫困的渊薮里挣扎，看不到出头的那天。她不是富人的女儿，她没有那么奢侈。若是一个公主从皇宫逃出，逃到民间，她走到一个打铁铺前，会为那个一身膂力、赤膊捶打的年轻铁匠所吸引。她望着那棱角分明的面庞，那筋骨结实、肌肉紧致的胸膛，那青春荷尔蒙膨胀的性感，她会为这个男人所入迷。公主不会考虑物质需求，因为她不匮缺，她缺的正是让她身心为之战栗的年轻蓬勃、富于力量之美的男人。女人只有走到这一步，才可能听从性别的沉迷。而红梅不是。于是，少平承受着红梅的离开，红梅和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顾养民好了。虽然后来她与顾养民也是分道扬镳。

少平说他不想像哥哥那样找个农村姑娘匆匆忙忙结婚。他的哥哥少安是另一类型，他现实、随遇而安。原来他与润叶相亲相爱。润叶的父亲阻挠女儿嫁给这个穷小子，迫于无奈，润叶嫁给了吃商品粮、有公职的李向前。润叶不爱李向前，两个人长期生活在有名无实的婚姻形式中。

年轻的穷人总得找自己的活头。他们比别人更渴望异性的拥揽，那温热的炕头和等待的窑洞灯盏。当少安得知秀莲是个不要彩礼的女子，他寻了去。这一见，他们就彼此喜欢上了。秀莲当即收拾了小包袱就随了少安而去。少安也一下子相中了这个体态匀称、面孔红润、感情火辣的女子。他似乎嗅到了如地母般沉厚的土香，如山涧岩畔野菊花的植物的芬芳。他们牵手而走，像极了高亢的信天游所唱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悔。"穷人的男女相爱，是一件愉快而奢侈的事情。日子在一个贤良勤俭的女人操持下，男人更有奔头，日子开始红红火火地过起来。

少平应该感谢红梅的不恋，这让他终于遇到他的心上人田晓霞。

这是如冬妮娅一般的女子。晓霞与少平也是高中同学，但一开始他们很少交集。少平的文学细胞和艺术天分在他参加学校的演出《夺鞭》时已有崭露。后来，少平和晓霞作为学校选派的代表，参加地区举办的革命故事调演。他们两个来到县城，在二所待了七天，与有名的贾冰诗人见面，看到了很多稀罕的东西。而后，他们又替学校拿到了二等奖。这些天让他们找到天性浪漫的自由表达机会，他们彼此读懂了对方。

他们总是借书、还书，交流读书体会，渐渐地，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了。如果过去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指的是科举高中以后的男子娶进娇妻美妾，现在，两个年轻人通过书本和阅读，让他们的幻想如悦耳的风铃，回响在漫山遍野和天地之间。通过阅读，他们青春洋溢的生命通体发光。一天，少平对晓霞背诵了《热妮娅·鲁勉采娃》一书中的片段，他们被那优美的词句、旷远的情境深深打动了。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揽在一起，内心起着终生终世永不分离的盟约。通过阅读，他们犹如两只放飞的苍鹰，跳出现实的沉重藩篱，致高于清远无限的天空。

晓霞是少平头顶的朝霞，他原本与她是不相匹配的。良好的家世背景和条件，让晓霞上了大学，并成为报社记者。而少平即使脱离了黄土地，也仅仅成了个不见天日的煤黑子。晓霞却是对少平如此依恋。她说她无法想象今后与她同床共枕的男人不是少平而是别人，那样她受不了。她觉得依他们目前的情形，基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舍此，她只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在梨花飘飞的时节，他们去圆一个生死相依的誓盟。

晓霞作为报社记者来到少平的矿上采访，她不回避与少平的亲密关系。少平心里也有一些小得意：看我的女友是什么样的人。

晓霞对少平的胸襟、情怀、抱负都是那么理解。虽然他们眼下的社会地位、生活道路都那么悬殊。她相信他不是久困之人，但也不会给他功利性地要求什么。她爱这个自尊、帅气的男人。爱他，连同爱他的贫穷与奋斗。

晓霞爱得恣意而奔放，她在日记里写道："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

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是共同奋斗!你有没有为他而付出自己最大的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2]247-248

那时的男人女人都那么纯粹,他们的爱,带着古典主义情怀。现在,已经很少有如此浪漫的感情以及带有自我牺牲的爱了。现代人讨论的是需要,是对忠诚与自由的诘问,是带着不安与歉疚上路。

衡量一个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往往能透视到这个作家的精神旨趣和仁慈宽厚的态度。路遥对女人是敬重而钦慕的,他写她们身上的好品质,即使有些认为不怎么样的,他也写出是基于无奈。好女人一直是带领着男人飞升。这几乎和路遥的婚恋经历很相似。

他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乡下孩子,长大以后却找到了西北下乡的北京知青做妻子。即使日后他的婚姻破裂,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是向上眺望而不是向下俯身。他胆大无畏,全无自卑。少平对晓霞亦是如此。

令人叹惜的是,晓霞在一次抗洪抢险中,为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少平眼前的霞光湮灭了。

这是路遥的悲剧性诗学之叙事。

何谓悲剧?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晓霞从此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少平的孤单、悲怆、哀恸可以说是无以言表。他几乎垮了,走不出来了。

从晓霞父亲家出来,“他立在黄河老桥的水泥栏杆旁边,抬起头来久久凝望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塔山没高也没低,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那里,可他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剩下的只是一丘黄土和一片瓦砾。但是爱情将永存在那片黄土和瓦砾上,会长出两颗合欢树,那绿色的树枝和粉色的花容将在蓝天下掺合在一起,雪白的仙鹤会在其间成双成对飞翔。我的亲人,明天我将如约走到那个地方,我也相信你会从另外一个世界走来和我相会”。

从写作叙事来讲,路遥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常用的某种浪漫抒情。他写下的并不是特别机智的表达,但那质朴中携带的浓郁,打动人心,读得令人泪流满面。若干年里,我们经历了西化的训练背景,文字总显得疙疙瘩瘩,我们却不一定能写出内心深处这么动人心扉的文字。

少平那么年轻,他肯定得从悲伤中走出来。晓霞死后,他又将经历怎样的情感过程?金秀——少平眼中那个小妹妹般的女孩成了女人,她主动向他表白了心迹。可少平难以习惯从兄妹一样的纯洁情感转化为男女之间的性爱。这是不能转换的心理制约。他好言拒绝了秀。

那么,他会回到矿上与师傅的遗孀惠英嫂在一起生活吗?

一切都是未知。

少平的日子仍然要过,他过得总是那样艰辛而又那样自省。

二、自省: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让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

“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料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揽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

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绞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辘轳把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把两桶水提上来。

手上的疼痛使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一下插进一桶水中。

爬到半坡上时,少平感觉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3]540

读到小说的这个段落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这一段让我格外动容也格外留意,这是考察少平未来发展前途和精神走向的一个重要伏笔。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结构,我们似乎也可以揣测到少平今后的奋斗成功有几分把握,并且有无长久性可持续性,

1977年春天少平就从原西县高中毕业了。这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18岁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对命运左冲右撞的抗争。他先是回到家乡在双水村学校教书。这一年底,中断十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但少平他们全落榜了,因为基础知识太差。

路遥把少平写成落榜生,这是更多基层年轻人的命运。能够考上大学,鲤鱼跳龙门者,毕竟是少数。如果可以如愿考上大学,命运就将是另一种景象叙写,是幸运者的叙写。恰恰不是,少平是个落榜者,他挣脱低矮屋檐,改变本阶级的命运更是难乎其

难。

教了一年书以后的少平是一定要离开双水村的。他离开了不一定有出路,但他若是不离开就绝对是无出路。

少平不想老死家中,他背着破烂铺盖卷从双水村来到了黄原县城。他走到东关的大桥头,那里有许多等待被人挑走的揽工的人。在汗酸味的人群中,他发誓新生活就从大桥头开始,他一定要在城里活下去。这有点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塑造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他来到巴黎,站在山坡的高处俯瞰美不胜收的这座城市,他发誓一定要留下,打拼出另一番天地。当然,拉斯蒂涅后来的命运又是另一个话题,此处搁下暂时不表。让我们继续叙说少平。

一天都没揽到工,晚上住到哪里是个大问题。外出的难题一步步到来了,少平必须开动脑筋予以解决。他蓦然想到这个县的诗人贾冰,上高中时他和田晓霞抽调到县里参加故事比赛曾经见过他。他认识人家,人家未必记得自己。但总是有过这档子事情上的接触,他必须找到这个熟人。

果然,诗人贾冰让他在自家存放杂物的小土窑里住了一晚。次日一早,他就又去寻找远房舅舅马顺。舅舅于是介绍他到阳沟大队曹书记那里背石头。三天为考察,看他能否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沉重的石头几乎把他挤压到地里去。三天下来,脊背被压烂了,如葛针一样扎着钻心地疼。他经受住三天的考验,被留下来。

书记的老婆知道他高中毕业,又曾经教过书,有文化的人会机灵些,于是,少平又被派去干钻炮眼儿的活计。这活儿看起来轻巧,却危险,需醒目之人才能干得了。此时的少平,在如此卑微的境地,被人关心引起的美好的情感,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业余时间,他捎带着为主家挑一两回水,打扫院子,给两个娃补习功课。这就是俗话说的很有眼力头儿。他喊他们叔叔婶子。他认为“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

两个月下来结算工钱时,曹书记原本该发少平工资 65 元,实际发了他 90 元。少平硬是不要多出部分。

少平的不贪、隐忍、知恩图报早已给曹书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正是这好印象,日后少平的命运转机也正缘于此。

少平离开这里,又到了一个建筑工地上背石头。这活儿虽然也累,但不会马上失业,可以干得时间长一点儿。在超强度的劳动中,少平和所有普通劳动者一样,用力气谋生。他唯一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业余时间他全部用来读书,已开始读伟人传记。他和劳动者的另一种区别是:夜晚他会失眠。但年轻的身体足可以应付次日的艰苦劳作。

少平总在找活儿干。他曾到南关柴油机厂干活,又到工地拉水泥板。然后就是,他在县里遇到了已上黄原师院的晓霞。曹书记想为独生女儿菊英招少平为上门女婿,他说可以将少平的户口落到阳沟。少平不知曹书记用意。有此等贵人相助,他当然没那么不识抬举,自然应承。谁知人家女儿看不上少平这个穷小子。正在这时,铜城矿务局到黄原招 20 名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到煤矿当工人,曹书记帮忙把少平推荐上了。

命运就是这样,一漩一漩地改变着少平的现状,将他一步步从低凹潮湿的背阳处,往高处有阳光的地方拽。当矿工是下到更幽暗的坑道,在井下不见天日,但之于少平,却是阳光明媚的命运转机。这些,是偶然,却又充满了必然。

人出生于富庶或贫瘠家庭都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这犹如上帝掷骰子,有的被掷到山的阳面,可以天然承受更多阳光温煦照抚;有的则被掷阴坡,只能在阴湿濡郁中喘息。但在这种不理想的生存环境中依旧倔强活着,如山涧缝隙中的野草那样柔韧坚强,这才是天不助人人自助。人自助最靠得住,这是改变命运原始而持久的动力。

接着仍然说少平给舅舅挑水的那个细节。

想起舅舅妗子对他的白眼、不待见,甚至是歧视的目光,少平那一刻把流血的手伸进水桶很是自然,这是很自然的情绪发泄。小小的报复手段,属于人之常情。但很快少平就意识到,做这样的事是野蛮的,他的文化素养不允许他这么做。终于,他将水倒掉,重又到井里打了一桶水挑回去,这样他才找回良心上的安宁。

少平在寻找个人出路时,同时在修为自己。他得把自己这个主体侍弄好、历练好。他不能时时怀有怨恨、愤懑、仇恨,那样,他就无法走到外部世界,并找到希望的生活了。他首先要驱散阴暗的心理、驱赶畸形病态的心魔,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有出路。

他在寻找出路。他明白出路和机会并不多。

路遥在借少平表述着自己的感慨: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到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上,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又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重的土地上,既

长出大多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材。

路遥这个底层叙事的前辈，深谙民间疾苦，但在他笔下，那是真实、朴质、淡定、稳健的情感，含蓄中有着感慨，内敛中有着爆发，一唱三叹。他写人间愁绪，却又哀而不怨。

比较后来，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随着大量进城务工者的增多，兴起了打工文学和底层叙事。但这里边无可讳言充满了一种怨恨情绪，怨恨社会不公，怨恨老板对工人剥削，怨恨自己半夜被查户口，怨恨生产线上劳乏的工作，等等。代穷人发言的写作者，披露弊端，给劳动以尊重和体贴，这是非常需要的。以此借助各级政府和媒体舆论的关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与生产环境，这都是对的。但在某些作品中，一味将打工者即底层劳动者当成天然正确及正义的化身，他们气冲冲进城，仿佛就是来发泄情绪化的怨恨与仇富心态；这样的底层叙事，有失偏颇。

劳资矛盾、务工者的生活待遇都应随时代进步有所改善，但煽动对立不应该是目的。比如说，你可以待在自己的故乡做一个安稳的农人；可你不甘，一定要外出闯荡。一旦走出自己的地界，不可知的艰难都会接踵而来。问题是你要来，而不是别人非要逼着你来。作为劳动者本人，他如果是个终日牢骚的怨妇，根本不应该走出家门。因为凡事都不会全部对你脾气。可待在家乡就安全吗？家庭的贫困，人与人之间并不总是和谐友爱，乡村同样充满阴谋，以强欺弱、霸道强梁之人横行乡里。乡村的亚文明，更是让法律隐匿；而城市，则自有城市的规律，那就是给你机会，尤其会给一个踏实肯干、孜孜矻矻、谦和隐忍、世事练达者以机会。

少平正是这样一种充满正能量的人。

少平从不任性。他知道自己没有任性的资本。那些出身不错的人可以任性，因为他们有接得住的支撑保障。而自己凡事都要学会妥善解决到来的一切难题。他从不奢望有更好，他把自己的眼下目标定得不高，首先是活下去；接下来就是逢山开路、过河架桥，对每一个到来的难题都妥当解决。有灵悟的穷人的孩子从来要学会的是解决难题，而不是空洞地说解脱虚无。

少平深谙人心世道，逐渐学习着与人如何打交道。他并不油滑，他质朴而拙笨，却知道如何化解矛盾、化险为夷。比如：少平初到黄原借住了诗人贾冰家土窑一晚，次日他去取铺盖卷儿时，不忘给贾冰买一盒饼干作为感谢；少平重回工地干活时，他不忘花 5 毛钱买一盒纸烟送给工头；招矿工体检时，他因心情紧张而血压升高，他害怕失去这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珍惜复检的机会，当晚他决定去女医生家拜访求见。他心怀忐忑，却不忘登门时买一兜苹果作为见面礼。开门以后，严肃的女医生看他发窘而又诚恳的模样，也一改严肃，面容泛出笑意，让他进屋。女医生实在是为这个乡下青年奋力抗争命运的努力所打动，也为这个年轻人懂礼数的质朴心意所打动。她告诉他要心绪平静，临时可以喝上一点儿醋。找醋的过程又遇上他后来的师傅王世才一家，由此开启了少平另一种命运的起承转合。困囿于底层的人，接受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他绝不乞求卖惨，而是分寸得当，不卑不亢。

少平一开始并不太懂人情世故，只是他本能地揣度着人的微妙心理与思想活动。他需要别人帮助，他运用的只能是诚恳、努力，舍此，他已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懂得按中国古训要求自己，比如他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懂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懂得“天不助人人自助”，他又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又懂得像保尔那样绝不荒掷自己的生命，绝不能碌碌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少平却因此总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 。

他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给人一个整洁、自尊、体面的形象。他内在浪漫、自由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化为外在的气质养成。于是，他懂得早上起床刷牙。他对着窗户玻璃抿一下自己的头发。他到矿上工作不久，就为自己买了一身深蓝色涤卡衣服。这衣服在当年是很时尚的了。路遥在某个关穴点，总会写到少平为自己添置新衣的细节，这肯定是有意为之。书的最后，少平在井下为救人受了重伤，待他照镜子，看到自己脸上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时，这个身量高拔、面孔俊朗的年轻人几乎崩溃了。后来，他平静下来。他走到街上，为自己买了一副墨镜，又为自己买了一件铁灰色风衣。今后，他不再用漂亮潇洒，而是用冷峻酷帅面世于人了。

作为一个主体的个人，少平无师自通地认为各方面都要好。内里要修为，外在形象气质也要良好。改变野蛮的途径，要有渴望走出困局的意志，聪颖的心智，通透的人情世故；也要有合宜的礼数，清爽的衣着。这是路遥奋斗途中的写照，他用艺术手法赋予到少平这一典型形象的身上。

三、血性：对安锁子的这次暴力行动，使他无形中在矿工中提高了威信

“孙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一种无

言的愤怒使他掼下铁锹，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

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他的光身子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这当回事。

孙少平正当气圆力壮之时，他把这个壮汉在掌子面打得乱滚乱爬。最后，他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

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他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上。

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似的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杀猪般嚎叫起来——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2]137

路遥是如此深入了解民间生存的真相。

在少平出外闯荡时，他在生存过程中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有古道热肠给他以帮助的人，也有恶霸狠毒的挑衅之人。

安锁子借着自己人高马大的壮汉身体，又加上是矿上的老资格，他对初来乍到的少平不友好，总是戏弄、欺侮。书中写道：安锁子不知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少平到那个地方帮他找东西，结果却让少平抓了一把屎。他露出大牙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

这么恶心龌龊的细节并不是路遥的杜撰，实际生活中就有这些无赖、人渣。

心字头上一把刀，少平忍了。忍是他生存下去的盾牌。他内在的文明教养和精神气质与外部粗鄙的生存环境差异很大，但少平想要端这个饭碗就要适应。来到煤矿，是少平改变生存命运的重要一步，是他千方百计争取到的，他必须隐忍。可这一次，少平终于不能再忍，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一次，是安锁子污辱了师傅王世才的遗孀和少平。

安锁子说：王世才才死了没多长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有人下流地说：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吧。

安锁子又说：轮不到咱，少平比咱年轻足劲，早就接了王世才的班了。

少平已是忍无可忍。师傅王世才正是为了救安锁子才死掉，这个丧失人性底性的安锁子居然能说出这种话，天地难容。于是，我们就读到了路遥的上述描写：少平饱揍安锁子。

在澡堂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却是讨好地给少平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饱打之后，他就立刻服服帖帖承认了少平的“拳威”。

少平生活的煤矿，介乎于丛林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遵循的是丛林与文明两种不同的法则。

所谓丛林法则，是生产力低下时，人赤手空拳打天下，凭借的是膂力。气拔山兮，谁有力气，谁强悍，谁才可能获得更多资源，其中包括食物资源与性资源。渐渐地，更严峻的生存到来，有身无脑、有勇无谋都不行了。膂力、武力之外的智力游戏必然到来。人类在进化演变中，文明社会到来。

所谓文明法则，智力游戏普遍为人接受。由氏族到部落，再到集团、政府，一系列的规章、法度必须建立。人开始进入教化、教育、开蒙思维的阶段，社会分工开始，低层和上层的阶级分野出现。一切先从知识说起：封建社会推行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现代社会全程考试，中小学考试、大学考试，然后考研考博。一路考下去，你学历越高，越可能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经济报酬。人借助于获得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将比身体比生命权力得到更实惠的延伸性权力。

少平所在的煤矿呢？这里有砂石、岩土、巷道、棚架、掌子面，这里有下井挖煤撮煤、点火茬炮，这里有渗水、瓦斯爆炸、界面塌方，这里也有矿工、班长、区长、矿务局，等等。煤矿总是与原始劳动原始作业脱不了干系，它比拼的是气力、干劲，这是狼图腾的世界，孱弱无法行事。而且你少平得把你文明的那一面先遗忘，你必须很不文明，甚至要有几分野蛮，才能不被吞噬掉，才能干下去、活下去。你要不惧好勇斗狠的肉搏，有出拳凌厉的刚正血性，这才是你成为真正矿工的通行证。

被猛揍的安锁子马上变得服帖了，工友们高看了少平许多，他的威信大大提高。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正好经过这里，他不但不劝阻，反而嘿嘿笑着说：“好！我还正愁没人顶替王世才当班长哩！孙少平这小子能打架，就能当个好班长！”这就是丛林法则到文明社会过渡时的逻辑。

说这话的是个官儿，煤矿是个有组织有领导的现代机构。但这里仍是底层，底层社会并不都是古道热肠、体恤帮衬，底层有欺软怕强，有笑人贫。少平遇到的不平之事，恰好发生在煤矿，他可以武力征服武力。若是放在乡村，就没那么简单了。

路遥写了乡村，但他重点在写乡村的贫瘠艰苦，还没过多涉及乡村的黑恶势力。但是，乡村的无奈与欺人太甚，那是家常便饭。尤其当强势者与权力

者勾结时,更是强横野蛮、无法无天。那时的乡村,法律废弛,处在亚秩序状态下。时隔 30 年后,政府实行打击黑恶势力的举措,正是要还百姓一个能够有理说理、相对公道正义的生存环境。

也有长久处在亚秩序下的人们,弱势者悄悄酝酿着日后的报复之心,待他羽毛丰满,便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因此发展出黑社会,比如意大利电影《教父》所揭示的。

路遥无意于对乡村的亚秩序进行探究。少平生活的双水村,相对人烟稀寥,塬坡隔膜,在小农经济下,人际关系也相对不太复杂。路遥重在写煤矿的人际法则。

少平到了煤矿,这里仍是有机构、有组织的地方,大家来此只是单纯的工作、劳动,谁好谁坏,众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工友们对人的评判,除了能量,还有血性。血性在矿上仍然是为人尊重也可以说是令人敬畏的一个重要方面。

少平终于在矿上站住了脚,并且当上了班长。曾经被少平揍过的安锁子对他是鞍前马后,殷勤得不行。

少平在生活的各种考验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他会适应环境,却又不忘梦想,他要成为所期待的那个人。他珍惜眼下的一切,闷声做事,不会浮夸。那质朴而又清秀的乡村青年正接近城市。他从低地向高地走去时,那结实的身影如此动人。

四、劳动: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人强大

"'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她小声问。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都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远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2]72

这是少平领着晓霞在矿上转悠时,少平与她的对话。这时候,两人已确定了恋爱关系,晓霞希望少平去做更有前途的工作;而少平则说,唯有现实的劳动,才让他感到心安踏实,否则,又能怎样?

重新阅读这一段关于劳动的话语,让我不禁感慨万千。

路遥深谙艰辛劳动中的辛酸与煎熬,但他始终礼赞劳动与劳动者。劳动,是人的本分,是可以依峙不会倒塌的靠山;劳动,让人珍惜一切,懂得常识,学会运筹,了解疾苦,不事浮华;劳动让人知道该怎么解决难题,实操能力增强,说话做事妥帖稳重……总之,劳动使人成为靠谱的人。

在少平那里,首先是劳动让他获得了一种物质生活的改变。路遥绝不会讳忌因劳动所得人会改变自己的外形装扮和生活条件,这不是俗气和虚荣,而是正当劳动必然会带给人的体面与尊严。

少平在矿上每月都有工资领。他除了往家里汇些钱,自己手头也渐渐宽裕了。同宿舍的人经济吃紧,纷纷在变卖自己的物什,有人开价 20 元卖一个包着铜角的漂亮皮箱,少平要了;有人卖蓝涤卡衣服只要 18 元,少平又添上了 2 元,20 元成交了;又有人卖蝴蝶牌手表,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少平也买下了。少平买了他们的东西,等于帮这些请假旷工的人渡难关。此时书中写道:"劳动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互为辉照。""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路遥关于劳动的描述,平实中带着深邃。多少年来,我们却放弃了劳动,放弃了对劳动的深度理解,也对劳动的过程日渐疏远。

是的,现在许多手工劳动早已被机械、电子设备所代替,这给人带来了极大方便,也将人从烦琐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比如,用手洗衣服总比不上洗衣机来得快捷,手制鞋子总比不上专门制鞋厂制作出的鞋子精美、耐穿。侍弄庄稼,从播种、田间管理,再到收割、扬场、粉碎,都有机械化承担了大部分劳动,农民再不用一滴汗水掉到地上摔八瓣那样辛苦了。还有大型矿山、工厂,都因先进的科技带给人更多的轻松和安全。这都是应该庆幸和表彰的。即使如此,一种对劳动质朴的认识不能遗忘,也不能扭曲。

曾几何时,我们不再培养劳动能力和劳动习惯了。

先说应试教育。所有家庭的子女,从小到大,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为了考上大学而奋斗。所有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别以为给孩子很多的时间,一点也不做家务劳动是对她好;恰恰相反,这是对人的软性折磨。人不能长久处在劳心之中,否则会生病。如今疾病的早龄化,与对学习的迷信、

对身体认识的昏聩，或许有一定关联。应试教育中一系列的认识误区和错误观念，形成了某种合力，正在不动声色地戕害着下一代。如过多的脑力付出，试图通过补充更多的营养是误区；而过分强调一时半刻的体力锻炼，也是不明智的。一切应该是平时的循序渐进，若想通过一时一刻改变羸弱，会适得其反。

对于我这个写作者来说，许多灵感往往是在干家务劳动时迸发的。思考重大哲学问题的斯宾诺莎在海牙干着给人磨镜片的营生，正是在慢慢磨砺的机械性劳作中，这颗智慧的大脑灵醒着，思考何为君主的职责、何为臣民的职责，思考人类的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等等。托尔斯泰永不会放弃田野间的劳作，在麦浪滚滚中，在空旷风声中，他蓄存着足够体力，以保证他可以完成那叩问灵魂、同时又铺展史诗画卷的鸿篇巨制。

劳心与劳力相伴随，才可以掀起更有效率的头脑风暴。

借着路遥关于劳动的话题，我情不自禁地派生出很多的感慨，冒昧把它表达出来。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仍然执拗地想把这个真相指出来：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身体垮了，就什么都会垮。许多孩子一路拼杀考上大学，然后读研、读博。过多的读书、案牍劳形的日子已经耗着他的气血。他如果有病，家人会让他吃西药、立竿见影地见好。殊不知西药是大寒，在弄乱一个人身体内部的平衡。现在频发的抑郁症疾病，并不仅仅是心理问题，也是阳气不够、血流不畅所致的失眠、抑郁，等等。

缺失强健体能的下一代，那形体已经变得不是很自然了。年轻男子那结实强悍的体格，姑娘那婀娜饱满的身姿都到哪里去了？病态、早衰、亚健康，没几年一次洗牌，呈现水落石出的真相，同时，传来的是令人扼腕长叹的黑色报告。我们无不痛心地看到，那为人艳羡的学霸，却在工作不久传来自戕、早逝的不幸消息。他们在应该很好地报效社会的大好年华却撒手人寰，这是家人的厄运，是时代的悲剧，是对人才最大的浪费。如果一个人从小可以健康茁壮地学习和生活，即使不读很多书，不成为学霸，又能怎么样？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可以更长久的贡献于社会，这才是教育和知识的本意。但结果却不是这样，这逼使我们一定要追问。

这也许是极端的例子，如果关注普遍现象，那又是如何呢？

一直读书，没有劳作，很可能因匮乏动手能力显得没有常识。他们即使有专业技能，但走向社会却显得是那样笨拙不堪，并带来不妙的后果。

书读得很好，但实操能力不行，这样的人如果因文凭高而走向仕途，他面对任何棘手事情时，很可能是头绪紊乱、措施不力。在各个阶层中，若是白养一批无识见、无经验、无能力的迂阔之人，那也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事情。

谁都知道劳动带出的常识、经验的重要性，可为什么各方面都不能从根本上引起重视呢？这还是传统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在其中隐伏。

中国有句老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被治于人。这就是说，劳动者被人管着、治着，是等而下之的；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鄙视。你一直读书，哪怕读成身体单薄、面色苍白、病态异常，也能轻松进入体制，在权力延伸中得到种种利益。

过去，劳动者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他谋生的唯一资源就是力气；那么，他只有拼命干活，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干的总是最苦、最累并且是最具危险性的活计，比如种地、打铁、搬砖、修路架桥、挖煤挖矿，或者选择当兵打仗。有的活儿虽累，但生命还有保障，但有的活儿则充满不可知和危险性，比如挖矿和打仗。当兵打仗，除了怀抱荣誉之人，普通百姓子弟，皆因了生存——当了兵，至少可以有饭吃了。过去的人生存需要何其低廉。

那么，和平年月最危险的工作莫过于下矿挖煤了。这就是少平所从事的工作。

少平带晓霞在矿上走着。走到一个山湾，可以看见一个坟堆连着一个坟堆。坟前立着墓碑。这大致都是在突发事故如煤层坍塌、瓦斯爆炸导致井下作业者的死亡。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

煤矿犹如战场，人不伤亡是不可能的。

正是对这生死未卜命运的担忧，晓霞才会问少平对自己的今后有什么打算。而少平的回答是：珍惜现在，努力劳动。少平对未来又是有所筹谋的，他说："我准备在一两年中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学数学、理化，以便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理想，而是一个实际打算。"他打算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学习的专业仍然与煤矿有关。

少平的想法是一步步提升的。刚开始入矿时，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职业，但对于一个毫无出路的农家子弟来说，当矿工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拿工资，这对于他就好比走向天堂而不是进入地狱。但少平又何尝不知矿工的安全总是无从保障，报酬也不高，这是被人鄙视的工作，有能力的人

不会加入它的行列。劳力者比不上劳心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这让劳动无形变成负面的、受罚的代名词。

少平想考学,当然是想寻找别的机会改变现状。他不是鄙视劳动,正是劳动让他获得体面和尊严,也让他找到进步的空间,从而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他掌握了知识,可以为劳动者做更多有所裨益的事情。

路遥关于劳动的素朴描述发人深省。联想现在,年轻一代那里当然有更多的创造者、奋斗者,却也有不少躲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啃老一族。有父母在,他们可以混吃混喝,不会想到担当责任,至于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更是他们要逃避的。这是被称为"废柴"的一种类型。过去,俄罗斯出现过"零余人""多余人",这是些耽于精神、不屑上手去做的劳心者;但是现在"废柴"则是彻底废了,灵魂沉睡、坠入深谷,无法自拔。当一个人丧失生活目标和日常秩序,被空虚、颓唐所攫住而不思改进,这真是悲哀的事情。我们在逐年老去,未来都落在下一代身上。下一代能干什么,意味着将来是什么。

实际上,当一个人无聊时,动手做家务、搞清洁,都可以让你洗涤掉污垢,让你振作。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

一个消极的人,如果他可能读到路遥的这本书,他是否可以树立新的劳动观,从而改变一蹶不振的消沉?希望如此吧。

五、命运:他依稀听见一支充满活力的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 "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茬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未绷的碎顶上有一块大砂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家伙却带着醉意独个儿在傻笑!他立刻箭一般蹿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便一掌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砂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他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2]393

三卷本的小说已近尾声了,可少平仍然遭遇到不幸。他救了别人,自己则倒在血泊中,生死不明。大砂石从他的右额扫过,头骨露出。经过抢救他活了下来,却面部毁容。

看到这里,我心里涌出这么一句话:厄运如身后的小狗不知在追撵着谁。不知是路遥本人身体不好的病理学特征给他的某种暗示,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悲观论者,认为悲剧人生是常态人生,总之,他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许多人的不幸,他们难逃恶魔的桎梏。

少平的哥哥少安原来和润叶恋爱,女方家人阻挠,爱不成,他与秀莲结了婚,两个人过得还不错。秀莲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为他发家致富没少牺惶。少安的窑赔钱了,秀莲也不怪他。秀莲嘴一份手一份,为少安分担忧愁。他们晚上依偎在一起,少安感到的是女人如火炕般的温暖。他沉浸在这个开朗的、红润而健康的秀莲给予他的男欢女爱中。你可以说少安对润叶的爱变得太快,没那么深沉。的确,深情需要力量、需要心智,也需要奢侈。而少安没有这种奢侈的深情。他对一个更合适他、能跟他过普通平凡日子的秀莲产生了依偎的踏实感情。

却不曾想,当少安取得成功,成为一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在表彰大会上披红挂彩时,秀莲却嘴里鲜血喷涌,身体摇晃着向地下倒去。秀莲得了肺癌。

曾经爱少安至深的润叶却无法放下少安。父母替润叶找了一个在公家干事、在一个部门开车的李向前。他长得不错,对润叶也很钟情,但他得不到润叶的爱。李向前很痛苦,几乎是天天喝酒,借酒浇愁。一次酒后开车出了车祸,腿残废了。润叶到医院看他,他说:"我这个样子了,我们离婚吧。"润叶说:"离什么离,出院以后装个假肢。我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呢!"这真是有受虐情结。原本可以平静安然地过生活,却非要酿成如此悲剧才要安生下来。后来,润叶给他生了儿子,李向前也从此振作,可以自谋生路了。他们似乎注定了一定要遭此劫难。人好像就是这样,不做、不打碎了自己再重新拼接就不能往前走似的。这是人类的秉性,也是人无可逃脱的命数。

少平的师傅王世才死了,他心爱的女人、最懂他的知己晓霞死了,少平又遭此大难。这些灾难,要少平承担,这是为什么?

路遥自己有着悲剧人生与悲剧感。他为写这本书,从 1982 年到 1985 年在做前期准备,一稿写两年,1988 年春到夏完成了第二稿的修缮增删。这三卷本 110 万字,路遥写了六年。他的写作可以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勤奋来形容。路遥从小生活条件差,身体已是虚弱不堪,可他又承担这样耗神耗血的精神性劳动。他在窑洞、在招待所、在距人背后的僻处写下那一笔又一笔。他的日常餐饭怎么解决,他的睡眠可否良好,他的心力可否够用?没有人知道。他是煎熬的。写作中,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久久徘徊在脑际的暗示,每每体会到的是如火焰般焚烧的、无法吹去的厄运与悲剧的灰烬感。这一切,

让他在悲剧人物形象塑造时，在对命运与命运感的探勘中，打上了刻骨深邃的心理印痕。

在对悲剧的描述中，我同时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形，王世才、晓霞死于救人，少平的身负重伤也缘于救人。路遥这么处理，是他在潜意识里有着对利他主义、舍生取义的赞颂。这种非个人、非自我倾向，是路遥非常推崇的高尚价值观。这种古典主义情怀，自始至终贯穿在路遥的创作中。

关于秀莲的悲剧我还想多说几句：劳动者总会摊上那猝不及防的厄运，但在其背后，劳动者个人意识稍微清醒一些，是否会多一层自我保护的可能？秀莲嫁给少安，为改变那贫穷困顿的生活，她连明彻夜地干，她不仅生儿育女、烹调洗涮，还要养猪喂牛、拉犁帮套。她的元气、精血在繁重的劳动中一天天耗散着，直到某日，她大口吐血，患上肺癌。农村劳动妇女里外夹击之疲累，是我们身在城市的人无法想象的。旷旷塬上，绵绵山峁，那蠕动而劳作的生灵，正不眠不休地干着。

我曾经如此热情地歌颂着劳动，但我现在仍想补充说：那过于疲惫的劳动者，一定要懂得珍摄自己，否则坐下病灶，只能自己活受罪。

如果问，一个人能从伤害自己的劳作中脱身吗？只能答，许多普通人为生计所迫可能考虑不了那么周全，他们不太懂这其中的蹊跷。在一个发展正常的社会，有出售劳动力的，也有购买劳动力的，正确的做法是：购买劳动力者应该是有恻隐仁慈之心的人，应该给出售劳动力者创造躲开风险戕害的劳动环境。这样做，正可以提高效率和财富积累，同时也让自己良心安宁；否则，忤逆正道，是会遭天谴和报应的。进步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减少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之虞。

但是，写作者路遥，却自觉选择了一条自我献祭之路。路遥原本是个有政治抱负和胸襟的人，后来，他从政治迷狂转向写作迷狂，这注定了他要走一条九死而不悔的创作之路。他对自己够狠的，不写出他心中的一部大书决不罢休。他身上洋溢着古典主义的价值观和写作观。

我仍然记得多年前在《南方都市报》看到一篇棉棉的访谈。她说她不可能像前辈作家那样，以身体的残破和某种自杀式写作从事文学。棉棉等人为更现代的写作者，她与路遥等古典主义写作者有什么区别呢？

从价值观方面来看，古典主义的价值观推崇舍生取义的美德，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则看重好好活着的道理。

从写作方面来说，古典主义写作者具有普世情怀和理想主义，其写作以殉道者之姿，欲以唤醒众人冥顽的灵魂。而现代主义的写作观，则为个人的精神救赎提供情绪宣泄与表达渠道。

路遥不会考虑是否现代性，他挺着病体，哀民生之多艰，欲为中国农民抒发那深情的奋斗之歌，写出自己的血与泪、灰与烬。

路遥用质朴而又恢宏之笔，叙写着中国从1975—1985年让人难以忘怀的、充满历史转捩的十年断代史，他涉及领域之广泛开阔、人物之丰富多彩，令人敬佩。在他笔下，从乡村、县邑、省城，从农民、矿工、基层干部、高层领导，从种地、开矿、商战、致富，一幅幅生动历史画卷和现实生活徐徐展开着，那人物的表情带着刚毅、果决。我再一次阅读，每每愀然动容。这种叙述者不能太机巧，它一定是如山一样的路遥用这拙拙有力的笔，凿出那山、那岩、那树，那迎春、那莺尾、那柳絮，那喜、那衰、那倔的世间万物生动纹理与表情。

少平，无疑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鲜活生动、留下无数可解读性的形象。

写到现在，文章该结束了，可我仍然对结尾的开放式结构感兴趣。

少平买了墨镜和风衣，一个又酷又帅的男人将重回矿山。今后等待少平的命运会是什么？

假定他考上了煤炭学校，他奋斗出来，当上了干部，走到了社会耀眼的位置，这样的话，他就算奋斗成功了吗？

奋斗是个动态过程。奋斗中的人朝气勃勃，用各种正能量激励自己，不懈怠、不灰心。奋斗的动力当然是要改变卑微的命运。但是能始终把握住正确的奋斗方向吗？

假定少平所在的矿山在新形势下关停并转了，他能出外闯荡再创新天地吗？

少平即将赶上开放改革的重要年份，他如果经商，能做得风生水起吗？前路有多少不确定性，他能始终把握商机，调整开拓，立于赢者位置吗？又或者他在生意场输个精光，该怎么东山再起，这对他又是新的考验。

他如果走向仕途，在风气不正的年月，他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吗？他如果把持不住，即使不贪不拿，但过多的请吃请喝，极有可能患上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如果他有贪腐行为，日后双规，或锒铛入狱又说不定，又或者监狱生活让他食简当食物、过静态生活，反倒收敛肚腩，改变体能，又捡了一条命也说不定。

人类的命运真是吊诡,谁能把握住自己?

相信少平是个可以把握住自己的人,从他替舅舅挑水时,他将血手插入水桶后认为自己是野蛮的那种反省,从他对劳动质朴无华的认知态度,从他热爱阅读的开阔性思维里可以判定,少平在混乱昏暝时分,都可能具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明理彻悟。少平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纠缠,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自己年轻时的裂变与愈合。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倒退、在退步。我现在日益对高邈宏阔的概念不感兴趣。我对那从事普通劳动、安静沉着做事、偶尔抬头微微一笑的人,充满敬重;而对那些不谙世事、总是嫌弃、牢骚满腹、以否定性思维赢来喝彩的人,有某种不适应及质疑。我愈发相信鲁迅说过的话:世界是由愚人创造的,聪明的人绝不能支撑这个世界。因此我对劳动者深怀敬佩。

我想,我一定和少平一样陷入对命运纠缠的反复追问里了。我们不敢任性,缘于少时的生存恐惧。譬如:如果咳嗽,我害怕肺部发炎;如果失眠,我害怕神经衰弱;如果厌食,我害怕元气不盈。我想把自己调整到身心舒泰、不疼不痛的状态,为的是躲在灵魂背后,直视真相,不捏造谎言。

以咀嚼汉语为业,不可打诳言妄语,不可自欺也不可他欺。我只是想悄悄活着,不惊动他人,却有耐心与少平、少安、金波、润叶、向前、红梅、润生等人一道,在劳动与奋斗中等待有希望的日子来临。

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变得时髦、夸张、便捷,但仍有人愿意耐下心来去读路遥的这本大书。年轻人仍然愿意看,一茬茬的人接续着看,因为他们要为迷茫的青春寻找灵魂的坐标。迄今,路遥的这本书已发行 1800 万册,现在每年仍在不断重版印刷发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作家发行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部书。路遥用他的命换了他的这部小说。他 1949 年出生,1988 年完成 110 万字的《平凡的世界》,1991 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 年 8 月他得病,是肝癌;三个月之后,1992 年 11 月去世,享年 43 岁。一个坚强的男人,未能逃脱病魔之手。可他留给世界一部沉甸甸的大书。

2020 年 4 月 24 日

参考文献:

[1]路遥.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M]. 2 版.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路遥.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 2 版.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路遥.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 2 版.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Praise Labour and Labourer

—Leading Lu Yao's *The Ordinary World*

AI Yun

(Guangdong Writers Associ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5, China)

Abstract: In *The Ordinary World*, Lu Yao, who was well versed in the truth of the life of the underclass, took a real carving knife in his hand and chiseled out the real underclass narrative. Lu Yao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riters involved in low-level narration and working literature. He is also a close tracer and description of the fate of the poor. The simple and pure narrative of the work is supported by real and steady details of life, with a romantic tone; realism has the feelings of classicism, looking for the coordinates of the soul for a generation of confused youth. The book seems to be a self-portrait of Lu Yao; the novel will surely remain in the vast and profou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u Yao; *The Ordinary World*; labourer;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路遥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陈泽宇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北京 100125)

摘　要:路遥的创作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书写者,他敏锐地抓住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转折的关键节点,对 1975—1985 年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和书写,为读者留下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进一步分析路遥的文学成就与路遥所引发的文学现象,厘清文学意义上的路遥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路遥之间幽微深邃的区隔,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意义重大;路遥研究有待深化。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诗意的现实主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13-05

1975 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1]1

这是独属路遥的语言,这是《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人们宁愿足不出户,但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

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1]2

1988 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据统计,收听过央广《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的听众超过三亿人[2],当时的年轻小伙子施战军就是这三亿人中的一员。现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施战军在 1988 年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据施战军说,那是在他大学毕业前后——人生中最迷茫的一段时间,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的《平凡的世界》时,平凡又充满张力的文学表述给予了他巨大的力量。时至今日,施战军依然对这部杰作称赞不已。正如上文所引述,小说的开头中酝酿着天地死寂的泥泞氛围,在一片冬日已逝但春未来临的寒冷雨雾里,学校中青年男女们的蓬勃生命力一览无余,人的生机在寂静的空间中突然出现。施战军认为,路遥虚构但不虚设、慈悲但不伤悲,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充满敬意。《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有魔力的作品,它和它的作者路遥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平凡的世界》播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于 1991 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获奖的答谢词中,路遥说道:“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3]13 路遥逝世后,他的作品不断再版畅销;在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平凡的世界》等路遥的作品始终位居借阅榜单前列,有论者统计,从登榜频次与排名平均值来

收稿日期:2020-04-05

作者简介:陈泽宇(1995—),男,山东济南人,供职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看,《平凡的世界》在我国“985 工程”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中登榜频次最高,最受欢迎。[4]2018 年,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被称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5]。2019 年 9 月,路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6]荣誉称号。在被一代又一代读者用“历史眼光审视”并不断认可的同时,路遥的文学价值也逐渐被学界接受,路遥研究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指出,“在历史总体性意义上全景式地书写现实,且于大历史变革的整体视域中深度观照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困境和现实遭际,为路遥文学的基本特征”[7]。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到来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召开,刘跃进、张伯江、程光炜、王兆胜、白烨、吴俊、李国平、施战军、赵勇、李建军、邢小利、厚夫、鲁太光、钱远刚、周明、白描、李炳银等知名学者以及路遥生前好友、路遥著作出版方一道缅怀路遥的为人为文,回顾他的创作点滴,并探讨路遥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

一、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

当代作家的创作往往车载斗量,但被人民和历史所铭记的少之又少,关注“留得住”的长篇小说作品,体现了一种文学眼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认为,路遥的作品中既充满了现实观照,又饱含着人民情怀。这种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的融合让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色彩,尽管写的是苦难、奋斗,但永远给人的是希望,是崇高和温暖。“一个作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能读,留下印象,就是永恒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认为,路遥的作品朴素而深沉,庄严又热情,他高度赞许路遥的作品“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在他看来,这种崇高的基调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密相关,路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放弃了对创作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恪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继承并开拓了博大宏伟的文学视野。张伯江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充满诗意,诚然,诗意的温情是路遥作品中值得驻足的一个光点。

回忆起路遥的点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评论家白描感慨万分:“路遥是优秀的作家,但如果他当了外交官、政治家,也一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外交官、政治家;他即使当农民,也不会是平凡的农民。陕北的农民特别坚韧,基本靠天吃饭,他们把劳动叫受苦。有雨水,就有收成;如果没雨水,也就没收成,他们也认命了。陕北人就是这样的,该我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得不得、收不收听天由命。路遥也是这种人,但不同于常人的是,如果天旱没雨了,他不会看禾苗死掉,他会一瓢水一瓢水地把苗浇活。”在白描看来,路遥性格的这种韧劲使得他笔下的现实主义也充满了温暖与爱心,是一种有情的文学。路遥的作品不以冷峻无情的批判现实主义见长,诗意是他赋予传统现实主义的新特征。白描认为,进入新时期后,有的作家仍然将书写重点放在对于政策和历史的简单评价上,但此时路遥已经把创作的注意力转移到关心人的价值与尊严上,路遥所关注的是人在一个时代中处于什么样的精神位置。

关注路遥的现实主义背后的方法与路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追新求异,新的技法与经验涌入中国文学场域,来自欧美和拉美的文学潮流迅速改变了当时文坛的面貌,并成功塑造出一代新锐作家,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打开了新路。但路遥与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韩少功等作家不同,在后者自觉接受域外文学洗礼并改弦更张的同时,路遥所坚持的是一种不改变,以及对现实主义丰富性的坚守与拓展。路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答谢词中也说道:“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3]1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评论家白烨谈到,相较于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更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同时也最适合他本人。白烨说,但在让他成功的现实主义方法背后,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路遥深切的人民情怀,《平凡的世界》中表达的是人与人共有的情感,充满了对不同阶层人的精神上的理解、激励、滋养、启迪,现实主义和人民情怀构成了路遥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

施战军认为,路遥的小说是忧郁气质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响,有着苦难诗学中抗争意志与包容的统一、创作理想中天下百姓情怀与自我建功祈望的融合。“路遥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苦难的诗学,他的小说有一种向前、向远奋斗的精神,在关于新人建构的理想主义中展现出一种忧郁的性格,路遥一方面心怀着最质朴的老百姓,一方面创造着不甘心的、有尊严的、敢闯的平民英雄,这些精神特质不仅属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同样适用于新时代。”[8]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

的传统出发，认为路遥及路遥一脉的创作主要体现为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正面直述，吴俊将其概括为四点：一是作品中充斥着宏大的思考、广阔的叙事，与一般从日常生活、细节进入社会生活的小说不同；二是路遥一脉的创作是一种贴近的书写，有文学的具体性；三是作品中重视“气质的再现”，从人物和个性来呈现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气质；四是精神概括，小说致力于对时代和社会的理性把握，并试图给出前瞻性的理解。在吴俊看来，理解路遥的作品，需要介入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学变革的背景。路遥尤为难得的一点，是他在整个80年代都将一个文学家的政治思考、社会思考、历史思考以及使命担当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接续上了五四时期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传统。与路遥同期的许多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仍能秉持这份传统，但在80年代后期都纷纷弱化。吴俊认为，路遥的长期坚持，是与他作为文学家的人格锻造与自我鞭策分不开的，而这种创作精神的核心点就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

二、脚踏实地的创作精神

“1992年的冬天，路遥，仿佛远古神话中逐日的英雄夸父一般，这位扎根泥土与大地的陕西作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倒在了他追逐文学理想的半途中，结束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一生。”谈起路遥的创作精神，评论家、编辑周明总是充满深情。

路遥的创作是脚踏实地的，和作者本人一样，路遥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人生》，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在高中毕业后的出路问题。高加林融入不进城市又不甘心回村务农，一个脚踏实地的好后生坚强、有韧性、充满活力，在奔向远大前程的路上，即使被狠狠绊倒也能迅速爬起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评论家鲁太光认为，《人生》把那个年代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写活了，路遥面向庞大的现实经验寻找文学资源，克服困难，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绩，与当时寻求历史文学路径的其他陕西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鲁太光还注目路遥的文学史价值，他认为路遥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异质性的存在，路遥以坚持自己的写作理念抵抗先锋技法的侵袭，保持了精神产品的独立性。

脚踏实地的创作精神背后，是路遥矢志不渝的读者意识。评论家段建军说，在20世纪80年代，深刻感受和理解世界，是广大读者更关心的人生问题，追新逐奇的艺术表现不能满足更广大读者的期待视野。段建军认为，从这一点看，路遥比那个时代所谓的先锋派作家要高明且清醒。段建军谈到，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源自自己的生活感受，充满了个体的生存危机和底层的认同危机，通过个体书写时代阵痛，表现为底层为理想奋斗，却在现实面前遭遇重重阻挠和坎坷的真实境况。“在这种生存危机中，他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追寻社会以及人的认可，他把握住了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生的感觉，这种跨时代的同理心和共振感一直从那个时代延续到今天。”

此外，段建军认为路遥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始终把人物放在时代的交叉地带进行探索，在时代新与旧的交叉处，个体生命“昨天”与“今天”的交叉处，城市与乡村的交叉处，底层与上层的交叉处，都充满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生长点。“在这种交叉地带去写充满差异和对比的社会和人生，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也让他的人物在追求中充满了动感和动能。从而使作品从艺术的角度也非常具有探索价值。”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谈到，路遥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在他看来，路遥的创作精神是陕西作家创作精神的典范，就是用生命写作的精神，路遥启示当下作家要以传世之心对待创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创作。“在《人生》获得巨大成功后，路遥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把文学看作神圣的事业，执着写一部‘真正的大书’，主动‘归零’，沉下身心，寻求符合中国人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宗教般的虔诚、初恋般的热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创作定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益求精，经历3年准备和6年创作，用心血和汗水凝结成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宗教般的虔诚和初恋般的热情，让一个写作者的文字不能不带有高于生活的诗性光辉。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仵埂认为，脚踏实地是陕西作家写作的重要特色，但“魂动九天”的创作精神更值得后来人重视与学习，“路遥善于给人物形象赋予诗意和理想性的光辉，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在脚踏实地与魂动九天的两极之中，构成着对我们人生的某种参照”。

三、正在改变的学界风向

与读者的持续关注不同，学界对于路遥的态度有些不温不火，专业研究领域的“路遥冷”现象普遍存在。但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用文学评论准确反映文学创作，需要关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路遥的文学创作状况及其创作在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

为例，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在《文学评论》上，以路遥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只有3篇，而2012至2018年，《文学评论》发表的路遥研究论文就有7篇，关注度明显提高。

张伯江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首先应该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上，近年来像路遥这样的作家和作品重新回到舞台中心，成为文学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是一个好的征兆。张伯江说，创作者、研究者、评论者和读者之间既不应是对立的、也不应是推崇的关系。评论家需要以学术的态度认真研究经典作品，在《文学评论》近年来刊发的路遥研究文章中，不同学者都谈及了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这种犀利敏锐的观察视角与扎实的文本梳理功夫值得学习与发扬。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王兆胜认为，路遥在学界长期受到冷落，其文学地位没有被凸显，和研究者的错位不无关系。王兆胜认为，路遥是一个大巧若拙的作家，一个注重修炼文学“内功”的作家，学界在研究路遥时，应注重解读路遥内心的世界和文学结构的“密码”。王兆胜说，路遥的作品除了表面上的励志之外，更重要的是文本中令人心跳的、颤动的、“点到穴位”的文学描写。

王兆胜谈到，当下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误区，有些学人认为离开理论和概念没法说话，不分辨某种理论是否适合解释某个作家的作品，文学评论中存在理论的空转现象。王兆胜认为，路遥的创作少有时髦理论能够解释，用现实主义进行评价最为确切，但在新时期文学史中，先锋派的兴起对现实主义写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于是路遥长期以来被学界低估。王兆胜呼吁，在路遥诞辰七十周年之际，应该开启路遥研究的新航向，摆脱概念和理论的束缚，从作品开始，用“显微镜”透射出它独特的魅力，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

在当下，由于阅读、消费和话语主体集中于城市，文学的风尚偏向城市题材，而当代文学的乡土写作总体缺乏明确的清晰的系统，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耕文明的观照。许多以乡土之名进行的写作，实际上未能深入到农业和传统的内核。在此角度，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张哲认为，路遥的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写作生态具有建构意义；同时，路遥的写作超越了文学本身，还具备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他的写作提供了显微镜一般的准确观察力”。此外，张哲还谈到，先锋与现实的区别与其说是机理，不如说是趣味、潮流和特定时刻的艺术诉求。“我们可以从艺术历史的变迁得到这样的印证。但无论先锋还是现实，有一点是相同的：文学（艺术）都关涉自我的镜像。几乎所有的写作（艺术创造）过程都是自我与现实的折射。写作主体与日常和时代建立了某种对应，镜像成为另一种确切清晰的现实。”伟大的作家作品往往具有复合式的艺术风格，比如马尔克斯，既是魔幻的（现代的），也是现实的。路遥的创作带有挽歌式的悲怆和诗意的情怀，在乡村景观逐渐式微的当下，尤其具有记录与再现的文本价值，对于大量涌现的强调技术、符号甚至标签的现代性写作，也有良好的启示作用。“路遥夸父逐日一样的文学姿态，也带有极其丰富的书写精神隐喻。路遥的创作是以肉身的毁灭作为代价的，但就文学精神论，其书写恰好印证了文学的庄严肃穆、神圣高蹈。”

四、不断展开的路遥研究

摆脱固有的陈旧印象，需要新的材料来说话。学者程光炜近年来在发掘、分析路遥文学史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等文章面世。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尽管路遥研究中已经有厚夫《路遥传》、航宇《路遥的时间》等史料翔实的作品，但在路遥为什么要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在陈家山煤矿深入生活的事迹、第一部小说完成后隐瞒病情的经过、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路遥与林达感情问题等几个重要方面，均缺乏可信的材料，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没有这些周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将会变得非常孤立，处在被历史悬空的状态。”

新材料固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新视角往往更会让人耳目一新。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邢小利认为，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六个字：走出去，在路上。一个人某种心理定势的形成，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时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对于路遥来说，九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九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永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他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是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可能活口的远方。”在九岁的这次出走之前，还没有路遥其人，后来叫路遥的那个作家这时叫王卫国。之后王卫国改名为路遥，新名字中蕴含“路漫漫其遥远兮”的感受，这种对未知世界触摸所生发的人生情绪，来源于这一次出走清涧事件。在邢小利看来，作为作家的路遥早在九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时便已经诞生，“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他当时的心理体验时间应该就

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地重复九岁这一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

和路遥的创作一样,许多路遥研究专著也有着磅礴的生命意识。2015 年,厚夫的《路遥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即广受关注。在此次研讨会现场,厚夫回顾了几十年来路遥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他写作《路遥传》的点点滴滴。厚夫说,他可以找到为路遥立传的无数条理由:都是陕西延川"一道川"的老乡,延川中学的校友,青少年时代都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厚夫的外祖父与路遥是"忘年交",而厚夫本人又在路遥的大学母校延安大学文学院任教……尽管有这么多的相似相关经历,但在厚夫看来,这一切均是客观外因,最大的研究和写作动力是来自他内心的精神需求,为路遥立传是他的生命自觉。像厚夫一样,被路遥的智慧和勇气、性格和创作影响到的研究者还有很多。

路遥的创作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书写者,他敏锐地抓住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转折的关键节点,对 1975—1985 年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和记录,为读者留下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他也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熔铸在国家命运及时代大潮之中,这种殉道式的写作与忘我的创作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陕西作家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但也正如许多评论家有所"共识"的那样:"路遥的进步和超前在于一定的个人和自由意识,然而历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层,还是缺乏更深层的个人和自由的意识,而受制于某种'规范'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仍然是一个渴望现代但仍然处在前现代的人。这是路遥的局限,也是他的思想的悲剧。他勇敢地挑战着他那个时代,但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时代。"纵使再伟大的文学巨匠,也一定同时存在着光辉耀人的精彩和引以为憾的不足。进一步准确地分析路遥的文学成就与路遥所引发的文学现象,进一步厘清文学意义上的路遥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路遥之间幽微深邃的区隔,都将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意义重大。如此,我们或许应该欣慰又诚恳地自认,路遥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一定充满着丰富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路遥. 平凡的世界:上[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张漫子. 三十年后,为什么还需要读路遥[N]. 新华每日电讯,2019 - 11 - 15(9).

[3]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4]吴汉华,姚小燕,倪弘. 我国"985 工程"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6):63 - 69,20.

[5]新华社. 改革先锋名单[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 - 12 - 18/c_1123868819.htm.

[6]"最美奋斗者"名单[N]. 人民日报,2019 - 09 - 26(4).

[7]杨辉.《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39 - 47.

[8]相关引文见"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会议速记.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esearch of Lu Yao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30 Years Reunion of Lu Yao: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Lu Yao's Birth"

CHEN Zeyu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Lu Yao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ime backg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was the participants, witnesses and writing of the reformed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and keenly captured key node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ed and opening up of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the work conducted in - depth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writing of 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from 1975 to 1985, leaving readers with a magnificent historical picture of China's soci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Meanwhile he further analyzed Lu Yao'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nd phenomenon, and clarified the subtle and profound distinction between Lu Yao in the literary sense and in the sociological sense, which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of Lu Yao needs to be deepened.

Key words: Lu Yao; *The Ordinary World*; poetic realism

“真相”言凿凿,“和解”路漫漫

——由《我的祖国,我的头颅》探索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郑梦怀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安缇耶·科洛戈的小说《我的祖国,我的头颅》记录了种族隔离结束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致力于实现南非社会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努力。作品在顺叙中随时插入述评、新闻报道、法庭实录等多种文本,构成了来自众多群体的多元发声体系,展现了种族隔离时期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种族压迫罪行。作者对置凸显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以使“真相”自然呈现。作品对南非社会过往、未来以及和解道路予以思考,最终发掘出“认识他者”“实现多元”与“实现宽恕”的因果关联——寻求“共同的人性”便成为南非种族和解的关键。

关键词:《我的祖国,我的头颅》;安缇耶·科洛戈;种族和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18-06

Country of My Skull 是南非荷兰裔诗人、记者安缇耶·科洛戈(Antjie Krog,1952—)的一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英语小说,2018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我的祖国,我的头颅》(下称《祖国》)。小说中,科洛戈以新闻记者安缇耶· 塞缪尔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记录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下称“真相委员会”)调查种族主义的野蛮罪行,对部分罪犯实行大赦,致力于实现种族和解的故事。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科洛戈也在作品中展现着她渐进成熟地对南非历史政治以及和解道路的思考,展露出南非白人可贵的反思精神,并最终得出了“承认多元化,增进彼此的理解”的种族和解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祖国》并未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采用了多元文本书写的形式,将有关真相委员会工作的文献报道、人物的原声实录、他人的相关作品等文本形式捏合杂糅,构成了一部多元化的“声音的集合”[1]42。作品所呈现出的多元声部的杂糅结构对复杂历史场域的呈现,对置叙述角度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以及在“他者”身份颠覆背景下对实现种族和解道路的思考,体现出小说手法的独特及思想的深邃。

一、“杂糅”的本质——在多元声部中彰显历史场域的复杂

1995年,南非议会颁布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提议由11至17名独立人士组成真相委员会。在此后数年间,该机构对种族隔离时期的暴力、虐待、绑架、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通过举办受害者和施害者听证会的方式将历史真相公之于众,对部分施害者实行大赦,尽可能达成种族和解。作为一线记者,科洛戈曾全程跟踪报道这一改变南非历史的事件,《祖国》应运而生。

作品采用了一种杂糅式的叙事文体,即故事体叙事、叙述者的自述自评、现场人物言语实录、新闻报道文献、他人相关作品引用等众多文本形式的捏合杂糅。这种文本的多元化书写模式,使作品在文本形式的多频切换中展现来自不同群体对过往的认知,体现了历史场域的复杂。如在展现种族隔离时期的国家机器罪行时,叙述者常常退居幕后,取而代

收稿日期:2020-02-15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

作者简介:郑梦怀(1996—),男,河南南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之的是官方的审讯记录和实时的新闻报道。当时，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 ANC，“非国大”）为代表的黑人抵抗组织与国民党白人当局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游击战争。威廉·哈灵顿（William Harrington）作为当局的一名警察参与了对多达一千余人的袭击与谋杀，其短短两年零八个月的从警生涯充斥着屠戮。哈灵顿的复杂多面，通过其本人出席大赦听证会时的语言记录鲜活地展现了出来：

当我今天离开这讲台以后，我将一辈子都是一个被贴上标签的人。因为我已经违背了警察的宗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将永远背负叛徒的骂名，因为我说出了所有同事的姓名。战争年代，你们之间唯一拥有的就是信任，你们会把性命交付给彼此。但我背叛了他们——所有人……但我请求各位原谅我。[2]141

面对令众多罪犯胆颤心惊的庭审，哈灵顿却能从容应对，他“坚守”自己的立场，还对不得不“委屈降尊”争取大赦感到无奈。叙述者仅在案件结尾告知读者哈灵顿未能获得大赦，拒绝了更多评判，因为施暴者罪行的展现不应当通过他者的“主观”，而是由当事人“发声”来暴露“真相”，这样恰恰能够呈现历史场域的复杂。

作为“多元发声”的一部分，以新闻报道文本来结构故事，可以视作新闻工作者科洛戈的写作本能。小说中，本钦（Benzi）一案的审理就是灵活运用新闻片段的代表。托尼·严格尼（Tony Yengeni）要求本钦现场展示他所惯用的审讯方式——水袋法，本钦随后当庭指出：法庭上衣冠楚楚的严格尼曾经向自己出卖过他的挚友，导致其被酷刑折磨。作者选取了《开普敦时报》一则有关此事件的短评代替评论：

“葡萄藤屏障之上”——桑迪尔·迪尼科

在我眼中，托尼·严格尼仍然是个英雄。很多“非国大”成员，虽然知道有关“非国大”的一些事将会从施暴者中以最讽刺低俗的方式暴露出来，但仍然支持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严格尼也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来自谷谷勒图镇的严格尼是当下仍给我带来希望的人。不仅是本钦，我们很多人都欠他一句道歉。[2]151

《开普敦时报》上的短评可谓舆论之“冰山一隅”，作者将新闻片段强行植入主线叙事造成原叙事断裂，作为对严格尼事件另一角度的评述，并采用与上下文不同的字体，使得从叙事“剥离”而出的“新闻文本”成为孤立存在的“文本符号”，突显出严格尼事件的矛盾复杂本质。类似的“符号化”文本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在针对前总统彼得·威廉·波塔（Pieter Willem Botha）的听证会结束后，波塔面对记者的采访，直言“我不想道歉……但我会为他们祈祷”。面对这位蛮横无理而又无意悔过的种族压迫者，作者将一段意蕴深长的话穿插于整个听证会的叙事中：

那本旅游手册上这样写着，鳄鱼的牙齿长出来很容易，一颗牙齿掉了，那个地方会立刻长出新牙，鳄鱼的一生可以换四十五次牙。[2]519

波塔素有“大鳄鱼”的称号，正是这位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一手将南非带入压迫与战乱的深渊，以至于南非黑人民众将他视为“白人种族统治的象征”。叙述者将偶然看到的关于鳄鱼的介绍与这位“大鳄鱼”建立关联，意寓着冷血者暂时被拔走獠牙，不代表在和平曙光下没有下一次血腥时代的阴霾，这警醒着世人时刻警惕种族主义死灰复燃。可以看出，以牺牲叙事连续性甚至某种程度的可读性为代价，换来的是文本符号化和本身表意的凸显与强化。

《祖国》叙事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多种文体杂糅带来的叙事断裂和主线碎片化，采取这样的方式不无原因。首先，《祖国》涵盖社会事件范围广泛、涉及人物群体众多。如果按照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否实现如此大量真实的史实记录和明确多元的思想表达，的确令人怀疑。出于让“更多普通人发声”的创作目的，采用这样的文体形式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其次，这种简单而又缺乏规整的方式看似牺牲了美学效果，但能够更加自如地调配来自不同群体、不同立场声音的比例，也就更加能够实现多元框架下的均衡。这既可以被看作是科洛戈的妥协之策，也不妨将其视为实现多元发声，再现复杂历史场域的必由之举。

《祖国》多元文本的形式与加纳作家约瑟夫·艾夫拉姆·凯斯利·海福德（Joseph Ephraim Casely Hayford，1866—1930）的代表作《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 Unbound，1911）颇为相似。这部被奉为“西非英语小说鼻祖”[3]144的作品，杂糅多元的文体和自由反传统的写作风格，也曾经引发了对其文学价值缺失的质疑，有研究者就认为这是一部“有着强烈说教色彩，并为民族主义探索服务的作品”[4]82。然而，这同样不妨碍一代民族解放先驱海福德通过多元化的写作，为实现殖民地国家自主和殖民地属民“他者”身份的解构而发声。《祖国》与之相比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使用了多元化书写的模式，揭露隔离阴云下的真相，探索真相背

后的政治弊病和人性死角，再现纷繁复杂、阴沉厚重的历史。两部相隔近百年的作品遥相呼应，记录非洲大地的血与泪，也无不在回忆与哀悼中展露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姿态。

二、受害者与施害者——“真相”主体的对置凸显

1978 年，时任智利总统皮诺切特（Pinochet，1915—2006）曾自行宣布他和他的武装部队“自五年前夺取政权以来所犯的罪行不应受到刑事或民事处罚”，这是当代“给予政府官方大赦”的首次实践，事实上这种“自己给予自己大赦”的方式毫无法理可言。“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显然从中受到了启发，他们宣称防止被起诉是他们向新政权移交权力的前提。”[5]78 1994 年全民大选之后，黑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财富仍旧由白人把控，“新政府不可能如一场革命后的新政权对财富、资源等进行完全的重新分配来解决问题”[6]373，旧政权亦没有能力像皮诺切特政府那样“自我大赦”。采取听证会模式，让受害者与施害者面对公堂陈述真相，实施对旧政权中部分群体大赦，乃新旧政权双方的妥协之策。

科洛戈将来自受害者的倾诉和施害者的供述分别称为“第一个叙述角度的声音”“第二个叙述角度的声音”，它们构成了对置的两种声音，也构成了历史真相的主体。其中，受害者对悲惨遭遇的叙述往往萦绕着血腥恐怖的氛围。作者常常接连引述来自多个受害者的证词，展现受害者亲人被屠杀、自己被虐待的骇人听闻的场景，一个泯灭人性、遍地狼烟的时代随之跃然纸上。如其中一个受害者讲道：“我们在停尸间前等着……门下涌出了一股股浓稠发黑的血液……把外面的下水道都堵住了……停尸间里臭得根本没办法待……尸体一堆堆地叠放着……我儿子身体里流出来的血已经变成了绿色。”[2]58 科洛戈对“真相”的准确把握不仅仅体现于文字承载的事件真实，也同样体现在文字背后的人物情感真实。除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描写，这里的省略号充分展现了叙述者痛苦哽咽的状态。作为真相书写的一部分，作者在记录事实真相的同时兼顾了叙述者内心的状态，灵活使用标点符号，将叙述者的情绪状态转化为形象化的符号表达，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在诸多受害者中，科洛戈明显给予了女性受害者更多的关切，这种在后殖民视阈下给予女性特殊关切的做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书写传统。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创造性地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融入女性主义视角，她独树一帜地追溯了殖民主义，创造性地批判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中蕴藏的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忽视甚至打压，开辟了后殖民批评中殖民地女性的专属视阈。[7]414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在《他们的眼中望着上帝》中，借用“骡子”来刻画黑人女性的命运，隐喻了“骡子妇女们”不得不遵从黑人男性的指挥，驮起白人扔下的包袱，在双重压力之下生活。[8]4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大河两岸》展现了宗教规约和父权宗法对女性的双重压迫……

《祖国》为女性受害者专门开设了陈述的章节，形成独弦鸣奏的效果。小说第七章题为“两个女人——倾听另一种语言叙事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女人”分别为黑人和白人，他们分别遭受来自白人政府当局和“非国大”的袭击。作者将两位女性置于同一章节，双方同样悲惨的遭遇使得肤色、政治、阵营等区隔黯然失色，这无疑是作者对双方暴力行径的全面解构，毫无偏袒，唯有坚守人性与正义的标杆。其次，科洛戈拔高女性陈述地位的方式还另有玄妙，在《祖国》英语原版 *Country of My Skull* 中，作者写道：

After six months or so, at last the second narrative breaks into relief from its background of silence—unfocused, splintered in intention and degrees of desperation. But it is there. And it is white. And male.[9]56

译本将此节译为：“大约六个月后，对方的叙述最终打破沉默，浮出水面——虽漫无边际、装模作样，又带着些许绝望，但至少出现了。叙述者基本是白人，男性。”[2]111 笔者认为，最后一句的翻译尚可商榷：此处的“white”和“male”并非实指“白人男性”，而是对“second narrative”（第二叙述角度）的形容，隐喻长久以来白人男性群体作为暴力主要发起者的事实。也就是说，第二种叙述视角讲述犯罪者的故事，它是“白色的”“男性的”[10]8，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第一种叙述视角就应当是受害者视角，是“黑色的”“女性的”。这与“两个女人——倾听另一种语言叙事的故事”及第十六章“真理是一位女性”的章节标题形成互文。作者将女性受害者的语言称作“另一种语言”，使之成为一个“万声筒”中独奏的音部，并将其奉为“真理”。由此可以看出，科洛戈不仅仅开辟女性专属的陈述空间，还通过对“白人”“黑人”“女性”“男性”“真理”等词语的符号化运用，拔高了女性受害者的话语地位，以此凸显女性受害者群体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受种族与性别双重迫害的事

实。

对于广大受害者而言,真相委员会给予他们的发声机会实则是其应有权力的复归,因为"他们从自我的角度对过去进行叙述显示出了真正的尊严和重要性,并且至少是一种情感宣泄与情感治疗的工具"[1]42。对于南非社会而言,受害者的发声揭露了历史真相,给予了种族隔离制度政治法理和人性道德上的完全否定。而作为与受害者的声音对置的存在,施害者的供述同样是历史的真实的记录,是对种族隔离的无情解构。

大量种族迫害事件发生在波塔当政期间。当时南非黑人抵抗运动以及南非北部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愈演愈烈,大大冲击了种族隔离制度。波塔政府随之提出了"总体战略",即动用包括警察、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将维护种族主义政权当作一场"全面战争",并成立具有特工性质的"秘密警察"部队,以绑架、虐待、拷问的方式镇压黑人反抗者。[6]309因此,众多施害行径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然而大赦却只能针对实施暴行的个人而非集体。作为平衡,《推动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最终规定:如果暴行出于"政治动机",并承认罪行的罪犯可以申请大赦。于是,在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中寻找"政治动机",假装"认罪"以争取大赦成为申请者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基于事实的忏悔。塞缪尔在未参加大赦听证会之前曾期待施害者的叙述:"最好是好的、有说服力的、正直不阿的、充满细节、悲伤和迷惘的。"[2]112毫无疑问,这样的期待终归有些理想化。

德克·库切(Dirk Coetzee)是秘密警察部队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头目,其属下乔·玛玛瑟拉(Joe Mamasela)等人为了谋取财产,残忍地杀害了一名钻石商人。在库切的谋划下,几位凶犯毁尸灭迹。库切在陈述自己团伙的"政治动机"时这样说道:"如果诸如玛玛瑟拉这样的人物公之于众,自己团伙的行为被人发觉,将会令警察队伍蒙羞。"而诺佛米拉(Nofomela)冠冕堂皇的"政治动机"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作为一名黑人警察,自己长期为白人从事压迫同胞的工作。然而行窃被白人发现时却被对方辱骂为"黑鬼",遂起杀心。

科洛戈期望全体白人展露出一种对过去负责的姿态,这或许意味着她认为白人应当背负一种"集体责任"。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五人组"号称"为了白人的生存"而杀人,塞缪尔的同事对此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从来没让任何人以我或者我们政党的名义做这些事。"塞缪尔随之暴怒,认为同事完全没有意识到全体白人都因那些刽子手的所作所为而蒙受罪恶,在他们实行暴行的时候,保持沉默便是纵容罪恶。类似超越白人狭隘立场的观念也体现于科洛戈在《祖国》之后的创作——《舌头的变化》(*A Change of Tongue*,2003)《黑色的渴望》(*Begging to Be Black*,2009)两部作品中,都是在后种族隔离的语境下,试图改变"南非白人自传体作品趋向于白人中心的书写传统的有益尝试"[11]725。这种非白人中心的创作精神类似于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文学中特有的白人"忏悔"小说,诸如马克·贝尔(Mark Behr)的《苹果的味道》(*The Smell Of Apples*)、特洛伊·布莱克罗斯(Troy Blacklaws)的《卡鲁男孩》(*Karoo Boy*),都"在追溯过往中探究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串通一气的根源"[1]42。然而希望全体白人承认"集体责任"显然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因为对于真相的理解难以超越个人的主观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作为记录真相的作品,《祖国》对史实的书写也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有学者认为,科洛戈有"化用他人的作品,使之成为《祖国》中一些虚构人物的话语的嫌疑"[12]187。然而最为关键的是,科洛戈以对置的视角直接记录施害者与受害者言语的形式,使得真相得以最大程度地还原,两大群体的"原声"记录为世界了解南非血腥的种族隔离史和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价值斐然的参考。受害者因此得到了来自读者的怜悯与同情,种族隔离制度和它的缔造者们也因此受到世人的审判,这同样是另外一种尊重真相的方式。

三、"他者"身份颠覆下的和解之路

在后殖民批评中,"他者"一词指的是西方社会心理中,东方以及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相对于"自己"的存在。在"他者"视阈下,作为边缘化的集体,受殖民体系压迫的第三世界人民成为话语体系的失声者。以南非黑人作家为例,1961 年南非虽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黑人作家持续受到来自白人官方的打压。20 世纪 60 年代只能看到少数白人作家的作品,听到为数不多的黑人作家的抗议的声音,被称作"沉默的十年"[13]306。南非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扎克斯· 穆达(Zakes Mda)在访谈中谈到,当时的黑人作家只能广泛创作诗歌、戏剧等形式简单、表意直接而强烈的文学体裁,以对抗白人当局对出版业的打压。[14]69而伴随着黑人反抗运动的愈演愈烈,种族隔离体系逐渐瓦解,南非白人普遍担心黑人复仇的恐惧心理以及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日益加剧。南非著名小说家 J. M. 库切(J. M. Coetzee,1940—)的代表作《耻》(*Disgrace*,1999)就通过白人教授卢里囿于旧梦的挣扎和露西被黑人侵害阴影之下的留守,

揭露了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白人群体所表现出的特殊的流散症候:他们或许会批判反思殖民历史,自身也体会到无根所依的漂泊感。他们虽同情黑人的遭遇,却始终无法站在黑人的角度和立场,只能与他人互为"他者"[15]151。

《祖国》中,塞缪尔个人故事的开端便从自家农场的牛被偷、兄弟带枪追逃开始。她的兄弟亨德里克(Hendrick)枪击小偷后,无奈地对她说道:"我曾以为新出台的制度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残忍虐待普通人的行为原本只发生在黑人居住区,但是现在我看这样的事情不是在减少,而是扩散至全国各地。"[2]26这体现着隔离体系瓦解后白人日趋险峻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他者"身份颠覆的背景下,科洛戈也在作品中展现着她渐进成熟的对南非历史政治以及和解道路的思考。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主教是真相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作为南非开普敦第一位黑人圣公会和南非圣公会省的大主教,他因坚决反对种族隔离而赢得世界性的赞誉,并于1984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祖国》中,他将南非视作一个仇恨满盈、危机重重的病态社会:

图图说:"只有人在博爱的社会中,你才能堂堂正正地做回人。但如果你心中满是仇恨,你不仅失去了人性,你所在的社会也失去了人性。"[2]218

基督教的博爱并不禁止惩罚,它禁止的是"出于仇恨或其他的复仇情感来惩罚"[6]227,因为"仇恨"导致个人以及社会的病态化,长此以往,宽恕无门,和解更是天方夜谭。可以看出,即便为了开掘宗教教义之于南非种族和解的世俗化功能,图图依然坚持遵循教义的传统,致力于化解仇恨、寻求和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南非社会的和解之路依然面临极为严峻的困难。

1913年,南非联邦白人议会颁布的《原住民土地法》,通过不合理的土地划分方式,确立了白人的地位及其在乡村的财产权,同时亦是替南非农场主解决"原住民劳动力急缺的问题",剥夺他们和白人农场主"共享收成"的权利。[17]5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也在《无人伴随我》中准确洞见了南非和解之路上最为棘手的绊脚石——土地归属问题,在她看来,"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萍,当这层浮萍被打扫干净后,南非真正的问题——土地的归属,就要浮出水面了"[18]7。科洛戈与其见地相同,她引述了一则有关和解的著名寓言:汤姆偷走了伯纳德的自行车,一年后他来找伯纳德寻求和解,伯纳德问:"那我的自行车呢?"汤姆却答曰:"我没有在说自行车,我在说和解。"这个故事正好可以作为南非种族和解困境的缩影。"非国大"政府自1994年掌权以来,由于资金短缺、财政赤字,每年只能新建1万套住房,远低于其最初许诺的30万套。这背后便是积重难返的贫富差距问题,和少数群体依旧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财产的严酷现实。因而,"对受害者的赔偿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19]11。或许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无奈,科洛戈也并未在作品中给予具体负责物质补偿的"补偿和康复委员会"过多关注。故事中,塞缪尔直言:补偿和康复委员会"可能成就也可能摧毁真相委员会……他们根本没有做出承认或补偿的任何姿态"。这也就否定了通过物质补偿一劳永逸地实现和解的可能。于是,作者将更多笔墨用在了探寻真相、寻求精神和解的工作当中。例如,作者写到当塞缪尔的女儿询问妈妈"玛玛瑟拉是谁"时,塞缪尔感到"无比的轻松":

宽恕他人,发泄情绪,达成和解,梦想制定强有力的补偿政策很重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和孩子知道维拉科普拉斯是什么?玛玛瑟拉是谁?这里曾发生了什么事情?[2]259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科洛戈对种族和解的思考再次回归到对"真相"的探寻,和解不应仅仅是物质的、现实的,更应是精神的、历史的。"科洛戈明白委员会可能会揭示真相,但绝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解"[20]79。事实上,对于真相委员会的质疑向来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它没有选择司法途径,也没有审判罪犯,其职责太局限于审查个人,而不是谴责整个体系,鼓励了继任政府对法律的逃避[21]269;也有学者从真正的法学角度出发,认为其诸多决议都存在法理上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南非种族隔离终止后受害人对于历史真相的渴求,无助于消融现实中不同种族所面临的"实质隔离"[22]160。那么真相委员会的真正意义何在?科洛戈借助塞缪尔之口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寻求"共同的人性":"委员会顶着过去残酷暴行的重压,依然保持着共同的人性。委员会煞费苦心地打破了种族的歧视,另辟蹊径,让我们听到了所有人的心声。虽然委员会曾频频受挫,但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火苗,让我为它感到自豪。"[2]535

"心声"既是受害者的倾诉,也是施害者的忏悔。受害者很明白自己和亲人究竟遭何不幸,但是在"共同的人性"这样一个理念下,行凶者无论做出真正的忏悔还是流下虚假的眼泪,其实都在为达成"宽恕"创造可能。科洛戈也在另一则故事中流露

出她对和解道路的进一步思考:牧羊人莱克特斯的家遭到了警察袭击,与其他受害者相比,他和他的家人全程表现出惊人的笃定,甚至在警察感到疲惫的时候,为其准备茶水。这微小的举动,在塞缪尔看来,体现出主动探寻他人内心的渴望,寓意了宽容的可能。她认为,"莱克特斯迫切想要认识、接近、了解入侵者的世界和想法,这与多元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塞缪尔从莱克特斯的行为中,看到了他"认识他者"的渴望和"多元化"的可能。这两者相互呼应,为每一个种族及其个体提供存在的空间和理论的合法性,这与种族隔离时期对多元存在的蔑视,对弱小集体和个体的否认与打压完全相反,不失为"宽容和解"背后所蕴藏的深厚的人性伦理。从莱克特斯的故事中,塞缪尔感到"有时我们的时代充满光明",因为"作为牧羊人,他是羊群和家庭的领导者和守护者;但同时,他也是领路人,带领家人走向富足和安康"[2]425。这里的"家人"充满着浓浓的隐喻色彩:莱克斯特和他的家庭成为了南非社会未来的模型。可以看出,作者对南非社会的过往、未来以及和解道路的思考,最终指向了微观人性的养成,发掘出"认识他者""实现多元"与"实现宽恕"的因果关联。崇尚多元、认识他者、消除壁垒、力争互信,这便是科洛戈通过《祖国》传达的和解之路。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中,阐述了"脱域"、"去边界化"以及"混杂化"这三大全球化特征。[23]156这一理念实则肯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互相认同"对于实现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种族和解、族群融会的意义,也预示了南非最终实现"种族混杂化"的必然性。《祖国》传达出的"将和解寄望于时间与人性觉醒"的思想与其不谋而合,这既有面对复杂的历史文化困境和严峻的现状挑战时的无奈与妥协,也是作者在洞察了个体人性与集体理性之后对南非社会现实与未来的准确把握。

如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终结 25 年有余,种族矛盾虽日益淡化,但长久以来被种族问题掩盖的阶级矛盾却日益凸显。于是,南非作家也将目光凝聚在了结束隔离后南非社会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上:在伊凡·维拉迪斯拉维克(Ivan Vladislavi,1957—)的《不安的超市》(*The Restless Supermarket*,2001)中,主人公提尔勒目光所及的南非社会均是"待于纠正的错误";戈迪默的《偶遇者》(The Pick-up,2001),暴露出种族隔离后南非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问题"[24]18;戴蒙·加格特(Damon Galgut,1965—)的《冒名者》(*The Imposter*,2008),揭露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乱象,表达了积极有为的建设观念……《祖国》所传达的夙愿或许业已实现,然而这也仅是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发展的开端,这时刻警醒着人类社会努力加固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反省过去、面向未来的姿态掌舵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巨轮。

参考文献:

[1]康维尔·克劳普.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1945—)[M].蔡圣勤,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2]安缇耶·科洛戈.我的祖国,我的头颅[M].骆传伟,吕艾琳,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

[3]Dathorn O R. The Black Mind:A Hist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Minneapolis[J].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4.

[4]Hazel W W. GHANA 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 by J. E. Casely Hayford [J]. Negro History Bulletin,1970,33(3).

[5]Neier Aryeh. Uncovering the Truth [J].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1999,21(4).

[6]郑家馨.南非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8]孙薇,程锡麟.解读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传统[J].当代外国文学,2004(2).

[9]Krog A. Country of My Skull [M]. Johannesburg: Random House. 2002.

[10]Claire Scott. Voice/Body/Skin: (Dis)locating Belonging in Antjie Krog's Country of My Skull,A Change of Tongue, and Begging to Be Black [J]. Scrutiny2,2018,23(1).

[11]Rodrigues Elizabeth. Antjie Krog and the Autobiography of Postcolonial Becoming[J]. 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 (Biography),2014,37(3).

[12]Highman K. Forging a New South Africa: Plagiarism,Ventriloquism and the'Black Voice' in Antjie Krog's Country of My Skull(Article)[J].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2015,41(1).

[13]李永彩.南非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4]Williams Elly. An Interview with Zakes Mda [J]. Missouri Review,The Missouri Review,2005,28(2).

[15]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7).

[16]唐莹玲.试论基督教的博爱与刑事惩罚的关系[J].宗教学研究,2014(1).

[17]所罗门·特普克肖·普拉阿杰.南非原住民生活状况,欧洲大战与布尔人反叛前后[M].聂咏华,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下转第 37 页)

论《四象》的亡灵叙事与情感经纬

丁子钧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以非虚构写作成名的作家梁鸿,其长篇小说新作《四象》,以亡灵的视角展开叙事,进一步脱离了自我"非虚构"的身份。亡灵叙事的时空切换,也为小说叙事争取到了最大的自由度。个体的"离去"与"重返",个体的精神脉络如何藏匿在村庄的筋骨里,是这部小说钩沉的主要内容。在辨析来路的思维指向中,又隐含着女性特有的情感投射。

关键词:梁鸿;《四象》;亡灵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24-04

梁鸿以非虚构作品"梁庄系列"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而作为小说家的梁鸿一直在等待着人们的认识和发现。继《神圣家族》和《梁光正的光》之后,长篇小说《四象》作为梁鸿最新的一部虚构体裁的作品,由富于先锋精神的《花城》杂志率先推出,见证了梁鸿在虚构之路上的最新拓展。相比较而言,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是梁鸿对于吴镇精神世界的整体描绘,具有精神还乡的意味;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则倾尽笔墨塑造了一个丰满立体、复杂多维的"父亲形象"——梁光正。《四象》显然要复杂开阔得多。作者以略显魔幻的叙事方式,讲述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韩孝先,返回家乡河边的墓地放羊,在这里他遇见三个人:韩立挺、韩立阁和灵子,他们其实是墓地里的亡灵。他和这三个人交流,听他们说话,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韩孝先重返城市,被尊为大师。最后,他的精神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再也听不到那三个人说话了。小说以韩孝先个人的生活经历、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为核心,同时回溯了从义和团开始到当下,梁庄百年来的历史恩怨,场景众多,细节繁杂。《花城》杂志在推介这部作品时,这样描述:"小说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魔幻、历史与现实,富有隐喻地深入生活的肌理。"[1]

采用亡灵的视角展开叙事,必然带来叙事时间和空间的错乱与倒置,虚幻与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与此相适应,《四象》在文本结构层面也有其独特的追求。在表层结构上,采用四个性格、形象、思想各不相同的叙事人,从四个不同的维度交替叙事,以亡灵、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光观照现实生活。同时,以春夏秋冬四时作为各个章节的题目,按照四时发展,形成一个从河坡出发又重返河坡的圆形结构。在深层结构上,四个叙事人相互独立,相互补充,互相对话,形成文本内部的"对话性",纵横之间,前所未有地扩展了文本的空间。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连,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作者的内心情感,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以及在这黑暗之中寻找温暖的美好希冀,在总体上做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统一。因此,《四象》不但没有流入技术试验,反而蕴含着沉重的真实感,营造了特别的文本张力。

一、《四象》中的情感指向与亡灵叙事

小说开头,作者引用了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里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以此作为题记,文章内容与题记形成互文关

收稿日期:2020-01-20
作者简介:丁子钧(1997—),女,河南方城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批评。

系，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我们最后终将在黑夜里相逢。但死去并不意味着和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从生到死不过是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死去的人一直以某种形式活着，参与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直到青草掩盖坟冢，掩盖掉死者的名字，依旧不算是完全被遗忘。死去之人总是存在于活着的人之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为死去之人写作是梁鸿最初的情感冲动。因此，梁鸿借助亡灵展开叙事并非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情感使然，以此为基础，作者创造出韩立阁、韩立挺、韩灵子这三个人物。

亡灵叙事古已有之，常见于传奇、志怪、白话小说之中，主要表现方式是托梦和显形。古典时代的亡灵叙事作为一种假托的形式，其终极指向为道德叙事，作者借鬼魂言人间事，曲折委婉地表达对待人间善恶的态度。这其中，《聊斋志异》非常典型，且影响深远。而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亡灵叙事则转向个人化叙事的路径，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加以确立。因此，读者在小说中会发现亡灵可以自我言说，亡灵自身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叙事合法性。评论家雷达这样界定亡灵叙事："所谓亡灵叙事，简言之，就是一种以亡者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行文方式。"[2] 即亡灵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其所处的世界，自由穿梭于阴阳两界。20 世纪 80 年代，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以亡婴小八子的视角，叙述一家九口人的底层生活状态，将底层人生存的悲惨境况和人性之恶暴露出来；余华的《第七天》，选取了一个刚刚去世的死者"杨飞"作为叙述人，通过对他死后七天的见闻的书写，无限贴近现实生活，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看法；阎连科的《丁庄梦》，的叙事者是一个被爷爷埋在屋后墙下的少年，他以自己的眼光为出发点，讲述了在丁庄大地上发生的诸多荒谬之事。此外，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陈应松的《还魂记》等，都是亡灵叙事的代表性文本。

在此文学谱系下，《四象》借助三个亡灵形象展开叙事，这三个亡灵各有心事，从历史、现实、灵魂等维度上承担着叙事任务。韩立阁作为一个改革者，他受过新式的教育，在云南实行政治改革，但最终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母亲也因他而死于非命。他对于人间、对于现在还活在地上的人们，抱有恨意；他一直在观察河岸对面的一头"狮子"，等待它吞噬村庄之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韩孝先成为上仙的过程中，韩立阁一直在鼓动韩孝先复仇。可以说，在韩立阁这个叙事人身上，折射的是历史的记忆和创伤，以他之口，作者讲述了梁庄几代人的恩怨纠葛。韩立挺是基督教的长老，他善良宽厚，终其一生守护自己的信仰，在乡村中扮演着精神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一直想解决的是灵魂如何安放的问题。灵子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孩，是一个孤独者，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父母的下落，她热爱植物，热爱原始和本真的一切，渴望获得拥抱。小说透过这三个亡灵来观察人世间，韩立阁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黑暗与荒诞，韩立挺看到的是现代人灵魂的漂泊无依，灵子看到的则是城市生活的丑陋与无根状态。

按照巴赫金的戏仿体文学理论，以骗子、傻瓜、小丑的视角来叙事就属于异常叙述，而文中的叙述者——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三个亡灵，虽不属于这三种情况，但也同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可以归属为异常叙述的范畴。然而，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对这三个亡灵生命的尊重，赋予他们叙事的合法性。作者把这三个亡灵都当作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来写，尊重他们的性格，让他们独立说话，而不必受作者价值观的束缚。梁鸿曾在伦敦光华书店的演讲中谈及《四象》："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魔幻性质，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作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在我心里面，我一直把这墓地的三个人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来写的，他们在那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那里，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3] 这几个人物携带着作者的体温，与作者处在平等的地位。

同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亡灵生前在人世间的所见所闻，死后对人世间的看法，在现实世界与亡灵世界之间自然地架起一座桥梁。叙事人也因其身份的特殊，可以自由出入两界之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叙事自由度。亡灵叙事不必顾虑生活本身的真实和逻辑，从而让荒诞的现实更具有叙事的合理性。三个亡灵交替叙述，多重叙事声音同频共振，三个维度相互补充，形成了小说的"复调"特征，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和叙事力度，创造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真实。这也许是作者希望摆脱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再现，借此方式深入生活的本质。"唯有亡灵，才能真正洞穿理性肇事与逃逸的现场，并在同理性世界的对抗与分裂中，以荒诞之境将现实反射成虚无的空城。"[4] 亡灵叙事手法的使用，最大程度上将作者的心事展现出来，包括对社会荒诞的挖掘和批判，以及对人性之恶的体认和救赎。

二、《四象》中的情感经纬

在几个亡灵的交替叙事当中，现实世界的样貌

在我们面前呈现开来。《四象》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变形而又密切的关系，透过小说中的世界，可以见出梁鸿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我欢喜这人世间，我害怕这人世间。”[1]64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现代生活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人类的情感和社会进步间的错位，皆使得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时刻处于悬浮的状态和人际关系的拉扯之中。在受到迫害的精神分裂病人韩孝先眼中，现实世界无疑是丑陋和黑暗的。“新世界已经诞生了，城越来越大，水泥越铺越远，金属越来越亮，人越来越空虚。”[1]48人性是很复杂的，在某些选择面前表现出的善与恶，都不能被简单地定义。因此在《四象》中，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情感体验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某一种情感，更多的时候是爱恨交杂，既爱又恨，不同情感形态之间相互对立和中和，反而造就了情感的深度。

首先，作者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和微妙。作为文本中最重要的人物韩孝先，在刚刚通灵之时，只是利用自己的能力给别人提供一些建议，宽慰丧失丈夫的寡妇。而在到了县城、省城，经历过一系列变化之后，他好像也换了一副嘴脸，会偷偷地把别人送来的钱藏起来，说一些套话、空话、假话。在个人心理的变化上，他开始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大仙，可以操控别人的命运，并试图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作者将人性的多维立体及人性的嬗变，循序渐进地展示出来。此外，韩孝先被奉为上仙，背后则是从县长到普通人对于人生运算和预测的迷信——花婶将韩孝先拉回自己家中是出于金钱的考虑；县长尊敬他，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前程；信众们找他了解通灵之法，是为了寻找祖先藏在地下的财宝。但是，似乎这样的展示还不足够，作者又借立阁之口说出：“只要你是跪着的人，没人关心你是谁。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看血溅五丈，人头落地，他们害怕又狂喜。”[1]28在这里，作家以冷静的笔触将人性之灰暗暴露无遗。

其次，揭示现实世界的分裂和破碎。采用亡灵叙事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叙事情感往往是冷漠和压抑的。《四象》也是如此，青年评论家徐洪军在评价《四象》时说，梁鸿善于写那种让人不忍直视的腐败而又残忍的景象。她描绘人死后的情景是：“刑场上枪毙的那些人一个个倒在地上，那地上有猪粪、狗粪，有雨后发黑发臭的污泥，鸡在旁边刨食，啄出一个个眼珠，耐心地把它们吞下去。”[1]7而在“乌鸦”这一节中，韩孝先通过一种代言的方式替作者道出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之处，及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人的精神的异化，“资金链断了的老板吃安眠药自杀。反腐官员抑郁症跳楼自杀。苹果积压一屋的农民站在苹果堆里上吊。不得志的导演把自己吊在楼梯过道里。手枪轰头的歌手，皮带缠绕的歌手，吸毒过量的歌手。丝袜可以死人，毒药可以死人，刀片可以死人，塑料可以死人，浅河的淤泥可以死人……”[1]49这段话从作者胸中一泄而出，这世界本就是疯狂的，不管是不是精神病人，所有人都处在精神的撕裂状态之中。丁庄人将韩孝先供奉起来，围上栅栏，信众们在韩孝先面前磕头，甩进来百元大钞或金链子，一个人被当作物一样被大家观看，普通民众的愚昧和村干部的奸诈集合在一起就是——“弘扬传统文化有限公司”的蝇营狗苟。更为反讽的是，就连县长也将韩孝先算命的行为神圣化，称他是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文化顾问。第一任县长出事之后，第二任县长上任三天就来拜访他。作者将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这些情景、经验，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其中的计谋和荒谬。

不过，作者还有另外的情感维度和指向，她想寻找这黑暗和撕裂背后的希望。许多作家易于沉陷在一己的悲欢里面，缺乏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类之间整体性的关注，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多是主观、单薄，缺乏深广度。《四象》的故事内容纷繁杂乱，但是作者还是不忍心让这混乱继续下去，她要在这荒诞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人们存在的意义，她让所有的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让混乱归为有序。韩孝先发现，他的存在只能让人更加贪婪——贪婪于金钱，贪婪于相爱，最后，甚至要超越生死，超越世间最后的界限。“人间和阴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人和人，世界之初是什么样子，就还应该是什么样子。”[1]73“我守着这围墙。守着这世间最后的界限。”[1]77混乱过去之后，一切应该也必须重新回到轨道。在写作过程中，梁鸿常常秉持着对于这个世界的爱，纵使在众多的不美好、黑暗、丑陋面前，她也总是以深沉又敏感的心去体会和包容，痛别人之所痛。所以在故事结尾处，韩孝先将通灵的本领又还给了地下的人，地下与地上都各安其事，归于平静。“大地寂静。只有年轻的死者，在永久宁静的、断绝尘缘的最初状态中，爱慕地追随着她。”[1]78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混沌的最初状态。

对于死亡和苦难的记忆，对于痛苦体验的珍视，构成了梁鸿独特的创作心理。在这样的创作心理的驱使下，痛苦和死亡，已经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她的文学创作当中。“梁庄系列”不经意间讲述了诸多死亡案例，在《四象》中，又干脆打破阴阳的界限，采

用亡灵叙事。但同时,她也能在这种痛苦中寻找光亮,寻找希望。在《梁光正的光》结尾处,故事也是在墓地戛然而止,在葬礼上,一众儿女听闻"低语和哭泣",感知着田野、春水、阳光……这番"阴极阳复"的气象,他们重又看见父亲和过去的一切。而在《四象》的结尾,韩孝先回到了河坡上的坟地,在最偏僻最隐蔽的地方,看到麦苗肥壮、乌鸦飞翔、羊群慢慢地啃食着坟头上的青草,听到清清亮亮的一声笑声,"我努力捕捉它,我把雪扒开,把耳朵贴在大地上,我要找到那声音的来处,我要找到她是谁"[3]78。因为死亡的降临,一切又重归寂静,但是又会有一甲子一甲子的轮回,故事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纵使黑暗,但终归还是有希望,似是结束,又含新生。

三、结语

综观《四象》这部小说,母亲死亡之后,父亲年复一年带她上坟所带来的"形式感",以及现在面对父亲的墓地时的感情,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经历,那坐在河坡凝望远方的入定的形象,那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却又迫切激烈的声音,是梁鸿写作的最初情感冲动,是她写作的原动力。她想让父亲的那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传递下去。所以,她采用亡灵叙事的方式,让地下的人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活过来,参与到活生生的人间中去。亡灵叙事和对于现实世界及人性的深沉思考,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而作为独特的个体,应该如何在当下社会更好地生存,则是每个人都要直面和思考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梁鸿. 四象[J]. 花城,2019(5).

[2]雷达. 亡灵叙事与深度文化反思[N]. 文学报,2012 - 09 - 27.

[3]梁鸿. 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在伦敦光华书店的演讲[EB/OL]. (2019 - 03 - 15)[2019 - 03 - 14]. new. qq. com/omn/20190315/腾讯网

[4]李艳丰. 从《活着》到《第七天》:叙事转型与余华主体精神的成长[J]. 文艺争鸣,2015(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Dead to the Narrative and Emotion Dimension in *Four Images*

DING Zi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Liang Hong, a writer famous for her non - fictional writing, and her new novel *Four Images*, started the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ad, separated herself from her "non - fiction" identity. The time and space switch of the death to the narrative also obtains the greatest freedom for the novel. The "leaving" and "returning" of the individual, how the individual spiritual context is hidden in the bones of the village,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novel. In the direction of thinking to discern the future, there is also a female - specific emotional projection.

Key words: Liang Hong; *Four Images*; the dead to the narrative

中原高速收费管理模式转型探索与思考

杨 雪[1],张姝慧[1],岳道贵[2],王 菲[3]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2.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3.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梳理了高速公路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员工的服务水平与管理模式有待提高、车流量与车道的实时监控存在不足、计重设备故障所造成的安全隐患等问题,从运维管理的通行费、机电设备运维、信息安全三个方面以及人事管理的人才规划、绩效考核、教育培训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原高速推进互联网金融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模式;转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5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28-05

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的发展与交通智能化的进步,很多传统行业的经营模式也随之被颠覆,互联网思维被应用于各个行业,这使得它们的经营方式也有了创新与变革。互联网的"门槛低、效率高、覆盖广"等特点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服务方式,并且对现今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的不断涌现极大地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模式的融合,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实现资金流动与信息传递的新型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在各行各业的普及与应用也是对现有金融体制和运营管理模式的一大突破。我国的高速公路实行先投资,后期再对投资款进行收回的建设投资方式,鉴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且地理环境复杂的情况,我国的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实行的是封闭式收费制度。封闭式收费也就是在主干线的起始站和终点站两段各建立收费站,且在所有交互式立交的匝道出入口建立收费站。这种方式对于通行车辆统计和收费管理十分便捷。高速公路互联网收费是以多条高速公路为主体,以计算机互联网络为基础实施管理,通过通信、监控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对高速公路网络进行统一标准的收费管理模式。这种收费模式是提高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便捷车辆通行,加快资金收费流通渠道的重要管理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速公路管理的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

一、中原高速收费管理现状

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5年"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开始确立至今,作为一个新兴产物,其影响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形式,诸如互联网征信、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众筹等,其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的支付等,其中移动支付作为一种主要的创新支付手段已经成为大众完成线上支付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其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们开始利用手机、iPad等终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APP进行网络支付、投资、缴费、理财、贷款、购物、购票、打车、订餐、预约和团购等活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不断地给市场注入新活力和催生新合作的同时,还冲击着传统的金融模式。这使得传统企业的运营模式面临艰巨的挑战,给各行各业的传统经营模式带来了新的冲击。高速公路企业的传统运营

收稿日期:2020-05-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086);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2016-2-14)
作者简介:杨雪(1966—),女,河南光山人,河南省特聘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相关研究。

模式也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冲击，如建设转型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永续经营问题。长期以来，中原高速等交通基础设施行业的崛起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健增长，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交融，汽车保有量也将继续呈现高增长趋势，对高速公路的巨大需求仍将保持。

人们对出行需求的不断增加，加之国内外对河南自贸区货运的大量需求、车流量的暴增都使得中原高速收费站的收费通行能力，成了高速运营的新瓶颈。现阶段河南省中原高速公路经营收费的模式，以 ETC、MTC、支付宝、银联闪付等支付方式，与无线通信连接通行车辆车载标签和收费站信号收发系统相结合，使得车辆以一定速度通过并且是通过全自动收费模式与人工半自动收费方式相结合来完成不停车支付。以“互联网 +”为主导的新型支付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收费模式，这种新型支付方式是高速公路收费方式上一大实践性的创新变革[1]。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更加便民普惠的创新性金融模式[2]。中原高速能否利用好互联网思维引入创新商业模式从而实现转型升级，保证在现有服务水平下提高收费通行效率使整个收费过程更加快速化、人性化、便捷化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目前，在移动互联应用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日常生活中移动支付逐渐普及，用户的新兴支付习惯也逐步养成，“互联网 +”的金融创新模式在中原高速公路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不停车收费技术方式将慢慢渗透到我国各地区收费站的收费系统。在很长一段支付方式的过渡时期中，可以将自动收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接洽环节。在庞大的第三方支付系统群体中，将第三方支付系统完善进高速公路收费体系，是对我国高速收费站重新建立收费体系，被广大用户快速接受且实现运营效率提高的快捷方式[3]。同时，由现金支付方式转变为电子现金支付，极大地便捷了后期资金的整理和统计，填补了现金支付存在的各种风险，对后期数据的汇总和收费管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4]。

现在是互联网改变运营模式的时代，许多传统行业例如饭店也选择使用第三方支付的收费系统以方便顾客的结算，人们出行也越来越喜欢选择一个手机走天下的模式，使用第三方开发的手机软件进行支付也越来越方便。积极推动“互联网 +”的高速公路收费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并存且满足公众出行的各种需求也成了必要，使得公众支付通行费更加方便快捷。支付方式分别有：银联卡刷卡、闪付、云闪付、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300 元以下小额免密免签”，等等。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越来越方便，而且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软件的转账过程中不需要考虑手续费、排队等候时间、面对面交易等情况，因此成为公众出行的首选。中原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也需要综合考虑这种情况，对高速收费口的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满足公众出门使用“互联网 +”的付费方式需求。支付方式的改变对中原高速管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中原高速收费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出门会选择自驾的方式。与普通公路相比较而言，高速公路由于没有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没有各种特别复杂的情况出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出门自驾会选择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而是有偿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通行费。通行费的收费金额会根据距离的远近有所不同，具体收费金额有多有少，这就为收费站的现金管理工作增加了困难。在我国 ETC 不停车收费已经普及到各县区并且在发达城市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整体而言，在一些三、四线城市 ETC 利用率并不高，主要是因为用户不愿意选择大面值充值。这样还是有大量的司机选择现金支付的支付方式。大量通行费现金整理为收费站财务管理增加了困难，河南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员工服务管理起步较晚，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1. 员工的服务水平与管理模式有待提高[5]。相较于北京、浙江等地区的收费站员工的“微笑服务”来说，虽然中原高速组织了相关的岗前培训工作，但是收费站员工在服务的标准上有待加强与提高。这反映出了中原高速缺乏必要的监管办法，中原高速应严格要求员工的日常收费服务，提高收费站的服务水平。对于员工的服务态度问题，源于中原高速在管理条例的执行中缺乏监管。对于车辆排长队缴费的问题主要是源于收费站的应急措施不够完善，应急效率不够高。对于潜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收费站应该配备专职人员来处理。只有完善了收费站的服务水平与通行效率，才能更好地积累民众的口碑。

2. 车流量与车道的实时监控存在不足[6]。以周五傍晚高速公路高峰期为例，许多车辆在匝道内排队等候收费，同时所开放的出车道并不能够满足车流量的需求，造成了车辆堵塞，尤其是当出车道还存在着未开放状态，更加反映了收费站应对较大车流量来临时的反应效率与配套的车流量实时监控系

统不足。现金支付的方式需要通行车辆进行排队，收费员点钞、查钞和找零等浪费大量的时间，造成车辆拥堵的情况。在车流量过大时，现金收费硬件设施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收费站服务效率难以提升。“互联网+”的收费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收费站口有ETC专用车道，针对不同的车辆类型有不同的车道，舒缓了车流量。“互联网+”的收费方式中收费员只需要确认收费金额并电子确认即可，由于收费站口有自动识别车辆技术也减少了收费员输入车辆信息的时间。各种程序的减少就使得收费口通行效率提高，避免了拥堵的情况。

3. 计重设备故障所造成的安全隐患[7]。大货车在收费前需要在地秤上核对具体重量来分类付费，当计重设备出现问题与突发故障时难免会让大货车临时倒车，与此同时后面的跟车就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问题，通常在车流量过多时收费站会有专员在场外指导车辆交通，但是在夜间和低峰期就需要司机自行倒车并变道，这就增加了安全隐患。以郑新黄河大桥为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的耕地，经常会有违规的农用拖拉机驶入，同时该收费站计重设备相对落后，造成了倒车情况时有发生，为此该收费站配备了安全专员来引导车辆的通行。

三、对策建议

（一）运维管理方面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经营与建设模式可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自营模式，由交通管理部门直接负责建设、经营和管理路段（交通管理部门自行组建有独立法人性质的组织，按照企业化运作，性质属于交管下属事业单位）；第二种是拍卖模式，交管部门自筹资金或借助贷款进行路段建设，建成后将公路收费权益依法转让；第三种是合作经营模式，完全由其他经济组织出资，交管部门负责新路段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其中通行费的征收是交管部门还贷、其他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

1. 通行费管理

现阶段通行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收费期限不合理；二是偷逃通行费现象严重；三是费率执行标准缺乏灵活性。河南省内高速公路的收费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经营性收费，收费的目的是为了在收回前期修路投入的成本后获得利润；另一种属于事业性收费，收费的目的是为了收回前期修路的成本以及道路的维护和运营成本而不是为了获得营利。所有路段在达到规定的收费期限后，必须办理移交手续使其免费通行。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收费年限长、单次费用低廉的收费模式。发达国家是根据其非营利性的目的来确定收费年限的。在车流量拥堵的路段，根据时间点实行潮汐收费模式，通过费率版本的浮动来调节车流量，缓解交通压力；在车流量稳定的路段，收费的目的是收回建设成本，收费年限可以很短；在车流量小的偏远路段，收费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的基本维护和运营，采取较低费率甚至是微利、长年限的收费策略。

建议通过调整费率来进行差异化收费，这样可以在兼顾高速公路公共交通的属性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增加路段的收益。以上海市为例，上海是国际航运中心，也是货运中心，货运车辆给上海外环线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交通压力，上海郊外高速公路却少有货运车辆通行。上海市为了缓解这种交通压力在2006年提出了“弹性收费”的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目的就是鼓励司机“少交费，多跑路”，以此来缓解高速公路的外环线拥堵。

2. 机电设备运维管理

管理不规范，维护机制和管理制度跟不上现阶段设备更新。从改变现阶段被动维护机制开始，执行计划预防维护制度。制定统一的维护标准，一切维护工作要求达到各系统和设备的理想工况和最佳运行状态。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的建设发展是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老旧设备和系统已不能适应新时期高速公路的运营需求，这些设备和系统正在逐渐被新设备新技术替换。维护技术人员业务水平提升较慢，不能适应新设备的维护要求。而作为高速公路机电运维的技术人员，仅仅依靠设备厂商的技术培训是无法满足当前高速公路运维工作要求的，应该更新运维管理观念，引入全面生产维修制（TPM）；引入智能运维平台，提高维护效率。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营管理对机电设备的完好率要求较高，一般情况下都是24×365全天候的运转工况。这使得机电设备的维护工作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由于高速公路各路段工作环境差、设备分散，使得常态化维护工作进展缓慢、耗费大量工时。另外，以现有的维护模式，设备故障的判断基本上依赖人工方式。人工的误判率很高，造成的后果就是延长了维修周期，维护效率大打折扣。虽然设备的接口通信协议不统一，但这些设备都在一个通讯环路上联结，通过网络化管理的方法把这些设备呈现在一个平台上，并实时访问实时监测环路上设备的运行状态，对故障进行预警与精确判断就成为可能。引入一套成熟的机电设备运维智能化网络管理平台，可使得维护工作的效率与经

济性大大提高。

3. 信息安全的应对策略

信息安全需要保障的有数据中心、数据分中心、数据机房、服务器、矩阵和计算机、工控机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以及设施，整体来说就是保障运行环境的安全、信息的安全、各种设备系统的正常运转。而引起信息泄露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不能充分了解网络结构和应用变化，缺少有效控制网络共享的途径和方法，同意通过互联网远程访问的方式来访问单位内部网。例如，管理方面，相关操作人员缺少必要的安全培训，缺乏网络安全意识，公司缺少明确、规范的安全操作流程等；系统平台方面，系统与应用补丁缺少维护和测试。对于这些问题，应对的策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内外共同防御。在公司统一的治理框架下，做好计算机的外部防范和内部控制工作。第二，同步建设并运行省级中心和路段分中心以及基层监控室。疏忽了安全建设与业务系统中同步规划、建设、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给业务系统带来风险。第三，技术支持和管理层重视。信息安全风险是企业业务系统的第一条防线，信息安全风险和企业的财务风险、物理风险往往是紧密关联的。

（二）人事管理方面

从公司层面来说，主要问题有三大类。一是公司缺乏完整的人力资源战略理论体系，公司人力资源的培养、开发体系不健全。二是公司的薪酬体系和员工激励机制同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不匹配。三是公司的发展战略与公司内部人事管理工作之间步调不一致。

1.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制定符合公司现阶段要求的用人计划并进行合理的人才配置

公司战略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人才规划，在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出相对符合现状的用人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人才规划就是让人才招聘具有针对性和高效率性，只有做到合理的人才规划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招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无目标性。因为人才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企业在人才储备的时候不能如同购买商品一样去招聘人才，所以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就成了公司人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与人才规划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也应该是人事管理专员更加注重的方面，人事管理专员应对每个岗位的人才需求有一个了解，在此基础上来预测员工的需求，最后公司的领导会对最终上报的内容进行核对。每个部门在提交招聘申请表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公司的人事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应按照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来填写招聘申请表，如果涉及新岗位，相关部门还应提供职位说明书。人事管理专员应对公司员工和储备人才建立相关的数据库，目的是为了全面把握企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更加了解企业人才的发展状况，将员工与能力、专业水平一致的工作岗位相匹配，并且重视员工的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升。同时，通过从外部引入人才的方式，促进人才在企业内部实现良性的循环流动，最终在企业内形成员工竞争上岗和双向选择的优良机制。

2. 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目前，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对于人事管理没有贴切的内容与信息，对于人事管理来说也并没有起到精准的作用。因此，基于这一现状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员工的考核中加入计划考核、能力态度考核、部门满意度考核等内容。为了实现对员工有效的综合评价，使得员工的评价结果能够公平与公正，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以及考评年度中成长速度都是需要关注的方面，最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另外，为了体现出员工的个人价值和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将评价结果体现在员工的工资报酬上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对于企业人事管理的良性运转有促进作用。

3. 强化员工业务培训，确立多样化的教育培训体系，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首先，进一步加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培训工作，要明确培训的范围不仅仅是公司内的员工，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通过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来提高公司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作，可以邀请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或者知名的项目讲师到公司中给人力资源部门经理进行经理培训，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自身知识，不断开拓全新的视野，进而更好地掌握一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新的方法与新的知识，从而在以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有更好的实践。具体实施办法是自行组织培训和委托外部培养。自行组织培训包括专业管理技能培训、专业业务技能培训、办公技能培训，还包括聘请行业专家、领军学者开展专业知识讲座等形式；委托外部培养，包括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类专业技能短期培训和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组织的长期培养。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对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方式的改变有很多积极意义，各种新兴支付方式在全国开始应用，而之前半自动主要依靠人工完成收费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新要求，所以，对收费人员的

要求不能仅仅是业务技能娴熟、工作纪律严明，收费人员对于收费设备的维护以及处理能力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提高。通过加强收费人员的培训，建立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次的业务培训管理机制，从而让员工的技能素质得到提高。同时，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加强收费员工的思想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促使收费员工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进而从根本上杜绝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芦娜. 基于“互联网 +”的下一代高速公路收费技术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7(17)：321.

[2]马腾飞，姬建岗. 基于“互联网 +”的下一代高速公路收费技术研究[J]. 中国交通信息化，2017(5)：78 - 81.

[3]李蓉. “互联网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分析研究[D]. 太原：太原科技大学，2017.

[4]蒋海兵. PAD 便携式收费技术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J].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9(32)：169 - 170.

[5]谢海强. 移动支付在收费公路中的应用[J]. 中国交通信息化，2019(10)：133 - 135.

[6]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 新业态下，如何保障收费员职业发展？[J]. 中国公路，2019(20)：56 - 59.

[7]潘鼎如. 高速公路收费站双亭式复式车道自动收费管理流程探讨[J]. 中国交通信息化，2019(10)：32 - 33，9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ongyuan Expressway Toll Management Mode

YANG Xue[1], ZHANG Shuhui[1], YUE Daogui[2], WANG Fei[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2. Henan Zhongyuan Expressway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the service level and management mode of employees encountered by highway -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real - time monitoring of traffic flow and lane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safety hazards caused by the failure of weighting equipment and other issues.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constructive solutions to problems are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oll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s well as three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required by Zhongyuan Expressway in promoting Internet financial management are expounded.

Key words: expressway; toll management model; transformation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韩丽红,潘玉君*,杨冬琪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以云南省 16 个市州为研究尺度,以极差标准化和熵值赋权法为基础,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7 年云南省 16 个市州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关系紧密,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关系具有显著性差异,主要分为 4 类:(1)较高协调发展型,如昆明市;(2)一般协调发展型,如曲靖、玉溪等 8 个市州;(3)低度协调发展型,如昭通、普洱等 6 个市州;(4)轻微失调型,如怒江州。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可以将 16 个市州分为两大类: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和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

关键词:云南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6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33-05

旅游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会给旅游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环境依托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若开发利用不当,就会超过生态环境的负载能力,导致生态破坏,从而影响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处理和协调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

在国外,Farr 利用植被调查的方法,研究了旅游业对斯蒂尔岛(英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1];Mishan 认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2]。在国内,程慧[3]、刘德光[4]、李雪丽[5]等人通过构建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演变情况;张洪[6]、王兆峰[7]等对皖江城市带、长江经济带的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丛小丽[8]、李学[9]、孙晓[10]等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吉林、贵州和黑龙江的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协调分析;黄冬梅[11]、徐凯[12]、洪启颖[13]等对遵义市、大连市、福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区域、省、市一级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较多,成果较为丰硕。但是绝大多数研究以时间序列为主,很少涉及选取某一时间点对其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选取 2017 年云南省 16 个市州的截面数据,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为云南省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指导。

一、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指标选取

(一)研究区概况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介于 21°8′N—29°15′N,97°31′E—106°11′E 之间,东面、北面分别与贵

收稿日期:2020-01-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预警与均衡发展对策研究”(41671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结构、地理观念和人地系统预警”(41261033)

作者简介:韩丽红(1995—),男,甘肃环县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潘玉君(1965—),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源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地理学研究。

州、广西、四川相连，西北面紧靠西藏，西面、南面与缅甸、老挝、越南 3 个国家相邻，地理区位得天独厚[14]。云南省内山地高原所占比重大，平均海拔高，地形起伏大，再加上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使该区域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为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造就了云南“旅游大省”的品牌效应。2017 年，云南省全年接待国内游客 5.67 亿人次，接待海外游客 1364.66 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973.17 亿美元，旅游经济蓬勃发展[15]。但是，云南省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复杂性，使旅游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问题，这将会影响生态质量，降低旅游景观观赏性，束缚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协调好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本文主要选用熵值法来确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指标权重，最终分别计算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得分。由于选取的各指标的量纲和指标属性等不同，为了保证评价系统中各个指标权重的客观性，因此在计算权重之前需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X_{ij} = \frac{X - X_{\min}}{X_{\max} - X_{min}}, \text{其中 } X_{ij} \in [0,1]$$

计算权重：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计算熵值：

$$e_j = -k\sum_{i=1}^{m}(Y_{ij} \times \ln Y_{ij})$$

$$\text{其中，} k = \frac{1}{\ln m}, 0 \leqslant e_j \leqslant 1$$

计算差异度：

$$d_j = 1 - e_j$$

计算指标的权重：

$$W_i = \frac{d_i}{\sum_{j=1}^{n} d_j}$$

各评价对象综合水平得分计算公式：

$$S_i = \sum_{j=1}^{n} W_i Y_{ij}$$

（2）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概念起初源自物理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延伸到地理学、旅游学等学科[16]。耦合度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通过各种交织联系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17]。计算公式为：

$$C = \frac{2\sqrt{U_1 \times U_2}}{U_1 + U_2}$$

公式中，C 为耦合度，U_1 为旅游经济系统，U_2 为生态环境系统。

$$D = (C \times T)^{\frac{1}{2}}; T = \alpha U_1 + \beta U_2$$

公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综合协调指数，α、β 为待定系数，综合考虑到云南全省的实际发展情况，文中在评价过程中取 $\alpha = 0.4$，$\beta = 0.6$。文中根据云南省 16 个市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将协调度分为如下等级（表 1）。

表 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评价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评价等级
$0.0 < D < 0.19$	严重失调	$0.50 < D < 0.59$	一般协调
$0.20 < D < 0.29$	中度失调	$0.60 < D < 0.69$	中度协调
$0.30 < D < 0.39$	轻微失调	$0.70 < D < 0.79$	较高协调
$0.40 < D < 0.49$	低度协调	$0.80 < D < 1.0$	优质协调

（三）指标选取

文章数据主要选自《云南统计年鉴》（2018）及云南省 16 个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针对指标的可获得性及实际发展情况选取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两个指标评价体系。同时运用公式计算得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表 2）。

表 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评价指标	权重	性质
旅游经济	旅游总收入/亿元	0.067	正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	0.063	正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0.067	正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0.066	正
	接待入境旅游者/万人次	0.063	正
	旅行社/个	0.066	正
	A 级风景区/个	0.065	正
生态环境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0.069	负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0.069	负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0.062	正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0.070	负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0.069	负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0.067	正
	绿化覆盖面积/平方公里	0.070	正
	城市污水处理率/%	0.067	正

二、云南省市州层面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评价

应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 2017 年 16 个市州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并结合运算结果对其进行相关评价。

（1）当且仅当 $U_1 = U_2$ 时，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

图 1　2017 年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示意图

环境系统发展状况才会处在同一等级下协调发展。本文应用 ArcMap2.1 软件对云南省 16 个市州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空间分布的可视化展示,从图 1 可以看出:2017 年全省 16 个市州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性,协调度评价结果中既不存在严重失调的市州,也不存在优质协调的市州,其主要可分为四类:较高协调、一般协调、低度协调和轻微失调。昆明是 16 个市州中耦合协调度数值最高、唯一属于较高协调类型的市;曲靖、玉溪、保山、丽江、楚雄、红河、西双版纳和大理 8 个市州属于一般协调类型,其数量占据了全省市州的一半,呈现连片状且主要分布在滇中和滇西地区;属于低度协调类型的市州主要有昭通、普洱、临沧、文山、德宏和迪庆,这些地区布局较分散,主要分布在滇东北、滇西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边缘区域;怒江是 16 个市州中耦合协调度数值最低、处于轻微失调类型的州,主要与该区域地形地势相关。

(2)通过计算结果(表 3)可以看出,2017 年云南省 16 个市州的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值均大于 0.9,表明两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强;16 个市州之间的旅游经济综合得分和生态环境综合得分数值差异大,区域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从旅游经济系统得分来看,昆明市的数值为 0.553,居全省第一位。昆明市作为省会城市,其地理区位优越,气候湿润,四季如春,同时区域交通通达度高,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众多,民族文化多样,是云南省的游客集散中心,因此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快,势头良好;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市州自身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知名度较高,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因此旅游经济发展处于中间水平;昭通市和怒江州的旅游经济综合得分最低,其发展水平较差,主要由于该类地区旅游资源优势不明显,知名度低以及地形因素导致交通发展水平落后所引起的,同时也受到周边旅游发展较好市州"屏蔽效应"的影响。综合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综合得分最高值(0.553)是最低值(0.104)的 5.31 倍,说明全省的旅游发展水平差距大,发展不平衡。

表 3　2017 年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

地区	U_1	U_2	C	T	D	对比关系	协调类型
昆明市	0.553	0.491	0.998	0.518	0.718	$U_1 > U_2$	较高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曲靖市	0.152	0.391	0.9	0.295	0.515	$U_1 < U_2$	一般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玉溪市	0.186	0.354	0.95	0.287	0.522	$U_1 < U_2$	一般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保山市	0.194	0.282	0.982	0.247	0.500	$U_1 < U_2$	一般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昭通市	0.141	0.174	0.994	0.161	0.400	$U_1 < U_2$	低度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丽江市	0.413	0.219	0.952	0.298	0.532	$U_1 > U_2$	一般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普洱市	0.171	0.285	0.969	0.239	0.482	$U_1 < U_2$	低度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临沧市	0.176	0.215	0.995	0.200	0.445	$U_1 < U_2$	低度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楚雄州	0.184	0.298	0.971	0.253	0.500	$U_1 < U_2$	一般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红河州	0.264	0.373	0.985	0.330	0.570	$U_1 < U_2$	一般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文山州	0.151	0.236	0.975	0.202	0.444	$U_1 < U_2$	低度协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西双版纳州	0.266	0.241	0.998	0.251	0.501	$U_1 > U_2$	一般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大理州	0.367	0.21	0.962	0.273	0.513	$U_1 > U_2$	一般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德宏州	0.226	0.204	0.999	0.213	0.461	$U_1 > U_2$	低度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怒江州	0.104	0.126	0.996	0.117	0.342	$U_1 < U_2$	轻微失调,旅游发展滞后型
迪庆州	0.282	0.201	0.986	0.233	0.480	$U_1 > U_2$	低度协调,生态发展滞后型

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来看,昆明市的发展水平同样居全省首位,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昆明自身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昆明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取得好的成绩,

因此其发展在全省稍高。曲靖和玉溪2市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一般,仅次于昆明,近年来2市城镇化发展速度快,对各种资源的需求较大,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引起的生态问题对环境的影响导致其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低。昭通和怒江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最低,怒江位于滇西北,地处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全州98%以上的面积为高山峡谷,地形坡度较陡,地势起伏大,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小,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为了生存就会毁林开荒来扩大耕地面积;昭通属于典型的山地构造地形,地势陡峭,高山深谷遍及,生态问题突出,土地退化严重,因此昭通和怒江的生态环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得分比较可以将云南16个市州分为两大类:$U_1 > U_2$ 和 $U_1 < U_2$。当 $U_1 > U_2$ 时,属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即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优于生态环境发展,此类市州主要包括昆明、西双版纳、丽江、大理、德宏和迪庆6个,该类型型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完善;当 $U_1 > U_2$ 时,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该类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优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曲靖、玉溪、保山、昭通、普洱、临沧、楚雄、红河、文山和怒江10个市州。

三、结论

(1)2017年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关系紧密,所有市州的耦合度值均大于0.90,处于高度耦合阶段。16个市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显著性差异:昆明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属于较高协调发展型,曲靖、玉溪、保山、丽江、楚雄、红河、西双版纳和大理8个市州属于一般协调发展型,昭通、普洱、临沧、文山、德宏和迪庆6个市州属于低度协调发展型,怒江是全省唯一处于轻微失调发展型的地区。

(2)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得分比较可以将16个市州分为两大类:

①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主要包括昆明市、丽江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德宏州和迪庆州。该类地区在推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导致旅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未来发展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完善环境保护和管理体系,为旅游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促进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

②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主要包括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和怒江州。该类型的市州主要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导致交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相对较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有限。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地区要注重旅游交通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做好旅游景区的口碑宣传和推广工作,增强区域的旅游知名度;同时,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要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融合,着重提升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Farr H,Rogers A.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Isles of Scilly: Conflict and Complementarity[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1994(1):1-17.

[2]Mishan E J.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M]. London: Staples Press,1967.

[3]程慧,徐琼,郭尧琦.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J]. 经济地理,2019(7):233-240.

[4]刘德光,屈小爽.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测算及区域差异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1(4):89-96,105.

[5]李雪丽,张振国. 我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变化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3(8):836-839.

[6]张洪,司家慧,时浩楠. 皖江城市带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上海经济,2017(4):58-67.

[7]王兆峰,刘庆芳.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J]. 自然资源学报,2019(9):1945-1961.

[8]丛小丽. 吉林省生态旅游系统生态效率评价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

[9]李学.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贵州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D]. 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18.

[10]孙晓,李英. 黑龙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2):228-234.

[11]黄冬梅,何学海. 遵义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4):41-44,52.

[12]徐凯,李悦铮. 大连市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5(6):57-65.

[13]洪启颖. 福州市森林公园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J]. 林业经济,2019(1):76-80.

[14]明庆忠,童绍玉. 云南地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5]云南省统计局. 云南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16]张柳,李君轶,马耀峰. 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系统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分析[J]. 经济地理,2011(2):339-345.

[17]Vefie L. The Penguin Directionary of Physics[M]. Beijing: ForeignLanguage Press,199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Yunnan

HAN Lihong, PAN Yujun, YANG Dongqi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16 cities and states i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cale, based on range standardization and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16 cities and state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17 is close and in a highly coupled stag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highe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Kunming; (2) gene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Qujing, Yuxi and other eight cities and states; (3) low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Zhaotong, Puer and other six cities and states; (4) slight imbalance, such as Nujiang Prefecture.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two systems of tourism and ecology, 16 cities and stat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eco-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lag type and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ag type.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

(上接第 23 页)

[18]王旭峰.《无人伴随我》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正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1(2).

[19]李明奇,廖恋.真相委员会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以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J].岳麓法学评论,2016(10).

[20]Neier Aryeh. Uncovering the Truth[J].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1999,21(4).

[21]Philip Towle. The Impossible Machine: A Genealogy of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J]. The Round Table,2018,107(2).

[22]韩玲.国际刑法视野中的"南非真相委员会"[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23]却俊.从《哈罗德主人与男孩》看南非族裔边界的融合[J].贵州民族研究,2017(5).

[24]车莉莉.在迁移中重构身份:读戈迪默《偶遇者》[J].文学教育,2017(2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ruth" is Eloquent and the Road to "Reconciliation" is Long

—Explore the Road of Ethnic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by *Country of My Skull*

ZHENG Menghua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ntije Krog's novel, *Country of My Skull*, documents the efforts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o achieve racial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after the end of apartheid. The work inserts various texts such as commentary, news reports and court records into the narration at any time, which constitutes a diverse voice system from many groups and shows a series of appalling crimes of racial oppression during apartheid.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victim and the perpetrator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truth naturally. The work reflect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uth African society, and finally finds ou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the other", "realizing pluralism" and "realizing forgiveness" – seeking "common humanity" becomes the key to the road of racial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Key words: *Country of My Skull*; Antjie Krog; racial reconciliation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河南省“放管服”改革的路径研究

弓顺芳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河南 郑州 450042)

摘 要:优化营商环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借鉴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好赋予权力的分散性与审批的碎片性、制度与服务以及当前建设与长远规划之间的矛盾,聚焦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权责清单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地方政府只有在最难啃的关键领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形成制度优势高地,实现创新突破,谋求发展,方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关键词:营商环境;放管服;制度创新;对外开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7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38-05

引言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1]。在新的历史发展战略期和机遇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必须将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作为巩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探索研究符合新时代背景下内陆开放发展规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方略,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目标。

理论层面上,1986 年,美国学者依西阿·里特法克和彼得·班廷首次对投资主体进行营商环境评价,并概括出影响投资行为的“冷热图分析法”。“营商环境”一词源于 2002 年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Doing Business”项目调研报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营商环境对企业寻租和市场创新关系的影响遵循转型理论的一般观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是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监管,是消除寻租行为、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杠杆。一方面,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单位创新产出所耗费的各类资本、劳务成正比,与生产要素的利用效能成反比(周黎安等,2015)。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许和连、王海成,2018),增进市场主体的经营绩效、投融资活动的流向和高端要素市场的集聚与秩序(弓顺芳,2019)。此外,政府作为双重属性的代理人和自利者(赵静等,2013),不仅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避免营商环境的相对缺失(夏杰长,2017),而且还要调节市场失灵对创新的影响,避免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职能越位和错位,因此,治理理论与营商环境具有内在契合性,营商环境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公共治理过程(娄成武,2018)。当前,学术界对营商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商环境的内涵(倪鹏飞,2008;宋林霖,2018)、营商环境的评价体系(黄育容,2015;周志忍,2018;龙雪松,2004;洪海,2018)、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对策(董志强,2012;孙宇,2018;许可,2016)等方面。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营商环境作为资源组成要素,具有稀缺性、外部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各地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必须结合自身区域优势和特色,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生产力,从而提升整体生产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河南省‘放管服’改革的路径研究”(2018B030);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难点、重点任务和战略举措研究”(2018JC27)
作者简介:弓顺芳(1980—),女,河南郑州人,硕士,中共郑州市委党校、郑州市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公共政策。

但是,综合来看,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在东部城市、沿海城市以及发达地区营商环境,或者是将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端的主体来研究对策及相关工作的陈述和总结,而围绕改革目标,以数据、事实为依据,定量分析改革前后制度变化情况,以及通过制度变化评估对实际工作影响的改革成效的研究较少。

政策层面上,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也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确立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中多次论及营商环境。从"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出台,特别是在2019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即将实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增强开放效应。近年来,河南省和郑州市着力推动"五区联动""四路协同",加快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并先后出台《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河南省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培育和发展共享经济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要加强政策研究、制度创新,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巩固提升"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地位。2019年7月9日,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扬长补短、彰显特色,以更宽视野、更实举措谋划推动郑州高水平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2019年7月24日,河南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在郑州召开,明确了对外开放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开放促进河南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由此可见,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中国提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政府治理的新内容、新举措。因此,本文借助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整体治理理论,重点考察河南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探索完善中部内陆地区从开放末端成为开放前沿,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实现路径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营商环境优化的历史演变与延展

(一)从"招商引资"到"营商环境"的历史演变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曾提出著名的"诺思悖论",即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能保证政府干预必然有利于社会,国家的存在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2]。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集中控制市场资源以及社会资金的使用与流向。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地方施行,地方经济开始由政府决定投资的被动发展转向以招商引资为模式的主动发展,一些沿海城市率先从外部引入对本地区有利的商业项目、商业模式、管理技术和资金人才等资源,调整升级本地区经济投资、产业和人才结构,实现了促进地区发展的"经济奇迹"和"财富传奇"。但是随着地区资源优势下降,地方政府的干预招商工作又带来现实的困惑和发展的隐忧。表现在:第一,粗放型引资模式与约束性资源环境的不平衡。招商引资的模式亟须从过去"捡到篮里都是菜"的吸引招商转向重质量重效益的集约选商,以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来发展高端产业价值链和升级产业结构。第二,"过度"招商引资容易造成"权力寻租"。地方政府过度介入招商引资,就容易出现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现象,甚至滋生腐败,导致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下。第三,传统的招商模式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传统的招商引资,多以"优惠政策""政策洼地"为助力,通过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容易造成企业侧重投资短平快项目,不利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政府和公众的利益[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4],要集中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运营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当前学术界关于营商环境的概念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从2019年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营商法规及执行情况客观评估构建出的11项一级指标、43项二级指标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可以看出,营商环境是涉及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生态等一般环境与政企关系、劳动力市场、金融机构等特定环境的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有形要素,也包括制度、文化、生态等无形要素;既包括对资源要素流入的吸引力、监管力和服务力,也包括退出时的便捷度和满意度;既着眼于现时状态下的市场运营环境,又强调区域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潜能与创新动能。

因此,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营商环境,都是政府参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以及公共服务的一种手段,其目的都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营商环境概念的出现,是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区域资源配置与高效组

合的进步与发展[5]。从招商引资到优化营商环境，反映了由传统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制模式向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由“抓项目”转向“优环境”的转变。

（二）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契合

近年来，河南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命中之穴”，将“放管服”改革作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要义”，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以开放促发展，推进高品质营商环境是国家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塑造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营商环境逐步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高端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是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全面推进便企利民的重大举措；是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推动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新旗帜和总抓手；是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第一，立足本土化。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营商环境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具有稀缺性、外部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各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必须结合区域特点和比较优势打造营商制度环境，释放制度生产力，提升本地区城市竞争力。

第二，内生动力和目标一致性。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营商环境是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安排，其优劣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盛衰、生产要素的聚散和发展动力的持续性[6]，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拓展内需市场。可见，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都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即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强调结果导向，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目标。

第三，治理结构契合性。高质量发展与营商环境优化都是以网络式服务为基本组织形态，以协调合作为治理机制，构建跨政府部门、跨政府层级、跨公私部门的整合型治理结构，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是主体多元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不仅需要政府在硬环境上下功夫，更需要激发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建设好软环境，形成“人人皆环境”、共谋共推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如北京市积极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化服务的协商调解作用，设立商事调解、人民调解和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二是治理工具多样性。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政府必须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监管和治理，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积极回应公众诉求。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工具之一，要以“互联网 + 政务”为手段提高政府效能，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实现一网通办，构建营商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

二、河南省以“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河南省继续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郑州是“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上的主要节点城市、中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和内陆进出口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探索研究符合内陆开放发展规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优化营商环境是“命中之穴”。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坚持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为重点，深入融合“一带一路”，发挥经济腹地和双向衔接功能，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规则，加快“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加快形成双向开放大格局，不断提升郑州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河南省作为中部大省，在深化“三区一群”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和战略示范效应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河南省“放管服”改革存在碎片化特征，表现在审批标准不规范，审批事项“放”“管”落实不到位，审批权力纵横交错，政务中心整合力不足等方面。

（一）优化营商环境是实现河南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

营商环境是生产资源的重要组成要素，具有稀缺性、外部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优化营商环境时要因地因时制宜，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生产力，提升社会生产和治理效能。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先天不足，但是郑州“不靠海、不临江、打开世界靠蓝天”，正是因为郑州市坚持以开放做发展导向，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私有资本营造良好的“确定性”发展环境，才促进郑州在跨境电商、中欧班列、自贸区改革创新和航空枢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19 年 7 月，河南自贸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和一码集成服务 2 项制度创新首次入选商务部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 31 个“最佳实践案例”，以及包括“1210”监管模式、“秒通关”通关模式、“网购保税 + 实体新零售”销售模式建设等“五大服务体系”工作持续推进。

（二）优化营商环境是实现河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加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调动资源要素的集聚，促进区域发展由成本和资源优势转向以研发、服务和文化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的转变，发挥市场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的效能和作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优化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实现河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加快河南走进世界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中部崛起和中原更加出彩优势的靓丽底色的重要保障。

（三）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政府效能，坚持和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以加快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放管服”改革。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够推动形成竞争高效、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而且也是一个地区制度“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优化营商环境，以开放倒逼改革，决定了改革成效要突出体现在企业的收益和效能，有利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政府效能和服务意识，构建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巩固和完善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优化营商环境是提升河南省城市国际竞争力，塑造城市精神的重要途径

开放是实现城市繁荣的必由之路，营商环境是城市的名片。河南打造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要对标国际一流指标，以大量高质量生产要素为基础性支撑。围绕河南省亟须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专业建设，培育、引进和留住国内外“高精尖”人才，加大境外一流高校赴豫合作办学，形成高端人才集聚生态圈；以“五区联动”“四路协同”为平台，打造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提升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级，全力打响“中原形象”“河南制造”品牌。

（五）优化营商环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公共服务理念的重要体现

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促进新行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涌现，为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新的创业、就业机会，斩断“向企业乱伸的手”，杜绝把企业当成“唐僧肉”。一方面，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成长。针对正在成长或迅速扩大的中小企业和大学生创业主体，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成长时间和发展机遇，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效能。践行法治理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突破口，引入竞争机制和创新驱动战略，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三、河南省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目标的“放管服”改革推进路径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注重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在优化服务质量、提高制度效能等软环境上下功夫求突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作为核心抓手，以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和辐射圈为突破口，既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实现量的扩张，又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质的提升，将优化营商环境与对外开放战略紧密结合、持续推动。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据诚信、公平、负责原则的基本要求，建设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一方面，政府要保护市场主体基于对市场配置资源权威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并对在生产、分配、销售、交换以及最终消费环境中的弱势主体予以扶助，以保证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政府要严格权力监管，构建诚信、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对侵害企业正当权益或有碍优化营商环境的行为，要及时发现、纠偏和问责。

第二，以“政务服务集成化”改革为核心，推进“互联网＋政务”模式创新。着力解决“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权责界定模糊、“信息孤岛”及监管盲区等突出问题，推进“互联网＋监管”“互联网＋政务”等服务模式，缩短企业项目报建流程，推广区域联动评估，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加快优化整合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功能，着力破解群众办事“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瓶颈问题，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改革获得感”。

第三，以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导向，全面推行便利化的服务环境。营商环境便利化主要测算手续、时间、成本三个维度的营商便利度。一是搭建统一的融资服务平台。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完善面向民营企业的信贷评估方式、审批手续和贷款条件，探索实施民营企业风险评估和责任分担机制。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市县扁平管理”，建立“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的审批模式。政府核准制和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三是推行企业投资“一诺即办”项目承诺制。试行“政府靠前服务、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的承诺制管理模式。

第四,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模式,建立有地域特色的政策体系。一是完善跨区域和区域间的部门合作、生态环境和产业承接等协调机制。基层政府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政策或鼓励跨境贸易,加大开放型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掌握国际经济运行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以更加开放、积极的态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二是健全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采取高标准企业孵化器的形式,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机制和诚信档案,细化产品商标、专利等保护条款内容,确立档案信息后持续关注、跟踪和评价。三是建立对标提质服务长效机制。全面对标上海、深圳、杭州等先进地区,树立尊重企业家、尊重产权、尊重创造、尊重契约精神以及"保姆式""店小二"服务理念,结合实际复制推广先进地区在政务服务、审批流程、行政监管、干部监督等方面的创新举措。

第五,公正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前提,是合作共赢和现代契约精神的基石。一是建立健全保护产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和中介服务监管的法律制度,使市场主体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健康、充分地竞争,降低商业纠纷的内耗成本,引导市场主体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征信系统。对标国际,构建符合国际化营商规则和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推进培育建设现代契约精神和社会诚信体系。三是加快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跨部门联合监管、"互联网 + 监管"和"智慧监管",推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四是建立基金投资科技创新市场,推进国际企业总部或运营商计划。

四、结语

优化营商环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放管服"改革的新目标。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营商环境作为资源组成要素,具有稀缺性、外部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各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必须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特色,解决好赋予权力的分散性与审批的碎片性、制度与服务以及当前建设与长远规划之间的矛盾,不断释放制度生产力,从而提升整体生产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50.

[2]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江飞涛,耿强,吕大国.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 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 - 56.

[4]王昌林,任晓刚. 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宏观调控[N]. 人民日报,2018 - 12 - 28(7)

[5]董彪,李仁玉. 我国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基于《营商环境报告》的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16(13):141 - 143.

[6]李克强. 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9 - 07 - 28)[2019 - 11 - 17]. http://www.xinhuanet.com/2019 - 07/28/c_1124808469.htm.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he Reform of Henan Province's "Release - Administration -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GONG Shunfang

(Zhengzhou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Henan 450042, China)

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should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learn from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theory unde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paradigm,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he system and service, an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long - term planning, and focus on the simpl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system, list system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 supervis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even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masses. Only in the most difficult key areas, by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Release - Administration - Service", forming a highland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chieving innovation breakthroughs and seeking development, can local governments form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 up.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lease - Administration -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配偶权解析及其立法保护

祁雪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配偶权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配偶人格权,二是配偶身份权,三是配偶财产权。配偶权外延产生异质性权利束,配偶权权利内部存在法理冲突需要司法平衡。国内司法实践逐渐确认了过去没有提及的如配偶性权利等隐形权利。综合我国立法缺陷和国外立法趋势,建议从以下方面对我国配偶权制度进行完善:构建多法并用的立体协同保护体系,适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并用的责任认定规则,确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确立婚内隐私权保护制度,建立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确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度。

关键词:配偶权;权利束;立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8
中图分类号:D9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43-05

配偶权的正确行使是婚姻家庭和谐的基础,配偶权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2001 年《婚姻法》修订以来,学界对配偶权的探讨一直持续不断。早在《婚姻法》修改的时候,配偶权就成为立法争论的焦点,但最终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示配偶权,涉及该项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未明确界定,也就是说,至今没有在立法方面系统确立配偶权制度。配偶权权利救济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亟须完善。

一、配偶权是具有异质性和对抗性的权利束

(一)配偶权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配偶权是"基于合法婚姻关系,由夫妻双方专属并且平等享有的,其他任意第三人不得侵犯的夫妻特定身份的权利"[1]。权利主体是夫妻双方,空间指向可分为对内和对外,即婚姻关系内部和外部,主要是指内部。配偶权的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配偶权仅指夫妻身份权,广义的配偶权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包括夫妻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它是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一组权利束,该权利束内部具有异质性和对抗性。配偶权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是它存在其中的社会背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演变的产物。由配偶权概念的内涵可以概括出它具有如下特征:配偶权的存在以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为前提;配偶权对内是权利义务混合体,一般体现为夫妻双方的合意;配偶权具有绝对权和相对权双重性,对内具有相对性,对外具有绝对性。

(二)配偶权的法律性质与分类

学界对配偶权性质的认定,主要有利益说、陪伴说、身份说和性权利说。其中的陪伴权和性权利,可归结为广义的利益,即精神利益。利益说认为,配偶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其他任何人均负不得侵犯和损害赔偿的义务。身份说认为,配偶权是作为配偶的一种身份权利。性权利说认为,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上述观点共性之处是都认为配偶权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主要分歧是对该权利的具体化,即身份利益包含哪些内容。上述四种学说各有千秋也各自偏狭,综合起来才能反映配偶权性质的全貌,即它是基于特定身份的利益综合

收稿日期:2020-04-2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积极应对河南老龄化的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20A36)

作者简介:祁雪瑞(1963—),女,河南安阳人,哲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行政法,婚姻家庭法。

体,或者说是一种权利束。依据配偶权权利内容的不同性质,配偶权可分为三大类:一是配偶人格权,包括夫妻姓名权、生育权、孩子命名权、择业自由权等。二是配偶身份权,包括住所决定权、同居权、忠实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等。三是配偶财产权,包括夫妻扶养权、继承权、共同财产权等。[2]

(三)配偶权外延产生异质性权利束

配偶权的外延相当广泛,是一组异质性的权利束,而且内部权利之间具有对抗性,一方对外行使权利的时候与配偶之外的人的人格权也具有对抗性。对于配偶权都包含哪些具体权利,学者的认识不一,分歧的焦点在于配偶权是否应该包含财产性权利。

配偶权多表现为请求权。有学者认为,配偶权是纯身份性权利,将配偶权中的具体权利概括为:忠实请求权、同居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相互协助权。其中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在民法上称为表见代理。杨立新教授在其《亲属法专论》一书中主张配偶权有八项权利内容:"(1)夫妻姓氏权;(2)住所决定权;(3)同居义务;(4)忠实义务;(5)职业、学习和社会活动自由权;(6)日常家务代理权;(7)相互扶养、扶助权;(8)生育权与计划生育的义务。"[3]杨教授直接把几项权利写成了义务,是由于配偶权的权利义务相互成就特性,一方的权利即是另一方的义务,其中一些权利是要求对方不作为,义务性表现更突出。但是,笔者认为,把这种权利表述为请求权可能更为规范,因为权利和义务毕竟是相对的两个概念。

(四)配偶权主要的权利内容

综合学者的研究,配偶权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权利:

一是同居权,指夫妻之间互有进行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共同生活的权利。其中性生活的权利日益受到重视,成为离婚诉讼和请求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也是配偶冷暴力和夫妻感情判断的重要依据。二是忠实请求权,指夫妻双方均有请求对方相互忠诚、保守贞操的权利。主要指男女不为婚外性交的良好操行。贞操一词已经转化为忠诚、忠实,其实,用忠实比用忠诚表述更为确切,因为忠实描述的是平等主体,而忠诚则有主从的意味。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贞操的原始意义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丈夫的处女情结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三是相互协作权,指彼此协作、相互救助的权利和义务。缔结婚姻是组建了一个生活共同体,夫妻是个人合伙关系,它要求配偶在生活中彼此协作,包括支持对方的个人意愿和活动,甚至在个人长远利益与家庭短期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优先成就个人。四是日常家事代理权,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的权利。日常家事,不包括对共有的不动产和大额动产的处理。对是否大额的认定,以当地的社会习惯为限,由司法机关公布。

二、配偶权权利内部的法理冲突与司法平衡

(一)婚内强奸是配偶同居权与性自主权的激烈对抗

对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婚内强奸,学界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议。婚内强奸的实质是夫妻个体性自主权与传统配偶身份权之间的冲突。性自主权是一项基本人格权,具有支配权效力;而配偶权是一种请求权,配偶权的行使应当以尊重配偶性自主权为前提。故违背配偶意志强制进行性行为当构成强奸。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两性关系组成的婚姻家庭已超出个体利益,违反配偶同居义务需要在个案中通过价值衡量进行调适。判断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需要进行个案分析。历史性来看,对婚姻制度的价值观经历了从夫妻一体到婚姻合意的转变,相应地,婚内强奸的概念从无到有,其性质也经历了从无罪到有罪的变化过程。[4]其实,更多的具体情形可以归结为家庭暴力的一种,达到犯罪程度的并不多。

《牛津法律大辞典·婚姻权》条目,将"婚姻权"(Conjugal Rights)表述为"配偶相互之间的权利,尤指同居和性交的权利。"但是,过分强调婚姻的义务性,极易沦为对人性的压抑。婚姻契约不是卖身契,任何违背配偶意志的性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基于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多重弱势,女性往往是受害一方,20 世纪中国民间俗语有云:"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这是婚姻中两性关系不平等的典型反映。然而,性的功能又是婚姻的一项基础功能,故在坚持婚内强奸应入罪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也要处理好性自主权与配偶权的矛盾冲突。应当限定,婚内强奸仅存在于婚姻的非正常存续期间和一方非常态生活期间,如离婚诉讼期间,非正常分居期间,一方身体疾病期间或一方因重大不幸事件情感受损期间等。夫妻是平等的性伙伴,性权利也需依靠请求权成就。免受暴力威胁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暴力是国家的专属垄断权,除了正当防卫,没有其他例外。在夫妻之间,妻子首先是作为"个人"而非"配偶"存在,婚姻中首先是人权,其次才是配偶权。婚姻中的人权有克减,仍优先。

(二)对出轨行为取证遭遇配偶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就目前司法实务中配偶权与隐私权的冲突而

言，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夫妻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二是受害方取证保护自己的配偶权时，与配偶和第三人的隐私权的冲突。第二种冲突广泛存在于婚嫁家庭领域的诉讼纠纷中。受害方配偶在取证时会侵犯对方配偶的隐私权，一是取证内容方面，二是取证手段方面。如果受害配偶一方并无主观恶意扩散得到的私人信息，则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裁判不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就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了规定，但婚姻家庭案件并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取证的难度非常大。我们似乎可以借鉴日本家事审判的职权主义证据规则。

三、我国配偶权制度的立法缺陷和保护困境

（一）立法结构缺乏系统性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的概念、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及其相关救济手段和保护机制，以至于使配偶权制度在婚姻立法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关于配偶的具体权利义务，现行《婚姻法》只是在总则中提到“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司法实践中，法官只能通过自由裁量处理，因而造成案件结果的混乱，配偶权保护实务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关于相互扶助权，我国立法只规定了婚内要求对方支付扶养费的权利，而对于协作、救助内容没有体现，范围过于狭窄。一些国家已经将救助义务延伸到离婚以后，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在离婚和合法分居的诉讼中，一方生活困难即可请求扶养费。

（二）对婚内隐私权没有直接保护制度

夫妻之间侵犯隐私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如“丈夫安装摄像头监视妻子案”“丈夫偷查妻子话费案”等，不一而足。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项特殊类型，现有法律规定对此项权利却并未有效保护，仍然是夫妻一体主义的思维，而现在的婚姻家庭理论已经发展到夫妻别体主义。我国法律直接把隐私权明确列为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时间尚短，导致法院没有考虑到婚内隐私权自身的特殊性，大多以离婚作为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我国对婚内隐私权没有进行专门保护的条款，对一般隐私权保护历经了保护名誉权、隐私利益、隐私权的演化过程，进行寄生性保护。在婚姻关系中，一方若有外遇，另一方在行使其配偶知情权时必然会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导致权利的冲突，法律没有明示权利的位序。

（三）权利认定不明确不全面

《婚姻法》及其四个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及其解释，是配偶权的制度基础。《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对配偶权予以保护，《侵权责任法》略有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不支持夫妻一方向侵权第三人提起诉讼，不管个案情形如何，仅可向其配偶提起离婚诉讼附带离婚损害赔偿。法院对侵犯配偶权之诉讼一般是以不属立案事由而不予受理。我国相关立法关心夫妻对外界发生影响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多，而忽视了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婚姻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最基本的同居权利义务以及配偶日常事务代理权，司法解释也没有填补立法空白。性权利是忠实义务的核心，但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未明文规定，与性权利配套的分居制度也没有确立。

（四）权利救济呈现附带性间接性

我国现行《婚姻法》间接规定了侵害配偶权的司法救济，即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条列举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作为离婚时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以上行为本质上是违反了配偶权中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扶养义务等。但是没有规定婚内赔偿，无法及时有效保护受害当事人的权益。司法实践中，对其他法律的适用也因为司法人员理解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同样的案情会有完全不同的判决。

（五）缺失婚内损害赔偿制度

由于我国没有婚内损害赔偿的规定，无法在判决不准离婚的同时判决物质赔偿。这与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的原则相悖，同时，使无过错方不得不在维持婚姻与获得赔偿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从表面上看，刑事处罚有虐待罪、重婚罪，行政处罚有治安管理规制家庭暴力，民事裁判有离婚损害赔偿，这些制度保护了无过错方的权益，但是，这些保护都欠缺力度，程序和实体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是离婚，而相当多的受害方不想离婚，只想停止被害和惩罚对方，这种捆绑式规定不利于防微杜渐和维护婚姻。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恰恰应该首先是婚内赔偿，以离婚赔偿作为补充。

（六）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裁判不一

实践中常见的夫妻忠诚协议有赔礼道歉型、特定行为型、身份关系型、财产给付型四种。当下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判决呈现出法律依据认定不一、赔偿性质认定不一、财产分割认定不一的乱象。对夫妻忠诚协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文规定不予受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有类似发文。但是这两大高级人民法院的发文并没有缓解本领域“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司法实务界对夫妻忠诚协议观点各异,裁判不一。有必要重新定性忠诚协议,确定其是同时融合了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两种法律关系的无名合同,前者适用《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后者适用《合同法》。

(七)无法追究第三人侵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

受害方针对第三人的赔偿要求往往因为相关法律不够充分而被驳回。2001 年修正的《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配偶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还否定了第三人的民事责任,认为“告第三人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依照民法的一般理论和债权的原理,第三人有可能侵害债权。婚姻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合同关系,具有合同之债的性质。司法解释应予纠正。

四、对我国配偶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民法人身权制度的发展,表现为身份权和人格权此消彼长,一方面是人格权的日益扩张,另一方面则是身份权的渐趋消亡。相应地,婚姻契约理论逐渐成为婚姻制度的理论基础,夫或妻的平等地位以及个体权益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国家在承认夫妻间侵权责任时,也在探讨构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等直接保护配偶权的制度。江平教授认为:“人格权是私权利体系中所有权利的基础,是重中之重。”[5]那么,在配偶权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中,也应该贯彻这一理念。

(一)构建多法并用的立体协同保护体系

首先,应在婚姻家庭法中明确配偶权的概念。其次,基于配偶权权利束的异质性和内容丰富性,保护配偶权应保持国家对婚姻关系的适度干预,确定人格权优先理念,统筹整个私法体系及其与公法的协调。第三,配偶权应当在民法典总则、人身权法编、婚姻家庭法编和侵权法编得到科学合理的体现,多管齐下立体保护配偶权,改变单纯由婚姻法保护的羸弱局面。

(二)适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并用的责任认定规则

侵权行为侵害的是绝对权如物权、人身权,而违约行为侵害的则是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与侵权和违约两种行为相对应,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作为民事权利的两种救济方式,皆可用于配偶权保护,当事人可选择适用。应从侵权责任以及违约责任两种救济方式上完善配偶权救济渠道。在违约救济中赋予夫妻忠实协议以生命力,并在侵权救济中完善过错体系,明确第三人侵犯配偶权的责任承担及其限制条件。

(三)补充配偶权的立法内容

明确配偶权的概念,可在婚姻家庭法中设“配偶权”一章,以专章内容对配偶权进行规定。明确忠实义务内容,强调性权利为忠实义务之核心内容,因生理缺陷不能履行性生活义务时,配偶可请求法院宣告为无效婚姻。合理限制性权利,构建分居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暂时免除配偶同居义务,比如患病、发生重大不幸事件、双方长期感情不和等合乎情理的情形。需要特别强调,配偶性权利是典型的请求权,不能违背对方意志。完善相互扶助权内容,延伸相互扶助权期间,在婚内分居期间夫妻双方仍然负有扶助义务,甚至可以延伸到离婚后一年或者需要扶助的一方再婚前。

(四)建立婚内侵权赔偿制度

婚内侵权赔偿制度既能及时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又能及时惩罚和教育过错方,有利于挽救婚姻。更重要的是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变捆绑式的附带性制度为独立的侵害赔偿制度,突显了配偶权的重要性。婚内侵权赔偿制度需要与夫妻财产制度相配套,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婚内赔偿金属于双方个人的债权债务。夫妻约定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可以补充和变更共同财产制,使婚内过错赔偿的实现成为可能。无过错方取得的赔偿金,作为其个人财产。

(五)建立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有限责任制度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第三者”的含义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可以从相关的叙述中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给出答案。第三者,应指明知或者应知他人有配偶,仍长期与其保持婚外性关系,破坏他人配偶权的人的总称。第三者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具体的表现形式有重婚、同居和通奸。与有配偶者保持性关系的主体不仅限于异性,这一点需要立法明确。第三者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第三者由于过失实施了侵害行为,之后才知晓他人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并且及时地停止了错误行为,则不应承担责任。

(六)确立婚内隐私权保护制度

隐私,即信息主体不愿意让外部知晓的内容。婚内隐私包括双方各自的隐私和双方共同的隐私。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不同于一般隐私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主体间的情感性。一方会采取一些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来探查对方的状况,如偷看对方日记、聊天记录、电话信息、跟踪对方等。二是有限的私密性。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得相互克减,让步于配偶知情权。对婚内隐私权保护应以《婚姻法》为主,同时辅以

《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在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进入到《刑法》保护的层面。在司法实践中适当进行利益衡量,应保护较为上位的隐私权,限制配偶知情权。但应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配偶隐私权可以让步于配偶知情权,即配偶行使知情权在合理范围之内,为维护其专属的身份利益,且尽到了保密义务,则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对合法知晓的他人婚姻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七)明确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忠诚协议具备合理甚至代表正义的债因,具有事前威慑和事后惩处的作用,有助于配偶关系的诚信和稳定。订立忠诚协议的最终目的是诺行忠诚义务,维持婚姻正常,客观方面增加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合同法理论来看,忠诚协议就是无名契约,属于广义契约,也称非典型契约。分析忠诚协议的内容,通常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的特征,其客体是不作为的身份行为和财产给付行为,构建了意定法律关系。基于意定之债的理论,不违法即有效。财产给付应当定性为违约责任。我国法律目前不允许对违约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法律没有禁止当事人约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八)确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

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有限共有制。夫妻可以约定婚后及婚前财产的归属,约定优位于法定。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对法定共有制的附条件变更,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出现法定事由时,经夫妻一方的申请而由法院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该制度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呼应,可以有效解决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执行难的问题。建议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成就条件如下:(1)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2)被侵犯配偶权一方要求对方承担责任的;(3)配偶一方无理阻碍另一方履行法定义务的;(4)配偶一方严重损害另一方共有财产利益的;(5)夫妻分居的;(6)其他需要变更的事项。

(九)加强对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制度支持

法律援助主要针对残障、疾病、留守、同妻、抚养未成年人等配偶弱势群体。应建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专门救济机构等,比如一些法院的家事审判庭配备了受家暴妇女临时避难所,可免费提供若干天的住宿。推广"从妻居"或"两来两往"的多元化婚居模式,从源头上扶持配偶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妇联的妇儿工委应发挥更大的受害配偶救助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少敏.我国配偶权制度初探[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4(10):85-86.

[2]刘凯.论我国配偶权之保护[J].法制博览,2019(1):100-101.

[3]杨立新.亲属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28.

[4]袁昊.论婚内强奸:以性自主权与配偶权冲突为视角[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6):21-24.

[5]杨立新.江平教授人格权立法思想的主旨及形成基础[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6):148-15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Spouse Right and Its Legislative Protection

QI Xuerui

(Institute of Law,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right of spous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right of spouse's personality, the right of spouse's status and the right of spouse's property. The extension of the spouse right comes into the heterogeneous bundle of rights, and the conflict of legal principles in the right of spouse needs judicial balance. Domestic judicial practice gradually confirmed invisible rights such as spousal rights that were not mentioned in the past. In the light of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legislative trends abroa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ystem of spouse right in our country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construct a multi-method and three-dimensional coope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to apply the rules of liability for tort lia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marital loyalty agreement, to establish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marital privacy, to establish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marital tort, to establish a very legal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Key words: spousal right; bundle of rights; legislation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征与防控

贺晨霞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摘 要:互联—金融的发展催生了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兴起,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因其隐蔽性与便捷性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使之沦为洗钱的工具。与传统洗钱犯罪相比,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多元性、犯罪方式的特殊性、犯罪范围的跨区域性等三个新特征。就具体的防控而言,应构建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并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以及洗钱罪的刑法规定,以期规范和指引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与金融监管体系下安全、有序地发展与运行。

关键词:洗钱;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09
中图分类号:DF623;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48-05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金融是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大环境催生下,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第三方支付、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兴金融。[1]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随着新经济和新零售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面对面支付方式显然不能满足于当下交易的效率,为了促进交易的方便,互联网催生了支付产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助力,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技术先驱应运而生。随着第三方支付的不断发展和飞速普及,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已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第三方支付已成为当下最有效、最便捷的支付手段;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使我国资金转移渠道多元化的趋势迅速显现,正悄然改变着中国的传统金融业。

虽然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宠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其潜在的网络技术和监管漏洞也容易被图谋不轨的犯罪分子所利用,某些不法分子借机搭上互联网的便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互联网沦为犯罪的洼地。2010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20%的电子交易与洗钱犯罪相关,每天约有数亿美元正通过电子金融服务进行洗白。目前,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实施洗钱犯罪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犯罪分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快速转移、转让、清洗非法巨额资金。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却没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去防控这些洗钱行为,致使犯罪分子愈来愈猖獗、洗钱犯罪数量愈来愈多,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似乎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成为既定规则的法外之物,这给我国的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二、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征

(一)传统洗钱犯罪的特征

一个完整的洗钱犯罪大致包括放置、培植和融合三个阶段。[2]放置阶段,指将犯罪收益投入到"清洗"渠道中去,比如洗钱者为了减少怀疑将犯罪收益转换为现金、证券等便于控制的形式,放置阶段也是最容易被侦查到的阶段;培植阶段,指通过各种复杂、多层的金融交易,模糊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的

收稿日期:2020-01-30
作者简介:贺晨霞(1996—),女,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界限，使人难以分辨其真实来源，达到掩盖、隐藏的目的；融合阶段，指在为“黑钱”披上合法的外衣后，洗钱者可以自由享用这些“黑钱”。一般而言，在传统的洗钱犯罪中，洗钱者若要完成非法资金的转移、掩饰、隐藏，往往需要通过改变货币的占有方式，例如，传统洗钱犯罪常常通过购买地产、古玩、珠宝、保险、证券等掩盖非法资金的真实来源。由此可见，传统洗钱方式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机构才能完成资金的转移，才能达到将非法资产变为“合法”财产的目的，其具有风险性高、不易转移等固有缺陷。

（二）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征

第三方支付是指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由非银行的第三方机构经营的网上支付平台，在消费者、商家和银行之间建立连接，起到信用担保和技术保障的作用，实现资金从消费者到商家的转移。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洗钱方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犯罪分子只能寻求更为隐蔽的洗钱方式，而在当今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犯罪分子看到了可乘之机，开始借助互联网的优势通过第三方支付进行洗钱。与传统洗钱相比，通过第三方支付洗钱具有三个新特征。

1. 洗钱主体的多元性：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人员参与洗钱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技术先驱应运而生，第三方支付改变了传统金融交易的方式，使消费者与商家的所有支付交涉均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完成，在促使金融交易更加便捷的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网上购物的成本以及商家的运营成本。第三方支付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兴产物，其支付体系与传统支付体系不同，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另外，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平台用户量以及交易量越来越大，在巨额资金的诱惑力之下，出现了犯罪分子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人员共同洗钱的现象，洗钱犯罪的涉嫌主体更加多元化。在实践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工作人员参与洗钱主要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某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事前共谋，从而借助自身便利为犯罪分子洗钱提供帮助、便利。第二种情形，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后台数据“明知”行为人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洗钱，但平台及其工作人员基于维护用户量或其他需要，从而放纵此类行为，并帮助犯罪分子完成资金的支付与结算，使得洗钱犯罪得以顺利完成。

2. 洗钱方式的特殊性：利用第三方支付非面对面性质洗钱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支付称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其将第三方支付划分为网络支付（如网购）、预付卡支付（如购物卡、加油卡）和银行卡支付（如 POS 机刷单）三大类。第三方支付区别于现金、信用卡等传统支付方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其依托于互联网，所有交易均非面对面完成，即具有非面对面这一特性。第三方支付在开立账户、进行转账交易时往往以与顾客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3] 第三方支付平台凸显非面对面交易的性质，使得犯罪人可以利用平台非面对面性质洗钱。

第一，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假交易进行洗钱。即行为人同时伪装成为买卖双方或买卖双方事先约定一致，由卖方在购物网站上设置好将要出售的商品，待买家点击购买后，资金便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移。通过此类“交易”，可以掩盖非法资金来源，将非法所得资金“洗白”。第二，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非法注资进行洗钱。第三方支付方式相对于传统支付方式而言具有便捷性与隐蔽性的特征，正是基于此特征，犯罪分子往往将他人上游犯罪所得的赃款，通过购买不记名充值卡或者购买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方式向第三方虚拟账户注资，经过多次转换最后完成变现，这样赃款的来源和性质难以追踪并得以“洗白”。第三，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技术漏洞进行洗钱。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兴产物，其不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处于一种宽松的监管环境。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技术漏洞，向支付客户端植入木马等病毒，从而控制他人支付账户进行交易来完成洗钱行为。

3. 洗钱范围的跨区域性：第三方支付洗钱由境内向境外蔓延

在互联网的普及下，互联网将世界融为了一个亲密的整体，淡化了地域与国界之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支付平台开展跨境支付业务，随之带来的是跨境交易盛行。互联网的跨境属性使犯罪分子可以隐匿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也为犯罪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将“黑钱”转移至境外创造了条件，犯罪分子可以 24 小时随时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洗钱活动。犯罪分子为了规避风险，将“黑钱”转移至打击力度较小、监管环境较为宽松的国家，这无疑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追查难度。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相对于传统的洗钱犯罪而言，在洗钱主体、洗钱方式以及洗钱范围上都有了新的特征。这些新变化不仅使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在洗钱效果上更为显著，还对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金

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更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防控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三、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防控存在的问题

(一)反洗钱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虽已有《反洗钱法》,但《反洗钱法》大多只能解决传统洗钱犯罪中的问题,然而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我国反洗钱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随着网络化的普及和金融机构反洗钱措施力度的加大,传统的以金融机构为中心的洗钱行为方式已经逐步转向非金融机构。[4]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过第三方支付实施洗钱犯罪的现象,然而我国对于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立法单一且层次不高。我国原有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新挑战,亟待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加以改进。

第一,《反洗钱法》对于非金融机构应承担的反洗钱义务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反洗钱法》第 3 条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主体仅包括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一直没有被明确[5],这种对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规定的欠缺,易造成依据《反洗钱法》规制第三方支付机构行为的难度较大。《反洗钱法》自 2007 年施行以来从未进行修订,无法对第三方支付等新兴业务作出具体规定,存在明显的立法滞后。第二,法律层级过低。《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规范,但它们均属于部门规章,监管的法律依据以及法律效力较低,部门规章的法律层级不足以反映非金融机构洗钱的社会危害性,这与该领域严峻的反洗钱形势不相匹配,故存在适用性不广泛、可操作性不强、威慑力不大等问题。

(二)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

1. 洗钱罪上游犯罪过于狭窄

根据《刑法》第 191 条规定可知,上游犯罪仅包括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这七大类犯罪。除此之外,"洗白"其他犯罪所得并不构成本罪,只能构成《刑法》第 312 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是,《刑法》第 312 条相对于《刑法》191 条洗钱罪而言,法定刑更轻。其实,除了洗钱罪所列举的七大类犯罪外,还有许多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犯罪,然而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这些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掩饰、隐瞒行为,司法机关只能依据刑法第 312 条适用较轻的刑罚,这在法理上说不通。[6]犯了同样的错却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 洗钱罪实行行为存在遗漏

我国《刑法》第 191 条对洗钱罪列举了五种行为方式,即"掩饰、隐瞒、转换、转移、协助",但对于经过"洗白"后资金的"获取、占有、使用"行为则没有规定。换言之,倘若某人主观上明知资金是由洗钱行为"洗白"的,或者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获取、占有、使用",从客观角度来讲这种行为也是洗钱犯罪的一种延续。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仍然造成了洗钱的后果,势必将妨害我国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破坏我国金融管理秩序,故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洗钱行为,理应成为刑法打击的对象。但是,严格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获取、占有、使用"是上述五种行为方式之外的行为方式,其行为并不会被认定是洗钱行为,只能按照其他犯罪处理,这显然不妥当。目前,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还刚刚兴起,第三方支付平台仍存在很多技术漏洞没有完善,犯罪分子从中看到了可乘之机,立法如果不能及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形进行调整,司法机关在现有的立法下,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将不能以"洗钱罪"对其他值得处罚的行为定罪量刑,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联合国禁毒公约》早就规定了"掩饰、隐瞒、转换、转让、获取、持有、使用"共七种行为方式,而我国并没有覆盖到公约中所列举的所有行为方式。

(三)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

互联网金融的无界限、跨境性等特点,决定了防范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任务。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但从目前开展的反洗钱工作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由于机构本身职能的局限性,单单依靠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并开展反洗钱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健全,极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而使第三方支付沦为洗钱犯罪的洼地。

四、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防控的完善对策

(一)完善反洗钱法律体系

《反洗钱法》的滞后性已经使其不能胜任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的重任,加之其他相关法规的法律层级过低,已不足以应对严峻的反洗钱形势,这无疑增加了反洗钱的难度,使第三方支付活动的有序开展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因此,笔者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对《反洗钱法》进行重新修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洗钱正严重破坏我国资金的正常流

转，为了有效打击此类行为，应该重新修订《反洗钱法》。首先，扩大反洗钱义务的主体的范围。为了有效打击洗钱犯罪，应将反洗钱义务的主体扩大至非金融机构，这样便能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囊括其中。其次，将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具体化，保证法律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最后，明确非金融机构的法律责任。在《反洗钱法》中，明确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法律责任，以增强第三方支付机构知法、守法意识以及服务意识，进而净化互联网金融环境。

第二，提高法律层级，增强监管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为了有效打击利用第三方支付实施洗钱的行为，应提高第三方支付相关监管规范的立法层级。与此同时，还要协调好《反洗钱法》与其他反洗钱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构建一个以《反洗钱法》为核心，以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反洗钱法律体系，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的发生。

（二）完善洗钱罪的刑法规定

1. 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在互联网环境下，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网络金融发展了起来，伴随而来的消极影响是洗钱犯罪的行为方式越来越专业化和网络化，这迫使我们需要对新兴的犯罪模式的刑法规制进行重新解读。洗钱犯罪在互联网环境下日益发展成新的模式，我国《刑法》第 191 条洗钱罪所规定的内容有必要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洗钱方式。笔者认为应将上游犯罪的范围进一步延伸，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互联网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借用互联网的便利，利用第三方支付进行洗钱，而《刑法》第 191 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并不能完全概括现有的洗钱犯罪行为，这使得刑法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显得更加被动，若不及时针对社会发展作出调整，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难以满足打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第二，满足国际合作打击洗钱的需要。如前述说，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点之一就是洗钱范围的跨区域性，因此，需要各国的协助才能有效打击跨国犯罪。国际惯例要求引渡必须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倘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规定和其他国家不一致，因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将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的开展。故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具有必要性，至于将哪些犯罪新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换言之，上游犯罪将如何扩充才更为合理，学界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激进扩容说”，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我国应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到一切有犯罪收益的犯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定得过死，导致司法实践中以洗钱罪定罪的案件屈指可数。[7] 第二种是“有限扩容说”，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将洗钱罪之“上游犯罪”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8] 笔者赞同“有限扩容说”，理由在于，如果将上游犯罪扩展到一切有犯罪收益的犯罪，将导致一些较轻的犯罪被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使得洗钱罪成为口袋罪，这样不仅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还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形同虚设。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不断普及，利用第三方支付进行洗钱已经成为洗钱犯罪的新模式，结合互联网金融这一时代背景，考虑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应当扩大上游犯罪范围，纳入所有与这七大类上游犯罪具有同等危害性的经济类犯罪，如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这样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能与国际上反洗钱监管相接轨，从而加强我国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2. 增加洗钱罪的实行行为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舍弃了高风险、高成本的线下洗钱方式，逐渐转变为低风险、低成本的线上洗钱方式。在实践中，洗钱的获取、占有和使用形式并不少见，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或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沉淀资金的行为。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沉淀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名下的沉淀资金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池，而这些沉淀资金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巨额的资金诱惑下，便有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或其工作人员对洗钱犯罪沉淀资金的占有行为。因此，应对洗钱罪的行为方式进行扩展，使之包含“获取、占有、使用”等行为方式。这样既能弥补刑法自身存在的滞后性，使刑法在保护法益上发挥更加积极的效果，又能顺应国际公约的规定。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建议将洗钱罪具体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改为概括性描述，过于具体的描述难以应对社会中日益出现的新情形，会将许多本应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排除于犯罪之外。故增加洗钱罪的实行行为方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市场监管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很多内在缺陷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克服，而需要金融监管力量的介入。我国对传统洗钱犯罪虽有较为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但对网络洗钱犯罪尤其是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监管还很薄弱。目前，我国现有的监管机构单一化，唯一有权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监管的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一非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表明了我国相关部门对其的监管应

有别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我国应该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手段,构建一个“以政府监管为主、以社会监管、行业自律为辅”的一体化监管体系。

第三方支付行业由于涵盖工商、税务、工信、银行、外汇管理等多个部门,因此要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对第三方支付实现统一监管,保证整个监管流程中没有遗漏。具体而言,可以建立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工信部、司法机关等多个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多部门联合定期研究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建立第三方支付动态监控中心,实现多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建议和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上述相关部门应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点,结合互联网特性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业准入标准,并定期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评估,对不符合要求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撤销其准入资格,降低由其带来的洗钱风险。只有不断健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才能有助于引导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有序发展,进而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

五、结语

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与发展,第三方支付成为新时代的“宠儿”,然而伴随而来的消极影响是洗钱犯罪的专业化与网络化,导致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丛生。与传统洗钱犯罪相比,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被重新认识。就具体的防控而言,应根据其新特征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以及增加洗钱罪实行行为的方式,以此弥补法典自身存在的滞后性。另外,还要修订《反洗钱法》,构建一个以《反洗钱法》为核心,以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反洗钱法律体系,从而增强第三方支付平台守法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服务标准,降低平台风险。与此同时,还应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构建一个“以政府监管为主、以社会监管、行业自律为辅”的一体化金融监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规范和指引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与金融监管体系下安全、有序地运行与发展,并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廖愉平.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风险监管研究:以 P2P 平台、余额宝、第三方支付为例[J]. 经济与发展,2015(2):51 - 57.

[2]徐汉明. 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3.

[3]兰立宏. 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犯罪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50 - 58.

[4]郭德香. 试析电子金融化时代反洗钱措施之变革[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4):60 - 64.

[5]吴波. 第三方支付洗钱:特点、风险与应对[J]. 河北金融,2019(7):44 - 48.

[6]赵秉志,袁彬. 中国洗钱犯罪的基本逻辑及其立法调整[J]. 江海学刊,2018(1):138 - 145.

[7]刘伟丽.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我国洗钱犯罪的惩治与预防[J]. 法学杂志,2017(8):101 - 108.

[8]赵秉志. 联合国公约在刑事法治领域的贯彻实施[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3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Finance: New Features and Prevention of Third - Party Payment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HE Chenxia

(School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finance has led to the rise of third - party payment methods. As a new payment method, third - party payments are easily used by criminals because of their concealment and convenience, making it a tool for money launder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oney - laundering crimes, third - party payment money - laundering crimes have three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diversity of the subject,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rime method, and the cross - regional nature of the crime scope. In terms of spe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tegrat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mprove China's anti - money laundering legal system and the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money laundering. It is expected to regulate and guide China's third - party payment industry to develop and operate safely and orderly under a sound leg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 money laundering; third - party payment; internet finance; financial supervision

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策略研究

张 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在我国,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基层政府,它也是我们法治政府建设亟待突破的重难点。而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由于特殊的社情、民情,在行政价值取向、行政文化建设、行政服务方法、行政管理创新等方面都要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探索和建设。少数民族基层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要廉洁奉公守法,培养法治思维,夯实目标责任,发挥他们的最大正能量,促进职能的充分发挥。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提出新的相对系统的标准构造模型:法治型、服务型、透明型、诚信型、责任型、绩效型"六边模型",简称 NSTCRP 模型,并构建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最后提出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治政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0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53-06

2015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 年我国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2019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确定了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我国宪法规定:基层政权在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是街道办,而在农村最具代表性的是乡镇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基础工作及重点都在基层。因此,基层政府处于基础地位,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服务最直接、反应最灵敏,是连接中央政府与群众的桥梁,是依法行政的前沿阵地。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基层政府,它也是我们法治政府建设亟待突破的重难点。

基层领导思想理念是下属行动的先导。建设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依靠的领军人物是领导干部,他们是"关键少数"。基层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要严格贯彻实施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守法执法,是下级做好工作的榜样和表率。同时,他们因为是"关键少数",还要加强作风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培养和谐的干群关系,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协作。"关键少数"履行好职责,要逐步养成目标责任制,定期落实。领导要形成法治思维,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法治政府的理念框架和政策导向。目前,全国正在推进《纲要》,正在养成运用法治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但这个过程不能松懈。

一、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现状

(一)调查问卷情况汇总

1.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程度如何? 是否按照《纲要》实施? 情况是否乐观? 为了解以上问题,我们组织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单位对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实地访谈提纲主要从法

收稿日期:2020-04-18
基金项目:2019 年度中国行为法学会课题"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研究:以郑州市、凯里市为例"(2019008)
作者简介:张霞(1977—),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和行政管理。

治政府建设工作总体情况、行政立法情况、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情况、行政决策情况、行政执法情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情况、行政监督情况、创建服务型 & 诚信型 & 责任型政府情况等 8 个方面 37 个小问题展开，访谈深入，对问卷调查是很好的补充。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单位、部门、职务 6 个问题；第二部分为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具体情况调查，共 31 个问题。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们历时两年半，兵分三路，分别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海南省、河南省部分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单位，特别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单位如贵州省凯里市和河南省郑州市，作为重点调研对象。被调查者均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管辖范围。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等距抽样等方法。问卷调查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共发出问卷 5000 份，回收 4500 份，有效问卷为 3995 份。所回收问卷显示被采访者填写态度认真，慎重选择，在很多选题中，不少被调查者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见与观点。本次问卷调查主要分析方法为对比分析法。

2. 受访者基本情况

本次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按照性别统计来看，男性被调查者占 2300 人，女性被调查者占 1493 人，性别缺失者为 202 人，比例分别为 57.57%、37.37%、5.06%。按照年龄统计来看，覆盖了自 22 岁至 58 岁的成年人年龄段群体，分布比较均衡，偏差较小。按照民族统计来看，2340 人为汉族，1455 人为少数民族，另有 200 人信息缺失。其中汉族被调查者比例为 58.57%，少数民族调查者比例为 36.42%。

本次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按单位和部门统计看，主要集中在基层村委会、居委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民政局、信访局、法学会、公安局、民宗局、法制办、民宗委、司法局、总工会、政法委、人民政府等相关的民族管理办公部门。按职务统计看，有上述相关的民族管理办公部门的相关基层领导和基层工作人员。样本代表性较好。

3. 问卷调查情况汇总

(1)社会治理方面的民族特征

82% 的受访者认为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扶持政策较多、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会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及族规、少数民族人员在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比例、少数民族群众能够经常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并发表意见这些方面。

在政府日常执法活动中，63% 的群众认为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群众被公平对待，而且 36% 的群众认为享受到民族优待政策。这说明我国的民族政策比较完善，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进一步调整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63% 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遇到过当地法律法规与少数民族的习惯和族规相抵触的情况，31% 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会结合实际采取折中的处理措施，18% 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会偏向采用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依法处理只占到 11%。

(2)依法行政现状的总体评价

当群众维护自己利益时，最信赖和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党和政府、司法部门和所在单位，而依靠家庭、家族和宗族的比例不太明显，说明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还有不尽如人意的细微问题有待处理。相关数据参照表 1。

表 1　群众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最信赖和依靠的对象统计表

A	B	C	D	E	F	G	H	I
78%	18%	7%	22%	33%	11%	6%	10%	6%

(A. 党和政府 B. 家庭、家族、宗族 C. 所在社区 D. 所在单位 E. 司法部门 F. 私人关系网 G. 工青妇组织、各种协会 H. 新闻媒体 I. 宗教组织)

58% 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地政府依法行政现状总体是好的，但是还是有 42% 的被调查者认为一般，说明依法行政水平还有待提高。被调查者认为对行政执法主体单位资格有必要进行认定的比例高达 89%，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单位资质的保障。被调查者认为对行政执法人员个人资格有必要进行认定，比例高达 96%，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人员素质保障。

本地区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方面主要存在缺位现象，行政不作为；错位现象，行政乱作为；越位现象，越权行政。缺位不作为有缺位和不作为两方面的意思。缺位即政府职能缺位，不作为即行政不作为。行政错位是由政府职能缺位不作为导致的，如果行政不作为非常严重，政府职能就背离公共权力机构的宗旨，反之如果政府太作为，就会越俎代庖，该管的不管、不作为；不该管的乱管、乱作为。行政越权干部干的往往是非行政职权范围的工作，或无法确定授权或委托的越权行为。

本地区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主要存在执法行

为不够规范，占到54%；执法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占到32%。执法主体、行为及法定依据等未按规定公示，执法人员未参加相关培训，管理不严格也会出现在行政执法问题中。只有不到3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存在这些行政执法现象。

本地区政府对平时工作中出现的行政争议，68%的被调查者选择派专门人员出面做协调工作，36%的被调查者选择请当地派出所协助做工作，只有不到30%的被调查者会上报上级机关处理。本地区政府在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方面，过半数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出现以上三种情况，但是有3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被终审法院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责令履行，2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胜诉或原告撤诉，但行政执法中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或程序中有瑕疵。

本地区政府在依法决策方面，主要存在决策程序规定不够完善(43%)，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落实不到位(38%)，决策评估制度落实不到位(32%)，只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依法决策良好，以上三种现象均不存在。

(3)行政执法监督状况

被调查者认为行政执法监督的含义应该包括上级对下级行政执法的监督(81%)，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机构的监督(78%)，社会主体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82%)。57%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部门贪赃枉法影响最坏，4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部门有法不依影响最坏。

71%的被调查者未曾参与过政府决策行为，22%的被调查者参与过政府决策行为，极少数的1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该如何参与政府决策行为。政府决策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决策公信力低(58%)、决策质量不高(51%)、决策执行力低(39%)和决策程序不正当(25%)。当前政府决策主体未能作出有效决策的原因按顺序排列主要是公众参与程度低、行政决策前期调研工作不到位、决策监督不力、决策责任追究不到位、决策机关管理不严、人员本身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素养低下、行政决策程序违反规定。相关数据参见表2。

表2　政府决策主体未能作出有效决策的原因统计表

A	B	C	D	E	F	G
21%	44%	53%	14%	25%	33%	26%

(A.人员本身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素养低下 B.行政决策前期调研工作不到位 C.公众参与程度低 D.行政决策程序违反规定 E.决策机关管理不严 F.决策监督不力 G.决策责任追究不到位)

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借助途径主要是通过相关行政部门调解以及矛盾双方自行协商，或者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通过信访、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比重较小，几乎很少人通过第三方解决途径来化解矛盾冲突(参见表3)。在纠纷解决的相关因素中，被调查者认为结果公正最重要，占到56%；其次是程序简洁，占到42%；接着是自愿灵活性，占到29%；再接着是经济实惠，占到21%；最后才是保密性，占到13%。可见人们对于公正的诉求最高(参见表4)。

表3　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过程借助途径统计表

A	B	C	D	E	F	G	H
65%	65%	26%	26%	25%	40%	28%	7%

(A.矛盾双方自行协商 B.相关行政部门调解 C.行政复议 D.仲裁 E.诉讼 F.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G.信访 H.其他第三方解决途径)

表4　群众最看重的纠纷解决的相关因素统计表

经济实惠	程序简洁	自愿灵活性	保密性	结果公正
21%	42%	29%	13%	56%

从本地区信访渠道畅通情况来看，63%的受访者认为畅通，19%的受访者认为不清楚，18%的受访者认为不够畅通，8%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不畅通。群众选择越级上访的主要原因是群众观念认识上的错误，总认为找上级比找下级更管用，有这种认识的受访者占到68%，有47%的受访者多次到基层反映未果，还有28%的受访者是受人指使或者煽动，仅有7%的受访者是在基层找不到人。大家普遍关注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质量方面，主要是更新及时、准确可靠、实用有效、全面和种类多且信息量大。

(4)法治政府建设的制约因素和衡量标准

当前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列为：依法行政的社会氛围不好，公众依法办事和守法意识不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绩考核过分追求GDP；“一把手”说了算，公务人员法律意识不强，运用法治能力不高；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问责不到位，不够有力；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行政能力欠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应该着力做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科学民主依法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等工作。相关数据参见表5。

表5　当前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因素统计表

A	B	C	D	E	F	G	H
33%	44%	35%	29%	49%	21%	21%	21%

(A.“一把手”说了算，公务人员法律意识不强，运用法治能力不高 B.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C.政绩考核过分追求GDP D.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问责不到位，不够有力 E.依法行政的社会氛围不好，公众依法办事和守法意识不强 F.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 G.行政能力欠缺 H.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调查显示,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主要有:领导人法律素养、政府执行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政府公信力等。公民心目中的法治政府的样子主要是:严格执法、公正廉洁、依法办事、高效便民、公开透明、服务到位、监督有力、诚实守信和公平民主。

在调查群众心目中的法治政府模样时,群众比较看重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比重都占到80%以上;其次是公正廉洁和公开透明,比重都占到70%以上;然后是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公平民主、服务到位、监督有力,比重都占到60%以上。相关数据参见表6。

(二)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显著特征

第一,由于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小聚居和大杂居,大分散和小集中,造成法治政府管理难度加大。比如宣传教育上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但是在执行和反馈上是很有问题的,希望政策在基层政府组织层面的时候不变形,不矫枉过正。

第二,各民族历史悠久,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在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时,要考虑民族习惯法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兼容问题。

第三,宗教对法治政府建设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者居多。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法规即为宗法,它们往往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制度,可见并不仅仅是依靠我国宪法允许的法律制度,比如村规、民约和族规。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中要利用宗法中合理的地方,但也不能忽视它消极的一面,以免对发展造成重大桎梏。

表6 群众心目中的法治政府调查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83%	79%	85%	67%	70%	60%	60%	65%	44%	49%	56%	44%	53%	65%

(A. 严格执法 B. 公正廉洁 C. 依法办事 D. 高效便民 E. 公开透明 F. 服务到位 G. 监督有力 H. 诚实守信 I. 政令畅通 J. 维护稳定 K. 保障人权 L. 促进发展 M. 科学决策 N. 公平民主)

二、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虽然《纲要》已经颁布,但是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行政文化氛围欠缺,管理体制没有民族的针对性和特色,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政府领导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法治思维欠缺,有法不依和有法难依。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指挥下属朝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正确方向前进。极个别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还是人治管理,领导干预司法,甚至高于法治。在城中村拆迁重建问题上,一些领导干部未能建立法治思维和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尚未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在基层法治政府层面上表现为县域政府的不作为[1],政府领导根本没有正确认识职能性质。

2. 行政执法人员少且素质偏低,执法人员资格管理不到位,执法不严格不规范。当前在依法行政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层执法人员素质偏低,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有法不依和有法难依,导致部分制度落实不到位,化解矛盾纠纷不依法进行。由于受到机构改革的影响,一些新增加的执法人员还无法办理行政执法证,无法开展亮证执法工作。另外还有其他问题:执法人员数量少、工作量大、待遇低;复杂案情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依法行政成为提高行政效能的障碍。

3. 行政决策不科学不民主。当前我国基层少数民族政府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科学决策体制,主要原因是决策者本身素质低,决策能力差,行政心理往往保守,受民风民俗影响。决策者一般凭经验,主观臆断性强,不会咨询专家,即使咨询也是走形式,不会采纳其合理化意见,极个别的还会暗箱操作,不公开,不民主。行政决策缺乏程序化、规范化,更没有形成制度化。因为权力太集中,加之决策监督不到位,不能进行有效的决策预警,导致决策方法手段不科学。

4. 执法机关利用手中职权搞腐败。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和时限不明确,效率不高。政府管得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的作用。尚未建立完善的全过程记录信息调阅监督制度,法制审核人员配备也未达到要求。在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开拓创新不够,工作亮点不突出,工作发展不平衡。社会治理水平与群众要求还有差距,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影响平安稳定的隐患还不少,营商环境还需要优化。

5. 政务公开意识不强,信息公开工作存在实效性和科学性不足等问题。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政务”得到快速发展,但基层政府的政务诚信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欠发达地区在政务服务过程中的信用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基层政府普遍在食药领域和重大建设项目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较弱,诚信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等。领导意识不到政务公开的重要性,不公开虽然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但有

些致命性的关键问题不会暴露,民众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预警。缺乏监督预警思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流于形式,结果也毁坏了政府良好形象。如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热点问题,李文亮事件、湖北红十字会捐赠事件,政府没有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公众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误解或者以讹传讹,好在政府后来进行深入调查,召开新闻发布会,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维护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模型构建

(一)打造职能科学的基层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

我们根据实地调研,结合基层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相对系统的标准构造模型,从法治型(Nomocracy)、服务型(Service)、透明型(Transparent)、诚信型(Credibility)、责任型(Responsibility)、绩效型(Performance)"六边模型",简称NSTCRP模型(见图1),进行塑造和完善,给地方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努力的方向,进一步优化我国基层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内在职能,从职能回归本质:走向现代政府[2]。应当允许基层政府"全身心"致力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再层层下压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任务[3],促进职能转变,使政府的内在职能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该模型具有稳定性强、系统完整的特点,对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有一定的导向和优化作用。

(二)打造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从上述的六边模型(NSTCRP)中的六个维度进行研究,其中法治型(N)主要从法律的建立与完善、行政执法、守法等指标入手。服务型(S)主要从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公众满意度等指标入手。透明型(T)主要从政务公开程度、信息公开时效、咨询服务能力等指标入手。诚信型(C)主要从政府诚信意识、政务诚信漏洞数量、群众信任度等指标入手。责任型(R)主要从责任意识、问责制度、责任担当等指标入手。绩效型(P)主要从地方GDP、环保、行为改善等指标入手。我国对公务员的考核标准是"德能勤绩廉",但实际上存在考核标准笼统、量化不足、手段陈旧、考核结果认定平均化、服务对象评价缺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基层政府考评除了经济指标外,更要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普及教育、促进就业、消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提供社会保障、保障民生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变单一考核指标为综合考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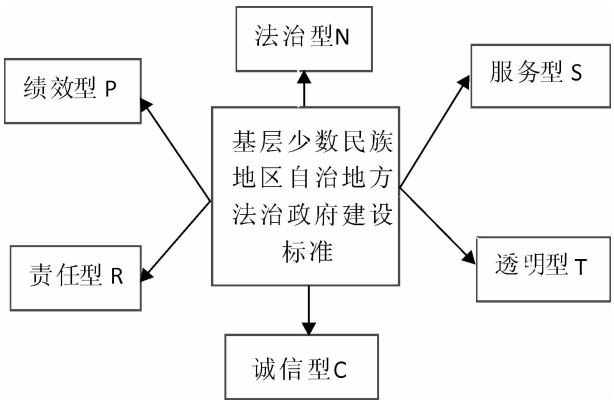

图1 NSTCRP塑造模型

四、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策略

1. 培养党员干部和公众的法治思维和意识,强化领导责任,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政府立法工作理念要不断创新,政府立法工作重点要与时俱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履行基层法治政府的相关职能。服务型政府职能应该秉承"以公民为本位"理念,以服务为核心价值的行政理念,公众共同参与决策为基础,精简和便民为原则,公开和透明为特点。权力设定、运行、监督,都应在公民普遍认同的法律框架之内。根据NSTCRP模型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职能向服务核心转变,确立以服务为核心的新的行政价值取向。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领导责任意识和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调查研究与工作力度,保障和推动基层行政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2. 扩编制精培养。基层执法人员编制数量少,建议增加编制,扩充基层力量。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提升民族宗教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特别是执法人员由于缺乏依法行政意识,往往在执法过程中无意中犯法,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争议。我们只能通过培训,增强其法治意识,执法才能守法。根据今后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工作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依法行政相关业务知识的学习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普及法律知识,加强培训学习,真正做到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 完善机制建设。依据法治建设成效,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等重难点问题建立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基层组织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管理,出问题要问责。针对在依法行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对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工作制度和机制建设,

确保行政执法工作稳步推进和规范开展。完善依法行政工作落实机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监督和问责机制。如海南省儋州市采取“干部一肩挑”制度,即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1人担任,实施“一核两委一会”制度,村务协商会协助解决各类民生和社会治理难题。

4. 建立阳光政务,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数字信息公开透明,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今后首先要提升信息公开、依法公开、主动公开意识;其次要拓展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与形式还需进一步规范;再次要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最后要拓展完善信息公开渠道,进一步提高门户网站建设创新度。政府要不断提高主动公开的全面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力度,配合机构改革进一步整合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构建智慧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进行梳理,按照新的科室职能进行分类。进一步充实细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尤其是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互联网时代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政府,少数民族基层新型政府具备整体性、智慧性、互联性、透明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深化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建议加快推进落实基层政府政务公开,完善基层政府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制。

5. 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依法行政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水平和能力,对于多次抵触政府的行为人,应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人治,落实法治。政府应加强执政,作为公务员,不应成为群众的出气筒。强化依法行政监督与问责机制,完善相关法规和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查处力度,反对提拔干部靠关系、看钱财的做法。少数民族基层法治政府应该增强公信力,提高软实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最需要政府提供服务,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的呼声最高,其次是简化政府相关部门的办事流程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 解红军.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财经界(学术版),2019(16):13.

[2] 竺乾威. 服务型政府:从职能回归本质[J]. 行政论坛,2019(5):96-101.

[3] 崔慧姝. 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考[J]. 杭州,2019(9):56-5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in Grass-Roots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ZHANG Xia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key point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is still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to be solved urgently.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social and civil con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n minority areas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and constructed in the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value orientation, administrative culture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method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etc. Leading cadr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leaders, organizers, and implementers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y should be honest and upright, abide by the law, cultivate the thinking of the rule of law, consolidate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maximum positive energy, and promote the full play of their functions. How to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we propose a new standard construction model of relative system, nomocracy, service, transparency, credi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performance, which is called NSTCRP model for short. At the same time, it construct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n the substrates ethnic minority areas. At last, it gives th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minority areas; grass-roots;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移动互联时代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

——以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为例

惠 萍,李倩楠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移动互联时代媒介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村民的信息实践活动,也改变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格局。以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为例,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呈积极态势,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及价值认知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是村民的人际交往受地缘、亲缘及价值归属的影响具有乡土性;其次是信息获取因年龄、职业及学历的不同呈现多样选择和诉求差异性;再次是生活方式受新媒介技术在农村迅速扩散的影响较大呈现新趋势,但其价值理念受乡村文化内在延续性的影响对媒介的回应较弱。当然,部分村民也对当今媒介技术的负面影响感到忧虑。整体来看,村民对移动互联媒介呈拥抱和期待的态度,乡村也从两者的双向作用中汲取养分并丰富其文化内涵,从而推动乡村的良性发展。长远来看,在尊重村民表达主体的基础上利用移动媒介发掘村民自主性,提高其认知能力和媒介素养是建设我国新型乡村文化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农村传播;媒介接触;信息实践;乡村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1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59-06

一、文献综述

移动互联时代,媒介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和文化形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方面,移动网络赋能社会所有成员,使社会成为一个信息、利益及价值的共享体;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跨语境、全球化的互动、参与及协作成为社会主流。这些变化也影响了农村:一是改变了村民媒介接触的方式和渠道;二是影响了村民的信息实践和生活方式,使乡村呈现出新风貌。这些变化业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媒介变迁与乡村发展关系的成果。仔细研究可知,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探讨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如方晓红以苏南农村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影响下,苏南农民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城市居民趋同,"电视成为乡村与都市对话的桥梁"[1];(二)研究媒介与村民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比如顾炜程[2]、姜彩杰[3]分别以上海青浦和鲁南乡村为例,研究媒介对当地居民社会交往格局的影响;(三)从信息沟理论出发探究城乡媒介传播的差距。如李艳艳认为手机在缩小城乡知沟中发挥了有效作用,推动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4]袁立庠则分析了手机媒体在农村传播中的优劣势,提出了缩减城乡间信息沟的措施。[5](四)研究乡村媒介传播的发展范式。仇学英从农村社会的传播类型、模式、效果等方面出发,探索了农村传播的有效性;[6]谭英则提出了我国乡村社会的传播体系;[7]王涛从乡村转型出发,探讨农村传播的路径、内容及趋势;[8]洛正林通过梳理农村传播研究的历程指明了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9]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目前关于媒介发展与农村社会的研究多是以某一媒介的个案研究为主,从村民的具体生活入手,多方面考察其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的研究较少。因此,调研以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村民日常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为样本,探析其与村民的学历、年龄、职业等因素的相关性及其

收稿日期:2020-04-18

作者简介:惠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等领域的研究。

为村民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价值理念等方面带来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总结村民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最后探讨这些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这样不仅可以明晰当下乡村发生的变化,为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还有助于村民自发利用媒介建立话语权,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调研结果还可以为媒介信息的针对性分配、合理性布局提供有效参考,从而促进我国信息传播格局的优化。

二、调研设计方案概述

(一)研究目标

从村民的实际生活入手,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从信息获取渠道、手机媒介使用状况、媒介接触评价等方面来分析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是否受教育程度、年龄状况、职业特点及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进而探讨媒介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二)研究对象选取

中王村,河南省济源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辖村,基本情况如下:(1)地理位置:地处二环路以西,济源示范区郊,深受示范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传播技术和手段的普及程度较高。(2)交通建设:获轵公路由西向东从村中央穿过,省道从村东面穿行,北面紧邻 207 国道,交通优越,出行便利。(3)人口结构:村人口共 4500 人,外加一千余外来人口。(4)耕地:耕地面积五千余亩,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还培育花卉、苗木、果园等。(5)基础设施:村中网络覆盖率达 95% 以上,基础设施完备。(6)职业构成:村民成员从业类型多样化,与本村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包括农民、教师、小商店个体经营者、技术工人、学生及单位工作人员等。总的来说,中王村集中体现了转型中农村的特点:生态样貌具有传统村落的形态,又因地理优势与城市互动频繁,村内现代化水平整体较高,结构布局又有向现代化村庄过渡的典型性。因此,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具备调研条件和研究价值。

三、基于中王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调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发放 150 份,回收 105 份,有效问卷 103 份;后期进行面对面访谈。中青年教师 2 人、55—65 岁农民 5 人、个体商户 3 家、学生 3 人、自由职业者 1 人、村干部 1 人,总计 15 人进行访谈。同时从三大方面着手分析移动互联时代下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首先是被访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其次是村民在生活、经济、人际交往及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媒介接触与实践情况;最后是村民对媒介的认知及评价。

(一)中王村民基本情况

主要从年龄、职业、学历三方面分析样本受众的构成情况。

1. 在年龄构成方面,20—45 岁的青年人占比 68.57%;其次是 45—65 岁的中年人占比 23.81%;之后是青少年和老年,共占比 7.62%。从整体上看,网络媒介的使用者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中年人次之,随后是少年和老年。

2. 在职业构成方面占比最多的是农民 36.19%;其次是自由职业者 20.95%;次之是民企职工 16.19%;之后是其他职业共占 10.48%。国企和事业编从业者及个体商人占比大体相同,分别为 8.57% 和 7.62%。由此可见,虽然务农比例高,但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当地的唯一选择,村民的职业由单一转向多元,出现职业分层现象。

3. 在文化水平分布上,村民学历大都集中在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最少,仅为 4.76%。

结合访谈得知,随着村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加上近几年媒介对上学无用论纠偏,大多数家庭村民已逐渐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村内各类辅导班的相继出现,预示未来村中的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得到提升。

(二)村民的媒介接触与实践情况

主要从村民的生活信息、经济信息、人际交往及公共参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

1. 生活信息获取情况: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问卷列出了六种途径:手机、电脑、电视、亲朋、邻舍及其他。调查显示,手机是村民获取信息最常用的媒介,占有绝对优势,高达 91.43%;其次是电视(57.14%);再次是亲朋好友(32.38%);之后是电脑(27.62%)。邻舍则是 21.9%,最后,其他渠道包括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10.48%)。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报纸、杂志、传统图书以文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群体为主,且订阅需要一定的费用,村民对这类媒介的接触并不多。但广播因成本低、内容贴合生活且声音传播易于理解等优势,在早些年得到村民的追捧。但随着手机广播的兴起,传统广播也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村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对手机的高频度使用也让村民意识到了一些问题。59.04% 的村民认同手机的使用会让人沉迷虚幻,脱离现实,尤其是青少年沉迷手机荒废学业的

现象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

在日常信息获取种类方面,村民对社会动态类新闻的接触比例最高达 75.24%。尤其是在一些热点的社会新闻上,不论年龄、职业和学历,村民的获取方式和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大同小异。而经济发展类新闻(45.71%);随后是政治时事(43.81%);最后是娱乐信息(41.9%)。后三者比例相差无几。

在休闲方式上,看电视占比最高为 65.71%。虽然电视仍是村民主要的休闲方式,但是观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村民既可以选择智能网络电视,又能通过多样的视频客户端观看。其中,村民对腾讯、爱奇艺等手机 APP 的使用高为 50.98%。

第二是用社交工具聊天,占比53.33%。这与村民热衷使用社交软件有关:村民对微信和 QQ 的使用比例高达到 98.04% 和 62.75%。排第三的是用手机看新闻(41.9%)。这与村民使用今日头条(42.16%)、微博(26.47%)等新闻资讯类 APP 相关。不少村民表示用手机看资讯不仅可以扩大视野,还可以积累不少文化知识。村民对支付宝(78.43%)、淘宝(55.88%)等购物软件的使用也使网络购物(37.14%)在其业余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看书阅读(34.29%)在村民的休闲生活中锋芒初显。其原因在于村民认为传统的大多数纸质书籍不论是内容深度还是书写方式与自身认知都存在较大差距,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但新兴的电子书以及喜马拉雅、荔枝等各种听书 APP 的兴起,不仅可以让村民在品类繁盛的资源中轻松找到符合自身认知习惯的书籍阅读,还能有充裕的机会听到各类通俗易懂的评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村民日常接触电子书的兴趣。

整体而言,村民的娱乐方式趋向多样性,尤其是以移动互联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娱乐方式正出现在村民的生活中,且占比逐渐上涨。

在村民接触与使用媒介的目的上,首要是为了方便生活(62.86%);其次是增长见识和休闲娱乐(55.24%);之后是了解社会动态(52.38%)、了解与己有关的政策规定(42.86%)、了解国内外时事(32.38%)、工作需要(27.62%)及其他目的(6.67%)。在婚丧嫁娶上,69.52% 的村民更愿意遵守老人留下来的经验,也有 35.24% 的村民在继承传统礼仪的基础上,从网络上查询获得相关知识。在教养子女上,69.52% 的村民在遵循长辈育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网上查到的相关经验知识培育子女。在此过程中,两代人根据实际情况相互纠偏纠错。此外还有 43.81% 的村民遵循父母辈养育孩子的经验;22.86% 依靠网络查询的经验培育子女。这种现象暗示村民代际之间正在出现更多的沟通与理解:老人对新兴事物不再是单方面的抵制和谴责,而是有选择性的学习;同时,青年人也在尊重的基础上纠偏。整体而言,村民的认知观念和情感判断受移动媒介影响出现了新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明显甚至未从根本上动摇其价值理念。

2. 经济信息接触情况:在日常网购行为上,85.71% 的村民都有网购经历。在村民日常网购的频率上,年龄越大,网购的频率越小。每天或十天以内的网购频率集中在 20—45 岁之间,45 岁之后的村民大都是在一个月及以上。据了解,目前村里借助网络售卖商品的行为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以微商为主且主要靠朋友圈推广。涉及洗护、瓜果、美容、服饰、小食等。

据调查,村民在网上搜寻或发布招聘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网站;一种是通过朋友圈。但是村民对两种途径的评价相差很大:大部分村民认为网站上的信息虚假失真,和现实情况严重不符,而朋友圈大都是亲戚朋友,信息真实可靠。并且在网上搜寻或发布招聘工作和年龄、职业、学历密切相关。首先在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占比越少:20—35 岁占比最多(69.23%);其次是 35—45 岁(26.09%);最后是 45—65 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仅有 10%。在职业方面,农民在网上搜寻或发布招聘信息的比例最低(15.79%);其次是个体商人(25%);随后是国企和事业编单位职工(33.33%);再次是民企职工(41.18%);占比最高的是自由职业者(45.45%)。在学历方面,总体趋势是学历越高利用网络搜寻或发布招聘信息的比例越大。这从侧面反映出,村民对媒介的接触与使用在年龄、职业、学历方面根据自身需求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

整体而言,村民在多样化的媒介使用中消费意识进一步增强,消费行为和消费生活不断拓展[10]。同时,部分村民通过移动网络使其工作有了更多样的选择形式,收入来源也有了更广泛的渠道。

3. 人际交往情况主要以访谈的形式进行考察。首先,村民日常的交流对象集中在熟人之间。其次大部分村民(85.29%)认为社交化媒体的发展,极大方便了日常夫妻、子女和亲朋间的沟通。如亲人或是朋友在外地,可以和他们视频,了解彼此生活的真实状况;在他人不方便接电话时,微信可以及时传递信息;尤其是微信的语音和手写功能,可以帮助低学历或年老的村民利用媒介进行社交。同时,他们认为朋友圈的出现不仅可以了解亲朋的生活动态,

点赞和评论功能还有助于增进彼此的情感交流。对此,也有14.71%的村民不认同社交媒体尤其是否定朋友圈可以加深情感。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朋友圈的观望者,并不能亲自参与别人的生活,点赞流于表面的客套。最后,村民的交往范围与以往相比有所扩展,且其扩展程度与职业有关。与个体商人、自由职业者等其他职业相比,农民非常赞同人际交往范围得到扩展的比例最低(26.32%);个体商人比例最高(75%);其次是自由职业者(40.91%);国企和民企职工比例大致相同,分别为33.33%和35.29%。整体上看,中王村民的人际交往范围有所扩大,但基于亲缘和地缘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交往频度没有明显改变。

4.公共事务参与情况:村民参与本地事务的方式以微信群为主(55.24%);其次是亲朋好友(24.76%);再次是街坊邻舍(15.24%);最后是村委广播仅有4.76%。从村委和村民处得知,目前村委建有微信工作群,平时都在群里交流工作。这种方式既方便传达信息,也利于村委和村民沟通。在媒介对村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影响上,74.29%的村民认为现在的媒介为个人就社会公共事件发表意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68.57%的村民认为媒介的使用可以促进个人诉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但也有25.71%的村民对此持怀疑态度,还有2.85%的村民不赞同这一说法。有44.76%的村民认同基于网络的转发、评论可以影响政府决策,55.24%的村民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原因在于:村民认为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人云亦云或是混淆视听的评论占多数,真正有助于事件解决的信息只有少数不容易被广泛传播。所以,网上的言论大多数很难被政府采纳。

(三)媒介的认知情况

主要从村民对媒介的正负面影响的认识及其利用媒介的能力等方面考察。首先,在村民对媒介的认知方面,85.72%的村民认同媒介的使用方便并丰富了生活;95.24%的村民认为网络媒介的接触与使用可以开阔视野、增长了见识。在村民对媒介的负面认知方面,75.24%的村民赞同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的使用增加了诸如就业、养老、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的频发。原因在于:媒介信息中经常有相关现象的具体描述,极易引发其他人的效仿意识。20%的村民不确定,还有4.76%的村民不认可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负面问题的频发只是表象。过去受地域限制,人们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加上媒介不发达,负面信息向社会传递的渠道很少。因此,违法乱纪主要还是与和个人品行有关,网络只是一种手段,让现在的人有途径将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

其次,在鉴别、信任及利用媒介方面,48.58%的村民确认自己能鉴别媒介信息的真假;45.71%的村民对此持怀疑态度;还有5.72%的村民认为自己不能区分媒介信息的真假。65.71%的村民对媒介信息的信任度不高;20.96%的村民表示相信网媒介信息;还有13.34%的村民不相信网络信息。除此之外,51.43%的村民认为自己可以自觉规避媒介的负面效应;41.9%的村民对此持怀疑态度。近一半的村民认为媒介传递的信息真假混杂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来鉴别信息真假并规避媒介使用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媒介多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村民利用媒介进行自我服务的能力。

最后,在媒介接触对村民行为认知的影响方面,47.62%的村民认为媒介不会对自身的行为认知产生重大影响;42.95%的村民赞同媒介改变了自身行为和态度,主要体现在媒介可以让自己更具包容性;9.52%的村民不赞同这种看法。在媒介使用评价方面,54.29%村民倾向利大于弊;35.24%的村民认为利弊相等;还有10.48%的村民认为是弊大于利。

总体而言,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使用并非是一种被动行为,而是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积极诉求。尤其是随着5G技术的到来,大部分村民对其发展满怀期待,认为媒介在未来会越来越智能,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但也有部分村民对媒介发展为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忧。如年轻村民沉迷手机的状态缩减了家庭日常的情感沟通、未成年子女受手机游戏或是短视频播主的影响价值观念扭曲、部分中老年不太熟练甚至不会使用智能媒介心里涌现出被社会抛弃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等。

四、村民日常信息获取与实践的特征及原因探析

在移动互联时代,村民对媒介多样化的使用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格局:一方面,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消费行为和其收入来源有了更宽泛的途径;另一方面,村民有了更多的自我发声渠道,其公共参与形式也得到了拓展。具体来看,目前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活动与传统乡村生活相比主要有五大特征。

第一,村民的信息获取方式主要依靠移动传播终端,获取的信息以社会新闻类为主。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内容趋向同质化。

其原因在于:首先,移动媒介的普遍使用与我国网络的普及与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的扩散有直接关系,而移动网络的普及与我国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扩散密切相关。换言之,中王村民的媒介接触和信息实践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媒介技术比如5G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更迭,我国相关部门对媒介的管理却相对滞后,绝大多数的信息分发被迅速崛起的大型互联网商业公司如今日头条、腾讯、阿里掌控,但其又不具备新闻采访权从而导致在一些热点、重大的社会事件上,依赖这些商业公司运作的移动互联媒介只能大量复制转载少数官方媒体的信息,使得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内容趋同。

第二,村民日常信息获取受年龄阶段的影响呈现内部差异、职业分层和教育程度。比如村民年龄越大,网购的频率越低、金额越小,利用网络买卖的能力越弱;职业分类的不同,对陌生人接触的比重也不同;村民学历层次越高,对媒介认知的态度越趋向中性,利用媒介的能力也越强等。在网络媒介接触中,"不同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和诉求趋势,这是一种正态的社会信息分布结构"[11]。现实中每个人的信息诉求不仅是多元化的,对信息的需求总量也是不一致的。因此,个体的信息结构差异具有合理性。除此之外,由于网络媒体出世的时间短,竞争激烈,对信息的审核流程把控不完善,导致虚假、低俗信息大量存在。而村民受制于文化水平,难以对信息的真伪做出准确判断,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大部分村民对利用媒介为自己服务的自主性不强。

第三,村民的信息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乡土社会色彩:村民虽然运用社交媒介与陌生人进行交往使其人际范围也有所扩大,但交往深度有限大部分还是基于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即"业缘关系的扩大并没有改变农村内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主体地位,由它们所决定的交往方式和交往频度等也没有明显的改变。"[12]

一方面村民在接触与使用媒介的过程中,把媒介看作一个熟人社会的联系工具,交往对象的拓展多数是出于交际的需求维持在较浅层的阶段,实际交往并不深入;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居住空间本身就是开放的,因此农村的人际传播是连续的、持久的、自由的"[2],因此村民的交往更多的是着眼于熟人之间情感、归属感、认同感的培养。可以说,移动互联媒介对于乡村居民而言,更多的是促进了熟人间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

第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逐渐偏向移动化、网络化。其原因在于网络技术和赋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不仅使村民接触和传播信息的机会增加,还为村民提供了和媒体、社会甚至是国家权力机构平等对话的机会。加上社交媒体比如微信、抖音的发展,村民发布的信息可以通过叠加推广快速传播。这些因素不仅激发了村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热情,还推动了村民借助各种媒介表达自己诉求:"越来越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观念更加开放,自尊感和责任意识也在增强。"[2]

第五,村民的媒介接触和信息实践活动没有因移动媒介的迅猛崛起出现明显的撕裂、无所适从或断层现象,而是自然更替的。

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所牵涉的不仅仅是行动层面,更包括文化层面。村民的价值认知在移动媒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新变化,比如不再固守所有的传统风俗、代际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沟通与包容、对多元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等。但受乡村文化内在连贯性的制约,村民的价值观念未从根本上受到直接冲击。一方面,在乡村成长、生活的村民,其价值认知是在乡村文化长期的熏陶下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固守性,没有重大或突变因素的影响,已有的价值观念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大部分村民只是将媒介作为方便生活的一种工具来看待,忽视其对价值理念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文化具有外在的更替性和内在的稳定性:当媒介试图通过改变村民原有的社会行为和价值理念使其朝向新的形态发展时,乡村文化就会发挥维持传统社会格局的作用,使两者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会从中汲取养分以丰富其文化内涵,确保乡村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得以稳健发展。

五、结语

中王村社会格局的变化表明,村民虽然将媒介看作一种丰富日常生活的工具,但媒介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往往会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价值理念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村民在长期的媒介接触中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媒介既有正向的引导也有负面的干扰。因此,媒介对村民生活带来的利弊权重以及村民利用媒介自我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村民自身媒介素养的高低。根据调研结果来看,村民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并不盲目听从或是否定媒介信息,而是结合自身丰富的经验阅历对媒介信息进行判断。加上当下移动媒介的开阔性和交互性,村民在与其的互动过程中自身素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受学历、地域及其他相关

因素的限制,媒介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尊重村民表达主体的基础上利用移动媒介激活村民自主性,提高其认知能力和媒介素养、为村民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及获取新媒介技术的机会,是今后推动乡村传播发展的必要路径,也是推动传统乡村向现代社区型乡村平稳转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方晓红. 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J]. 当代传播,2004(4):25-27.

[2]顾炜程,朱娇娇. 社会转型中农村的传播媒介与观念变迁、交往格局的关系研究:以青浦农村家庭调查为例[J]. 新闻大学,2007(2):70-74.

[3]陈丽雪. 社交类 APP 对苏中农村传播的影响[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4]李艳艳. 手机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角色探讨[J]. 今传媒,2009(12):89-91.

[5]袁立庠,尚 勤. 手机媒体对中国城乡"信息沟"因子的影响作用:一项基于农村手机媒体信息传播的调查分析[J]. 现代传播,2013(6):105-108.

[6]仇学英. 社会主义新农村传播发展模式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7]谭英. 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王涛. 当代乡村信息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J]. 读书文摘,2015(12):33-32.

[9]骆正林. 农村传播研究的"寂静"与"繁荣"[J]. 新闻爱好者,2013(9):32-35.

[10]刘兰. 互联网对岐山县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探析[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11]李红艳,牛畅,汪璐蒙. 网络时代农民的信息获取与信息实践:基于对北京市郊区农民培训的调研[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4):45-61.

[12]张静华. 传播媒介与乡村居民的社会交往转型:以上海市青浦地区为例[D]. 上海:复旦大学,201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Villagers' Media Contact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Taking Zhongwang Village, Jiyuan Ci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I Ping, LI Qiann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information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villagers, but also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heir cultural life. Taking Zhongwang village, Jiyuan Ci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villagers' media contact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shows a positive trend, and their chang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aspects such as lifestyl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perception, show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villager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ossesses localism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y, kinship, and value attribution; secondly,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has difference because of the ag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thirdly, the lifestyl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rapid spread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and presents a new trend. However, it's value concept weakly responds to the med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herent continuity of rural culture. Of course, some villagers are also worried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esent media technology. On the whole, villag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mobile Internet media is to embrace and look forward to it. Meanwhile, the village also absorbs nutrients from the two-way effect of the two and enriches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a resul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is promoted. In the long run, using mobile media to explore villagers' autonomy and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and media literac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villagers' main body of expression is a top priority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rural culture in my country.

Key words: rural communication; media contact; information practice; rural culture

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

王福帅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网络作为公民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对新社会阶层构成主体及其网络舆论生态的界定,提出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具有改变网络舆论阵地格局、带有鲜明主观色彩、舆论议题趋于理性和多元化、线上感召力强等特点。其可能带来引导政府舆论积极发声、促进媒体行业良好发展正向作用,也可能带来虚假信息泛滥和强大的线下破坏力等负面影响。积极构建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监控系统、运用舆论生态理论开展多维治理,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治理通过结合群体特色实现差异化治理,并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实际进行创新治理,总结经验主动引导社会参与,有针对性地吸取民众意见,以促进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舆论引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2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65-08

一、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界定

根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在现实社会中生态系统一般由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组成,在生命体中包括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在虚拟世界中,网络舆论生态同样存在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两部分,而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生命体对应着网络舆论的生产者、分解者与消费者,非生命体对应着传播网络舆论的互联网移动客户端以及相关基础设备。所以,人与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舆论集合形成了网络舆论生态体。在网络舆论中的生命体部分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团体或是政府组织机构,不同主体由于其发展方向和需求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舆论。简单地说,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生态也就是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进而编制而成的网络舆论集合。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社会结构中出现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2]由这四类人员构成了我国新社会阶层群体。新社会阶层人员作为工作在“体制外”的群体,其年龄结构主要以“70 后”和“80 后”为主,在教育经历上绝大多数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部分成员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人员数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而日益增多,他们线上线下都十分活跃,通过网络宣传的平台阐述他们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和人们普遍热议的话题的观点以及自身社会诉求等等,已然成为互联网发展和应用的新生代,有的甚至成了网络大 V 或意见领袖。伴随我国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与创新发展,我国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的互联网应用发展迅猛,信息的传播在社会转型中从过去的传统纸质媒介不断走向信息化、网络化,由此衍生的网络舆论其影响力随着网络民众的参与度提升而不断壮大。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人数已经突破

收稿日期:2020-05-25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贵州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18GZQN33);贵州全省党校系统课题“自媒体时代贵州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19DXKTYB069)

作者简介:王福帅(1989—),男,贵州丹寨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黔南州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

8 亿，这些网民中利用手机连接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网民为8.54 亿人。[3] 网民人数的不断增长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信息单一传播的同时，孕育了新的自媒体、短视频等的快速发展。如前所述，新的社会阶层均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线上线下的跨群体触发能力很强，他们在新兴自媒体网络平台上抒发对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以及其他社会过激事件的舆论观点，提出自身利益的诉求，转眼间就能快速地在网络舆论生态体中成为舆论的生产者。作为网络舆论中的组成部分，新社会阶层在快速传播、接收信息的同时也会扮演着舆论分解者与消费者的角色，不仅如此，随着关注受众的不断增加也加速了不同观点和舆论传播的影响力。

二、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的特殊性

（一）改变了网络舆论阵地格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定义不再单纯的指向政府、媒体和公众其中一方，而正是这种边界的模糊让网络舆论打破了原本金字塔似的自上而下单向传播，让信息传递越发平等、公开和自由，这一特性也恰好能够满足新的社会阶层对民主自由、公开公平的舆论自由的需要。舆论的单向传播转变成了扁平化、互动多渠道传播，舆论生态体中的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不再是固定的群体，借助新媒体的快速传播，新的社会阶层一改之前“沉默”的形象开始活跃于网络舆论中，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通过舆论的扩散与聚焦，进而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

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爆发式的增长除了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发展这一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之前没有被公众所关注到的声音在积攒了很长时间后借助互联网作为出口表达出来，这样的热度让新社会阶层群体的公众网络舆论打破过去传统媒体舆论和官方舆论占据舆论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成为与传统媒体舆论、官方舆论争夺网络舆论主导地位的新生力量。虽然一些主要的党政媒体和地方各级媒体在政府的支持下依旧会在舆论阵地中占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但在这场舆论主导地位的角力中传统的传播主体逐渐被边缘化。在网络舆论中，新社会阶层得益于个人参与度高、方便灵活的特点，其进行舆论的生产、分解与消费的效率要高于政府和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和政府在社交网络中受制于自身的属性要求和传播限制，要将舆论进行分解和消费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就给新社会阶层网民在重新分配网络舆论话语权时予以更多的机会，从而使得网络舆论阵地发生新的变革，少数群体也能借助舆论的平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

（二）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过去的舆论生态体中，公众个人往往扮演的是舆论的消费者。自媒体时代，个人也已然成为舆论的生产者，新的社会阶层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冲击着传统舆论主体的格局进而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个过程中新社会阶层自我意识、诉求在不断彰显，因而新社会阶层舆论带有鲜明的自我性。网络舆论作为新社会阶层群体表达诉求的一个窗口，一些人并不能对我国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有正确认识，这其中的部分少数便在网络上以意见领袖的口吻对我国现存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4]

除了群体自身自我生产舆论内容有较强的自我性外，其他舆论主体生产的舆论观点让新的社会阶层在消费该观点的同时再通过网络传播时也会带上个人主观色彩，进而使得再传播出去的网络舆论也就会出现偏颇甚至是曲解。受制于舆论传播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接受信息来源的条件限制，新社会阶层舆论中往往会出现多个意见领袖和一定数量的舆论认同者，然而这些意见领袖的言论在其认同者的再次传播，在熟人社交中“病毒式”的传播，形成为大多数网民所接收、分解的网络舆论信息。以微博为例，虽然个人微博账号每条微博动态内容被限制为 140 个字以内，但多次转发与评论所形成的舆论并不会因为动态字数的限制而不发酵。同时，发布舆论的个人主体受社会环境、自身身体素质以及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其发布的动态往往是碎片化的言论，这就使得言论更多是从主观的角度出发，不能全面地对事件进行阐述、分析。此外，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在为获取更多的关注、点击率时往往会以夺人眼球的标题作为宣传噱头吸引关注者，或者是刻意通过粗陋的言论内容来获取曝光率以求得更高的关注量。这就不能保证舆论对事件的真实、客观阐述，进而在论述时不能做到客观公正的评析。

（三）舆论议题趋于理性和多元化

新社会阶层舆论在实现参与人数激增的同时也实现了舆论多点式爆发，舆论从最初关注司法案件、反腐倡廉建设等时政方面的议题到后来的热点事件、百姓生活，更多的是关注中下层群众民生问题的讨论。在 2016 年的魏则西案件中，群体们除了对魏则西病情的关注之外更多的是开始反思和追问为什么公众在互联网客户端上搜索医疗疾病的救治方案

和救治医师时先看到的会是一些私人医院，且这些充斥着搜索信息前列的医院信息往往是打着某些知名医院的名字进行推广。在这些热点舆论事件的传播与消费中，当事人和舆论传播者均为普通网络民众，他们对事件延伸出的舆论更多倾向于对管理制度上的拷问以及对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反思。以医患关系为例，网络舆论中不乏对医疗制度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的热点事件，尤其是医患关系中常常发生故意伤害和甚至杀人事件，网络舆论从对医院方的声讨转向对医疗制度的不满再到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与支持，逐渐演化的过程中舆论呼声也从最初一边倒态势转为多种声音齐发，对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主流观点网民的关注度更高。网民在对待各种舆论的态度上从最初的极端转向温和，更多的是在网络上进行分析讨论，很少会出现线下激进的支持活动。也正是由于新的社会阶层有着较强的宣传力与煽动力，理性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社会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在面对热点事件时新的社会阶层考量的更多的是该事件会对同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背景的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极强的代入感让新的社会阶层对与自身阶层事件的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主动参与议题的传播和讨论。经济、时事、政治等热点事件与新的社会阶层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关注网络舆论的热点事件不再单单局限于某一民生事件本身，而是将该热点事件从政治、司法、道德等多方面展开讨论。例如2018年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在事件热点引爆的当天，网民的社交圈内都在纷纷议论疫苗事件，有孩子的家长更是直接向当地疫苗接种点询问孩子接种疫苗是否为问题批次疫苗。该事件的热点从最初的引爆到长春长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被刑事拘留，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对该事件行政管理缺失的舆论、疫苗影响的相关舆论以及延伸到对其他疫苗事件上的联系，各种自媒体网络大V的关注度瞬间大升，部分群体的曲解和推波助澜增加了事件紧张气息。

（四）线上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有极强的感召力

网络信息的便捷性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与他人完成日常基本社交活动，通过网络平台组建活动为人们带来的极大的方便。网络社交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所熟悉的社交方式，在网络平台发布、查询活动信息能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项目活动信息，找到同一活动群体，给自己展示空间，找到自身需求与价值发展，网络这样的便捷性赋予了新社会阶层线上舆论极强的感召力。近几年网上兴起的“水滴筹”“轻松筹”等公益众筹平台，以发布众筹信息和众筹所需款项在短时间内为需要捐赠的受困人士进行捐赠。网络舆论传播常是先以社交圈内推送使之形成舆论热议之后再大面积的宣传开，传播过程中已经对信息的消费者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而言，这部分“消费者”接收到具有感召口号的宣传消息后，基于熟人社交的信任背书就更容易去参与到活动中。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基础，网络舆论中活跃度非常高，其受众关注度也相对较高，一个细小的动态都可能会引发群体的关注抑或是线下的行动。无独有偶，这样的方式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现在商家在线下进行促销活动时，多数都会要求消费者转发活动信息到自己的社交圈内才能兑换活动优惠券，一方面是进行活动宣传，另一方面是利用熟人社交作为背书让活动更具有感召力也正是这一道理。

三、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传播的影响和透视

（一）问政于网，引导政府舆论积极发声

传统舆论场中，政府舆论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来进行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度很低，很难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完成舆论阵地上的价值观念的引导。2011年以来，各类群体通过互联网舆论问政于网，让管理层看到不同群体所关注的焦点及其利益诉求，以网络发问、群体关注等形式引起党和政府对其诉求的重视。我国互联网兴起时间不长，但却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对虚拟公共网络监管上我国法律法规滞后于当前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快速的发展和监管的空白一度任由虚拟公共网络舆论野蛮生长，政府部门越发重视政府舆论的形成和管理，坚持主动疏导，引导积极的舆论发展。

网络舆论导向瞬息万变，政府舆论从最初的消极应对到现今的从容不迫，抛开一定的危机公关应对经验之外是制度体系越发健全和地方到中央层面的理性应对以及长远规划，让政府在摸索如何在自媒体时代运用网络舆论影响重新审视政府形象；通过新社会阶层的问政了解民众心目中政府的理想形象。网络舆论中曾经有妖魔化政府、扭曲历史事实、抹黑某一英烈等负面舆论，到现今，应对各种虚假信息我国各地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在网络平台上开通认证账号，公开相关事件的处理进程和结果，借网络平台与民众进行互动，维护政府舆论中的话语权，引导

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积极向上的政府形象。例如某直播平台上被千万用户所关注的主播陈一发公然在其开通直播期间以游戏的方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戏谑的方式调侃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事件，江苏网警、共青团中央等官方认证账号在网上对这一行为发表进行了批评并转发，要求相关平台进行整顿。对于社会事件第一时间进行信息传递，引导公众开展积极、理智、健康的舆论交流。

（二）理性评判，维护网络秩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社会阶层在各地不断发展与壮大，其诉求更加多元化，所产生的网络舆论也更积极活跃。他们具有不同层次的受教育水平，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其内部成员职业差异也很大，个人网络素养也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一些自媒体新人在传播消息时为吸引关注度而撰写虚假新闻，或是对信息真假未做甄别或甄别能力不足在传播信息时演变为虚假信息杜撰、传播的助推者。当然，部分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够通过个人专业技能就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积极引导公众践行正确价值观和维持网络安全秩序的人士。这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舆论能够引导社会民众对热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甄别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虚假成分。尤其是在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他们主动为员工分担负担，在危难关头保障员工工资和生活，部分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积极支援一线参加抗疫活动，他们有的成了志愿者、有的成了清洁工，在不同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部分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制造了很多宣传抗“疫”的小视频，积极宣传正能量，不仅如此，他们还纷纷捐款捐物，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打破垄断，促进媒体行业良好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的社会阶层自我诉求的不断凸显让传统媒体手中的传播主导重心不断下移，不再为传统媒体所垄断，这是很多传统媒体从业者所未曾预料到的情形。在传统媒体从业者中一部分人坚持新闻行业所沉淀的价值观念和专业要求，但这类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受到严重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草根文化更迎合民众精神需求，更容易被民众所接纳。新媒体自身具有种类多、渠道广，受众多、参与度高等特点，在信息发布上灵活、多样，且少了层层审核报批机制，准入门槛低，这就使得在新媒体中各种群体都能在这里面找到发声的机会，各种价值观的不断碰撞和意见的不断累积，加之信息发布准入门槛低，这就使得新媒体中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支持的观点和反对的观点、积极的思想和消极负面的思想并存，运用新媒体这类平台让信息实现了快速传播，其利弊可想而知，一个事件处理不当短时间内很容易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暴。新社会阶层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是网络环境中与网络联系较为密切且关联度较高的人群之一，这一群体适应了网络的快速发展，他们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过程中利用网络平台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中纷繁复杂的舆论、行为进行辨析、引导，及时做到报真导正，将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促进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和谐、稳定发展。在自媒体时代，单一个体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或者舆论的消费者，他们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自主发表意见、观点、视频，也可以针对自己的喜好删除或屏蔽其内容，他们已然变成了舆论的生产者、分解者。

四、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真伪难辨，理性舆论引导力需要加强

部分群体在网络舆论中不断地制造热点话题并非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发声，不断的制造话题迎合部分民众的趣味博取关注，这些舆论主体中的部分人言论中存在价值导向偏离等问题，甚至在舆论引导中向受众传递错误的价值观念。受其影响，一些传统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时并未做好信息真实性的核实，为迎合部分民众对事件的猜想而跟从虚假信息的报道，进而达到提高收视率与曝光率的目的。网络信息量大，而理性网络舆论却缺少应有的引导力，社交媒体的强纽带性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一个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发生时，一旦非理性舆论抢在理性舆论之前对公众进行舆论传播，这就使得相关部门不仅很难真实有效地对事件过程进行还原，甚至部分虚假信息还刻意进行概念上的偷换散布疑点来混淆视听进而煽动大众恐惧心理，甚至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二）问政于微的持续实效性不持久

网络媒体传播将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民众在作为舆论信息的消费者的同时又可以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分解者，参与到网络舆论发展的过程中去。这样就使得多种价值取向和不同信息偏好的人群融入网络空间，让网络舆论的关注和传播走向多元化，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舆论传播的不确定性让事件发展随时可能发生转移，有些政论焦点不一定能在公众视野中维持长时间的热度，这对于通过问政于网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带来不小的难题。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对于某一个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会有一个完整的追踪报道，但网络舆论主体为个人时想要完成一个事件的前后报道则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甚至是财力、物力，这是依靠单一个人力量所很难实现的。同时，公共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对于严肃的事件报道和板块式的舆论交流很难引起人们长时间的关注。在长春百白破疫苗事件中，网民的关注度一直持续到整个事件进入审查阶段后才告一段落，其原因是因为事件所涉及的关键词为婴幼儿、家长、企业、偷税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除去媒体舆论的推送以及官方政府的追责，网民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维持事件关注度一直持续不下的主要原因，部分新的社会阶层意见领袖还推波助澜。但严格来说，虽然长春百白破疫苗同样涉及行政监督管理方面的缺失问题，但人们更多的舆论焦点在于这批问题疫苗的影响程度而非针对政府行政问题进行热议。就我国政府行政问题而言，民众关注度高，但持续关注度低，很多时候关于政府行政问题的舆论往往关注是一掠而过，无论舆论主体是个人抑或政府、媒体，以舆论发声的方式去促进行政事务上的发展如果没有引起大量的关注度其效果往往相对较弱。

（三）表达非理性、功利性突出

一些网络舆论中充斥着暴力、恐怖等的言论，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个人道德素养作为约束没有实质性的监督办法。在众多的参与途径中，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同社会进行互动的最主要渠道，伴随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趋重要的地位，其在社会事务中的分量也不断加重，在网络平台进行社会参与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也成为社会事务发展的重要特点和趋势。[5] 不过，网络平台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容易使其产生一些消极的舆论效果，例如虚假信息的散布、极端社会心理和情绪的集中、民意暴力发酵等，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新社会阶层在使用网络平台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新社会阶层经历的社会实践还比较少，阶层的成熟度有待提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社会参与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倘若处理不当则会限制该阶层在社会参与的作用和表现，甚至带来社会风险、威胁政府正常工作开展等消极性的效果。

由于新社会阶层在各项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社会参与存在较大的风险，这就很可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杠杆和的关键少数。

（四）煽动性网络舆论线下具有破坏力

虽然新社会阶层在网络平台的社会参与过程中体现出了自身的一些优势，但是该群体的线上舆论很有可能演化为线下行为。一方面，新社会阶层群体通过网络集聚，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不断扩大自身社会舆论影响力，成为影响主流舆论走向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引导并不是义务性的表现也非一贯性的表现，而是与其自身诉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某项社会事务或者舆论与其利益诉求相符，甚至有利于其诉求的实现，那么部分新社会阶层成员将会不背离原本的价值导向或初衷进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与其自身的诉求不相符，那么其行为表现又会有截然相反的变化，或者破坏舆论场的形成，或者通过引导的方式阻碍事务和舆论按照当前的态势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新社会阶层出生在“体制外”，对执政党在感情上天然较为疏离，对政府的认同感也并不稳定，缺乏对执政党、政府的足够理解，常常因为主观上对某些政策或者实际工作的不满意而在网络上攻击执政党、政府，甚至还会因为受到其他错误舆论的影响，而对执政党、政府产生误解甚至愤恨等极端情绪。这种认同的不稳定使其会在不同的社会参与中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例如某些社会事务是政府部门极力推进的，但是新社会阶层属下的某些个体自认为政府动机不纯或者政府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有序的参与，甚至还会有破坏行为。当然，如果他们认为与政府相关的社会事务对他们是有利的，那么就会极力支持，积极参与，有时候一个不当言论很有可能会带来对社会治理的不满情绪，煽动线下行为，制造不满集会等等。由此来看，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参与有着不稳定性、多变性的特点。

如前所属，由于网络发展为社会事务的参与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新社会阶层的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从本质的参与目标或者参与动机来说，新社会阶层并不是单纯为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部分个体更多的还是基于自身在社会地位、职业境遇、薪酬收入等方面的利益考量。通过社会参与期望能向各阶层人员反映疾苦、畅诉心声，进而期待实现得到社会承认、提高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同时对于社会事务的态度也转变非常快，容易出现从极度支持走向极度反对的极端现象。

五、促进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健康发展举措

（一）运用舆论生态理论开展多维治理

如前所述，网络舆论生态是一个集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于一体的动态系统，其本身属于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往往具备一定的修复和再生能力，结合生态学中关于整体、系统、互动以及平衡的理解，网络舆论生态的形成与发展与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是密不可分的。网络舆论生态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大环境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与社会生态中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教育等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实现系统内部自身的动态平衡。也正是因为如此，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问题不能仅仅只考量网络舆论系统中的各组成要素，而是应该将其放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个生态系统综合各种因素作动态考量。要对新社会阶层舆论生态开展多维治理，这其中就需要对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演变及其分解过程进行分析，了解新社会阶层的心理诉求和对新社会阶层意见领袖行为的反思，运用各种措施提升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力，促进新社会阶层网络互动的健康参与。对于各地区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则需要结合当前地区自身发展现状，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综合分析，进而寻找各因相互素作用的最优成效。

从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外在环境来看，对其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等领域，因为这些外部生态系统的轻微变化都可能对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进而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发生变化。从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内部看，对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其群体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化、个人心态、制约个人和群体发展的社会成就和职业期待以及当前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5]。因而，对于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构建应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及网络舆论生态中的内外部因素开展多维综合治理。

（二）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治理

找准问题理清思路精准施策是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要求，对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需要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综合考量对地区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以及成员群体间职业、收入及其生存状态。不仅如此，还应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中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各生态系统进行有条理性的梳理。

首先，从社会生态入手，保障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的综合稳定。通过对部分地区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发展的调查我们发现，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态方面普遍存在着对群体自身定位和社会地位自我感知的评价相对较低，尽管他们在政治参与的中有不同形式的参与途径，但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生活背景并不因此而发生改变。无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抑或是从生态系统中媒介生态的视角和理论出发，新社会阶层对自身较低的评价是受到现实生活中整个社会的影响，各种因素都可能制约新社会阶层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和对自身发展的定位。所以要改善、引导舆论生态朝着健康、积极向上的正向发展，就要改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下所处的社会地位、同时拓展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社会作用认知。

其次，从媒介生态出发，提升新社会阶层舆论生态中社交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力。舆论的传播、扩散离不开媒介的参与，作为舆论生态中重要的环节，它能直接影响了舆论发展的动态。“80”后、“90”后甚至“00”后已逐渐成新的社会阶层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群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更倾向通过社交网络传递自己的呼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网络媒体中关于国家安全或涉及个人利益的社会问题等公共管理方面的时事热点经网络传播能迅速散播到各个角落。在社交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上更应当强化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宣传工作，让新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交网络媒体中对社会时事热点进行评价和传播时能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尽可能地缩小在舆论传播过程中产生负面舆情的可能性。

第三，从新社会阶层自身成长出发，着力于这一群体职业生态和个人生存的关注，加强他们线下生活与线上舆论引导。舆论是作为公民个人表达诉求的方式之一，不同公民之间的利益诉求大同小异，或是千差万别，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舆论在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是直接受到舆论主体的影响。如前所述，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工作处于高强度作业、薪酬波动较大的状态，快节奏的生活中他们很难完全实现自我价值和找准自身定位，诸多的客观因素让他们对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并不高，对自身阶层的认同度较低。因此，要将解决新社会阶层人士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线上舆论引导工作结合起来，从

他们的职业环境、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入手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和政策激励，改善新社会阶层的薪资窘境、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第四，重视舆论生态中网络媒体工作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如前所述，新媒体从业人员最先接触各类群体利用互联网上传到网络中各类平台的相关信息，内容的审核往往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发布和传播。不仅如此，他们有时候也会扮演生产者的角色。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具体的网络工作中是信息生产和信息传递的主力军和监督人，信息内容的监督取决于新媒体从业人员对信息的把控情况，这一群体在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建设中所具备的监督和引导能力是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且直接针对具体舆论和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和引导，因而是最直接和最具实效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6]

（三）结合群体特色实现差异化治理

通过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所涵盖的职业群体数量日益壮大，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因人数多、分布范围广泛等特点在舆论传播上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新特点，结合这些现实因素进行舆论生态治理需要针对各群体不同特质的有效划分和进行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开展和实施差异化治理。

互联网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开展舆论引导需要结合其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习惯来开展。在各种应用软件的使用频率上尽管微信和 QQ 排在前列，但在传统的收音机、电视的使用上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要比其他群体要高得多，这也说明在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时不能仅仅采用单一的引导方式。不仅如此，在各种软件的使用时段上，各群体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些差异与其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工作类型息息相关。调查后发现，按照媒体的归属不同，新社会阶层在这其中浏览信息的偏好也各有不同，较多的官方微博、政府部门主办的网站、网页信息更易受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的青睐，新媒体网络从业人员更容易接受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对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传递的信息更为认可。根据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活作息时间的统计分析，按照不同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定点、定向在其浏览网络信息的黄金时间进行舆论引导和治理。新社会阶层是一个广泛的群体，其涵盖的人群在职业、受教育程度、价值理念等方面都表现出参差不齐，这就使得在解决新社会阶层的舆论生态系统治理问题时需要在信息推送、政策传递、发展引领上实行差异化引导和治理。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实际进行创新治理

进入信息时代，网络生态的构建和内容治理已经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社会治理问题，"世界各国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控制基本上都采用了'政府、企业与社会互动，法律、技术、社会、教育多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管理模式'"[7]。在虚拟空间治理问题上除了运用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等外，还要兼顾新的空间领域上不同国家主体、社会公民的风俗习惯以及相应的文化传统。虚拟空间同现实社会治理一样有社会多方的参与，开展综合治理并不是政府一方的任务，也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就能胜任，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开展治理，需要我们借鉴世界各地在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有效经验。

美国按照减少干预、保持中立、言论自由的基本思想在解决舆论生态问题时将预防工作作为治理舆论生态问题的关键，同时将威胁国家安全的舆论设为监管的重点。我国在虚拟网络空间的监管上采用多方参与、多部门协调、多渠道应对，在具体的应用上是可行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网信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决策和对网信工作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8]目前实施的多方参与的舆论生态综合治理方法正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虚拟空间的主要发展情况实行的理论实践、创新，也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体现。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贵州在学习、借鉴他人的有效经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忽略域内舆论生态的重要特点直接教条的将外来的经验作为治理的标准。

（五）总结经验积极引导社会参与

作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成长过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历程，他们拥有更为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对新兴事物的理解、接纳能力更快、更强。拥有高知识水平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对社会发展、社会法制、经济秩序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互联网跨越时空的限制

能将具有共同志趣的新社会阶层人士聚集在社交网络中,因此这部分人群相比较其他人士来说也更为主动接纳网络舆论中设计自身利益的观点并主动将其传播。加之新社会阶层人士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能在某个时事热点或话题中通过专业分析,迅速吸引大批网络用户的关注成为舆论事件中的意见领袖。这些具有专业知识、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拥有大量网络活跃用户关注的意见领袖如果没有得到正确、及时的引导,受到现实生活中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旦其利用自身影响力恶意将舆论引向负面,就会引发新的舆情危机。治理网络舆论生态中新社会阶层可能存在和引发的负面舆论危机,应当从这一群体自身的引导入手,充分调动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发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特长有效地对其他人士进行正面舆论引导。根据目前新社会阶层发展的情形来看,新社会阶层人士的不断增多将会对舆论生态产生持续不断、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建立数据库,不断挖掘互联网时代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舆论生态中的特质,开展长期的跟踪研究。政府在做好意见领袖的监督、引导工作同时,自身应对舆论环境进行积极正向引导,转化权威的公信力对公众进行网络舆论宣传,以自身的观点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化解网络舆论存在的各式问题。

参考文献:

[1]尚玉昌. 生态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林,魏常雷. 新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化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2(1):61 - 63.

[3]徐世甫.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15(11):84 - 90.

[4]钟海. 生态政治视域下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功能审视[J]. 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6):105 - 110.

[5]新华社. 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 人民日报,2015 - 05 - 21.

[6]高宏存,张朝霞. 多管齐下治理网络不良信息:基于境外经验的思考[J]. 行政管理改革,2012(6):42 - 46.

[7]张晓松,朱基钗. 习近平: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EB/OL]. 新华网,2018 - 04 - 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 - 04/21/c_1122719810.htm.

[8]温红彦,张毅,廖文根,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论述综述[N]. 人民日报,2018 - 11 - 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New Social Stratu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WANG Fushua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ways of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the network,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constitutes the main body and its network ecology of public opinion. The new social stratu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ing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pattern, having the distinct subjective color, the public opinion argument tends to be rational and pluralistic, the online appeal is strong and so on. It may bring a positive effect of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ing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dustry, and it may also bring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the prolifer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and strong offline destructive power. We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new social stratu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use public opinion ecological theory to carry out multi - dimensional governance, take targeted governance for the problems, achieve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by combining group characteristics, actively learn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arry out innovative governance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 summarize experience, actively guid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bsorb public opinions pertinently, so as to promote the new society,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cology.

Key words: new social stratu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cology;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海洋考古视域下环南中国海国家的海贸互动

——以中国为中心

王丽敏
(中原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中国海洋考古经历了从无到有曲折而高效的发展历程,南中国海域是中国乃至世界海洋考古的重心。海洋考古在南中国海域发现、发掘的一批批不同时期、诸多类型的水下遗存,见证了中国与环南中国海国家在舟船和航海技术、航路和港市建设、船货与海商贸易领域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中国海洋考古的未来发展需要实现实践和理论的良性互动、海洋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有效整合。加强中国和国际社会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和利用,为进一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探索海洋文明、解读海洋历史开辟广阔空间。

关键词:海洋考古;海贸;中国;环南中国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3
中图分类号:K928;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73-05

海洋考古是世界考古学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内容涉及海洋活动的所有方面,从实践对象来看,主要是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考古学遗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指至少 100 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随着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视,海洋考古是我国考古事业战略转移的重要领域,而南中国海域日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海洋考古关注的热点。对此,俞伟超等水下考古专家及相关机构已作了较多的工作与研究,不过,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沉船考古领域;相比之下,澳洲学者李塔娜、中国学者李庆新等将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路径。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和其他环南中国海国家和地区的海贸互动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海洋考古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海洋考古学源起西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的海洋考古发现成果相对有限。尽管如此,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流互动却古已有之。例如,殷商甲骨文所用甲骨多为广东、福建、台湾、海南所出产,小屯村出土的“鲸鱼骨”来自东海,殷墟“妇好墓”出土的 7000 枚海贝亦来自东南亚海域,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大陆本位的主流意识,至少表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同样古老,并且,海洋文明至晚在先秦时期即已深入中原,建构了中原文化的海洋要素。就中国南部而言,番禺(今广州)更是发展成为岭南社会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1982 年,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岭南最大的考古成果,出土不少与南海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展现了早期中国岭南文化的海洋气息与海洋内涵。由于南越国与今越南北部联系殊为密切,北部湾更有“亚洲小地中海”之称。故此,华南及环北部湾地区史前考古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1] 可以说,晚至史前时代,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项目:2020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中越海道的开发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20-ZDJH-520)
作者简介:王丽敏(1986—),女,河南郑州人,博士,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中国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已与海洋发生联系，海洋活动成为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不过，由于传统陆地考古方法的限制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的缺失，这一时期中国海洋考古（主要是沉船及其船货遗产）集中于近海或内河淤陆地带。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我国成立了包括交通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海洋局、海军、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加的“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1989 年，在俞伟超先生的组织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University）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组合“中澳合作海洋考古培训班”，由此水下考古技术传入我国，为中国的海洋考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多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取得了“三道岗沉船”“南海 I 号”“南澳 I 号”“碗礁 I 号”“华光礁 I 号”“小白礁 I 号”等一批重要的水下考古发掘成果，并出版了相关的沉船发掘与水下考古报告。其中，“南海 I 号”沉船考古是中国海洋考古的里程碑，大大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进程，南中国海域成为世界范围海洋考古工作最活跃的少数几个海区之一。

进入 21 世纪，中国海洋考古发展至“黄金时代”，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依托，中国海洋考古事业逐步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技术设备方面，2007 年，“南海 I 号”的整体打捞，标志着目前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2014 年，中国首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 01 号”问世，宣告中国自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对此，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与装备部主任宋建忠指出，“该船的投入使用是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创新技术装备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探索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平台，必将开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2] 基地建设方面，2003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在阳江海陵岛建成国内唯一的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2009 年 9 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依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中国水下考古和文物保护等工作；2012 年 6 月，中央编办批复同意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标志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学术建构方面，近年来，有关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史、造船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海洋三所、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都已设立专门机构和研究团队，开展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二、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与海贸史迹

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蕴含着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文化遗产，海洋贸易史迹是海洋文化遗产和海洋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海洋经济与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近年海洋考古发现、发掘来看，中国海洋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资料与研究数据，多来源于沉船考古，而南中国海域日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海洋考古关注的热点。

（一）舟船和航海技术

舟船是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载体，沉船则是海洋考古的主要源泉。生活于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尤其擅长舟楫和航海。越南学者提出，早在上古时期，古越人（包括华南地区百越居民）使用竹筏出海，后来又较早发现了帆、舵、桅，并从竹筒得到启示发明水密舱，此说法可以从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1970 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 6 支木质船桨和 1 只“夹碳黑陶舟”，是越人建造、使用独木舟的最早证据。苏秉琦分析指出，中国东半部史前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借助规律性的海流和季风，从中国南方搭乘独木舟就可以漂流到南太平洋诸岛，一年可往返一次。[3] 1989 年，考古学家在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 3 处距今 4000—5000 年的船只岩画，经认定是广东先秦时期越人的海船，且比独木舟时代的原始船只有很大改进。

秦汉之际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成为发展海上交通的基本前提。1955 年，广州先烈路 3 号汉墓出土的东汉后期陶船，船头系锚，有防浪篷，船尾有舵，舷板较高，表明此时中国海船已经能够进行深水航行。

至宋代，中国造船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福州、泉州、广州、雷州等地所造的海船最为出名。水密舱、平衡舵、减摇龙骨、车轮舟、铁钉和铁锔连接技术、舱料密封和维修技术、桐油及油漆封护技术、指南针、船坞等，都是中国在造船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贡献。此外，中国海船不只进入东南亚，中国传统的造船技术、方法也与当地优良的造船技术和驾船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南中国海式”的混合型船，这种船舶已为近几十年在泰国湾、廖内群岛、中国南部海岸以及朝鲜半岛西海岸沉船考古发掘成果所证实。它们多为两桅或三桅的大型船舶，使用木榫钉固定船舱、复合舵和龙骨，也采用铁钉和夹钳以增加船板固定的强度，它们满载着船主的货物、肩负着远洋货运的重任，乘风破浪于东南亚主要航道上。[4]25

南海航道的繁荣滋生了海盗群体的存在,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思考海船的武器配备问题。2007 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海Ⅱ号”明代沉船中就发现了铳炮。《东西洋考》载,“(舟)弓矢刀盾战具都备,猝遇贼至,人自为备”。[5] 虽无法判定其中所指船只是否为走私船抑或海盗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船舶应不属于东南亚官方商船,因为该地区的统治者们更乐于建造更多、更大装备武器的战船,而此类战船的装备则被禁止用于商业目的。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引领了此后长达四百年的帆船时代,“(爪哇人)极富航海经验,并自称航海历史最为悠久,不过很多人则把这一殊荣给予了中国人,并且认为爪哇人的航海技术实际上源自中国”[4]40。随着西方机器船的迅猛发展,帆船航海终在 19 世纪末期宣告结束。陈希育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远洋帆船的衰落情况描述道,“中国帆船的处境每况愈下。帆船数量以惊人的速度锐减。本国商人不是自置外国式船只,就是租用外船进行贸易”[6]。

(三)航路与港市建设

航路是连接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桥梁。鉴于大量中国丝及丝织品经海路运销西方,故这条航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起自中国沿海港口,分南海、东海两道;南道从中国珠江口、北部湾诸港起航,经南中国海域,或驶往菲律宾群岛、美洲,或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至非欧;北道从北方海港起航,经东海前往日本、朝鲜半岛,几乎将世界所有的文明体系都连接在一起,其中又以南海航道最为重要。

越南扼南海航道要冲,亦是南中国海考古的热点区域,海洋考古成果尤为丰富,环北部湾地区则较早成为中越海洋活动的重心。李塔娜等人的研究表明,汉代中国人已经经北部湾海道进入南中国周边地区;同期,来自非洲、中东地区的出土物品在番禺发现如此之多,证明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已经贯通。[7]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派遣使者经越南西行至印度的经历,亦表明当时南海航道已经在印度洋实现对接,而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古占城地区(位于越南“南圻滨海之地”,为“南方第一码头”),则是中国开拓中国至南亚、东南亚航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古老航线之一。

自 1993 年以来,越南联合多国考古学家先后在越南中部海域发现 5 艘古沉船,打捞出一批品相相对完好、套系相对完整的陶瓷制品,水下考古专家估计,这片海域可能是全球尚待发掘的沉船最多的海域;无数船骸和宝贝沉睡海底。2013 年,越南成立水下考古专门部门,并联合多国水下考古专家致力于探索和保护中部海域的大量沉船宝藏。据称,在已经发现大量沉船宝藏的会安古镇、广义省等地,散布着中国瓷器、古老的陶罐、小瓮、大花瓶等。这些文物的发现,不仅证明古代有很多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经过越南,也证明越南在南海航道中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近代越南向其南方的领土扩张,北部湾不再作为越南海洋文明的唯一中心,越南人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人口、商品、思想的持续互动,最终使越南南部边疆扩展至湄公河三角洲,开拓了富甲全越的南圻六省疆域。水运增强了湄公河三角洲的生气,给越南南部的繁荣打通了血脉。人口、运河、河流等构成了湄公河主要的航行网络,用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国家农产品的加工、出口,构成国家财富的主要生命线。18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之间,往返于广州与东南亚贸易的 30 多艘帆船中,75%—80%的船只都是驶往柬埔寨、河仙和交趾支那。[8] 伴随着这个过程,越南北方的云屯港、中部的会安渐趋衰落,南方的岘港、河仙、西贡被开辟为新型的多元化商港,与福建泉州、广东广州、香港等往来密切,形成了闽粤至河内(或至云屯)道、闽粤至会安道、香港至越南道、越南南北近海航道等数条中越航道,成为中国早期经略南海的主要海道。

随着航道的变迁,许多港口、城市在沿线或成长繁荣或日渐衰弱。越南最早的贸易港即主要分布在靠近东西交通航道的区域。毋庸置疑,西贡(今胡志明市)、金边、万象、琅勃拉邦等城市,都将其存在归功于湄公河。克劳福德指出,从暹罗湾至中国海沿岸,至少有 57 个港口,其中至少有 10 个位于东亚最安全和繁荣的地区,在这些港口中,最好的是西贡。[9]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西贡远离湄公河中上游,频繁的潮汐活动将流入西贡河的泥沙不断清理,从而保持了它的深度而无需高昂的疏浚费用;另一方面,在便利的水上航行之上,湄公河腹地为其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大米是主要的出口商品。除物流外,西贡港也是越南最大的客流港,华人在越南南部的数量远高于印度支那其他城市,从这里也可乘火车、汽车到东京或安南,除与中国的航线往来外,还有周发的前往新加坡和月发的前往巴达维亚的船只。

港市的发展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将越南,尤其是交趾支那,与国际市场而非国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甚至本地服饰也受到影响,“在官方场合,乡村富人和贵族穿着昂贵的欧洲服饰”;[10] 另一方面,开启了不等价交换原则,当地商品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口,进口制品则以高于其

价值的价格在越南出售。值得注意的是,商港的繁荣几乎全赖海外客商,尤以华商最为重要。

(三)船货与海商贸易

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对于货品的内容与交换形式,安东尼·瑞德作了总结:"东南亚从印度进口棉布,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白银,从中国进口铜钱、丝绸、瓷器及其他制成品,而东南亚的输出品则包括胡椒、香料、香木、树脂、虫胶、玳瑁、珍珠、鹿皮,以及越南和柬埔寨出口的蔗糖。"[4]25 由于此类货品在沉船中绝大多数会被海水冲走、腐蚀、消融,使得不少船货难以保存,唯有陶瓷、铜钱等能大量、持久地遗留海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水下"陶瓷之路""铜钱之路"。

1998 年,德国一家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一艘唐代沉船"黑石号",被认为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打捞者在船上发现 67 000 多件文物,其中 98% 是中国瓷器,主要有瓷碗、执壶、杯、盘、罐等生活器皿,包括长沙窑、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其中,长沙窑瓷器约56 500件,被誉为唐代"外销瓷第一窑"。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11]这些信息表明,至晚到唐代,陶瓷已经成为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且出现了专门面向国外市场的中国外销瓷。

作为贸易流通中的一项重要商品,钱币贸易亦成为对外贸易中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中国不仅对外输出钱币,也曾有从国外输入钱币的历史。据清中晚期的记载,由于中国国内制钱短缺,从外国流入大量制钱,东南沿海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越南制钱,"广东潮州府一带洋面,海船到日,携带外国(越南)景兴、光中二样钱文,钱质薄小……乡愚贪其多换,相沿成风,始则掺杂铜钱并用,今则久用景兴、光中,暨私铸小钱,"更有甚者,由于此类钱币质地、铸工较差,国内不法钱商"并有将制钱销毁,掺和泥沙,私铸景兴、光中小钱"[12],以谋取高额利润。福建地区亦面临同样境况。尽管官方采取严禁措施,情况似乎并无太多改善。大体上,闽广一带,越南钱币的比例依旧很大,如在光绪中叶,越南钱币占厦门总铜钱流通量的 40% 以上,清钱只占半数多一点;福州情形也差不多;不仅如此,在山东济南、四川重庆、北京等地均有一定数量的越南钱在流通。[13] 总的来说,作为大宗商品的陶瓷、钱币、金银器等制品,既为压舱,也为交易,这些商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奢侈品的定义,更多地用于满足日常所需,体现了实用性的目的,显示出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是华人生活的保守特征,他们需要大量的中国产品以维持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南中国海的物资交流,既有利于华商侨居国产品的外销,也为其开辟了一个长期的稳固的国外市场。

大量不同类型的船货展现了环南中国海繁荣的国际贸易场景。华商参与海洋贸易的深度和广度相当可观,无论是在发达的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抑或是跨海之间,华商商贸活动都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奠定了环南中国海贸易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商贸文明之路,也是移民发展之路。尽管尚无考古发现证实,但是人口贩卖亦是清商贸易的一项内容。越南史籍中有数条相关记载。1872 年,越南严令沿海各关口"辖民毋得诱汉民、妇女专卖清船或有惯于此习,为人告发,即行拏治,卖者买者与汛守不能摘发,各重治,不贷其所在之省道府县、总理等,亦并分别议处"[14]。越南对人口买卖的处罚如此严厉,可见其势必定不小,然而,这种禁令似乎并未杜绝买卖人口的现象。在海盗袭击中,许多男人、女人、儿童被抓上船带到中国,男人像在古巴或秘鲁的奴隶那样做苦工,而女人和儿童的处境更加恶劣。[15]

三、中国海洋考古及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海洋考古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曲折而高效的发展历程,海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广泛水域、海域推广,发现了一批批不同时期、诸多类型的水下遗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海洋考古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越来越吸引广大史学工作者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李庆新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强调"海洋考古再现海国历史",他进一步指出:"海洋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循着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以验证历史,发现历史,乃至重构历史。"[16]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海洋考古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

第一,海洋考古的发展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现阶段的中国海洋考古呈现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从现有实践工作来看,海洋考古大多集中于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保护工作,对沉船以外的海洋文化遗产亦重视不足。此外,海洋文化遗产内涵丰富,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船货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影响海洋经济的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意识的民俗与心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海神崇拜等信仰体系更呈现跨国界、跨地区的文化

特性，是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也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的海洋考古需要实现从实践手段到学科理论的双重吸收，将二者共同纳入海洋考古研究的视野与范畴，从而全方位地解释、建设海洋文化。

第二，海洋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科体系，现阶段的中国海洋考古表现出多学科整合力度的不足。例如，当前的海洋考古工作者习惯将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专门的水下考古技术上，将水下考古与海洋考古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下考古只是考古工作的技术性范畴，是海洋考古的专门技术，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水下考古都是海洋考古。因此，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拓展，海洋考古学也必须实现与其他领域如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相互协作。比如，海洋考古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中区域史的研究范式。区域史研究肇兴于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并研究的“地中海模式”后为其他各国史学研究者引进和借鉴。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丹尼斯·隆巴德（Denys Lombard），借助布罗代尔“地中海”理论提供的世界性眼光，想象在东南亚发现了另一个“地中海”，旨在以南部中国与环南中国海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体作为研究视角，探讨这个区域内的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就海洋考古学而言，亦可以通过关注南中国海共同体的整体性和重要性，“重构其内部共有的历史经验、反思这一区域的内部联系因素”[17]。

第三，中国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遗产的数量与质量更是难以估计，现阶段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一些困境。一方面，对于海洋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人为破坏严重，呈现发现与保护不均衡的现象。例如，2011 年考古人员巡查西沙 48 处水下文化遗存发现，盗掘面积占遗存面积 50% 以上的有 26 处；此外，当前，中外、外外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多有争端。在南中国海，中国的不少岛屿、岛礁被东南亚国家实际控制并声索主权，由于周边国家的开放商业打捞政策，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也因此受到挤压而面临保护压力。因此，保护好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既需要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普及与提升，也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完善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管理机制，对于争议岛屿、岛礁、海域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四、结语

海洋考古对海洋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考古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不仅使一系列珍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重现于世，而且见证了中国与环南中国海沿线国家频繁而密切的贸易交往历史。然而，海上交往的历史与内容远不止于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更多资料的发掘，也只有在不同学科整合的多维视角下，充分利用文史档案、地理环境、考古实物等，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解读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面貌，为进一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探索海洋文明、解读海洋历史开辟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郑雅，曾彦彬. 让北部湾地区有更好的未来：中外学者眼中的“亚洲小地中海”[N]. 南宁日报，2008 - 03 - 18(9).

[2]林国聪，王结华，姜波. 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首届“水下考古·宁波论坛”纪要[J]. 东南文化，2014(6)：121.

[3]郭大顺. 苏秉琦先生谈“岭南考古开题”[M]//华南考古：1.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6.

[4]安东尼·瑞德.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 2 卷)[M]. 吴小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张燮. 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70.

[6]陈希育. 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389 - 391.

[7]朱迪思·卡梅伦，杨芹，李塔娜. 考古与历史视野下史前北部湾的纺织工艺[J]. 海洋史研究，2013(4)：14 - 26.

[8]Li Tana，Paul A V D. Canton，Cancao and Cochinchina：New Data and New Light on Eighteen - Century Canton and the Nanyang[J].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2007(1).

[9] John Crawfu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Adjacent Countries[M]. London：Bradbury & Evans，1856：106.

[10]Hickey Gerald. Village in Vietnam[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238.

[11]三上次男. 陶瓷之路[M]. 胡德芬，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117.

[12]《清宣宗实录》卷 289，道光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条[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

[13]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84.

[14]许文堂，谢奇懿. 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C]. 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426.

[15]武堂伦，诺拉·库克，王一娜. 19 世纪北部湾的中国商船和船员[J]. 海交史研究，2014(1)：106.

（下转第 88 页）

从辽代刺绣的现存实物看其文化遗产价值

叶立群
(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学文化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近年考古发现和民间征集的辽代刺绣较多,且有相当数量的实物是中国刺绣中的精品。辽代刺绣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并成为今日辽绣的重要源头,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遗产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工艺价值、美学价值、历史和文化价值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辽代刺绣;现存实物;文化遗产价值;辽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4
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78-05

刺绣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精神需求而创造的工艺品,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和审美精神。宋辽金时代,中国文化及艺术精神经历了重要转折期,刺绣也不例外。在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发展阶段,辽代刺绣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并成为今日辽绣的重要源头。现存辽代刺绣实物相对较多,也极珍贵,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工艺价值、美学价值、历史和文化价值等几个方面。

一、关于刺绣发展史与辽代刺绣

中国的刺绣起源于史前时期,研究者多认为它与图腾崇拜及文身等原始人体装饰有着密切关系。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实物为商周时期的刺绣。考古实证主要有三:一是瑞典学者西尔凡在商代青铜器上发现的刺绣痕迹;二是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青铜器和泥土上发现的刺绣痕迹;三是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多件织绣衣物[1]56-59,刺出了精美的蟠龙飞凤、龙凤相蟠纹、龙凤虎纹等。到了汉代,刺绣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水准,代表这一时期刺绣艺术风格的当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绣品。其中的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等精品[2],做工精巧,针法各异,纹饰丰富,线条流畅。魏晋南北朝时期,刺绣开始用于表现宗教题材和人物形象,表现内容更趋丰富,技法更趋成熟。服装刺绣盛行于唐代,除佛像、人物外,山水楼阁、花卉禽鸟等成为刺绣的重要表现对象。刺绣针法突破了以锁针绣为主的显花形式,在齐平绣的基础上,发展了抢针、接针、钉针、套针等技法。

宋辽金时期,是中国刺绣的重要发展期、高峰期,也是转折期。空前繁荣的绘画,为这一时期的刺绣提供了新的美学标准和艺术表现的路径。逐渐走向世俗的审美取向,也促进了刺绣艺术的繁荣。随之,刺绣开始分化,观赏性价值开始凸显,部分绣品真正脱离其母体,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契丹人及其所建立的辽所发展和创造的具有融合性、民族性特征的刺绣艺术,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最为发达的刺绣,在中国刺绣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辽代刺绣,上承唐代风格,并体现北方民族固有的风韵,且不断吸纳汉文化元素特别是宋所发展的中原刺绣技艺。从刺绣发展史上看,辽代刺绣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将强烈的北方民族风格纳入了刺绣美学体系,后经金、元、明、清等多代的传承、发展,构成了今日以汉文化为底色、多民族融合的中国刺绣艺术风格;二是辽代刺绣是今日辽绣的重要源头。辽绣是东北各民族历经千年所创造的一个具有民族特征和区域特点的绣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现有的研究结论,辽绣源自契丹人,始自辽代。

收稿日期:2020-02-28
作者简介:叶立群(1973—),男,辽宁绥中人,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文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地域文化、艺术理论。

二、现存辽代刺绣实物

近年考古发现和民间征集的辽代刺绣较多，且有相当数量的实物是中国刺绣中的精品。现存具有代表性的辽代刺绣实物如下：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大窠卷草双雁绣。相同纹饰的绣品共两件，一为毬路纹绢地，大窠卷草环，以黄、绿、蓝等多种丝线绣出。团窠中心为双立雁，以盘金绣绣出，另一件以黑色罗作底，以纯金线盘金绣绣出图案，卷草环，中心为双立雁[3]。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团窠对凤纹绣。整体构图为团状，多色丝线绣出团窠和其中的花纹。团窠中的对凤双翅伸展，尾羽飘动，呈修长轻盈态。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飞鹰啄鹿纹绣；以罗为地，用金线和蓝、黑丝线绣出飞鹰、鹿，飞鹰展翅飞翔，鹿在下面奔跑。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秋山双鹿纹绣。红色罗地，以金线和黑色等线绣出鹿和秋山背景，鹿奔跑灵动，动物与环境结合自然。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双天鹿缠枝花纹绣高翅帽。以绛丝包边，绣地为棕色花罗地，以金色绣线绣出口衔宝仙花腾跃的带两翅双鹿。缠枝宝仙花婉转穿插，四周有卷草、覆盆子花、枝蔓等环绕。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粟鸟绣香囊。在深棕色纱底上，以棕色绣线和金银线绣出一鸟头，其衔粟一串。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簪花羽人绣锦袍。锦袍为棕黄色罗纱面料，通体平绣花纹。在锦袍的领口上，绣有双龙，在肩、腹、腰等部位，绣有簪花羽人骑凤、桃花、水鸟、蝴蝶等纹样[4]。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绣花分指手套。为分指包腕式罗地绣花手套，绣花施在手套背部。

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联珠云龙纹绣。此类实物共发现两件。红罗地，以黄、白、浅豆、橘红等色绣出，主题纹样为龙、祥云、火焰珠。刺绣中心为四窠联珠团龙，左上两窠团龙的龙首右向，右下两窠团龙的龙首左向。白色联珠作边。

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联珠梅竹蜂蝶绣。红罗地，以黄、绿、紫、蓝、粉白、杏红等色绣出，主题纹样为梅、竹、荷花、蜂、蝶、湖石等。梅、竹居中，辅以山石、小草、祥云、蜜蜂、蝴蝶等。白色联珠作边。

辽庆州白塔出土的蓝罗地联珠梅花蜂蝶绣。蓝罗地，与上述绣品风格接近，以红、黄、蓝等色绣出，中心图案为一梅独放，辅以花草、蜂、蝶、云山等。白色联珠作边。

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联珠人物绣。红罗地，以橙、黄、黑、浅棕、湖蓝等色绣出。在白色珠团窠联珠圆环内，绣出了骑马且两手高擎猎鹰的契丹族猎人，空隙点缀着杂宝纹[5]78-79。

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烟色贴金绣残片。烟色罗地，以绿、黄两色相间的颜色绣出，现存主体纹饰为龙纹和火焰纹，龙身麟纹为三角形，以贴金线作边[6]。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修复的辽代刺绣凤纹罗袍。根据原存三块残片修复。为两窠袍，烟色罗地，以金线等绣出对凤纹、卷草纹，长袍后背和正面的两窠较大，肩部和袖口的团窠较小。

伦敦博物馆藏紫地蹙金秀盘凤罗袍。紫色罗地，在罗袍的正面、后背和里侧，以金银线绣出六窠双凤团窠图案，中间为火珠。在肩部、袖部绣出四窠单只盘凤图案[1]381-382。

英国伦敦私人藏八团升降龙蹙金绣龙袍。烟色罗地，长袍的正面、后背和里侧，以金银线等绣出升降龙大团窠图案，中间为火珠、朵云纹。袖口绣有小团窠龙纹。其它部分以卷草纹作地[1]381。

香港梦蝶轩藏刺绣摩羯纹罗靴。以烟色罗为面料，衬绢后刺绣。以蓝、绿、黄、白、褐色绣出，主图案为简化的摩羯纹、云纹，辅以火珠纹[7]。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绫锦缘刺绣皮囊。绣底的材料为皮质，绣蓝底，以黄线、金线等绣出图案，“一面是对蝶对鸟牡丹花纹，围绕四朵大牡丹为中心旋转，四周则有对鸟在嬉戏，对蝶在取花蜜，相互呼应。另一面则是飞鸟狩猎纹，四鸟之间有一只硕大的海东青，正追逐着野兔与野鹿”[8]。

其他重要的实物还有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满地折花枝短袄、绣花障泥，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烟色绣折枝写生花残片，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金线绣衣物，瑞士藏刺绣莲荷纹裙摆，瑞士藏红色蹙金绣凤纹罗冠，中国丝绸博物馆藏联珠莲花双鱼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婴戏莲纹刺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童子戏花纹刺绣枕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牡丹纹刺绣枕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穿枝花绶带鸟璎珞纹刺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荷花水鸟纹刺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西辽墓出土的莲塘纹纱绣残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阿拉尔出土的荷塘鸳鸯纹刺绣肚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阿拉尔出土的四叶对鸟纹刺绣，私人藏罗地刺绣莲花天鹅等，民间藏绣画《捺钵狩猎图》《宋辽议盟图》《二十四孝图》《礼佛图》《出行图》《歌舞图》等。

三、从实物透视辽代刺绣的文化遗产价值

从相关文献特别是现存实物来看，辽代刺绣有着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这种孕育于辽河文化的艺术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体文化的特质，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刺绣这一艺术形态的发展。辽代刺绣的文化遗产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工艺价值、美学价值、历史和文化价值。

（一）工艺价值

艺术品的工艺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制作和创造过程中所使用、发展的方法与技艺。对更高的工艺技巧和更为精妙的手法的追求，是更好地实现艺术品的实用价值、体现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美学趣味、提升其文化内涵的基础。

作为赋予绣线材料以新的形态过程的工艺，刺绣的针法是其工艺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从刺绣诞生到东汉，锁绣是主要的针法，多为装饰纹样，锁绣能够更好地凸显肌理效果。三国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佛像和人物等题材的流行，开始使用平绣针法。这种针法更加丰富灵活，能够更加精准地表现人物形象，反映人物个性特征。平绣被大规模的使用，当在唐至宋这一历史阶段。宋辽金时期处于针法的转折期和发展期。三朝中，辽的刺绣对唐的继承最多、最早，且多有突破，因此，说辽开启了宋辽金刺绣针法等的转折期当不为过。如庆州白塔发现的刺绣均属平绣，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平绣实物之一。仅这批实物即可表明，辽高超的平绣技术和对锁绣等的灵活运用，对中国刺绣工艺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据赵丰分析，“其中所用针法有铺针，即用长直针刺绣使其满如平铺，如竹叶、枝干、花朵、人物等，绝大部分均用铺针绣成，但其中又有平铺、斜铺、射铺等不同的针向，以表示不同的实物对象”[5]80。铺针之上，需表现竹节时，用横钉针；需表现花蕊时，用直钉针；需表现龙鳞时，则用套针。在红罗地联珠人物刺绣中，以不同色彩的套针，表现骑士身上和马身上的披饰。在勾勒和作单枝时，出于表现的需要，也灵活使用了锁针。辽代刺绣，特别注重以多种针法的搭配达到表现效果，如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烟色绣折枝写生花，花和叶的轮廓、枝脉，以锁绣针法绣出，花瓣和花蕾，则以辅绒绣针法绣出，突出了写生花的特点，也体现了素雅、简练的美学趣味。

选线配线、选色配色是刺绣工艺的另一重要内容。辽代刺绣在工艺上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选线配线技法更加娴熟，以针法表现晕色层次的技巧已经成熟，绣金技艺被大规模的使用。辽代刺绣，能够熟练地选配各色绣线，通过调配各色绣线、使用各类针法，实现了良好的晕染效果。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烟色绣折枝写生花，其所产生的晕染效果，即为调配各种丝线配色的结果。庆州白塔的刺绣中，使用戗针表现具有深浅变化的不同色阶，多用由边及里的正戗针，“荷叶、花朵、湖石、祥云、云山等，均有晕色层次，而且晕色色彩的使用非常讲究，有规律可循，往往是边浅里深，白色常配豆沙色，浅蓝配蓝，黄色配橘黄等，十分调和自然”[5]80。以戗针等使刺绣表现出退晕、晕染等效果，后来成为中国刺绣中常用的重要针法。利用金线装饰衣物起步于隋唐，辽代开始增多，且其中用金装饰的大宗为绣金。按绣金的针法和方式等分类，可分为蹙金绣（或称盘金绣）和钉金绣。蹙金绣由盘金线构成图案的主体部分；钉金绣则是以金线勾勒图案的轮廓线、结构线。辽代刺绣实物中，钉金绣较多，蹙金绣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为伦敦博物馆藏紫地蹙金秀盘凤罗袍、英国伦敦私人收藏的八团升降龙蹙金绣龙袍。也发现了两种方式并用的实物，如瑞士藏红色蹙金绣凤纹罗冠，则结合使用了钉金绣和蹙金绣[9]。辽代刺绣的用金，对于宋特别是金、西夏及元、明、清乃至今日刺绣的用金法，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美学价值

手工艺品都有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合乎功用是设计时需要考量的第一因素，但让使用者和观赏者能够赏心悦目，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考察，刺绣是一种近于绘画的造型体系，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念、审美形态。辽代刺绣，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均有着鲜明的特点，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

从现存实物来看，辽代刺绣的整体艺术风格，继承了唐的雄阔、大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宋的秀雅、清丽和写实风格。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契丹人所具有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注入了刺绣艺术中，在由古典趋向于世俗的中国装饰艺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创造出了既具融合性、又具民族性特征的艺术形态。如从审美的角度考察，辽代刺绣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下择要介绍。

较之前代和同时期的宋代，辽代刺绣在造型与用色上均体现出独特风格。其在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在宋的影响下，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艺术的写实风格的发展，动物、花卉均重视写实造型，特别是花卉，突出了立体感和细部刻画。对部分场景的描绘，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世态人情和人间风物。其风格较隋唐等更趋精细，比宋更加简洁、粗犷。在用色上，

辽代刺绣对黄、绿、蓝的偏爱以及对多种颜色的搭配，体现出的具有独特地域特征和民族风格的美学风貌。从构图上看，辽代刺绣格外重视对称与均衡，这与自然界对称、均衡的规律对契丹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契丹民族较早就掌握了对称的规律，并将其灌注到对美的创造上。”[10]

辽代对动物纹饰的偏好并发展和丰富了这一类装饰纹样。动物纹饰在隋唐之际开始盛行，但到了宋辽金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更多地将北方草原和江南的动物纹样纳入表现体系，二是风格趋向于平民化，三是沿用的传统动物形象，其内在精神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1]。上述特点，在辽代刺绣中有着明显体现。辽代刺绣中对动物纹的使用，主要有三类：

一是汉文化所崇尚和喜爱的龙、凤、鱼、鸳鸯、蜂、蝶等，但其形象和内蕴的审美精神已经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如早期的龙纹，与唐风格无二，但中晚期的龙纹，则少了霸气和威严感，吉祥色彩更趋浓厚，并在某些细部体现了草原风格。最为典型的是英国伦敦私人收藏八团升降龙蹙金绣龙袍的龙纹，为喜相逢形式，二龙戏珠，团龙为三爪，龙嘴呈细长尖翘状，后足与龙尾缠绕，尽显草原风格。辽代刺绣中的凤纹，彻底摆脱了唐凤的丰满健壮的形态，受宋的影响较深，但带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凤的动态和凤尾的式样，凤一般被描述成站立或飞翔的样子，尾羽飘动，双翅伸展，修长轻盈地与或龙、或鹿、或天鹅等相伴，遨游于花丛之中，一派吉祥喜庆的氛围，这种民间性风格，可谓前所未有。

二是摩羯纹等的使用较宋要多，且具有自身的特色。摩羯纹是东汉时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唐代盛行。受唐的影响，契丹人对于摩羯纹有着浓厚的兴趣，形态更加多样，甚至出现了人首摩羯纹。辽代刺绣上的摩羯纹，呈简化形态，但造型新颖，惟妙惟肖。

三是大量使用了鹿、鸿雁、马等反映北方渔猎文化的纹饰。北方渔猎文化的纹饰，主要有鹿、马、虎、狗、兔、熊、天鹅、大雁、鹤、海东青、野鸭、鸳鸯、鹭鸶等。此类纹饰中的部分内容，在其他朝代和少数民族的艺术表现中多有涉猎，但像辽代这样集中而全面地使用和发展此类纹饰的情况，尚不多见。同样重要的是，辽代也由此成为中国装饰史上重要的春水秋山纹样的源头。鹿纹是辽代刺绣中最典型的流行纹样，契丹人对鹿有着深厚的感情，一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二是鹿与契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辽代各种形式的艺术品中均有鹿的形象出现。在辽代刺绣中，以鹿为主体，“经常作为辅助纹样的包括松树、花卉、山石、花树、卷草及云朵”[12]等，构成了典型的辽代秋山图样。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秋山双鹿纹绣，山石树木中的两只奔鹿，身长翅膀，头戴灵芝状花冠，一鹿向前，一鹿回头，仿佛边跑边交谈。辽代鹿纹形态与唐、宋不同，是北方草原民族秋山纹样的典型代表装饰纹样。现存辽代刺绣中，多出现的鸿雁纹，是春水纹样的典型代表。辽代的鸿雁纹，常见的有立雁纹、鸿雁踏莲、鸿雁嬉水等往往配有卷云纹和对称的叶纹，充满草原特色。私人藏罗地刺绣莲花天鹅也是春水图案，贴水展翅的天鹅，粼粼水波中的慈姑、莲花、莲叶，水面上的蜻蜓，展示着春水中的生动形象。

（三）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辽代刺绣，对于我们研究和梳理辽河流域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对于推动当今文化艺术特别是刺绣工艺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它是一种我们尚且认知不足的文化资源。辽代刺绣，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辽代历史、契丹民族习俗和民间信仰、民族文化心理等。同样重要的是，辽代刺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刺绣文化，是今日之辽绣的源头。对其所具的文化内涵、所承载的艺术精神等进行深入发掘，对于辽绣艺术的传承、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辽代刺绣的总体风格是稚拙、直白、简约，体现了契丹民族自然、豪放、粗犷、爽朗的性格特质。契丹人的性格与审美意识是在与自然的斗争、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苦寒的自然环境，广阔的草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放牧畋猎和马上征服的生存模式，以上种种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契丹人的性格特质和美学趣味，在辽代刺绣中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在辽代刺绣中，契丹人信仰的转变及其对社会、世界认知的变化，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早期契丹人有着强烈的自然崇拜，对日、月、星辰、山川、风、火、雷、电、动植物均有崇拜，并信奉原始多神教——萨满教。随着自身的日益强大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加之与北朝、隋、唐等的接触逐渐增多，契丹人开始信仰佛教，辽对佛教的信仰要甚于宋。由于辽的统治者对于儒学、佛教、道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道教也进入了契丹人的精神生活中[13]。现存的辽代刺绣中，反映契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牧猎图案、花石小鸟、吉祥图案以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图案是主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牧猎图案有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联珠人物绣、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飞鹰啄鹿纹

绣等;常见的吉祥图案与反映宗教信仰的图案有莲花纹、摩羯纹、云纹、连珠纹、龙、凤、鹤以及双钱、珊瑚、法轮等;花石小鸟图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联珠梅竹蜂蝶绣和蓝罗地联珠梅花蜂蝶绣等。

契丹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辽的文化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辽代现存刺绣实物虽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但绝大多数绣品和元素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辽代刺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绫锦缘刺绣皮囊最为典型,一件刺绣两面风格截然不同:绫锦缘刺绣皮囊一面的花树鸟蝶,整体上看是南方风格;另一面的秋山狩猎图案,则是典型的北方风格,反映了南北文化在辽代的融合。

考察辽代刺绣的价值,不能不谈它与今日之辽绣的关系。辽绣源于契丹人,发端于辽代,是辽河文化涵养的、东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朵闪耀着迷人光华的艺术之花。很多人只知道苏、湘、蜀、粤等绣种,岂不知辽绣在历史上曾与上述绣种齐名,其历史之悠久、工艺之高超、特色之鲜明,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后期辽绣之发展,今日辽绣之成果,均与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辽代刺绣有着密切关系。根据非遗项目辽绣代表性传承人何晓霞的研究,辽绣艺术的表现技法、工艺和地方特色,在辽代已经基本形成[14]。后经金、元、明、清、民国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成为中国刺绣文化中的瑰宝。因此,研究和发展今日之辽绣,应该高度重视辽代刺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赵丰.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下)[M]. 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56-59.

[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57-62.

[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6(1):29.

[4]朱和平. 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318.

[5]赵丰. 辽庆州白塔所出丝绸的织染绣技艺[J]. 文物,2000(4):70-81.

[6]王立华. 从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看辽代纺织技术[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4(2):13-14.

[7]赵丰. 中国美术全集:纺织品 1 [M]. 合肥:黄山书社,2000:237.

[8]何琳,卞向阳. 辽代契丹绫锦纹皮囊的艺术探析[J]. 艺术科技,2019(5):206.

[9]李薇.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契丹卷 3[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168.

[10]贲鹤龄. 浅谈契丹民族的审美意识[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6(6):69.

[11]谷莉. 宋辽夏金装饰纹样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1:104.

[12]茅惠伟. 辽金元时期织绣鹿纹研究[J].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2):55.

[13]冯继钦. 契丹族文化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346.

[14]何晓霞. 浅谈辽绣艺术的历史沿革和表现技法创新[J]. 文化商业,2002(3):3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of Embroidery in Liao Dynasty Based on the Extant Material Objects

YE Liqu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olog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 lot of embroideries in Liao dynasty i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folk collections,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aterial objects are the best Chinese embroideries. The embroidery in Liao dynasty present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al style, an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today's Liao embroidery, which is a valua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value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technologic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Key words: embroidery in Liao dynasty; existing material objects;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Liao embroidery

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兴修与发展

丁大涛
（郑州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明清时期的太平府即今天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本区圩田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东吴就已经开发，宋代达到第一个高峰，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太平府地区圩田的发展有其自然因素，如气候温暖湿润、湖泊广布等；也有社会经济因素，如人地矛盾的激化、税银的征派、商业的繁荣等。明清圩田呈现出数量大增、联圩并岸、圩田水利系统化、洲渚圩田大发展等特点。圩田的发展对当地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过度的开发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破坏。

关键词：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兴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5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83－06

明清时期安徽沿江圩田的发展，尤其是江淮地区圩田的发展，学界多有论述。如水利史专著《中国农田水利史》认为安徽明清时期沿江圩田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但书中所列例子大部分在江北，皖南地区很少提及。本文以明清时期太平府为例，通过大量的地方志材料勾勒出明清时期太平府地区圩田的基本情况。

一、太平府圩田兴修溯源

太平府是明清两代安徽省的一个府，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日马鞍山市及芜湖市范围。该区在宋代为太平州，元代为太平路，元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丁巳，朱元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清代仍沿袭明代的叫法。太平府在明代属南直隶，清属安徽省。太平府下辖三县，即当涂县、芜湖县、繁昌县，府治位于当涂县。太平府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境内有长江及其支流姑溪河、青弋江、水阳江等河流。该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大小河流密集，湖塘遍布，再加上地势低洼等特点，是理想的圩田开发场所。修圩筑堤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圩田的发展也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中国古代自宋朝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大部分赋税，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就是这种情况。据《清史稿》记载：“顺治四年，给事中梁惟请开荒田，兴水利，章下所司。十一年，诏曰：‘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道，修筑堤防，以时蓄泄，备水旱无虞，民安乐利。”[1]

所谓圩田即低洼地区四周筑堤防水的田地，是人们在利用滨河滩地，湖泊於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北宋沈括的《万春圩图记》是最早记载圩田的。沈括是这样记述的：“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滨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2]关于圩田的特点，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描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在《圩丁词十解》中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灌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3]

关于圩田的形制规划，沈括的《万春圩图记》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千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丈……”[2]

收稿日期：2020－04－15
作者简介：丁大涛（1983—），男，河南郾城人，硕士，郑州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与考古学。

太平府圩田最早可追溯至蜀汉，据地方志载“后汉景耀三年，都尉严密建议作甫里塘，开丹阳湖田，工费无极，民不堪命，此丹阳湖圩田之始也。”[4]兴起应肇始于三国东吴时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国由统一逐渐走上分裂，北方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中原人口大量外逃，其中绝大部分进入江南孙吴统治地区。他们当中就有一部分人到了安徽沿江地区，并在那里侨置郡县。这些北方人口的南迁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大量劳动力，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人口逐渐增长，耕地逐渐不足，地狭人稠的局面逐渐显现出来，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为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也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孙吴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当时三县境内已开始修筑圩田。如芜湖咸保圩、当涂永丰圩，等等。宋代该区圩田趋于完善。许多圩田在宋代被开发，如芜湖县陶辛“宋大观二年筑”、当涂县政和圩“宋政和四年筑”、芜湖县易泰圩“宋崇宁年间筑”[5]。北宋政和中期（1111 年至 1118 年）太平州（今当涂县）修治江田“自三百顷至万顷者凡九所，计四万两千余顷。其三百顷以下者又过之。”[6]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重修政和圩并兴筑芜湖万春、陶辛及当涂广济等圩。据乾道八年（1172）统计，太平州福定、庭福等较大圩田有圩岸一百公里，芜湖县圩岸一百四十余公里，通当涂圩两百四十余公里。鲁明江五堰更是在唐末就开始修筑，据地方志载“孙儒与杨行密战，行密将台濛作五堰，于此以给军食”[7]。元末战乱曾一度使该地圩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元末，岁收田赋为石仅一十有七，但至明初，太平府农业生产已迅速恢复。以当涂县为例，从户口方面来说，明初太平府人口数已超过了宋元（见表 1）。

表 1　宋、元、明太平府户口比较表

时间	户	口	资料出处
宋祥符天圣间	54676	86066	康熙《太平府志》卷九《户口》
元	32345	215820	康熙《太平府志》卷九《户口》
明（洪武二十四年）	37589	292998	康熙《太平府志》卷九《户口》

明朝建国后和大多数王朝一样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本区圩田迅速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区离首都南京很近，处于京畿地区，也是朱元璋的兴起之地，因此本区得到了政府的大量减税、免税的优惠政策。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5）清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特别是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人口无限制地增长，由康熙时期的 1 亿猛增至乾隆时期的 4 亿。太平府地区自然也不例外，人口剧增，原有耕地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人们千方百计寻求增加粮食产量的方法，而圩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人口增长以外，还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政府对当地征派巨额税银，促使湖区扩大围垦以增加耕地面积，航运商业的繁荣也激发了人们开垦的热情，使更多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除此以外，一些地方官绅对圩田的兴修管理做出了卓越贡献，因而深受百姓爱戴，被百姓奉为祭祀之神，百姓往往修建祠堂以示纪念。如明万历年间，当涂知县朱汝鳌为圩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万历三十六年（1608）青山镇西麓建有朱汝鳌祠堂，并传有李维桢所作的祠记。自明万历至民国，当涂各圩共修建朱汝鳌祠堂二十多座。可见，地方官绅对圩田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

二、明清时期圩田发展过程和规模

明清以来太平府圩田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朝初年政府就在当涂县大修圩田，明“洪武十二年（1379），塞广通镇成丹阳石臼湖田，二十五年（1392）复浚，河立闸以通苏浙粮道”[8]。明初官方很重视圩田的开发。据《明史》记载：“当涂民言：‘慈湖濒江，上通宣歙，东抵丹阳湖，西接芜湖。久雨侵淫，潮涨伤农，宜遣勘修筑。帝从其请，且论工部，安、徽、苏、松、浙江、江西、湖广凡湖泊卑下，圩岸倾颓，亟督有司治之。”[9]

永乐十一年修芜湖陶辛圩、政和圩。另当涂县乾隆间“查得业户王士纯等呈报丹田 17 顷 77 亩 7 分 9 厘 5 毫……该县徐家、竹山等圩埂外多有旧额荒滩地荡等项，昔因地势低洼，难筑埂堤，未能栽插，每年或取柴薪或种二麦，各照所产分别等次，折完赋粮，刊载全书。近缘各地，历年久远。沙涨土雍。渐成高仰，可得筑埂插禾，更无妨碍水道坟茔，于是劝垦升科以抵补丹额”，此次计“溢额水田 9 顷 13 亩 2 分 3 厘”，不足之数“领容劝垦”[4]。

在南陵县“邑东北两乡，地处低洼，徽郡休、歙、绩三县西北之水同旌、泾、太三县水，又池郡青、石两县水皆由北达江，每山水陡发，建瓴而下，为患最甚。万历十年，知县沈尧中踏勘形势，督筑圩坝以备水患”。[10]可知当时南陵县普遍修筑圩田。

晚清时期据陶澍介绍：“其时沿江各圩垸不下数百所，咸即劝民兴筑，宣城、南陵、繁昌等县，被冲尤多，如金宝圩，周围至一百七十余里，如养贤圩、叶村湾、管嘴滩等处缺口各长五六百丈，高至二三丈不

等。”[1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晚期包括太平府在内的皖江圩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

圩田的扩张使不少湖塘废而为田,如清葛元福在奏章《申请以劝垦升科匀抵丹额详》中说:“当涂忠惠圩原系丹阳湖水乡泽国也。……至顺治十六年卫宪巡按江南,逐将本湖尽垦为田。”[4]可见至迟在顺治十六年已将丹阳湖尽垦为田,丹阳湖这么大都能全被开垦为田,更不用说其他小湖了,这一时期废湖为田应该不少。繁昌县在道光年间,下官庄湖、骊山湖“今已为田”。

太平府不仅圩田的数量在增加,圩田的规模也在扩大,光绪三十二年修芜广路,途径陶辛圩,“共废田一千两百亩”,途径前林坝,废田一百二十九亩;罗周坝废田八十七亩;杨家坝废田二十九亩;愈家坝废田一百八十四亩。[7]有些圩田的面积达万亩以上。比较大的圩有万春圩、保定圩、广丰圩等,这三个大圩的面积达30万亩。除此之外,对旧有圩堤的修缮也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圩田发展状况。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当涂县县令成文运修长堤[8],道光年间,芜湖县将与当涂毗连的北埂加高墩厚,在西麻浦筑太平埂一道[5],当涂县因“福定圩漫,水旋决大官圩中心”,由官圩居民按亩输费修复[12],大官圩面积有20余万亩[13],可见修复的规模是很大的,道光四年(1824),因江南之苏、松、常、太,浙江之杭、嘉、湖等属河道淤垫,遇涨则溢,命林则徐综办之,[1]至咸丰年间,当涂县对大官圩又有修复,修复圩堤达一百余里,并筑滩浪及品字塾,同治间芜湖县筑保兴隔埂,光绪间,芜湖县在陶辛圩兴建大斗门一座,在行春圩建大斗门一座,筑芦花总斗门一座,筑边江新埂一道。

最后还要说一下对溢额田的开垦。所谓溢额田就是原来的田额数被开垦完,其后陆续垦辟的田就被称为溢额田。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的溢额田开垦状况可参考表2。

表2　太平府各县溢额田开垦状况表

府县	时间	升科,溢额田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
当涂县	康熙十七至二十八年(1678 — 1689)	共报垦溢额折田360.5亩	康熙《当涂县志》卷之十《田赋》
当涂县	乾隆间	升科913.2亩	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十八《艺文详》
芜湖县	康熙十四年(1675)	垦山升科1.8亩	乾隆《太平府志》卷十一《田赋志》
繁昌县	清初至道光年间	新垦新升田2379亩,新垦地1792亩	道光《繁昌县志》卷之五《食货志・田赋》

三、圩田发展的特点

明清时期太平府地区大量兴修圩田,这些圩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圩田数量激增。

明代,太平府圩田向湖泊、河网进军,原有圩田的地方继续增修,原没有圩田的地方兴修圩田,清代圩田继续扩展。明末清初当涂县有石城乡51座圩、令乡15座圩、姑熟乡37座圩、黄池乡36座圩、化恰乡20座圩、慈湖乡4座圩、望延福乡68座圩、积善乡29座圩、永保乡27座圩、贵游乡34座圩、白鹿乡7座圩、多福乡9座圩、湖阳乡52座圩、沿湖诸圩54座;[8]繁昌县有在城都6圩、一二都5圩、三四都13圩、七八都两圩、十五都九圩、十八都9圩、二十三都14圩、二十五都7圩、二十六都25圩、二十九都7圩、二十五都8圩;[14]芜湖县有博望乡45圩、德政乡57圩、丹阳乡106圩、易俗乡61圩、移风乡54圩。三县共859圩。[4]史载“当涂、芜湖、繁昌三县低接江湖,圩田十居八九”。[6]

第二,圩田发展屡兴屡废。

本区在圩田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圩修成后就一直延续下去,许多圩田都是屡次被废屡次兴建的。如“明永乐二年塞广通镇坝圌之以名银坝,于是三湖圩十坏其五……八年诏修圩岸以备风涛。”[8]芜湖万春圩“宋嘉祐中转运使张顾判官谢景温请修筑,”后“圩果坏”,“明正统间,当涂县民刘祖阴合建阳卫官军陈词募工修筑,将成,县民胡琦等备图经,呈控巡抚,仍复掘毁”,“光绪二十九年间,由两江总督张江密将军信奏请开垦以裕旗民生计”[5]。可知万春圩在宋嘉祐年间修筑,后被毁坏,明正统年间修筑将成,后又掘毁,到光绪年间又由张之洞奏请开垦。当涂忠惠圩于顺治年间(1644 — 1661)围垦,成田4.5亩,康熙初因水灾无法耕种,废田为湖。

第三,联圩并岸。

联圩并岸是明清时期圩田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成为圩田防御洪涝的有效措施。“所谓联圩并岸即针对圩区圩岸交错、水面萎缩、水系紊乱、蓄泄不利、修防能力分散的状况,而采取的将众多小圩合并或将圩堤连接成整体以增强抗防洪涝能力的措施。”[15]并小圩成大圩可以缩短防洪堤线,统一规划蓄泄布置,减少险工,增强抗洪防洪的能力,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本区联圩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据《当涂县志》记载,绍兴二十三年(1153)大水,诸

圩尽决,当涂知县张津带领群众筑长堤 180 里,“包筑小圩”。当涂大公圩是本区联圩最早的。大官圩“古名十字圩,合众圩而成者,俗称八十四圩,志载五十四圩”,[8]但康熙间经查只有 29 圩名。清代芜湖县联圩比较多,据民国《芜湖县志》记载,九都圩与当涂福宁圩同一大堤;保和圩与宣城永安圩同一大堤;保丰圩、保胜圩合成一圩;白沙圩内含太平圩、马家坝、祠堂坝、章家坝、刘家坝,堤长四十余里,张宕坝、张秋坝均附属白沙圩;十联圩堤长三十余里,内分多圩,如天井坝附属十联圩。

第四,圩田水利系统化。

明清时期圩田一般都外建圩堤,堤上筑有涵闸,内涝时开闸放水,洪水侵袭时闭闸御水。旱时放水入沟堤,引水入田灌溉禾苗。所谓“随潮启闭,以御淤沙。岁旱则长闭以蓄其流,岁涝则长启以渲其溢”[9]。涵闸斗门的完备有利于控制排灌,本区涵闸斗门很多,许多都为清代修筑。如芜湖行春圩的西坡陶方斗门为光绪元年建修,东埂的新斗门为光绪七年重修,东地大斗门为光绪十三年重修。清代晚期芜湖县已有斗门 206 个,土闸两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复垦的万春圩,东有大闸两座,西有大闸两座、斗门一座,南有斗门一座。

第五,圩田以洲渚圩田和围湖造田两种为主。

放眼皖江地区圩田,共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湖泊沼滩或浅水面围垦而成的圩田,如丹阳湖、石臼湖等大湖之滨及众多的小湖湖身都是圩田围垦的对象。第二种是江河洲滩围垦而成的圩田。太平府地区主要是在长江沿岸及青弋江、姑溪河等长江支流两岸,洲滩的发育为圩田发展提供了条件,太平府地区尤以这一类圩田最为发达。许多洲渚被开垦为圩田,由于长风沙洲地不断扩大,嘉庆八年(1803)筑堤成圩,原名广太圩,后改名广济圩。鸠江河段的锦卫洲宋初就部分靠岸,大部分成熟于清代。当时“锦卫洲宽二十五里,长三十里,今有桐城绅士徐海秋自备万金,会同业主姚姓,具禀督辕,呈请开垦,改种稻麦”[16]。其洲位置并入保定圩内。采石矶前明代有潜洲,至清初沙洲出水 6 处,清中叶部分垦殖,清代末期筑堤成圩。梁山洲隋唐时靠岸并开垦,宋代完备了堤防,现为芜(湖)当(涂)江堤。清代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共有洲渚 4 个,分别为曹姑洲,耕地为 0.09 万亩;当涂彭太洲,耕地 0.49 万亩;当涂江心洲,耕地 2.95 万亩;当涂小黄洲,耕地 0.5 万亩。第三种是对原有田地加筑圩堤以防水患而形成新圩。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特意说明此圩修筑的必要性,“太平襟带江流又合江宁广德宣歙诸水汇为三湖,浸灌稻田,地称沃野,然江潮时溢,受害亦先,谨修圩岸,培薄增卑,农隙劝民岁行毋怠……明正统间抚军周沈筑坝以来非遇盛涨之年尚可宴然无患,若开此坝三吴皆泽国也。”[7]

第六,圩田区人工管理完善。

圩田可分为官圩和私圩两大类。官圩设有圩吏,私圩设有圩长。官圩的维护与养护由官府出面组织人力;私圩则由圩长召集圩丁于每年雨季来临之前修筑圩岸、浚治沟渠和防护圩田。

四、圩田兴修的作用与影响

圩田是我国江南地区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的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农田模式。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圩田对于促进当地将自然地理因素转化为农业生产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维持着庞大帝国的生存。因而发展农业是根本,古代社会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太平府地区,圩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比例。当涂“民之农者十而八,山农三而泽农七”[17];芜湖则是“芜鲜山乡,率山农三而泽农七,水旱迭为苦乐”[5]。芜湖县的十个湖中有五个被开垦,分别为兴成湖、易泰湖、殷村湖、向岸湖和鸭蛋湖。当涂、芜湖两县圩田所占比例都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可见圩田在太平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圩田之所以被大量开垦肯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圩田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呢? 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圩田产量高于一般田地。由于圩田开垦自湖沼山泽之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质肥沃占有了农业生产的地利,再加上圩田的合理规划,又占了人和,而江南地区湿润的气候,又占了天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农业产量当然高。李本樟说:“其濒江一带为圩田,设堤防而立斗门以司吐纳,往往称沃壤。”[18]光绪《六和县志·地理志·水利》载:“水之所汇,田必肥美;水之所经,兼美茭茨,腊其鱼鳖足以供乾豆;获其蒹苇足以备材用。故圩田、湖田较之山地获常倍钟。”[19]正是因为本区圩田的高产,使本区有了余粮可供输出,而著名的芜湖米市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太平府各县的亩产量来说明问题(见表 3)。

表3　太平府各县亩产表

县别	亩数	额租	亩产量	资料来源
当涂县	学田186.6亩	米302.27石	6.48石/亩	康熙《当涂县志》卷之10《田赋》
芜湖县	学田24.5亩	谷11石	2.4石/亩	民国《芜湖县志》卷之23《田赋》
繁昌县	籍田7亩	米14.7石	3.14石/亩	道光《繁昌县志》卷之6《食货志》

由此可见,圩田区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

虽然圩田开发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历史证明自然界对人类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具有反作用,只是其结果不一定立即显现。正如恩格斯那段著名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0]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兴修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泥沙淤积与水道堵塞

本区除长江外大多河流较小,流速慢,由于人们不断在河旁开垦田地,导致河床抬高,泥沙淤积,最终诱使人们进一步开垦;加上上游的不合理开垦,一些官员对水利不懂,使河流的泥沙含量加大,河床进一步抬高。于是每逢汛期,河流两岸都要泛滥成灾。《明史·河渠志·直省水利》提到“本朝亦常命官修治,不得其要。而滨湖豪家尽将淤滩栽莳为利。治水官不悉厉害,率淤泄处置石梁,壅土为道,或虑盗船往来,则钉木为栅,以致水道堰塞,公私交病。”[9]

第二,破坏了原有水文环境

湖泊对环境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调节径流,吞洪吐涝。圩田的不断扩展不断侵蚀着湖泊,最终导致湖泊缩小直至消失,这样就导致了蓄洪、泄洪能力的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

第三,过度围垦容易引发自然灾害

圩田的特征就是水高田低,因此对水利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有内涝之患。本区水灾发生频率比较高,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低洼,平均海拔在50米以下,有些地区海拔只有6到8米,低于长江汛期水位,容易积水,所以必须要把圩堤加高,但本区水灾加剧主要还是人为原因,即过度开垦导致泄洪能力下降。另外,百姓渔利导致河道变浅,也会加剧水灾;最后圩堤疏于修防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涂县万历三十七年(1609)朱汝鳌这样描述:“旧年大水异常,圩埂尽行倾泻,本县单骑亲出,遍踏荒畴,廉知往时修筑,俱托圩长,各处敛财入蛊”,并且“老弱搪塞,视为具文”,可见圩堤修筑徒为形式,“往往一年之灾变作两年之害。”[8]

第四,不合理的开垦导致田地荒芜

据《清史稿·河渠志·直省水利》记载:“江苏巡抚于准言:‘丹阳练湖,冬春泄水济运,夏秋分灌民田。自奸民图利,将下湖之地佃钟升科,民田悉成荒瘠。请复令蓄水为湖,得资灌溉。’从之。”[14]可见正是由于人们不合理的开垦才导致“民田悉成荒瘠”。

随着圩田的不断开垦,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于是有人就提出了限开圩田的建议。《明史·河渠志·直省水利》云:“巡抚周沈言:‘应天、镇江、太平、宁国诸府,旧有石臼等湖。其中沟港,岁办渔课。其外平圩浅滩,听民放牧滋畜,采掘菱藕,不许种粳。故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遇泛滥,害即及民,宜悉禁革。”[9]“‘治水之法,有不可与水争地者,有不能弃地就水者’,三楚之水,百派千条,其江边湖岸未开之隙地,须严禁私筑小垸,俾水有所汇,以缓其流,所谓不可争着也。其倚江傍湖已开之沃壤,须加紧防护堤坝,俾民有所依以资其生,所谓不能弃者也。其各属迎溜顶冲处,长堤连接,责令每岁增高培厚,寓疏浚濬于壅筑之中。”[14]这虽然是针对湖南湖北的圩田所说,但这套理论适合各圩区,太平府地区也不例外。另“给事中邵正笏言江湖涨滩占垦日甚,论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卢坤等饬属详勘,其沙洲地亩无临水道者,听民任垦,否则设法严禁。”[14]这说明人们已对圩田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是圩田开发中的一大进步。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发展在宋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又一个新高峰。除了规模扩大,数量增加,还存在圩田发展屡兴屡废、联圩并岸、水利系统化、以洲渚圩田和围湖造田为主以及圩区人工管理完善等特点。太平府圩田的兴修对当时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一直到今天圩田对当地农业生产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不合理的开发,圩田的兴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人地矛盾日渐突出、江河湖泊淤积、对水旱灾害调控能力减弱、加剧了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等。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卷129)[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沈括.长兴集(卷21)[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杨万里.城斋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4]太平府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1998.

[5]芜湖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1998.

[6]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重修安徽通志[Z].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8]当涂县志[Z]. 稀见中国地方志本.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
[9]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南陵县志[Z].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江苏古籍,1998.
[11]陶澍. 陶澍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10.
[12]安徽通志[Z]. 安徽通志馆编,1934.
[13]安徽省志[Z].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1.
[14]繁昌县志[Z]. 中国地方志丛书本,1970.
[15]陈恩虎,惠富平.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维护[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5).
[16]杭宏秋. 皖江洲渚圩田的历史与现状[J]. 古今农业,2002(1).
[17]当涂县志[Z].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江苏古籍,1998.
[18]铜陵县志[Z].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江苏古籍,1998.
[19]六和县志[Z]. 中国方志丛书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20]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lands in the Tai Ping Coun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NG Datao
(Zhengzhou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both nature factors and socio – economic factors which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lands in the Tai Ping County. The farmlands showed the features of largely increasing, combination with other fields and shores, systemat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in farmlands and great development with continents.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s had a huge promotion to the local agricultural, but un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lso caused obvious damage to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i Ping County; farmland building

---

(上接第 77 页)

[16]李庆新. 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J]. 学术研究,2008(8):109.
[17]Nola Cooke, Li Tana. Water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M]. Singapore 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Maritime Trade Interaction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ne Archaeology

——Focus on China

WANG Limin
(Marxism College,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7, China)

Abstract: China's marine archaeology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center i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underwater remain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witnessed a long and close exchange hist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at and navigation technology, shipping routes and port cities, shipping and marine trad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archaeology require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arine archae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e further protection,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by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opening up vast spa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arine civil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rine history.

Key words: marine archaeology; marine trade; China; the South China Sea

从管理术语及其汉译观中西方学术文化之差异与交融

冯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学术的引进与本土化是一个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必然受到目的语文化的价值选择和本土改造。术语是专业领域知识表达的最小概念,体现出不同民族在认知和描述世界时的不同方法、视角以及价值观。通过中西方管理术语的对比,以及术语在汉译过程中显示的价值差异和文化调整,还有同一术语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翻译等现象,揭示中西方学术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内管理学界在国际化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文化吸纳和文化融合。

关键词:管理术语;翻译;学术文化;差异;融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6
中图分类号:H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89-06

术语是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1],由于概念是人类思维的最小单元,因此可以说术语是学术话语表达的基本单位。不同民族由于认知、描述世界的方法、视角,以及对这些认知赋予的价值并不相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体现为由差异化术语构成的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学术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和所有的翻译一样必然受到译者价值观(实际代表的是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和本土化改造。[2]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只有通过与社会和语境关联因素才能得到解释的语言特性,[3]研究不同民族在特定领域表现出来的术语差异以及术语引进所作的翻译调整,往往能帮助我们洞悉其背后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价值选择机制。

就管理学而言,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是在引入西方管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引入并移植了大量的管理学术语,这对我们从术语比较入手探寻中西方学术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对比中西管理术语,以下为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人名命名的术语:个人价值与集体智慧

西方管理学中存在大量以人名定义的理论、模型、假设、研究等等,放眼望去,比比皆是,比如 Hawthorne Studies(霍桑研究)、Gannt Chart(甘特图)、Hay Guide Chart-profile Method(海氏指示图表个人能力分析法)、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菲德勒模型)、Peter Principle(彼得原理)、Robert Rosenthal Effect(罗森塔尔效应)、Murphy's Law(墨菲定律)。其适用领域之广,适用知识层次之多,甚为震撼。而中国原生的术语体系中以人名命名的术语相对较少,除非是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或政治领袖,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

根据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区分的六个文化维度,[4]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西方文化偏向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个人价值、个人成就。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个人价值往往与经济价值联系起来,西方社会不仅存在大量以人名命名的商号、作品等,即使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建筑合同,也多允许设计师

收稿日期:2020-04-21
作者简介:2018 年度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新一代信息技创新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法律事件知识本体建构研究"(2018A02017)
作者简介:冯曼(1975—),女,湖北公安市人,翻译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教育。

署名。由此,知识产权很早在各个领域得以巩固、确立并受到法律保护,第一部专利法于15世纪诞生于威尼斯共和国。[5]此外,西方学术传统界对引用他人成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凡提及他人观点,必提及姓名。久而久之,哪怕较小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内都常被人以研究者姓名命名。而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学术传统注重集体智慧,不太热衷用个人名号定义学术主张。另外,国人在学术方面秉承谦虚谨慎的态度也不喜好以个人名义彰显其学术影响力。仅仅当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达到权威地位,或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才会被国人冠以其名,突出其贡献。一般领域的一般研究发现很难得到国人以研究者姓名进行命名的殊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术中各种理论、公理、原则、定律、模型、分析方法、图表、效应等各个层次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发现被大量以人名进行命名,最后得以术语化而固定下来。

近年来,由于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也出现了不少以中国学者命名的科研成果,但似乎更多地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是少之又少。比如侯氏制碱法(侯德榜首创联合制碱法)、陈氏定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华—王方法(华罗庚与王元采用代数数论方法研究多重积分近似计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传播。

这一术语现象反映了西方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对个人研究的肯定、对知识价值和知识产权的重视。中国学术在国际交流、传播过程中也会受国际规则的影响,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学术界对学术发现的术语化表示,可以预见将来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成果也会以研究者命名。而这些以个人命名的术语,也会打上民族的标签,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二、缩略型术语:知识传播中的抽象与显义

缩略型术语短小精悍,能承载更多信息。虽然缩略是英语和汉语都有的构词法,但相比汉语常用的缩合(如行管)和节略(如清华)两种方法,英语因其表音文字的特点,缩略语多提取音素、音节,形成了较多的形式和种类。[6]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英文中缩略型术语大量存在。其中,缩略词,比如Demo(demonstration)、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等,不管省去的是原词前、后拟或中间部分;还有拼缀词glocalization(globalization + localization)、Euro - crat(European Bureaucrat)、email(electronic mail)等,不管对原来的词组如何拆并,由于他们均与原词有着形式上的联系,较容易识别、认知和记忆,因此也是常用的手段。除此之外,英文管理术语中还存在很多首字母缩略或字母缩略词(详见以下举例)。

首字母缩略词在不同领域中字母可能对应不同的原词,容易产生混淆。而且,其过于抽象的形式,若不是业内人士,或者如不去查证,其含义往往无从说起。而汉语表意的特点,带给我们极大的优势,缩略术语时一般省去相同词素或选取代表词素,又或者采用数字概括关键词素,使得我们通过单个字意就能较容易理解其含义。因此,从知识的识记、理解和传播而言,汉语偏向显义的术语更具有优势。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

NGO(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装配件制造商(贴牌生产)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alysis:(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点分析法/SWOT分析

当然,我们也能从上述例子中发现字母缩略语更能节省信息空间,在单位时间和空间内能承载更多的语义信息量,从这个角度而言能提高传播效率。因此,对字母缩略术语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在专业场合,多采用零翻译策略,比如B to B、SWOT分析、PEST分析、X理论、Y理论等。

毋庸置疑,汉语显义的管理术语有助于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也便于学术在母语环境中的传播。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缩略术语的简洁性对学术的国际传播也有借鉴意义。中国的管理理论要走向世界,在术语命名时也可以考虑这一特点。知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就用C理论来命名其所提出的中国管理哲学,而北大阎雨在C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C模式。①其中,C代表China way(中国模式)、Charter(宪章)、Change(《易经》)、Confucianism(儒家)、Culture(文化)。可以说由于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代表了理论自身的大容量,这一命名不仅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比如管理学中知名的工作源动力理论:X理论、Y理论),其本身也是非常容易识记的。用英文字母命名中国管理理论,本身就是学术交流和融合的典型代表。

三、表达型术语:学术传播与学术身份

术语是用来进行知识表达的,相比西方管理术

语拥有大量的形象化表达,国内术语稍显拘谨,偏向直指概念本义的显义性表达。这是否说明了中西方对待学术的不同态度?让我们先来看看主要有哪些区别。

(一)寓言性术语

西方管理术语中经常能找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和故事来表达一定的管理学原理。比如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Horseshoe Effect(蹄铁效应)、Alligator Principle(鳄鱼法则)、Catfish Effect (鲇鱼效应)、Hedgehog Effect 刺猬法则、Cannikin Law (木桶原理)、Watch Law(手表定律)、Frog Effect(青蛙效应)、Herd Effect (羊群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破窗效应)、Halo Effect(晕轮效应)、Garbage Can Theory(垃圾桶理论)、Kick Cat Effect(踢猫效应)、Mushroom Management(蘑菇管理)、Bald Argument(秃头论证)、Rules of Thumb(拇指规则、经验法则),等等。寓言本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将教育意义蕴含于浅显易懂的故事中。西方学术注重实效,而管理学又是一门应用学科,大量的观察、研究均来自实践,研究成果也用于管理实践。这种寓言式的术语类似典故,不仅具有亲民性、可接受性,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信息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中国原生的管理术语少见寓言性术语。虽然,我们的文化重视经验科学,寓言因其饱含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备受推崇,但更多出现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而不是学术领域。一方面中国古老的管理思想多散见于诸子典籍中有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如儒家的尊卑有序、以人为本,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兵家经典《孙子兵法》,甚至近代的韬光养晦、实践出真知等都能与管理结合起来,但毕竟需要后人的挖掘提炼,国际化道路仍旧漫长。等到 20 世纪初科学管理代替经验管理,西方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起来,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更多追随西方,大量引进西方管理学理论,研究上也多关注西方前沿问题,对本土的管理问题相反研究较少。因此原生的术语本不多,再加上学术影响力尚有限,暂时还谈不上将本土寓言带入管理学术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再者,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阳春白雪”的定位,通过术语及其他学术话语表达,来确立其身份和地位,[7]使得“下里巴人”的故事较难和学者身份联系起来。难怪有时候我们常常自我批评,批评故意生造艰深概念,似乎越难懂、越玄乎就越学术的学术怪象。注重学术传播效果,学术表达确实值得我们探究。

(二)隐喻型术语

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说,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概念系统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8]术语体现了特定领域特定概念的认知,隐喻通过将熟知领域的概念(喻体)认知映射到另一个领域中去描述带有一定相似性的概念(本体)。因此术语的隐喻表达在英汉两个语言系统中都很常见。不过,由于汉语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除了表意的偏旁部首,单个汉字本身也是表意单位,如此庞大的字符集使得新概念的命名常常可以通过单个汉字的组合完成,不需要增加新的字符。而英语是由 26 个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是一个更为抽象的符号体系,其构词法颇为丰富,但是相对于由于表意功能强大的汉语,英语在表达新概念时创造新字词的比率大大高于汉语。这种抽象化的语言符号重新组合构词指代新概念时,往往需要通过词缀、词根猜测,或查阅辞典,或从相关文献赋予符号的意义才能进行理解,不利于新概念的认知和传播。而通过隐喻表达的术语则可以通过跨域映射解决新概念的描述和认知问题,因此这类术语较多地出现在西方管理学术话语之中。

隐喻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这类术语的翻译除了要遵循术语命名八大原则,即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等原则外,[9]喻体的处理还涉及目的语文化对其异质化内容进行认知、价值、审美、学术规范等层次的过滤。总的来说,其汉译可归为三大类:喻体直译容易造成认知障碍和错误或不符合规范的译出本义;喻体直译不阻碍术语认知且符合术语规范的可以保留形象意义;以及喻体表达可能遭遇文化障碍或规范障碍时,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试看下列例子:

1. 喻体直译易造成认知障碍、理解错误、文化心理别扭或不符合术语规范的,直接译出本义

out - of - the - box thinking 开放性思维(按原文译出,比较费解且表达不够简明)

white war 经济竞争 (将经济竞争比作白色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 表意不够直接)

baby bond 小额债券 (国内业界更偏向较为正式的称名,翻译时放弃了比喻意义)

package deal 批量交易(国内译名也有

作一揽子交易的，其实也无不可，只不过商业领域的正式表达似乎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更占上风）

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理性（直译过来是受束缚的、有界限的理性，而该理论的真正内涵指的是决策者作为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会追求理性但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会按满意标准而不是最佳标准进行决策。因此有限理性比受束缚的、有界限的理性在意义上更加清晰，前者关注结果，而后者强调状态。）

2. 喻体直译可以为另一文化认知，不造成认知误解的且符合术语命名规范的，可以保留其形象化描述。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knowledge bazaar 知识市场、spillover effect 溢出效应、chain of command 指挥链、grey - hair market 银发市场、frozen account 冻结帐户、sunk cost 沉没成本、red ocean strategy 红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 红海战略，等等。

另外，术语的翻译也会遵循系统标准的系统关联率、经济律、生态率三大定律。[10] 比如 white collar、blue collar 最先出现时，分别译作白领、蓝领；极具能产性的这一术语表达方式又创造了 grey collar（灰领）、gold collar（金领）、green collar（绿领）等新的术语，分别指的是服务业员工、收入相当可观的高端岗位以及环保事业的从业者。翻译时，尽管灰领不如白领、蓝领表意那么明显，但由于术语的系统关联性，即使不知其意，也可以断定为从事某种工作的员工。前面术语的翻译一旦稳定下来，其翻译方法对在此基础上新造术语的翻译提供了参考，一致的翻译方法不会阻碍术语的理解和扩展。

3. 喻体直译可能遭遇文化障碍时，或者不符合术语规范时，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

game theory 博弈论：中国文人雅士的治学传统使得中国学术话语更认可“雅”的语言，游戏一词略显随便，而博弈既是游戏的一种，同时又体现了智者的策略选择。通过喻体的置换，该汉译术语更符合国人的规范和审美旨趣。

joint venture 合资企业：本指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即合资企业。中国文化对风险以及商业上不利局面的避讳，使得翻译时侧重企业出资的形式，隐藏了共担风险的字面意义。

think bank 智库：think 指代的是人才，bank 原意是银行，用来存储资金、有价证券等财富形式的地方，think bank 喻指人才储备库，译作智库，更为简洁。

Pink Sheet 粉单市场（美国未上市证券的交易市场，因最初把报价印刷在粉红色的单子上而得名）：该术语在翻译时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因国人不一定知晓粉红单的来历，直译加注释既保留了源语文化和该领域概念的特质，又照顾了目标读者。

click - and - mortar 鼠标加水泥（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结合）：鼠标点击指代的是现代的电子商务，而水泥指代的是传统的实体商业。直译遵循了透明性标准，[11] 使术语回译时与国际称名同步，而注释则解决了概念认知的困难。

4. 同一喻体表达用于不同的语域，根据该语域的规范和具体语境下的意义，可能需要不同处理。

grass root management（基层管理）与 grass root culture（草根文化），同一个“grass root”由于使用在不同的语域，前者为管理生产语域，用语相对正式，翻译时将喻体转化成本义译出；而后者用于文化语域，该语域更倾向接受鲜活的、令人喜闻乐见的表达，因此喻体得以保留。

leadership pipeline 领导补给线模型：该模型用于解释企业内部领导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的时间配置、工作技能以及工作价值发生的变化，为企业培养领导人才提供理论参考，因此将 pipeline 具体为补给线，概念意义更为明确。而 Sales pipeline 销售管线（更多称销售漏斗）描述了处于不同销售阶段的销售目标、对应工作以及销售成功率，由于该模型看上去更象一个漏斗，且漏斗更对应销售机会可能漏失的情况，因此更多被称作销售漏斗。

西方管理术语更多形象表达背后可能还有一层原因：西方学术偏好以小见大，从微观量化研究导向宏观，并多用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思维[12]，因此话语体系中不乏这类具体的表述。而中国先前的学术传统多在归纳的基础上再进行抽象，抽象的结果自然需在具体的现象上更上一层楼提取知识，此时具体的现象就很难成为表达知识的术语。同时我们传统的思辨研究多进行概念推演，较难将具体的现象作为知识概念涵括进来。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由于西方管理界注重管理实效、传播效果；学术上擅长以小见大，并由于语言系统本身的特点，新的学术概念为避免制造新词，或者太过抽象的字母缩略语，而采用更容易识记的语言进行描述，也

就造成了西方管理术语中存在大量形象化隐喻表述。西方曾在司法和政治领域推行“Plain English Campaign”,呼吁避免使用晦涩艰深的语言,而应该采纳平实、易懂的文风,这也正好与西方管理术语多形象化表述的特点相互印证。而汉语因其自身表意显化的特点、因学术文化带来的严肃正式,倾向于接受直达意旨的表达或更抽象化的概念。前述同一喻体在不同语域的处理,也验证了这一差异。随着西方术语大量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我们希望术语回译时能与国际接轨,通过字字对译的方法尽量保留原文形式。对于西方术语中鲜活的表达,只要无损于信息的准确传递,或未给读者带来认知障碍或误导,翻译也会尽量保留术语中的文化信息。但是,如果喻体移植到目的语文化时,可能带来文化误解、文化抵触、增加认知负荷、表达不够经济等问题,这时术语翻译就应该灵活处理。在翻译隐喻术语时,对于存在异质性内容的术语,我们多采纳本土学术话语规范,比如选择直达意旨的概念表达、更正式的措辞、注意学术修辞等。

四、术语中的学术中立与价值判断

西方学术话语涉及一些较为敏感的概念的时候,为避免争议产生和不当价值判断,常会使用一些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 correct)、委婉或者相对中立的表达,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冲突。试看下列例子:

(一) 敏感概念的委婉表达

Industrial conflict / labor dispute 劳资纠纷:西方术语有意模糊劳资双方的对立,汉译时添加劳资双方,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显阶级对立,意图撕下资本温情脉脉的面纱。

underdeveloped/developing countries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术语避免使用 poor countries 这种带有偏见的表达,尽量使用所谓政治上正确语言。

Inner city 贫民区:在美国英语里指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为赋予低微职业以平等尊重,不乏一些委婉称谓:sanitation engineer 垃圾工、domestic help 家政助理。对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困境现象也有间接的表达:layoff 下岗 downsizing 裁员,等等。

(二) 术语中的价值判断:价值中立与价值评价

西方一些术语对有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太希望过早进行价值判断,是非曲直留待他人评述,概念本身多取中立表述。例如:

Euthanasia 安乐死:安乐死在西方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从词源学来看,euthanasia 在希腊语中有“good death” 的意义,却并无安宁、快乐的意思,定义是为了减轻痛苦选择终止生命的行为(It's the practice of intentionally ending a life in order to relieve pain and suffering)。汉译术语更多地考虑了该行为背后的善意,忽略了伦理上的争议。台湾多将其翻译为“医助死”,只描述事实本身,较好地避免了这种价值倾向性。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本是规范伦理学的一个流派,认为判断行为伦理性的标准应该从该行为是否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了福祉进行确定(Utilitarianism is an ethical theory that states that the best action is the one that maximizes utility)。其核心词汇 utility 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功利主义基于行为后果判断行为善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但对于奉行该主义者而言,汉译中的“功利”二字意蕴存在贬义,如果称作“功用主义”似乎更符合价值中立的做法。

knowledge half - life 知识半衰期: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容易过时,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半衰期”。西方术语用 half life 来表示,避免使用不太受欢迎的字眼。而汉译语义更加明了,便于概念认知。

non - performing / doubtful loans:关于银行的不良贷款,西方的措辞是 non - performing, doubtful 语义明显弱于汉译的呆账、坏帐、不良贷款。对于商业行为的风险,西方的态度似乎更加容忍,而汉语则更希望划清界限。“hyperflation”译作恶性通货膨胀,“overdue payment/late charge”译作滞纳金亦类似。

(三) 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商业价值肯定

经济管理不分家,在经济管理领域,一些与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挂钩的术语在汉译过程中往往被赋予更正向的价值以迎合国人希望业务顺利、吉言吉祥的心态。比如 forfeiting 本意指的是国际贸易中出口商的一种融资手段,即将出口交易中经担保行担保过的本票交于大的金融机构贴现以获得现款的无追索权融资。汉译术语称福费廷,既有音译的成分,音译采用的汉字也有较弱的表意功能,“费”与融资有一定的相关性,“福”则打上了吉言的色彩,希望讨得好彩头。这类词还有:factoring 保理、World Wide Web 万维网、American Express card 运通卡,等等。

五、结语

管理术语凝结着一定文化对管理领域知识的表达,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构建于整个社会和

文化之中,从知识的产生、传播,到转化为生产力,都承载着社会价值。对比中西方管理术语的差异,我们发现西方管理学存在大量以人名命名的术语、简明抽象的字母缩略术语、诸多表达型术语(例如寓言性术语、隐喻型术语等),为数不少的术语对具有意识形态内容或敏感内容采取了中立或委婉模糊表达。针对引进术语中的异质文化内容,汉译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处理。此外,同一隐喻在不同领域中也存在的不同的翻译现象。这些都从微观层面体现了一些中西方学术文化差异。中国的学术不断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我们要挖掘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自己的和让世界接受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思考中西方术语表达的不同、了解学术文化的差异,对于我们走向世界是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C 理论的著作见成中英著《C 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东方出版社,2011 年 11 月出版;C 模式的著作见阎雨著《中国管理 C 模式》,新华出版社,2010 年 4 月出版。

参考文献:

[1]冯志伟. 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与知识本体[J]. 产品安全与召回, 2006(1): 9 - 15.

[2]王秉钦. 东西文化价值观差异与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2(5): 36 - 42.

[3]杨永林. 社会语言学四十年[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6):402 - 411.

[4]Hofstede G, Hofstede G J, Minkov M.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3rd edition[M]. New York: McGraw - Hill, 2010.

[5]冯晓青,刘友华. 专利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丁晓宇. 英汉缩略语的构造对比分析:以英汉热点词汇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5):158 - 160.

[7]王苏生.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易中天现象"分析[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2): 49 - 53.

[8]莱考夫,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M]. 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9]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10]胡叶, 魏向清. 语言学术语翻译标准新探:兼谈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律[J]. 中国翻译, 2014(4): 16 - 20.

[11]姜望琪. 论术语翻译的标准[J]. 上海翻译, 2005(S1):80 - 84.

[12]辜正坤.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学术研究[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7(2):6 - 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Introspection of Academic Culture Differenc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alysis of Management Terminology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FENG M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 and localization of academic thoughts is a process of cultural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is academic communication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the value judgment of target culture and local adaptation. As terms represent the minimum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a certain domain, based on which the academic discourse is built and expressed, their usage by different peoples reflects diversified methods, perspectives, attitudes and values to describe and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s. Based on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management terminologies, and some adaptation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term for specific registers,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culture, China's cultural absorption and fusion along its pat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have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management terms; translation; academic culture; difference; integration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以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为例

黄兰堞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公示语是旅游景点的名片,其翻译质量不容忽视。实地调查发现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现状不容乐观。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来研究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对提高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译文质量、从而更好地促进桂林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公示语;红色旅游景点;桂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7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095-05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如何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成为国内翻译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红色旅游是一种承载着中国红色文化的特色旅游项目,近年来不仅成为国内旅游业的新热点,而且具有超越国界的广泛吸引力。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示语指为国内外游客提供红色旅游信息服务或规范其行为的语言文字,包括路标、路牌、招牌、指示牌、标语、警示语等;广义的公示语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景点简介[1]42。公示语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的“旅游名片”,有助于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2]47。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的翻译体现着我国的精神文明风貌和民族魅力,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的传播。

桂林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红军三次过境给桂林市区及周边县城留下了许多有名的遗址、遗迹和遗物。“桂林的红色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品位极高。”[3]桂林不仅隶属于《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的一条,而且还有着全国100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的“桂林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广西红色旅游“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桂林为“广西七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并且以“桂林—兴安—资源—全州—灌阳”为主线的“重走红军长征路”红色游线入选“广西八大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据统计,2018年桂林红色旅游共接待中外游客539.8万人次。“桂林红色旅游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成为桂林旅游的新引擎。”[4]然而,笔者实地调研发现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翻译现状不容乐观。很多中文公示语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即便公示语配有英文翻译,其翻译质量也不尽人意,存在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层面的翻译失误、文化层面的翻译失误以及语用层面的翻译失误。这无疑给外国游客带来了困扰和不便,阻碍了桂林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因此规范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

收稿日期:2020-04-19
基金项目:2017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研究”(2017KY0851);2019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带一路’下广西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人才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培养研究”(2019JGA336)
作者简介:黄兰堞(1981—),女,四川内江人,硕士,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外语外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教学。

译迫在眉睫。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可知,迄今为止用生态翻译学指导红色旅游公示语翻译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历史不长,而用生态翻译学指导桂林红色旅游公示语翻译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在现有的四篇相关文章中,一篇运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阳朔徐悲鸿故居文本翻译;一篇探析跨文化背景下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解说词的翻译;另外两篇为同一作者,主要研究桂林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翻译现状和对策以及翻译策略,但没有翻译理论依托、实例分析少。鉴于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入手,研究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以期提高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质量,同时为今后类似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Eco - translatology)是21世纪初我国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在其先期研究成果"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提出的翻译新论,它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观,或者说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5]4,对翻译的实质、过程、原则、方法、译评标准等进行了新的解读和阐释。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6]17。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语境概念,其内涵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6]18。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过程描述为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原则可概括为"多维度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翻译方法可谓之"多维转换",但主要落实在"三维"转换上,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评标准为"整合适应选择度",其有三个参考指标: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与发展,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持续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厚,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具有范式特征的宏大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数十个大小不同的理论视角"[7]1,"三维"转换就是其中之一。"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5]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5]2;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5]3。归根到底,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追求的是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能够得到最佳的维护和保持。"三维"转换主要基于译论发展、翻译实践以及语言、文化与交际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提出。翻译过程中的转换显然不只限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但此"三维"是最主要的。译者只有真正做到"多维"的适应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出恰当的译文[6]239-241。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关注翻译实践层面的问题,对应用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指导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

"公示语的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8]98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能够为公示语汉英翻译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翻译中,译者基于公示语翻译生态环境,在"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原则的指导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努力创造出正确表达原文语义、灵活处理文化差异、成功传递原文交际意图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以下针对桂林市区及其周边县城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为指导展开实例分析,并勘正其中存在的错误。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5]2,"包括词语的选择、句子结构的调整和修辞风格的转换等"[9]59。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种语言在发音规律、字词结构、造句谋篇、修辞形式等方面存在诸多明显的差异。如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倾向使用动态词汇,英语倾向使用静态词汇;汉语词汇基本没有形态变化,英语词汇有形态变化;汉语多用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汉语多重复,英语多省略等。译者在进行公示语翻译时,要适应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生态环境,选取符合英语行文规范和表达习惯的语言形式,避免拼写、语法、用词等低级错误,力求准确忠实地再现原文语言信息。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在语言形式转换上出现的错误颇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 单词拼写、字母大小写、标点符号以及语法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由译者粗心大意、翻译水平不高或是标牌制作单位工作马虎造成的。例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的公示语“非机动车停车场”被译为“Parking Lot for Non - motor Vehicle”,其中“Vehicle”应改为复数“Vehicles”,此外“motor”的首字母应大写。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的公示语“陈列馆”的译文为“Exhibion Hall”,将“Exhibition”误拼为“Exhibion”;“小心地滑”的译文为“Cautionl Slippery”,将“Caution!”误拼为“Cautionl”;“主碑”的译文为“The Main Starue”,可英语中根本没有“Starue”一词,应改为“Monument”,同时应去掉多余的冠词“the”;“观景台”的译文“The observation deck”多了冠词“the”,且两个实词的首字母应大写;“台阶陡峭注意安全”的译文“The steep steps Caution!”多了冠词“the”,此外两个实词的首字母应大写,且主要信息“Caution!”应放在句首。“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英文简介”更是语言错误泛滥,令人触目惊心,比如标题被译为“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emorial park of the red army breaking through the Xiangjiang River Campaign during the Long March in Xing'an county”,其突出问题在于大小写使用不规范,英文标题书写规则要求除冠词、介词(少于5个字母)、并列连词和不定式to之外,其余单词首字母均应大写,建议改译为“Introduction to the Memorial Park of the Red Army Breaking Through the Xiangjiang River Campaign During the Long March in Xing'an County”;又比如正文多处地方使用了顿号,如“The Sculptures、the Monument、the Fame Gallery、the Red Army martyrs sculptures of the soldiers from Fujian in Xiangjiang battle、the Clear Stone Park、the Xiangjiang River Campaign Memorial Hall.”但是英语的标点符号系统中是没有顿号的。

2. 用词不当。这类错误主要是因译者对词汇的误解或选词不恰当而引起,也很有可能是机器翻译的结果。例如: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的公示语“出口”被译为“Way out”和“EXPORT”,前者的本意是出路,主要指建筑物的出口或通道,尽管可以使用但不具有广泛性,后者是指经济层面上对外贸易出口。“出口”的正确译文应是“Exit”,该词占有空间小,体现了公示语简洁明快的特点。另一则公示语“禁止烟火”被译为“No Burning(禁止燃烧)”,应改为“No Smoking or Open Flames”。灌阳县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的公示语“文明参观”被译为“Civilized visit”,然而“Civilized”一词实际含义是“开化的,非野蛮的”,与原文语境中的“文明”根本不对等,建议改译为“Well - mannered Visit”。

3. 译文不统一。景点公示语英译主要为外国游客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信息服务的关键在于信息等值与信息统一,然而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存在着不同景点同一公示语译文不一,甚至同一景点同一公示语译文竟然也各有差异的情况,这容易误导外宾,给他们带来困惑和麻烦。例如: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的公示语“入口”有“ENTRANCE”和“Way in”两种译文,而“入口”通常译为“Entrance”,较少使用“Way in”。“七星岩”这一景点的译名有“SEVEN STAR CAVE”和“SEVEN - STAR CAVE”,且均存在语言错误,建议统一翻译为“Seven - star Cave”。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中“飞虎队”的译文有“Flying Tiger”和“Flying Tigers”,建议统一为“Flying Tigers”。“新圩阻击战”的翻译在灌阳县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中为“The Battle of Xinxu”和“Xinxu Blocking Action”,在灌阳县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中为“Xin xu resistance war”,在灌阳县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中为“Xinxu action”,建议统一为“Xinxu Blocking Action”。

4. 中式英语。中式英语是指带有汉语词汇、语法和表达习惯的英语。母语的负迁移和译者的语言功底不够扎实是造成这类翻译错误的主要原因。例如:七星景区的“陈光烈士墓”被译为“Chen Guang Martyrs tomb”,建议改译为“Tomb of Martyr Chen Guang”。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的“公共卫生间”被译为“Public Toilet”,然而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即为一般意义的“厕所”,无需翻译“公共”一词;“游客服务中心”被译为“The tourist service center”,灌阳县“红五师指挥所旧址”的“旧址”一词被译为“Former Site”,但按照2017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应分别改译为“Tourist Center/Visitor Center”和“Site”。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与内容上存在的差异。“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5]2-3,“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努力保护两种语言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6]237。

公示语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

流传递。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承载着大量的政治、历史、文化元素,英文公示语的目标读者是外国游客,他们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与国内游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译者必须要有跨文化意识,熟知汉英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文重要的文化因子和再现其文化内涵,同时也要关照译语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使用有利于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传达文化问题,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红色是汉语中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颜色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英雄精神的象征,具有忠贞和进步的褒义联想。英语中的红色(red)也和革命有关,但通常和暴力革命、共产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在公示语这个翻译生态环境里,我们'应尽量保存中国文化信息',使中国文化顺利走出去。"[10]99"红色旅游景区中亦留有'Red Revolution','Red Army'等彰显中国特色的译文。"[11]72因此,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中含有"红色""红军"词语的公示语,我们可以采用"red"一词来忠实地传递其文化内涵,笔者试译如下:

红色教育基地 Red Education Base

兴安红色文化研究会 Xing'an Red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红军堂 Red Army Hall

红军亭 Red Army Pavilion

红军标语楼 Red Army Slogan Tower

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Eternal Glory to the Red Army Martyrs

红军精神万古长青 The Spirit of the Red Army Lasts Forever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示语因其特殊性,没有现成的英文可以参照,是公示语翻译的一大难题。译者在翻译时应将译语读者放在首位,关照其文化和接受能力,把公示语的信息准确传递出来。以灌阳县战地救护所旧址的一则牌示解说为例:"战地救护所旧址,位于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蒋氏祠堂,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其中"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被译为"was built in the fourth year of daoguang(1824)",该译文必会让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游客感到疑惑,不明白道光是何人、道光四年为何意,通过语义增补概念就清晰明确了。修改译文为:was built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Qing Emperor Daoguang's reign (1824).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语系统中作者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语系统中得以体现、是否传递给了译语读者[6]237。"公示语文本理应属于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能够感染读者并使其获得信息服务","公示语英译是以成功交际为最终目的的应用文体翻译"[12]166,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最大限度地照顾其信息需求、社会文化习惯、认知和接受能力等,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重组甚至改写,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12]195,才能真正实现成功交际的目的。

桂林红色旅游景点禁止公示语使用词汇"forbidden"和"prohibited"或命令式的祈使句,语气生硬冷漠,降低了公示语的交际功效。考虑到英语国家向来倡导民主平等,翻译时要尽量使用中性或暖色调的词语。例如: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公示语"禁止吸烟"被译为"Smoking is forbidden",可改为语气相对柔和点的"No Smoking",还可改为译语读者最乐意接受的"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显然后一个译文体现了交际维最大限度的实现。灌阳县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中的公示语"请勿触摸"被译为"DON'T TOUCH",建议改译为"Please Do Not Touch"或"Hands Off"。相比较而言,后一个译文质量更胜一筹,因为用名词比用动词委婉,正面劝说比反面禁止更容易使受众接受。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中以爱护草坪为主题的公示语"保护一片绿,增添一份美"被译为"Add a protection of a green beauty",建议直接套用现成的英语公示语"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请勿践踏草坪)",这样的表达简洁规范,感染功能突出,从而很好地达到了交际目的。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中"抗日战争"多被译为"the Anti-Japanese War",该译文容易让不谙中国革命历史的外国游客以为是反对日本、反对日本人的战争,体现不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之意。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最新发布的中央文献术语译文,"抗日战争"译为"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简译为"the War of Resistance"。此译文充分再现了原文的信息功能,表明了战争的正义性,能够增强外国游客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同,引发其情感共鸣。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交际的积淀"[6]236,语言、文化、交际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联。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公示语汉英翻译

并非只是一个维度的考虑。为了方便描述而强调某一维度时,并不意味着其他两个维度在翻译过程中没有起作用。事实上,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有时很难截然分开[6]237。一个维度的翻译失效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一个甚至两个维度效果的再现。只有做到三个维度协调平衡,才能产生和原文最贴切自然的对等。例如将公示语"违者后果自负"翻译为"Please help us by observing the above rule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则同时体现了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符合生态翻译学的译文评判标准,是"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佳译。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具体地进行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关注语言形式的转换、文化内涵的阐释以及交际意图的传递。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指导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能够有效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当然,规范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汉英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终归离不开政府职能部门、标牌制作机构、译者、社会公众等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桂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的成功翻译对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促进桂林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的传播以及助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睿,袁邦株. 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综述[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5).

[2]廖亦斌,董爱智. 红色旅游产业中公示语翻译问题研究[J].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

[3]武葳. 重走长征路:兴安突围走向胜利[N]. 中国旅游报,2016 - 12 - 09(A02).

[4]巫美桥红. 山水桂林擦亮红色旅游品牌[N]. 广西日报,2019 - 04 - 29(7).

[5]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2008(2).

[6]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胡庚申. 若干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应用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2017(5).

[8]张全,黄琼英. 简明应用翻译教程[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9]郁青青.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景区公示语英译中的三维转换:以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公示语为例[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

[10]肖乐.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外宣英译策略:以公示语翻译为例[J]. 湖南社会科学,2014(3).

[11]赵艳,苏贝娇. 从翻译目的论看红色文化旅游外宣翻译:以三明市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为例[J]. 昌吉学院学报,2018(2).

[12]万永坤. 公示语汉英翻译探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Eco - translatology

—A Case Study of Red Scenic Spots in Guilin

HUANG Land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de,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Public signs are name cards of scenic spots, and their translation quality cannot be ignored. Through on - the - spot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Guilin red scenic spots is not optimistic.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Guilin red scenic sp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Eco - translatolo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public signs in Guilin red scenic spots and thus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uilin red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spread of its red culture.

Key words: Eco - translatology; "three -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pubic sign; red scenic spot; Guilin

转型发展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郎慧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提升教师能力是推进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本文从提升教师能力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学校转型发展对教师能力的要求,阐述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不足的成因,从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搭建平台,促进教师发展;多措并举,加强教师培养;完善制度,树立竞争意识等四个方面提出提高教师能力的对策。

关键词:转型发展;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8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00-05

一、引言

新建本科院校是指教育部2000年以后批准设立的本科院校。我国1999年有本科院校597所,2018年有1245所,二十年间增加一倍。新建本科院校占据我国本科院校的“半壁江山”,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转型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的重要出路,是一项系统工程。[1]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主要有办学定位转型、培养目标转型、师资队伍转型等问题。[2]教师作为影响学校转型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转型发展的关键点和难点。[3]面对学校转型发展,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教育理念普遍停留在专科阶段,专业知识有待提升,对学科热点、前沿问题缺乏系统认知和把握,缺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未能很好地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4]。目前,学者对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能力[5]、科研能力[6]、实践能力上[7],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及教师综合能力鲜有从转型发展角度进行探索研究。本文从教师能力提升的角度,试图探索出一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路径。

二、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新的产业变革和技术革命正在发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争夺成为焦点。优先发展教育,培养大批创新型和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是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保障。为全面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新建本科院校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促进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贡献度。新建本科院校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来,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行业支持,通过建设智库、社科研究、科技创新,形成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机制。和行业、企业进行相关应用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更直接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体现。

(二)新建本科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在众多高校中,既有“双一流”高校和传统本科院校,又有老牌专科院校和特色院校,新建本科院校竞争压力巨大。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的问题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紧缺,远不能满足经济社

收稿日期:2020-04-17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指导计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河南省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19B630021)

作者简介:郎慧国(1979—),男,河南焦作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人事处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高校管理。

会发展的需要。新建本科院校又大多为地方性院校,具有建校时间短、规模小、综合实力弱、学校发展受限、师资力量薄弱等特点。由此,新建本科院校面临多种形式的转型,如由专科向本科的办学层次转型,由文科向工科、单一向综合的学科设置转型,由传统专科向应用型本科的学生培养方式转型,等等,这种转型发展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要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技能型大学。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教师要将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带入课堂,反哺教学,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建本科院校和国外高校交流更加频繁,合作层次更高,学生国际化视野更加开阔,教师必须提升自身能力以应对这种挑战。

三、转型发展对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的要求

2015 年 10 月,教育部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2017 年 1 月,教育部又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应用型高校是指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研究的高校。这就明确界定了新建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问题,为学校发展指明了方向。由此,加快转型发展,增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能力,是推进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要求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自身不仅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还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应用型的人才。这也是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教师能力的主要区别。由于长期从事专科教学,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普遍在专业理解深度和教学深度上不够,面对教学对象的改变,教师专业素质的不足也逐渐突显出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师原有专业素质和知识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代大学生学习的需要。教师自身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掌握本学科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对所教授的专业有整体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二)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能力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教师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可通过网络获取多种信息和知识,教学活动的开展脱离了课堂,教学空间得以延伸。网络资源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使其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教学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所以高校教师既要通过丰富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改善课堂质量来吸引学生,又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结合互联网优势,加快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要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仅仅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做到理论联系实践,深入了解行业当前的新技术、新方法,掌握行业对人才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加强实践教学。新建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总数相对不足,且在学科和专业之间分布不均衡;在"双师型"教师中,持有相关职(执)业资格证书,但缺乏实践经验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不利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三)具备较高的应用研究能力和创新驱动能力

应用型高校和研究型高校在科学研究方面是有区别的。研究型高校科研重心侧重于理论研究与创新,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则侧重于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应用型高校的科学研究致力于产品开发和应用创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力,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但新建本科院校科研的现状是,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较少,发表论文级别较低,教师科研意识薄弱,整体科研能力有待提高。

(四)具备较强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新建本科院校要通过校企合作、科技创新、咨询服务等渠道提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教师应充分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现状,通过社科知识普及、政府决策咨询、企业管理培训、行业调研建议等方式,发挥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对接地方产业发展,成立研究中心、创新中心、高端智库,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四、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的困境

(一)重视程度不够

教师能力提升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的，所以学校要制定长远的教师能力提升计划，从源头上抓好教学质量。目前，学校重视教师的使用，而忽视教师的培训；重视硬环境的建设，而忽视软环境的营造；重视事务性工作的开展，而忽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教师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学校不仅要对教师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更需要对原有思维习惯进行改变和优化，

教师教育思想和责任意识薄弱，严重制约着学校教师能力的整体提升。教师习惯于传统专科工作思维，工作重心是上课，而不是应用研究、服务社会、专业实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师角色未能及时转变。学校虽会举办转型发展培训、规章制度建设和教师能力提升培训，但教师认可度普遍不高，落实不到位。新建本科院校多处二三线城市，信息相对闭塞，竞争意识和主动学习意识淡漠，存在得过且过思想。

（二）能力提升平台欠缺

新建本科院校管理人员的观念滞后，对教育教学、应用研究、实践经验和服务社会缺乏认知，严重影响了教师能力提升平台的搭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新建本科院校的首要职责。新建本科院校不乏精品课程和教学水平高超的教学名师，因平台建设不足，使教师仅限本校或其他高校兼课，教师的教学能力难以在全社会有效发挥。良好的科研平台是高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和保障。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格之前，由于受办学条件和办学定位的限制，科研平台较低，科研条件较差，很难满足教师科学研究的需要。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受人才限制，短期内依然很难营造出更好地科研氛围。同时，缺乏相应科研考核机制，对高层次科研项目申报的意愿不强，高层次项目难有所突破。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社会交往狭窄，熟悉领域单一，难以建立起以教师为中心的社会服务平台。教师科研能力不足，行业联系不够，从事科学研究的意愿不足，从而导致科研成果级别不高，成果转化困难。新建本科院校经费不足，培训投入较少，缺乏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造成教师国际化视野不足。

（三）培训力度不够

培训是指通过一段时间的在职或脱产学习，使受教育者掌握组织期望员工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高校教师的培训形式通常包括学历进修、企业挂职、专家研讨、专家讲座、跟班学习、访问学者等，培训内容包括实践培训、专业培训、教育教学方法培训、科研能力培训等。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多是基础性的培训，时间较短，缺乏针对性、专业性和有效性。英国应用技术大学多数设置有教师发展中心，针对不同教师采取有区别的培训措施，并将个人发展和学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8]

（四）缺乏有效的教师竞争机制

新建本科院校多为地方性院校，地处二三线城市，财力保障不充分，吸引人才力度不高，所招聘教师学缘结构单一，具备国际教育背景的师资匮乏。教师多是应届硕士和博士，他们不仅缺乏教育经验和教学能力，同时也缺乏专业实践能力，很难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工作中。

新建本科院校因受传统思想影响，重理论、轻实践，“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严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称评价体系。职称评审照搬原有模式，应用型教师和普通教师未区分的问题普遍存在。新建本科院校对实践能力的认定，多是通过职业资格证书来判断。工作中，具有职业资格证书而无企业实践能力的教师普遍存在。

在人事分配制度上，由于受地方财政收入和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的限制，新建本科院校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难以打破固有的分配体制，调动教师积极性的力度有限。新建本科院校因受传统思维影响，改革难度较大，又缺乏对各类人员的科学合理评价，教师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

五、转型发展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之后，对教师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各级干部和广大教师思想认识的转变，只有思想认识到位，教师能力才可能得以真正提高。面对新建本科院校专科向本科、理论向应用转型，教师的教学层次和教学内容也应随之改变。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应树立竞争意识和主动学习意识，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合格的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教师能力提升离不开组织领导，更离不开党委的坚强领导。面对学校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新建本科院校必须高度重视教师的能力提升。教师能力提升不仅是职能部门的事情，更是人才队伍建设的范畴，应由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应成立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负责教师能力提升，定期向党委汇报研究。

（二）搭建平台，促进教师发展

充分发挥教师发展中心的作用，完善制度建设，为教师能力提升创造条件。加强校企合作，推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通过挂职、交流、跟班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讲座等方式，切实增强教师能力，开阔教师视野，使教师学习和掌握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加快工程训练中心和智库建设，为成果转化提供平台。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为教师能力提升提供资金保障。

（三）多措并举，加强教师培养

高度重视教师的培育工作，科学制定培养方案，搭建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平台。

1. 专业知识培养。通过学历进修、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等方式，推动教师更新观念，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5G手机的广泛应用，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受到了很大挑战，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宽泛。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如果仍按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授课，则难以获得学生认同。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及时更新专业知识、扩充知识层面，才能满足教学发展需要。2019年5月16日，习近平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升本后，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培养目标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教师必须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完善知识结构，才能培养出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2. 教学能力培养。通过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措施，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加强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完善传帮带机制。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查找不足，积累经验，以此完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聘请一些教授或专家，为新建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出谋划策，为学校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动力。

3. 科研能力培养。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学科特点，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组建若干科研团队。加强学科带头人建设，鼓励学科带头人整合内部资源，强化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争取在区域内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形成品牌效应，以带动学校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面对新建本科院校师资水平薄弱，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现状，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发展规划，学校应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重点建设一两个一流的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从而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4. 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侧重于能力提升，应突出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鉴于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定位，学校应鼓励教师进入工程或管理一线，参与科技开发，了解科研动态，以便能更好地设计出人才培养方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教师专业实践能力通常可以采取以下方式：第一，通过企业挂职、企业兼职、脱产培训等方式深入企业，使其掌握本专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以提高专业实践能力。第二，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加强教师与企业之间的深入交流，以提高其专业实践能力。第三，将企业一线的高管和技术骨干聘请到学校授课。这些举措可以开拓教师的专业视野和实践应用能力，提升整体专业的教学水平。

5. 国际化水平的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学校应探索国际化合作培养教师的管理办法，逐步扩展教师的国际视野和海外工作经验，培养出具有国际专业化能力的应用型教师队伍。

（四）完善制度，树立竞争意识

建立和完善人事管理制度，营造竞争氛围，有效发挥“鲶鱼效应”。

1. 建立严格的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录用关，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双重考察，确保教师能力入口关。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鼓励聘用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教师为兼职教师。根据专业发展和学科特点，适度引进一些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师，健全师资队伍结构。

2. 完善教师内部流动机制。根据编制和岗位情况，鼓励教师在学院与学院之间、学院与机关之间、学院与教辅单位之间自由流动，引导绩效差的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向专业相近的教辅岗位或管理岗位流动，完善优胜劣汰机制，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的热情，促进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塑造良好的组织文化。

3. 完善奖励性绩效工资制度。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成果为目标，建立健全绩效工资制度，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强化岗位职责、以岗定薪，进行岗位管理，重点向教学、科研一线核心岗位倾斜。坚持校院两级管理，总体设计、平稳过渡，逐步加大二级单位的分配自主权，进一步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搞活内部分配，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发展活力，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和用好人才，提升教师能力，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的激情，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 推动学校职称制度改革。新建本科院校应结合学校实际,继续完善职称评审办法,将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能更好更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充分发挥职称的导向作用。健全岗位设置,完善聘任办法,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5. 深化学校考核评价制度。加强师德考核,把师德考核放在教师考核的首位,强化思想政治建设。突出教育教学考核,强化课堂纪律,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完善科研项目考核,强调应用研究,建立"代表性成果"制度,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社会服务考核,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引导教师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搭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将教师个人发展和学校战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助推学校健康持续发展。

6. 建立教师能力提升反馈制度。教师考核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核结果,而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绩效。学校应当建立定期的考核反馈制度,将考核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并与教师进行沟通,使教师了解自身能力的不足以便改进,从而达到提高整体教师能力的目的。

六、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新建本科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这就要求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能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从思想认识、平台建设、培训开发、竞争机制等方面着手,探索提升教师能力的路径,以此对新建本科院校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周乐强. 转型发展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基于C学院的调查[D]. 南昌:南昌大学,2016:6.

[2]曲殿彬,赵玉石.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问题与应对[J]. 中国高等教育,2014(12):25-28.

[3]顾永安.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核心要义、目标趋向与根本指向[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4):1-5.

[4]束仁龙. 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转型发展的困境与破解[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8(4):33-37.

[5]姚亚菲.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以集宁师范学院为例[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9(15):129-130,136.

[6]谢吉容. 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培养问题探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21-124.

[7]张根华. 新建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提升刍议: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12(12):18-20.

[8]李明强,吴雯雯. 国外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经验对我国转型地方高校的启示[J]. 高等教育评论,2015(1):170-184.

(责任编辑　许峻)

An Analysis on the Way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in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LANG Huiguo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eachers' abilities,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abilities in th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e lack of teachers' abilities in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e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in terms of raising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building platforms to promote teacher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 teacher training; improve the system, establish a sense of competition and other four aspects.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eacher's ability

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田 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到2011年完成国家验收,我国利用25年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任务,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也由"量"向"质"转变,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已成为新时代的教育发展核心。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滞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依然严重。通过分析农村教育现存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政策制定、经费投入、师资配备、学生营养等方面未做到协调统一,从而得出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并提出建议与对策,以期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和困难群体倾斜,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关键词:新时代;城乡教育;教育公平;教育质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19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05-05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下,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使我国在全球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在"量"的达成下,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对教育提出了"质"的更高要求,体现了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公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要让教育在公平基础上实现"有质量",这既是百姓的新期待,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到2020年,实现"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战略目标[1]。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当前面临的关键任务。我国正在实行"精准扶贫"政策,力争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是保障小康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教育问题同样需要精准扶贫,需要对农村教育给予更多关注。

一、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的价值逻辑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面向人人"的现代化理念[2],即教育要面向每一个人,不再拘囿于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而是要回归教育公平的本质,尊重教育对象的独特性,强调其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参与和充分发展。这就意味着,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焦点在于有质量,注重的是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的教育公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农民收入水平低,学生"有学上"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物质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开始更加渴望一种突出学生个性与多元化的教育,对"上好学"的期盼变得尤为迫切。

我国教育正面临巨大挑战,正如《教育规划纲

收稿日期:2020-05-03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8年度调研课题"农村辍学现象与教育公平问题研究"(SKL-2018-2038)
作者简介:田晨(1990—),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理论与政策,教育管理学。

要》所指出的,“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矛盾为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公共教育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对于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要有量与质两个层面的支撑。从社会矛盾的角度来看,量即解决学生“有学上”的问题;质即满足学生“上好学”的需求。在公平的视域下,量表示入学率上量的平等;质意味着,既能保障受教育者享有教育过程上的平等,又能针对教育对象个体差异提供多样性的优质教育。推动教育现代化,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符合社会需求,凸显了新时代我国教育从“大”到“强”的发展特点。显然,当前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核心在于对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的追求[3-4]。

二、农村教育现存问题及分析

目前,虽然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基本上所有孩子都能上完初中,但是教学质量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差距明显。教育具有连续性,如果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接受高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关注点应该从入学率转移到教育质量上。教育资源配置城乡有别,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村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是我国教育体制现存的问题,阻碍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一)教育政策城市倾向严重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40年。要想弄清楚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取向,首先需要了解我国教育发展的变迁史。自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到1986年普及义务教育的提出,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这之后的十几年间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难以确保城乡教育保持均衡,因此发展的重心被放在了政治中心——城市。教育政策向城市靠拢,政府集中力量在城市办好一批学校;而农村教育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对其发展教育的标准也相应宽松,城乡之间教育经费生均投入差值明显。教育政策城乡有别,城乡普及教育的程度亦相差悬殊。

到了2000年,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教育发展的目标开始向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转变。具体通过优化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学生充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均衡发展的目标成效[5]。但是,部分地区在实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盲目调整和简单化操作,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学校布局结构不合理,原先就近的学校被撤并,学生及其家庭需要投入额外的教育成本接受教育[6]。

(二)经费投入差距显著

我国城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较大,翟博等[7]通过实证分析,测算出2006年至2009年城乡生均经费比值均超过了1,说明了该投入的差异与不均衡。不仅如此,调查还发现,校与校之间也存在着教育不均衡现象,即教学质量好的学校生均经费高于教学质量差的学校,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对教学质量好的学校的生均经费投入均超出了1倍之多。肖桐等[8]根据2005-2014年全国31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出十年间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均远低于城市,最高投入差达到3000元左右,且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也历经了探索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先后以乡和县为主,保障机制重心偏低,不仅造成地方政府教育财政压力过大,还出现了不同地区的财政投入不一致局面,导致城乡教育呈现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例如,当乡级政府作为教育责任主体时,因财政能力十分有限,不得不采取多渠道的教育经费筹措体系,其中包括让农民承担起绝大部分的教育投入,这种“农民办教育”的管理体制无疑是杯水车薪,最终问题频现;当县级政府负责管理农村教育经费时,同样遇到责任超出财政能力的局面,导致农村学校负债严重[9]。

(三)师资配备不完善

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教育资源配置均衡,首先要保证师资配置均衡。我国城乡学校之间师资方面在数量、质量、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从地理上来看,农村地区不具备城市人文位置关键、交通便捷等优势,经济水平低下、发展空间受限。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制约,为摆脱出身贫苦的工农阶级,国家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口号,这在带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增大了贫富差距,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资源配置城乡有别,国家对于教育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投入偏向城市,而农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自我来负担,导致了地区间的差距,这也是造成师资配置不均衡的源头性因素。

农村地区教师与城市相比工资水平、福利待遇悬殊,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学习培训、职称评定等机会相对较少,投入大,产出小,这也是致使农村师资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直接原因。余秀兰[10]提到近年来城市中民办学校发展势头迅猛,凭借其待遇好、硬件强的优势冲击着公立学校,甚至引

发了公立学校教师跳槽到民办学校的热潮，优质师资流入优质学校，加剧了校际的师资差异。由此，农村学校生师比过高，教师学历及职称偏低、年龄偏大，且各学科任课教师短缺，拉大了城乡学生享受教育质量的差距。

（四）学生营养不均衡

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家长大多靠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看护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了老一辈人身上，这样的儿童群体被称为留守儿童。农村大多地处偏远地区，农作物产物类别单一，对于食品的购买也十分不便，这影响了农村家庭的膳食搭配和食材的新鲜程度。受制于家庭收入与生活习惯的影响，看护人对营养知识认识不足，留守儿童往往得不到良好的营养条件，这会影响他们的大脑和身体发育，进而影响对学业知识的掌握。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及其团队[11]经过多年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学生营养摄取不足，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缺乏肉类、水果和蔬菜，长此已往必定会引发健康问题，造成发育不良、认知能力下降，继而引起学习兴趣低下、学习信心受挫、学习动机缺失等心理负面因素，无法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目前，在校就餐的农村学生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我国于 2011 年启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通过财政拨款及集结公益项目为农村学生提供营养餐，目的是要提高农村学生的健康水平。为检验计划的进展情况，2016 年研究者们对试点学校的食堂建设情况、食堂供餐情况、食物供应情况、学生餐剩饭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发现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部分学校尚未建设食堂或餐厅，学生只能在教室或操场就餐，还有部分学校食堂和餐厅面积或桌椅配备不足；第二，部分学校不能满足一日三餐的供应需求，甚至有一小部分学校无法提供午餐，对于配餐软件的使用情况极为有限；第三，食堂供餐缺乏果蔬类及高蛋白类食物，奶类供应量为 0；第四，学校食堂供餐的剩饭率较高[12-15]。这些说明了当前农村食堂建设数量、软硬件配套设施、配餐种类多样性、对学生的营养知识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三、新时代促进教育公平的路径选择

（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要实现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需要在教育政策上“精准扶贫”，并在“准”和“实”上下功夫。首先，统一城乡教育规划，要求各级政府明确职责，多方配合，协调发展，优化组织结构。其次，统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准确地设立政策依据。再次，找准根源所在，对教育弱势地区进行政策上的补偿，对症下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16]。

教学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做到城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我国近年来民办学校势头正旺，但学校分布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建议采取多渠道的筹资体系在农村建校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辐射。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可推动民办学校的集团化发展，由一所学校为核心带头组建办学集团，将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到其他薄弱学校，以强校带弱校，实现集团内成员的自我提升。

此外，改革创新课程结构与教学方法，深入透析学生个体的特点与差异，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参与。建设符合当地特点的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提倡“以学代教”的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促进学生个体之间的均衡发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是实现教育公平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二）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改革农村教育供给侧，上移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重心，让省级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田发顺[17]呼吁应将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纳入迁入地的省级或市级地方政府财政保障体系。这是因为城市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远发达于农村，农村的人力资本具有单项流入城市的趋势，所以其外溢效应也主要发生在城市，而外溢区域的绝大部分是受到省级政府的管辖，按照“谁受益谁负责”原则，由省级政府统一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减小省域内学校之间的经费投入差距，实现统筹管理。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些国家曾将基层地方政府作为教育经费保障责任主体，并由此陷入发展困境，之后通过上调责任主体，有效改善了城乡教育差距大的境遇[18]。

各级政府应加强合作，互相监督，保证农村教育经费落到实处。下级政府定期向上级政府汇报教育经费使用情况，上级政府也要定期巡查巡视。建议为农村教育经费开设专户并建立使用档案，保障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和截留的情况发生。

（三）优化农村教师资源配置

教育乃国之大计，也关乎民生。习近平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19]，发展农村教育，教师是关键，必须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点

在于农村,因此,“要把更多教育投入用到加强乡村师资队伍建设上”。

面对当前农村教师“请不来、留不下、待不住”的问题,要想鼓励教师进入农村执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升教师的待遇水平,消除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待遇差别。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就要强化农村教师的待遇保障机制,落实各项补助政策,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让农村教师劳有所得。“加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将符合条件的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对农村教师应给予工作及生活上的关心,拿出务实举措,让农村教师住有所居。加大对农村青年教师的培养培训、评优表彰力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育教师对教育工作的幸福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快农村青年教师成长步伐,使他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20]。

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不仅要扩大教师规模,降低农村学校的生师比,还要保证教师自身素养与梯队结构的合理性。采取合理的流动机制,例如让教学名师、骨干教师等在校际内定期轮岗,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共享,与此同时,建立农村教师进修制度,提供在城市学校开展学习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教学经验与水平的提高。

(四)保障农村学生早期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认为,对于孩子的投入越早,得到的回报就越多,而到了成年,回报值则变为负数。中国相当一部分儿童成长于农村,因此,关注农村学生早期营养状况,关系到学生健康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

提高农村家长的营养认知水平,是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的直接举措。建议在社区建立营养驿站,定期开展营养知识讲堂,加大营养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普及农村家长的营养观念。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600多万农村学生”[21],需要集中社会力量,对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进行公益资助,确保他们能够及时跟进营养,提升农村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建议政府因地制宜,确定各校的供餐模式,加大食堂及相关设施的投入建设,改善就餐环境;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及营养宣传教育,提高其专业素质,保证学生的就餐质量,让供餐种类更加多样与科学;加强对农村学生的营养知识教育,降低学生的剩饭率,确保学生膳食的合理性,促进营养计划的顺利实施。

四、结语

我国教育公平的特点具有阶段性。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农村学生对于教育的获得感也在逐步增强,教育发展对于量上的需求已经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质的更高的追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低附加值产业正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更需要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进而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人才。

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改善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局面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保障。近年来,我国在改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不断积累经验,逐渐缩小城乡间差距,在政策、经费、师资、营养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革新,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实现教育公平的改革实践中去。教育公平的发展战略目标是长期的,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表明学生对于优质教育的追求以及渴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当前,我国在满足教育数量要求的基础上,正在寻求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让每一所学校都办成人民满意的学校,是“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的时代诠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0-07-29.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2019-02-23.

[3]王旭东.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J]. 中国高等教育,2019(21):13-15.

[4]余秀兰. 关注质量与结果:我国教育公平的新追求[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9-38.

[5]刘天,程建坤.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变迁、动因和经验[J]. 基础教育,2018(6):22-31.

[6]田晨. 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及其原因浅析:以中原某地区W村为例[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7]翟博,孙百才. 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研究报告[J]. 教育研究,2012(5).

[8]肖桐,邬志辉.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的均衡现状研究:基于2005—2014年全国31省的面板数据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28):22 - 27.
[9]朱文辉.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回溯与前瞻[J]. 中国教育学刊,2018(12):12 - 17,37.
[10]余秀兰. 关注质量与结果:我国教育公平的新追求[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9 - 38.
[11]罗斯高. 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EB/OL]. https://www.sohu.com/a/192832894_299738,2017 - 09 - 18.
[12]徐培培,杨媞媞,曹薇,等.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 2016 年学校食堂建设情况[J]. 中国学校卫生,2018(5).
[13]杨媞媞,李荔,徐培培,等.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 2016 年学校食堂供餐情况[J]. 中国学校卫生,2018(5).
[14]甘倩,张倩,许娟,等.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学校 2016 年食物供应情况[J]. 中国学校卫生,2018(5).
[15]李荔,徐培培,杨媞媞,等.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 2016 年学生餐剩饭状况[J]. 中国学校卫生,2018(5).
[16]祁占勇,杨宁宁.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义务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与未来展望[J]. 教育科学研究,2018(12):17 - 23.
[17]田发顺,拜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研究[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8(10):77 - 78.
[18]朱长存,马敬芝. 农村人力资本的广义外溢性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农村观察,2009(4):37 - 46,96.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9/t20180910_348145.html,2018 - 09 - 10.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946/fj_2018/201801/t20180131_326148.html,2018 - 01 - 31.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EB/OL]. http://www.gov.cn/premier/2018 - 03/22/content_5276608.htm,2018 - 03 - 22.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Research of the Equ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IA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was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1986, and in 2011, a national acceptance has been achieved. Thus, China has accomplished this historic as well as strategic mission within 25 years, which mean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concerning educational issues.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equity of education have become the key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s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s imbalanced; the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s still serious. Based on these current problems in rural educa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inconsistency in policy making, educational investment, teacher resources, and nutrition for stud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rthermore, it finds out the causes of inequ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tries to propos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hese, hopefully, could help prompt a flow of high - 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cities to poverty - stricken areas, rural schools and vulnerable groups, accordingly promoting the equit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era;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the equity of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基于OBE理念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实践

黄继海,刘秋菊*,姜 宇,许镔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为避免传统的以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带来的弊端,引入了OBE理念的教育模式,并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从课程培养目标、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加强实践教学、合理地融入课程思政和改革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实践与研究。实践证明,教的质量和学的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关键词:OBE;C语言;教学质量;教学效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20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10-05

一、引言

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急需一批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C语言程序设计作为计算机类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面向对象C++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和嵌入式系统等课程的先修课程,适用于智能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软硬件层次的开发语言,在课程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课程体系与知识结构上以及在编程思维、实践能力的塑造性上,这门课程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非常重要,甚至贯穿四年不断线。

该课程也是大一新生在对专业认识还比较模糊的前提下接触到的第一门编程课程。如果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法"填鸭式"教学[1],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随着课程难度的增加逐渐降低甚至丧失,直接导致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进而影响与该课程关联紧密的课程的学习,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具体表现在:以教师为中心,重理论轻实践,教师讲授重在理论教学部分,实践部分讲授指导较少或实践设计内容较为零散,缺乏专业工程应用;教材内容未能及时融入新技术;考核方式单一,很难准确把握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本文从课程培养目标的重定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与指导、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思政等几方面,阐述了基于OBE理念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在该方案中融入工程教育模式,对进一步深化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OBE理念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是遵循结果导向,反向设计教学体系的教育模式[2]。与传统的以教学内容为中心的理念相比,OBE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与"质量持续改进"。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首先要明确教与学的目标,即要取得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不仅包含书本上的知识,也包括能力和素养。其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上都要

收稿日期:2020-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20190102800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资助项目(2020-ZZJH-184);郑州市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ZZJG-B901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ZGJG2019022A)

作者简介:黄继海(1977—),男,河南台前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现主要从事软件工程、机器学习教学研究。
通信作者:刘秋菊(1970—),女,河南孟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现主要从事模式识别、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以学习成果目标为驱动,以学习成果目标的达成度作为教学评价的重点,采用多元和阶梯式的评价标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根据发现的问题及时做出调整,为下一轮教学做准备。

成果导向教育如图 1 所示,整个系统是一个闭环反馈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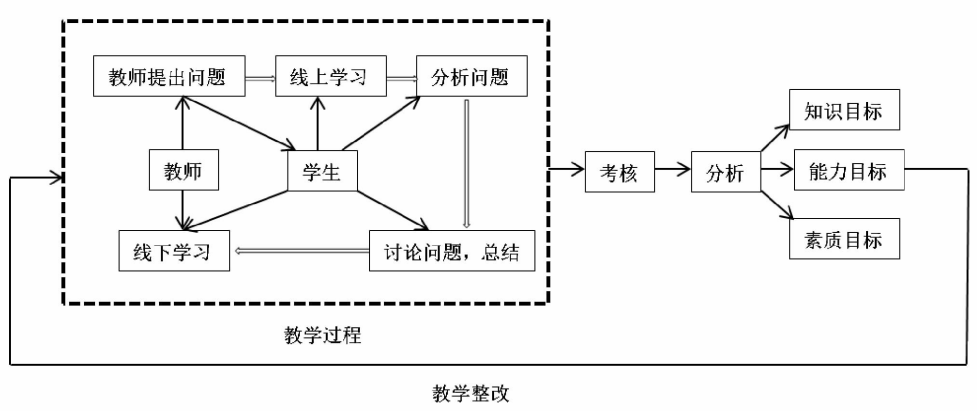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OBE 理念的教育模式

在新工科教育背景下,工程教育认证也全面融入了 OBE 理念。工程教育认证的过程为:首先确定认证专业的培养目标,同时按照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给出毕业生所具备的毕业要求,设置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条件都是围绕这一要求展开的,对毕业生的毕业要求的达成度则是通过对各个教学环节的实施加以说明的,其中合理的课程体系是达成毕业要求的关键,因此,在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3-4]。

本文遵循 OBE 教育模式,结合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及 C 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本课程的最终学习成果:

(1)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形成模块化程序设计的逻辑思维能力,并逐步形成正确的程序设计思想。

(2) 能够熟练地使用 C 语言进行程序设计,能运用合理的控制流编写清晰高效的程序,具备分析与解决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3)为本专业后继课程及其他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同时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为其将来从事专业活动和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基于 OBE 理念的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

(一)重定位课程培养目标

C 语言程序设计在许多工科类专业中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和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都开设这门语言课程,而且这 3 个专业对 C 语言程序设计的培养目标基本一致,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重点包括 3 个方面:软硬件问题分析、设计解决方案、软件开发与调试[5,6]。由此就可以确定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学生通过学习 C 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熟悉并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算法,具备计算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环节,增强动手能力,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并初步积累编程经验;通过课程综合实践,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计算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进一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课题,为今后专业学习奠定坚实的编程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内容	培养能力	具体描述	实现环节
知识目标	专业基础	培养学生 C 语言语法基础	线上学习
	后续支撑	明确 C 语言在后续课程中的作用	线上学习
能力目标	分析问题	熟悉程序的执行过程,了解存储空间的分配,熟悉指针与存储空间的关系,明确如何使用函数解决模块化设计方法,理解典型算法并具有计算思维的能力。	线下学习
	设计创新	用算法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线下学习
素质目标	自学能力	探索新知识,终身学习的能力	线上线下学习
	团队协作	沟通协调的能力和多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线上线下学习
	爱岗敬业	通过课程思政,具有责任心、进取心、忠诚度和奉献精神	线上线下学习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

受传统大学学科教育的影响,在 C 语言程序设计的课程教学中,沿袭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学内

容偏理论化,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缺乏趣味性。教师虽然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教学的组织管理和教学过程的调控,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效果欠佳。

表 1 中的“实现环节”就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了实现学习目标,结合现代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线下面授有机结合的方式开展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以具体案例为驱动,课前通过教师提出问题,学生线上自主预习学习,课堂教师组织对案例分析,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在实验课中安排小组讨论,教师讲解语法与总结常见错误等不断提升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避免了教师的一味说教。结合案例分析介绍知识点,重视计算思维的培养,提倡算法的多样化,同时拓展创新思维,发挥师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不仅从应用的角度汲取知识,而且还要为了解决问题而主动去挖掘知识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真正做到“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例如,在讲解循环结构时,为了完成学习目标,制定该模块的教学过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循环结构模块教学过程

目标任务		具体描述
学习目标		1. 掌握 for 语句、while 语句和 do while 语句的功能和应用。 2. 利用循环语句完成简单任务。 3. 重点:掌握 for 语句、while 语句的功能和应用。 4. 难点:循环语句的嵌套及应用。
学习任务	任务 1:循环结构	课前:回顾选择结构,预习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任务并完成预习作业。 课堂:重点讲解循环结构的思维方式,结合课程思政培养计算思维。学生分组讨论循环在生活中的应用。教师解决学生预习中的问题。
	任务 2:循环语句	课前:学生学习循环结构内容,观看循环结构教学视频和案例讲解视频,完成视频中的任务。 课堂:学生根据观看视频的效果解决课堂任务,教师根据课堂任务完成情况对知识碎片进行重构、总结,通过课堂作业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
	任务 3:利用循环解决实际问题	课后:学生观看案例讲解视频,完成视频中的任务,并完成 PTA 在线作业。 拓展:教师截取实际应用案例部分代码给学生阅读并写出其功能。

(三)产教深度融合

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达成度。在设计任务时结合实际项目让学生进行拓展训练,项目选取的是课程组设计的一款智能化产品——医用智能配药机。该医用智能配药机是依据“药品集中配置理论”模型和“静脉用药配置工艺标准化”概念研发而成,能够通过无线模块多机联合使用,具有快速、精准、安全、轻松配药的优点,目前已经在很多三甲医院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使用。把项目的软件部分提取过来让学生进行创新训练,该医用配药机的总任务框图如图 2 所示。

基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以 OBE 教学理念的最终学习成果为出发点,并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设计教学内容,以便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基于上述项目设计出“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作为教学案例,将 C 语言课程知识点构建在综合项目当中,让学生“从做中学”,有助于巩固已学知识。在研究和分析“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所需要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本文根据该综合项目对应的 C 语言知识点,将项目划分为 9 个子模块,每个子模块包含了达到其实际能力所要完成的任务,涵盖了教学内容的所有知识点,并遵循了知识的连续性和扩展性,如表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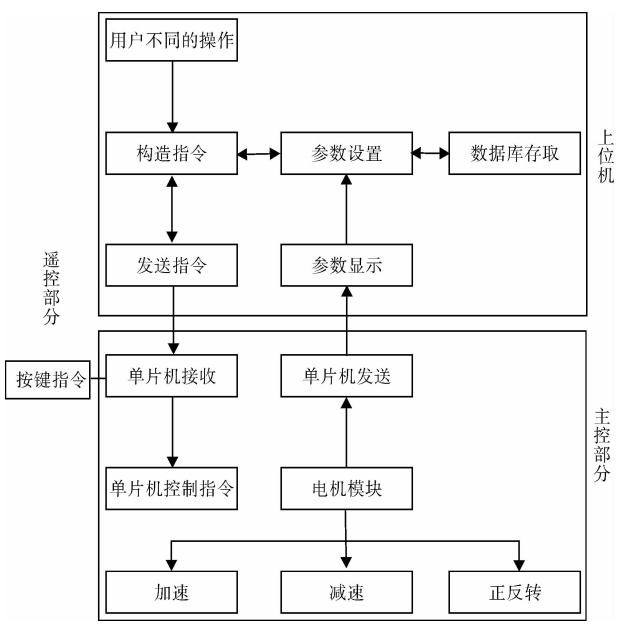

图 2　医用智能配药机任务框图

通过对医用智能配药机的分析,引导学生注重身边存在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通过程序调试、测试机器的功能等过程,让学生有满满的成就感,也极大地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探索欲望。利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中

授课,有效解决了学生的疑问,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课程的创新性,增加课程的挑战度。

表3　C语言课程模块化教学任务表

教学任务模块	对应知识点
模块一、系统初始界面设计	C语言语法基础、数据输入输出
模块二、参数显示	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模块三、选择功能	分支结构
模块四、发送指令	循环结构
模块五、指令描述	字符数组
模块六、反馈指令	函数
模块七、更新显示界面	指针
模块八、参数描述	结构体
模块九、数据处理	文件

(四)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与指导,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实验8学时、一周的课程设计和课外的开放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实践环节是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关键环节。为了更好地达到实践环节的培养目标,课内实验一般提倡学生在业余时间先写好,课内有限的时间主要是用来调试和解决错误,避免学生把大部分课内时间都用于录入代码。课内实验环节的考核成绩按照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确定。课程设计主要选取综合的应用,课外的开放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主要是通过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开放实验室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和教师的课题进行的,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和创造发明。在指导教师的带领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下,学院也给予经费支持,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学生参与课程组利用C语言编写的“郑州市宠物管理系统”“医用智能配药机项目”“自行车运动员机能状态数据分析平台”,取得了“郑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等成绩,学院学生参加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智能巡线机器人项目获得国赛二等奖1项、河南省一等奖3项的好成绩。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课程学习的广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实践动手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五)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

课程组教师在进行教学改革中,也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把思政点和育人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达到实时育人、课课育人的功能,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二者的有机统一,教书和育人有机统一,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在C语言程序设计中,每个课程内容模块都可以设置一个思政点,表4中给出了思政教育目标、思政教学内容和部分课程知识单元的对应关系。

表4　思政教育目标、思政教学内容与部分课程知识单元的对应关系

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思政教学内容	课程知识单元
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建立工程教育理念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学生敬业务实和团结协作精神; 培养学生的工程质量意识、行业标准规范意识。	典型人物的科研故事 愚公移山的典故 中共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战 面对疫情,医用智能配药机的研制 红色文化、国学文化 云计算与大数据	使用流程控制语句设计合适的算法,解决常见的数学问题,如:验证哥德巴赫猜想、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判断素数、搬砖问题、猴子吃桃问题等。 设计一种结构体,对该结构体进行相关数据的插入、删除、查找、更新等功能。

通过表4不难发现,课程的思政元素、价值观本身就能够深深地吸引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引起学生的思考和感悟,自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理念的转变,课堂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从学习知识的传授转变为学习效果的达成。这就要求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看待问题客观公正,激发学生的实业报国信心和勇气,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六)采用更加合理科学的考核方式

基于OBE的课程改革,也要转变传统的一张纸决定考核的方式,采取多元的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以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完善考核方式。考核的各个模块及所占的比例为:线上学习和线上考试占25%,平时表现占25%,期末考试(笔试或机试)占50%。线上学习和线上考试主要考查学生线上学习过程,在中国大学MOOC和雨课堂等平台上都能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如观看视频的时间及进展、练习题的提交情况、参与互动的情况等,测试主要以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等客观题为主。平时表现主要包括出勤、课堂讨论、实验报告的书写、实验考核成绩等环节的综合评定。期末考试根据需要可以采用笔试或机试,考试的结果要进行分析并给出改进措施,用于持续改进。

笔者所在学院从2017年开始进行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从课前预习、课中授课到课后作业整

个评价过程形成一个闭环培养反馈机制，每次评价可以为下一次教学改进提供依据。实践表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培养目标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基本达到，说明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改革效果良好。

四、结束语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工科类本科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今后从事专业工作与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的教学效果都至关重要。以 OBE 教育理念为导向的教育模式逐渐在各院校展开，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在课程建设上”。通过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的实践证明，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达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的。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课题组将继续完善、创新与实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王军英，马红梅. C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63－64.

[2]顾佩华，胡文龙，林鹏，等. 基于“学习产出”(OBE)的工程教育模式：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1)：27－37.

[3]林建. 工程教育认证与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2)：10－19.

[4]孟庆娟. 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教学改革探讨[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2(3)：124－125.

[5]赵娇洁. 基于 OBE 理念的《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探析[J]. 智库时代，2017(14)：266－267.

[6]李冶. 嵌入式专业方向基于 OBE 理念的 C 语言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 信息与电脑，2017(3)：243－245.

(责任编辑　许峻)

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of C Language Programming Based on OBE Concept

HUANG Jihai, LIU Qiuju, JIANG Yu, XU Bindu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for the center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BE education mode, and the C language programming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practice and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training objectives,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reasonable integration into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reforming assessment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he effect of learning have been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OBE; C Language; teaching quality; teaching effect

混凝土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因素研究

刘成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通过对混凝土叠合面抗剪性能试验研究,探讨混凝土叠合结构叠合面的抗剪机理,分析了混凝土强度、配箍率、叠合面处理方式、跨高比等因素对叠合面抗剪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因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21
中图分类号:TU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15-04

1 概述

推行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是解决现浇混凝土结构环境污染大、噪声严重、工人劳动强度大、工程质量波动大等问题的重要举措,其中叠合楼盖是提高装配式建筑预制率和装配率的重要措施。有关受弯叠合构件抗弯、斜截面抗剪结构性能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混凝土叠合面的抗剪性能研究相对较少,跨度大于4200mm以上的叠合板,不配置抗剪箍筋的自然粗糙叠合面可能发生剪切破坏[1-4]。混凝土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着叠合结构的安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2 叠合面抗剪性能研究

2.1 叠合面抗剪破坏特征

叠合结构叠合面混凝土存在明显的界面区,是抗剪的薄弱环节。在主拉应力作用下,叠合结构下边缘受拉区混凝土首先开裂,继续延伸到穿过叠合面发生弯曲破坏或剪压破坏,或者延伸到叠合面水平发展形成剪切破坏。叠合面剪应力计算方法主要有截面平均剪应力、叠合面某一点最大剪应力、叠合面剪切试验数据分析计算应力,而叠合面允许剪应力限值多有叠合面抗剪试验数据分析而得[5-7]。

2.2 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因素

叠合结构的斜裂缝发展到叠合面时,叠合面的受力状态可以用桁架模型模拟(图1)。上部受压区混凝土受压,下部纵筋受拉,裂缝间混凝土承受压,箍筋承担竖向拉力,裂缝间混凝土的黏结力、咬合力以及箍筋承担水平剪力。通过对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桁架结构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叠合面抗剪承载力主要由混凝土的黏结力、叠合面粗糙度引起的咬合力、混凝土滑移趋势下的静摩擦或动摩擦力(叠合面上荷载产生的压应力、箍筋拉应力垂直叠合面的分量产生的摩擦力)、箍筋的销栓抗剪作用力等组成。混凝土叠合面抗剪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叠合面粗糙程度、配箍率、混凝土强度、叠合面压应力、叠合面主拉应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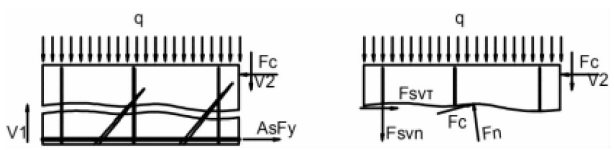

图1　叠合面抗剪模型

2.3 叠合面剪应力计算

2.3.1 叠合面平均剪应力

对于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弯矩极值点两侧的剪力反号,说明弯矩极值点两侧的剪切变形趋势相反,考虑到叠合受弯构件叠合面破坏时混凝土已经进入到塑性状态,隔离体选取长度应以支座、绝对最

收稿日期:2020-02-18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研究课题“叠合楼盖叠合面抗剪性能试验及技术应用研究”(19B560009)

作者简介:刘成才(1973—),男,河南柘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工业化方面研究及教学工作。

大弯矩点和零弯矩点为界限，划分成若干剪跨区段（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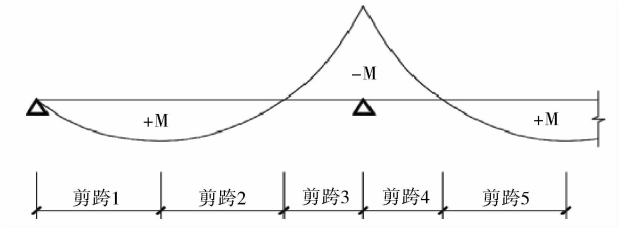

图2　叠合受弯构件剪跨的划分

叠合面抗剪计算隔离体取每一剪跨叠合面以上的现浇区域（图3）。由于弯矩为零的截面处，混凝土受压区压应力为零，可以通过剪跨区内$|M_{max}|$处叠合面以上的混凝土受压区总轴力来求得叠合面的总剪力。叠合面抗剪承载力的设计目标应该是该破坏模式不应先于其他破坏模式出现，所以，极限破坏状态时，混凝土的压应力σ可用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f_c替代。又因为水平受弯构件中，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力合力加上受压钢筋的压应力的合力与受拉区钢筋拉应力合力相等。利用水平投影平衡条件建立下式：

$$V = \int_a^b \tau \cdot dA_{ch} = \sigma A_c + f'_y A'_s = f_c A_c + f'_y A'_s = f_y A_2 \quad (1)$$

式中：V— 剪跨内水平叠合面处的总剪力；τ— 水平叠合面剪应力；A_c— 叠合面以上混凝土等效截面的受压区面积；A_{ch}— 叠合面面积；f_c -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σ— 混凝土压应力；f'_y— 受压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A'_s— 受压区钢筋的面积；f_y— 受拉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A_s— 受拉区钢筋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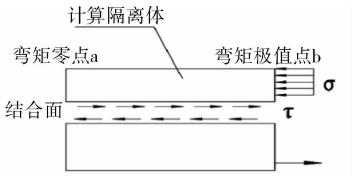

图3　叠合面剪力计算隔离体

利用（1）式计算叠合面剪力或平均剪应力虽然可以避免复杂的积分运算，但是剪跨区段内叠合面混凝土和箍筋的抗剪作用在构件塑性破坏时是否接近均匀分布值得研究。根据文献[1-2]试验数据编制表1进行分析，材料强度取标准值，按式（1）计算出的叠合面抗剪强度标准值为V_u^1，试件实测极限抗剪强度值为V_u^s，二者比值为4.2～8.6，特别是发生叠合面剪切破坏的3个试件，比值分别为6.8、7.5和8.6，说明取整个剪跨区段长度，用公式（1）计算平均剪应力不具有代表性，同时也证明混凝土叠合构件发生叠合面剪切破坏时，整个剪跨区段的塑性变形不足以使整个叠合面剪应力均匀分布，公式（1）的应用条件需进一步研究。

表1　叠合面平均剪应力分析

数据来源	试件编号	A_P（mm²）	f_{ptk}（KN）	V_u^s（KN）	V_u^1（KN）	V_u^1/V_u^s	破坏形态
文献1	YDB-B3600	108.6	1635	32.8	177.56	5.4	弯曲破坏
	YDB-B3900	108.6	1635	30.48	177.56	5.8	弯曲破坏
	YDB-B4200	108.6	1635	30.59	177.56	5.8	弯曲破坏
	YDB-B4800	108.6	1635	26.10	177.56	6.8	叠合面剪切破坏
	YDB-B5400	108.6	1635	23.63	177.56	7.5	叠合面剪切破坏
	YDB-B6000	108.6	1635	20.66	177.56	8.6	叠合面剪切破坏
文献2	YKDBa3362	157	681	25.46	106.92	4.2	弯曲破坏
	YKDBa3662	196	681	27.37	133.48	4.9	弯曲破坏
	YKDBa3961	196	681	23.79	133.48	5.6	弯曲破坏
	YKDBa4261	235	681	26.18	160.04	6.1	弯曲破坏

注：A_P—试件的配筋面积；f_{ptk}—试件配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2.3.2 叠合面最大剪应力的计算

叠合结构在线弹性阶段，变形符合平截面假定，根据剪力互等定理，叠合面处剪应力等于与叠合面垂直相交处横截面的剪应力。叠合面剪应力公式仍是：

$$\tau = QS/bI \quad (2)$$

叠合结构开裂后，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并非线性分布，受压区混凝土进入塑性状态，通常假定受压区混凝土均匀受压，受拉区仅钢筋承受拉力；根据剪应力是计算截面以上正应力的积分这个原则，可绘出横截面应力分布如图4。利用截面剪力的大小等于剪应力图形面积的原则可知：

$$\tau_{max} = Q/bz \quad (3)$$

式中：z—受弯截面的力臂；b—受弯构件的宽度。

由于混凝土受压区范围内剪应力分布为线性，利用几何相似性可知，叠合面处剪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tau_{max} = \beta Q/bz \quad (4)$$

式中：β—叠合面至受压边缘的混凝土受压面积

与混凝土总受压面积的比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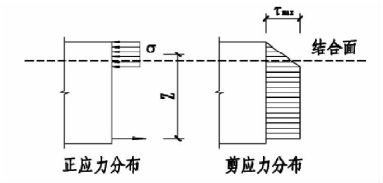

图4　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应力分布

3 叠合面抗剪试验设计

叠合面抗剪强度影响因素实验试件的设计主要考虑叠合面处理方式、混凝土强度、配箍率、叠合面压应力等因素。试件由预制底层、现浇叠合层组成，预制底层、现浇叠合层尺寸均为 150mm × 150mm × 75mm。混凝土设计强度预制底层为 C40，叠合层为 C20、C30、C40。叠合面处理方式为自然粗糙、4mm、6mm、8mm 纵横双向压痕四种。叠合面抗剪箍筋分为不配箍筋（ρ_{sv} = 0%）、2φ6（ρ_{sv} = 0.2512%）、4φ6（ρ_{sv} = 0.5024%）、6φ6（ρ_{sv} = 0.7536%）四种，其中 ρ_{sv} 为叠合面配箍率。叠合面压应力为 0MPa、0.007MPa、0.012MPa 三种。不同条件试件每组各制作 6 块，共 432 块。抗剪试验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结构试验室 1000kN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上进行。

4 叠合面抗剪影响因素分析

4.1 混凝土强度

为了研究叠合面抗剪强度随叠合层混凝土强度的变化规律，将不同叠合层混凝土强度叠合面抗剪强度试验结果列于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叠合面的抗剪强度基本上随后浇层混凝土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叠合面在没有抗剪箍筋及压应力作用时，抗剪承载力跟混凝土抗拉强度相关，即：

$$\tau_u = \beta f_t \tag{5}$$

式中：β—叠合层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表2　叠合面抗剪强度及 β 分析

叠合面粗糙度	自然粗糙 (N/mm²)	4mm (N/mm²)	6mm (N/mm²)	8mm (N/mm²)	β
C20	1.085	1.345	1.463	1.589	0.986
C30	1.107	1.381	1.549	1.550	0.774
C40	1.240	1.435	1.603	1.966	0.725

各组试件实验结果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计算出 β 平均值列于表 2。当底层混凝土强度一定时，β 值随叠合层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而减小，但减小的趋势随混凝土强度提高有变缓的趋势。具体变化规律需要增加实验数据分析。文献[1]试验中，所有构件都是在跨中底板处先出现裂缝。叠合面破坏是由斜裂缝延伸到叠合面处，再沿叠合面开裂造成的，所以底板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对叠合面的抗剪强度起着重要作用。

4.2 叠合面处理方式

叠合结构的叠合面处理方法主要有自然粗糙和压痕等。由表 2 可知，在一定的压痕深度范围内（≤8mm），叠合面抗剪强度跟叠合面压痕深度近似成正比例关系，但压痕深度一般不宜超过 10mm，过深将影响预制构件的强度和刚度。

4.3 箍筋特性

从不同配箍率试件的实验结果可以得出，随着叠合面配箍率的提高，叠合面抗剪强度均逐渐增大。实验中箍筋与叠合面垂直，叠合面抗剪承载力由箍筋引起的增量计算公式为：

$$\Delta\tau_{us} = \mu A_s f_y / A_{ch} \tag{5}$$

式中：μ—箍筋对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依据式(5)计算出配箍率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列于表 3。

表3　配箍率对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分析（单位：N/mm²）

叠合面处理方法	2φ6	4φ6	6φ6
C20	1.032	0.716	0.550
C30	1.124	0.823	0.576
C40	1.272	0.837	0.583
	1.143	0.792	0.570

由表 3 可知，配箍相同时，μ 值随叠合层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而提高，说明采用高强度混凝土对配箍叠合面抗剪是有利的。随着配箍率的提高，叠合面抗剪强度提高，配箍率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呈现出减小的趋势，说明叠合面抗剪箍筋也存在最小配箍率和最大配箍率。文献[5]研究表明配箍率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应该接近 1 左右，本文实验中，叠合面配置抗剪钢筋 2φ6（ρ_{sv} = 0.2512%）时，箍率对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平均值为 1.143，比较符合适筋破坏的特征；箍筋配置 4φ6（ρ_{sv} = 0.5024%）时，箍率对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平均值为 0.792，箍筋强度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箍筋配置 6φ6（ρ_{sv} = 0.7536%）时，箍率对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平均值为 0.570，破坏时混凝土被压碎，箍筋没有屈服属超筋破坏。根据配箍筋 2φ6 和 4φ6 时的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插值计算箍率对叠合面抗剪强度的影响系数 μ 为 1 时的配箍率为 ρ_{sv} = 0.3535%。所以，受弯叠合结构配箍率在 0.15% ~0.35% 应该比较合适，但需要进一步补充实验数据验证。

4.4 叠合面的压应力

垂直于叠合面的压应力一般包括抗剪箍筋垂直于叠合面的分量、底板和叠合层之间的黏结力和垂直于叠合面的荷载产生的压应力。前二者在各国规

范中已经考虑,但对于垂直于叠合面的荷载产生的压应力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工程应用时建议按最不利的状态考虑。混凝土强度、叠合面粗糙度相同时(表4),随着叠合面压应力的增加,叠合面抗剪强度均逐渐增大。主要原因是叠合面压应力提高,摩擦力逐渐增大。

表4　叠合面压应力对叠合面抗剪承载力的影响

叠合面压应力		自然	4mm	6mm	8mm
C20	σ_n =0Mpa	1.085	1.345	1.463	1.589
	σ_n =0.007Mpa	1.632	1.865	1.976	2.132
	σ_n =0.012Mpa	2.158	2.324	2.496	2.612
C30	σ_n =0Mpa	1.107	1.381	1.549	1.550
	σ_n =0.007Mpa	1.814	1.818	2.122	2.235
	σ_n =0.012Mpa	2.296	2.516	2.734	2.841
C40	σ_n =0Mpa	1.240	1.435	1.603	1.966
	σ_n =0.007Mpa	1.865	1.955	2.144	2.456
	σ_n =0.012Mpa	2.354	2.535	2.840	2.990

4.5 动荷载

叠合结构在动荷载的作用下,会产生双向裂缝,使箍筋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力发生疲劳破坏。因此动荷载的作用会使叠合面抗剪承载力降低,具体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做叠合结构的动载试验研究。

4.6 叠合面位置

叠合面剪切破坏主要由于主拉应力超过了叠合面抗拉强度造成的。在设计预制构件和叠合层高度时,尽量使叠合面位于受压区或中和轴附近,可以减少混凝土叠合面的拉应力,提高叠合面的抗剪性能。叠合面的位置可以用预制截面高度 h_1 与叠合后截面总高度 h 之比 $\alpha h = h_1/h$ 来表示,当 $\alpha h \geq 0.6$ 时叠合面抗剪较有利[5]。

4.7 跨高比

为了分析跨高比对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性能的影响,将文献[1、2]试验结构列于表5进行对比分析。10个试件混凝土强度等级、叠合面处理方式、叠合面位置基本相同,主要是跨度和跨高比不同。试验中除文献[1]中 YDB－B4800、YDB－B5400、YDB－B6000 发生了沿叠合面剪切破坏,其他试件都是发生弯曲破坏。10个试件的跨高比变化幅度为18.9～31.2,随着跨高比增大,除试件 YDB－B5400 由于叠合面提前发生剪切破坏挠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外,试件挠度逐渐增大,变化幅度为14.6mm～122mm,挠跨比也逐渐增大,变化幅度为1/210～1/39;叠合面剪应力值逐渐变小,变化幅度为0.88N/mm^2～0.52N/mm^2,但都大于等于0.4N/mm^2。随着跨高比的增大,试件挠度增大,叠合面抗剪性能降低,不配箍筋叠合板当跨度大于4200mm时有可能发生叠合面剪切破坏。

表5　跨高比对叠合面抗剪性能的影响

数据来源	试件编号	试件高(mm)	计算跨度(mm)	剪力实测值(KN)	剪应力(N/mm^2)	跨高比	挠度(mm)	挠跨比	破坏形态
文献1	YDB－B3600	180	3520	32.8	0.88	19.6	26	1/135	弯曲破坏
	YDB－B3900	180	3820	30.48	0.84	21.2	20	1/191	弯曲破坏
	YDB－B4200	185	4115	30.59	0.80	22.2	36	1/114	弯曲破坏
	YDB－B4800	185	4720	26.10	0.67	25.5	122	1/39	叠合面剪切破坏
	YDB－B5400	195	5320	23.63	0.58	27.3	30	1/177	叠合面剪切破坏
	YDB－B6000	190	5920	20.66	0.52	31.2	101	1/58	叠合面剪切破坏
文献2	YKDBa3362	171	3236	25.46	0.78	18.9	14.6	1/210	弯曲破坏
	YKDBa3662	167	3525	27.37	0.87	21.1	17.2	1/196	弯曲破坏
	YKDBa3961	174	3824	23.79	0.77	22.0	28.4	1/129	弯曲破坏
	YKDBa4261	170	4126	26.18	0.85	24.3	43	1/92	弯曲破坏

5 结论及建议

5.1 混凝土叠合面的抗剪强度基本上随后浇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而增加,β 值随叠合层混凝土强度的提高而减小。

5.2 叠合面抗剪强度跟叠合面压痕深度近似成正比例关系,但压痕深度一般不宜超过10mm,过深将影响预制构件的强度和刚度。

5.3 在适当的配箍率范围内,随着配箍率的提高,叠合面抗剪强度提高。本项目研究得出配箍率在0.15%～0.35%比较合适,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实验数据验证。

5.4 随着跨高比的增大,试件挠度增大,叠合面抗剪性能降低,不配箍筋叠合板当跨度大于4200mm时有可能发生叠合面剪切破坏。

参考文献:

[1]张丽伟.预应力叠合板受力性能和叠合面抗剪强度分析[D].郑州:郑州大学,2012.

[2]刘成才.预应力混凝土空心叠合板结构性能试验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建筑,2011,41(2):35－38.

[3]刘成才.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叠合空心板结构性能试验研究[J].工业建筑,2012,42(6):38－40,54.

(下转第128页)

钢框架结构建筑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

司道林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　要：通过对某钢结构建筑主体结构的安全性检测鉴定和加固处理的工程实践，提出了钢结构的检测鉴定思路和方法，阐述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施工缺陷，通过对检测结果的分析和承载力验算，对钢结构建筑进行评定得出建筑物鉴定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加固处理措施。该工程实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可为类似的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钢结构；检测鉴定；加固设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22
中图分类号：TU31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19－04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钢结构广泛地应用在房屋建筑领域。部分建筑物在未履行正常审批手续的前提下提前施工，施工过程中会出现设计图纸不正规、质监资料不全等问题。针对这一种情况，为了保证结构安全性，需要对既有建筑物进行检测鉴定。本文以某钢结构房屋为例，从工程实际出发介绍了钢框架结构建筑物的检测内容和加固处理方案。

1 工程概况

某钢结构建筑为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建于 2010 年，地上两层，首层层高为 3.90m，二层层高为 3.60m，总高度为 7.95m。该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的基础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楼面和屋面均采用压型钢板与混凝土组合楼板，钢柱和钢梁均采用 Q345－B 的实腹式焊接工字型截面，梁柱节点均采用大六角头摩擦型高强螺栓进行连接，螺栓的性能等级为 10.9 级。该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结构平面图如图 1 所示。

该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无正规设计图纸，且施工时质监资料不全，为保证结构安全，对该钢框架建筑物主体结构进行安全性检测鉴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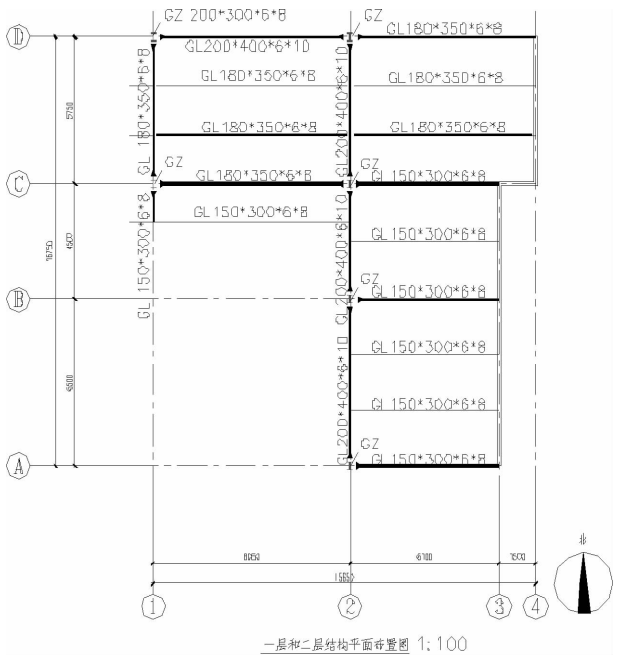

图 1　一、二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2 钢框架结构检测鉴定

通过现场实际情况和相关检测鉴定标准[1－2]规范，对该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的主体结构进行现场检测，其检测内容包括钢梁截面尺寸、高强螺栓扭矩、钢材强度、宏观状况等。

收稿日期：2020－01－30

作者简介：司道林(1985—)，男，山东聊城人，硕士，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既有建筑结构加固改造设计和工程技术研究。

2.1 钢梁截面尺寸检测

本工程钢梁截面均为焊接型工字型截面。对其截面尺寸进行检测时，采用钢卷尺量测构件截面高度和宽度，钢板测厚仪量测构件壁厚，钢梁截面示意图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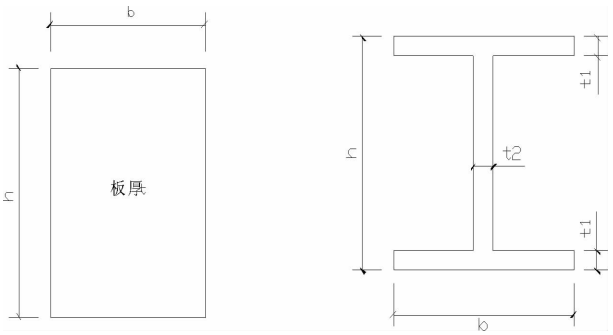

图2　梁截面测试位置示意图

现场检测数据参照《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17)中附录C表C.0.1和7.2节[3]规定及《热轧H型钢和剖分T型钢》(GB/T 11263—2017)中5.2条[4]的规定，实测工程中焊接H型钢梁的截面尺寸偏差均满足钢结构验收规范的要求。

2.2 高强螺栓扭矩检测

本工程中的高强螺栓均采用10.9级M20摩擦型高强螺栓。根据《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17)中对高强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的试验数值的要求：每组8套连接副扭矩系数的平均值应为0.110～0.150[3]。本工程取连接副扭矩系数平均值0.130，对10.9级M20高强螺栓终拧扭矩进行抽查，检测结果详见表1。可以得到：实测构件中高强螺栓连接副施工终拧扭矩偏差均不满足验收规范要求。

表1　高强螺栓连接副施工扭矩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	检测部位	性能等级	型号规格	终拧扭矩设计值(N·m)	终拧扭矩实测值(N·m)	允许偏差	结论
1	一层顶2－C－D轴梁D端节点	2#	10.9S	M20	445.4	200	+10%	不合格
		3#	10.9S	M20	445.4	180	+10%	不合格
		6#	10.9S	M20	445.4	210	+10%	不合格
2	一层顶1－2－2/C轴梁2端节点	2#	10.9S	M20	445.4	200	+10%	不合格
		3#	10.9S	M20	445.4	180	+10%	不合格
3	一层顶1－2－1/C轴梁1端节点	1#	10.9S	M20	445.4	150	+10%	不合格
		2#	10.9S	M20	445.4	200	+10%	不合格
4	一层顶2－3－B轴梁2端节点	2#	10.9S	M20	445.4	220	+10%	不合格
		5#	10.9S	M20	445.4	240	+10%	不合格
		6#	10.9S	M20	445.4	180	+10%	不合格
5	二层顶2－3－2/C轴梁2端节点	1#	10.9S	M20	445.4	150	+10%	不合格
		2#	10.9S	M20	445.4	200	+10%	不合格
6	二层顶2－C－D轴梁C端节点	3#	10.9S	M20	445.4	200	+10%	不合格
		5#	10.9S	M20	445.4	240	+10%	不合格
		6#	10.9S	M20	445.4	220	+10%	不合格

2.3 钢材强度检测

现场采用HLN－11型里氏硬度计对钢梁的里氏硬度值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详见表2。

根据《金属里氏硬度试验方法》(GB/T 17394—1998)[5]和《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GB/T 1172—1999)[6]中的相关标准，所测构件里氏硬度值均满足规范要求。

表2　钢材里氏硬度检测结果

序号	构件名称	检测位置	钢材型号	里氏硬度理论值	里氏硬度实测值
1	一层顶1－2－2/C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30
		翼缘	Q345	410～473	440
2	一层顶1－2－1/C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3
		翼缘	Q345	410～473	421
3	一层顶2－C－D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3
		翼缘	Q345	410～473	427
4	一层顶1－C－D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5
		翼缘	Q345	410～473	432
5	二层顶2－4－2/C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20
		翼缘	Q345	410～473	425
6	二层顶2－3－1/A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8
		翼缘	Q345	410～473	432
7	二层顶2－3－D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6
		翼缘	Q345	410～473	436
8	二层顶2－C－D轴梁	腹板	Q345	410～473	415
		翼缘	Q345	410～473	436

2.4 宏观检测

现场检测时，发现一层顶和二层顶3轴、4轴处钢梁端部与混凝土剪力墙连接处节点存在问题：锚栓数量被改为4个，螺栓布置方式与设计不符；部分节点处钢梁端板施工偏差大，螺栓孔采用电焊后开孔；部分节点钢梁腹板采用角焊缝三面围焊方式与端板连接，与原设计不符，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螺栓布置方式与设计不符

图4　螺栓孔采用电焊后开孔

现场检测时，未发现该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外围护墙存在因地基不均匀沉降而引起的围护墙体变形、开裂等现象；未发现钢柱、钢梁等主受力构件存在因承载力不足引起的明显变形；未发现梁柱节点、梁梁节点以及杆件对接焊缝存在因承载力不足引起的开裂现象。

3 承载力验算

依据原设计图纸、现场实测数据以及目前该钢框架结构建筑物的所受荷载状况，采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PKPM 结构设计软件对该钢框架结构建筑物进行承载力复核验算。

该钢框架结构建筑物一层顶和二层顶 3 轴、4 轴处钢梁端部与混凝土剪力墙连接处节点锚栓数量被改为 4 个，布置方式与设计不符，承载力验算时按照铰支座考虑；部分节点钢梁腹板采用角焊缝三面围焊的方式与端板连接，与原设计不符，承载力验算时也按照铰支座考虑。经验算，该钢框架结构建筑物一层 2－B 轴钢柱和 2－C 轴钢柱的承载力不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

4 鉴定结论

（1）部分节点处钢梁端板施工偏差较大，螺栓孔采用电焊后开孔，影响结构承载力，建议进行加固处理。

（2）该建筑物实测构件高强螺栓连接副施工终拧扭矩偏差不满足验收规范要求，建议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复拧。

（3）该建筑物一层 2－B 轴钢柱和 2－C 轴钢柱的承载力不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建议对一层 2－B 轴钢柱和 2－C 轴钢柱进行加固处理。

5 钢框架结构商业配套用房加固方案

根据《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17）及相关规范[7-8]并结合建筑物的实际情况，进行加固方案的比选，选取技术可行、施工便捷、经济合理的钢结构加固设计方案。

（1）在一层顶和二层顶 3 轴、4 轴处钢梁端部与混凝土剪力墙连接处部分节点处后加钢支座进行加固，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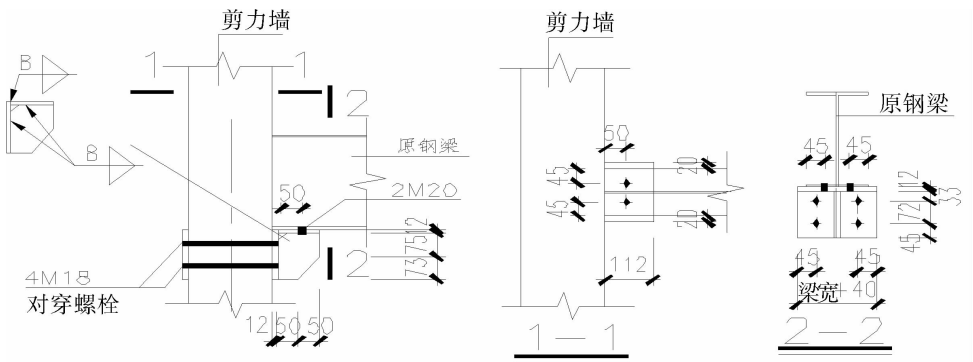

图5　节点后加钢支座加固

（2）按照规范要求对建筑物实测不满足终拧扭矩偏差验收要求的高强螺栓进行复拧。

（3）对该钢框架建筑物一层 2－B 轴钢柱和 2－C 轴钢柱沿钢柱全长在原翼缘板上加焊钢板进行加固处理，见图 6。

6 结语

（1）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创新，优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间，建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审批手续。

（2）钢结构建筑检测鉴定前，应先根据相关标

准法规的规定,结合建筑物的设计图纸和现场实际情况确定检测鉴定方案,明确检测程序和检测内容,确保检测结果能够全面反映结构现状,满足检测鉴定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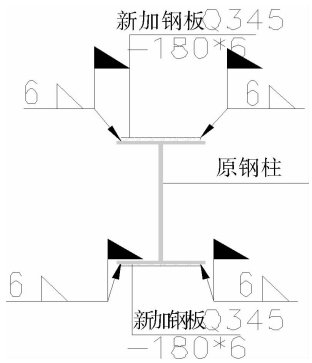

图6　钢柱加焊钢板加固

(3)根据检测所测得的实际数据和钢结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对钢结构进行分析验算。针对不满足安全性要求的结构构件和工程现场的问题缺陷需要进行加固处理以满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4)加固方案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功能要求、业主对工期和成本的要求以及加固方案的可实施性来确定最合理的加固处理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T 50621—2010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 50144—2019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 50205—2017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GB/T 11263—2017 热轧 H 型钢和剖分 T 型钢[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5]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GB/T 17394—1998 金属里氏硬度试验方法[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6]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GB/T 1172—1999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7]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 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8]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YB 9257—96 钢结构检测评定及加固技术规程[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Detection and Reinforcement Design of A Steel Frame Structure Building

SI Daolin

(Jin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Jinan, Shandong 2502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the safety detection and reinforcement design of a steel frame structure building,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tection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steel structure, expounded the hidden dangers and construction defects found in the detection process, evaluated the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spection results and the bearing capacity calculation to draw the building identification conclusion, and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strengthening measures.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effect,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steel structure;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reinforcement design

梨果实香气物质的研究综述

张 军,李靖靖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香气是梨果实的一个重要品质特征。经研究证明梨果实香气成分主要是醛、醇和酯等次生代谢物,这些挥发性化合物的生物代谢主要有脂肪酸路径、氨基酸路径、糖类(单糖)三条路径,涉及关键酶主要有脂氧合酶、醇脱氢酶和醇酰基转移酶等。从 1927 年研究梨的香气成分开始,至今已经深入到基因层面,为下一步精准调控梨果实的香气品质和品种改良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梨; 香气;生物路径;酶基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3.023
中图分类号:S6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3-0123-06

梨是人们最喜爱的水果之一,其独特的香气是构成梨品质的重要因素。作为世界四大水果之一,全世界有 88 个国家和地区生产梨[1]。栽培品种分为东方梨或亚洲梨和西洋梨两大类[2]。据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鲜食梨产量达到 2530 万 t,中国梨产量达到 1930 万 t[3]。随着产品的大量供给和人们需求价值的提高,对品质追求从外观、口感等转向内在的、隐性的品质,消费者愈发重视果实的香气品质。因此,果实香气品质成为近年来水果产业的重要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1 梨果实香气的研究思路和态势分析

果实的香气是评价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对水果(蔬菜)香气品质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水果(蔬菜)的挥发性气味被人们称作芳香性气味,也称之为果实的香气。评价果实品质的主要指标通常有个头大小、表面完好程度、颜色、耐贮性等,而对果实香气品质评价却一直没有确定的、明晰的评定方法。

早在 1927 年,Harley 和 Fisher 通过热崩解有机化学物质的方法(逆向假定)研究发现 Bartlett 梨挥发性气体中含有乙醛,拉开了人们研究梨果实香气成分的序幕。随后的 1938 年,Tindale 等发现 Bartlett 梨挥发性气体中除了含有乙醛外还有乙醇,并随着贮藏时间而变化。1952 年,英国科学家 Martin 和 James 发表用气相色谱分离低碳数脂肪酸、挥发性胺等的方法,这标志着气相色谱法正式进入历史舞台。1955 年第一台商品气相色谱仪的推出[4]是科学家研究痕量气体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人们对果实挥发性气体(香气)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从模糊假定推测到精确定性定量。1956 年,Mehlitz 和 Matzik 使用气相色谱法研究了不包括 Bartlett 梨在内的其他几种梨果实中挥发性酸和酯的含量,Jennings W 在 1961 年使用同样的方法再次研究了 Bartlett 梨,定性定量了大量的酯等成分。由于气相色谱的使用,在 1962 年 Drawert 研究了梨果实中甲酸乙酯、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醇、异丙醇、异丁醇、正丁醇、正戊醇、2-甲基丙醇、甲基丁醇、正己醇酯等等。1970 年, Nursten 证明了癸二烯酸酯是 Bartlett 梨的特征香气成分或定义为“赋予食品独特香气的化合物”。自此,对于果实香气的研究由定性定量进入了特征成分确定阶段。自 1990 年 Paillard 发表了关于苹果、梨、榅桲的风味的文章后,对于西洋梨和东方梨的香气研究越来越多。虽然已有 50 多个栽培品种梨属植物,已鉴定出 300 多种化合物,包括烃类、醛类、醇类、酯类、酮类和含硫化合物等,但

收稿日期:2020-04-0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0B55000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园艺学重点学科基金(2016-10758-3)
作者简介:张军(1978—),男,河南淮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食品代谢组学。

是相对于苹果、桃、草莓、香蕉,梨果实香气的研究仍然较少。

随着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理论的发展以及 GC－MS\MS 等超痕量检测技术的应用,结合 QTLs 分析技术、基因芯片和 RNA seq 等信息处理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香气物质代谢过程中的关键酶及调控因子不断得到明确,克隆和分离果实香气的相关基因不断取得相应成果。常见诸报端的研究有苹果、草莓、番茄等,而鲜有对梨果实香气的代谢研究。1975 年 Strandjev 研究了东方梨,1990 年 Haruyasu 研究了西洋梨在成熟及其贮藏过程中香气的动态变化,开始了梨果实香气的动态研究。1998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 Natilia Dudareva 成功克隆了仙女扇花香气的 BEAT 基因;1999 年 Christian Chervin 研究了梨成熟过程中乙醇脱氢酶基因表达和乙醇产生的关系,发现乙醇脱氢酶(ADH 酶)是果实香气合成过程中重要的酶。从此,对果实香气的探索进入到生化及分子层面。

我国对果实香气的研究相对较晚,1991 年张富春[5]研究了猕猴桃的香气成分是果实香气研究的起点;1992 年梁莲莉[6]开始对蔷薇科刺梨果实香气进行研究。从此,有多人对各种梨的香气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2014 年,廖凤玲[7]开始研究梨香气的生理机制,巴金磊[8]研究了梨果实香气的 α－法尼烯基因,Li G 等[9]研究酯类与香气相关基因;2016 年,Wei S 等[10]通过转录组揭示了与香气代谢和释放相关基因;2017 年,王龙[11]研究了梨果实在冷藏条件下酯类香气物质代谢途径关键酶活性及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1992—2017 年,国内科学家用 25 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等国对梨果实香气 90 年(1927—2017 年)的研究历程。

使用 Web of Science 选择所有数据库,检索关键词“pear & aroma”,得到 174 篇国内外对梨果实香气的研究结果,其中研究论文占 170 篇。使用中文知网检索关键词“梨 and 香气”,共有学术论文 390 篇,主要集中在 2010 年以后。综上,国内外科学家对于果实香气的研究按照香气成分定性定量、果实特征香气的确定、香气成分的前体物质、代谢机制及分子机理这一路线实现。

2　梨果实香气的成分及其研究方法

目前,已经鉴定出不同品种梨果实中 300 多种香气化合物,按香气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可以分为酯类、醛类、醇类、酮类、酸类等五类挥发性物质。不同的果实品种中这些挥发性化合物的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构成了果实特有的香气特征。有研究认为,酯类是西洋梨特征水果味或闻起来香甜的香气挥发性成分[12],构成西洋梨果实特征香气成分是己醛、己酸乙酯、丁酸乙酯、2－甲基丁酸己酯、乙酸己酯、丙酸乙酯等[13],其中辛酸乙酯给予梨果实有甜蜜的嗅感。李国鹏[14]等认为东方梨香气成分主要有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乙酸己酯、己醛、己烯醛、α－法尼稀等。

对于含量微小的果实香气的鉴定是随着高精密仪器的发展而被确认的。随着 GC－MS 等精密仪器的出现,香气成分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广泛,而对于香气成分的采集(萃取)或香气分析的前处理方法成为决定该项研究的关键步骤。通常,对于气态挥发性化合物的富集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同时蒸馏萃取法(SDE)。利用挥发性气体样品(蒸汽)和萃取剂蒸汽在密闭的装置中充分混合,组分在低于各自沸点时被蒸馏出来,样品挥发性成分首先被蒸馏出来,然后和萃取剂在冷凝管中完成萃取分离。SDE 法的优点是将样品和溶剂萃取两步过程合二为一,与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方法相比,减少了实验步骤,节约了大量溶剂,同时也降低了样品在转移过程中的损失。在挥发性气体研究方面一直被人们使用,如张凤芳等[15]使用 SDE 提取葱的挥发性成分,Hong J H 等[16]对柑橘香气进行研究。对梨果实香气的应用也多有报道,如使用 SDE 前处理结合 GC－MS 研究东方梨的香气、结合 GC－MS 研究 La France pear 成熟时的香气成分,等等。

(2)超临界萃取法(SFE)。以二氧化碳等气体为萃取载体,因其安全、性质稳定,常用于食品的分析[17]。果实的挥发性香气多部分是非极性的小分子化合物,二氧化碳是其优良的溶剂,对果实香气的研究也常见于报道,如 Stefano 等[18]对草莓的香气进行分析,Lacassie 等[19]使用 SFE 萃取技术用 GC－MS 分析了梨等果实的香气,娄在祥等[20]研究了库尔勒香梨的香气精油成分。

(3)固相微萃取法(SPME)。该法是应现代仪器的要求而产生的样品前处理新技术,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一体,真正实现样品的现场采集和萃取。设备小巧,携带方便,能够与各种色谱及色质等精密分析仪器联用。1989 年加拿大 Waterloo 大学的科学家 Pawliszyn 提出了该新型样品前处理技术原理,1993 年美国 Supelco 公司取得专利并商品化,且于 1994 年获美国匹兹堡分析仪器会议革新大奖,该技术在近十几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将各种样品中挥发性化合物直接吸附到一根带有吸附剂涂层的熔融石英纤维上,依照

“相似相溶”原理对有机物进行吸附,从样品中将组分萃取出来,逐渐富集,然后解吸分析物至相连接的分析检测设备。固相微萃取的核心是萃取装置石英纤维上的吸附剂涂层,目前有两类:一类是均相聚合物涂层,如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和聚丙烯酸酯(PA),其中 PDMS 是一种高黏度橡胶状液体,PA 涂层呈固态水晶状,在解析温度下可转变为液态,二者均属高黏性液相涂层,作用是吸收萃取待测物;另一类是多相多孔聚合物涂层,如聚二甲基硅氧烷/二乙烯基苯(PDMS/DVB)、聚二甲基硅氧烷/二乙烯基苯/碳分子筛(PDMS/DVB/CAR)等,这一类为固相涂层,作用是以吸附机理进行萃取[21]。该技术设备装置结构简单,小巧紧凑,形状像一只医用注射器,由手柄和萃取头两部分构成。萃取头顶端涂有不同类型吸附剂的熔融石英纤维头,用于萃取、吸附样品,手柄用于安装或固定萃取头,可永久使用。随着萃取吸附剂材质的改进,新型涂层不断被发明和应用, SPME 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环境、食品、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对于果实香气(挥发性气体)的研究比较多,Giannetti 等[22]对苹果香气进行研究,Cuevas 等[23]研究鲜橙的香气成分,张涵等[24]研究对比了我国常见的 4 种主栽柑橘类香气,周立华等[25]研究了 7 种小浆果香气成分等等。对于梨香气的研究主要出现在 1995 以后,如 Suwanagul 研究了 4 种西洋梨的香气成分,Zlati 等[26]研究了 Bartlett 在不同阶段的香气问题,Chen 等[27]研究了鸭梨的香气,Li G[28]研究了 11 种东方梨的香气,Wei S 等[29]使用 SPME 研究了南果梨的香气变化。

3 梨果实香气代谢的生化机制

果实香气来源于果实的次级代谢,次级代谢依赖主代谢正常进行。参与主代谢的化学物质,也即香气成分的前体物质,由于参与生物代谢反应不同,产生香气(挥发性)小分子化合物的途径也不一样。按照前体物质的类型,可将香气代谢合成的途径分为脂肪酸代谢途径、氨基酸代谢途径和糖类代谢途径(单糖)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酶类主要有脂氧合酶(LOX)、醇脱氢酶(ADH)、醇酰基转移酶(AAT)、β-葡萄糖苷酶(CB)。随着果实所处的发育阶段的不同,相关酶类活性也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果实香气物质。在不同的阶段酶的活性受相关酶基因的调控,如 LOX 基因家族对果实香气成分中的酯类的调节,等等。

3.1 脂肪酸代谢途径

果实香气的主要成分是酯类、醇和醛类,这些物质的前体物质大多来自脂肪酸的转化,这一类香气产生的路径叫作脂肪酸路径。在果实香气合成过程中的脂肪酸路径有三种类型:α-氧化、β-氧化和脂氧合酶(LOX)途径,以 β-氧化和 LOX 途径为主。LOX 途径在很多果实的香气物质代谢中都得到了验证,如苹果、甜瓜、桃、梨等[30-33]。LOX 途径至少有脂氧合酶(LOX)、氢过氧化物裂解酶(HPL)和乙醇脱氢酶(ADH)参与反应,其中脂氧合酶是 LOX 途径中的第一步反应关键酶,决定反应的进行。在反应起始它识别不饱和脂肪酸的“二烯”结构并使其氧化形成过氧羟基脂肪酸,根据其加氧位点不同把 LOX 酶分成 9-LOX 和 13-LOX 两种类型。LOX 基因已从许多植物中分离和鉴定,在果实发育成熟过程中,LOX 基因家族差异调节香气的代谢,如苹果、梨果实香气的作用等。脂肪酸代谢途径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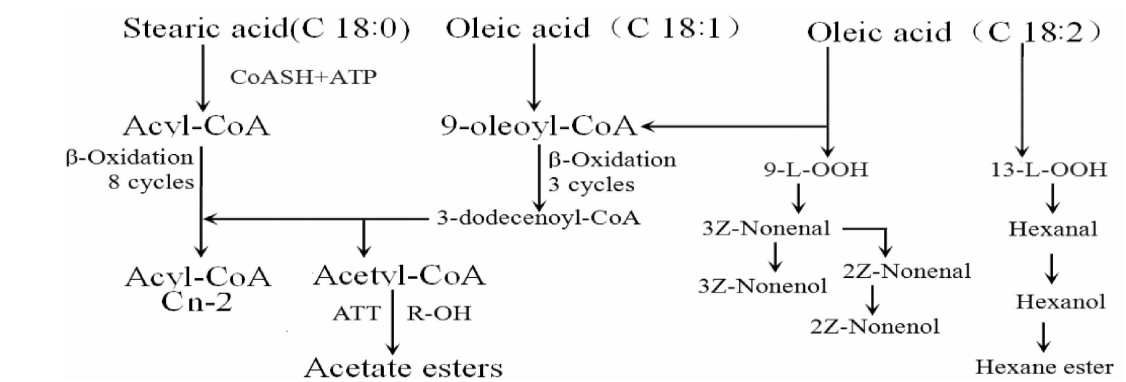

图 1 脂肪酸产生香气的路径

3.2 氨基酸代谢途径

果实组织中含有的氨基酸在酶的作用下转变为挥发性的有支链脂肪族醇、醛、酮和短链酯类物质[34],果实香气的这一来源被称为氨基酸代谢路径。氨基酸路径有两个支路:一条途径是在脱羧酶作用下生成醛,然后在醇脱氢酶(ADH)的作用下生成醇,接着参与或者不参与酯的合成;另一条途径是氨基转移酶的作用下生成 α-酮酸,α-酮酸与辅酶

A(CoAs)生成酰基 CoAs,然后在醇酰基转移酶(AAT)作用下生成酯[35]。参与香气合成的氨基酸主要有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丙氨酸、半胱氨酸和苯丙氨酸等,其中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丙氨酸为甲基支链酯合成的前体物质。在一些果实中已经得到证实,如草莓、甜瓜、梨,等等[36-38]。氨基酸产生香气的路径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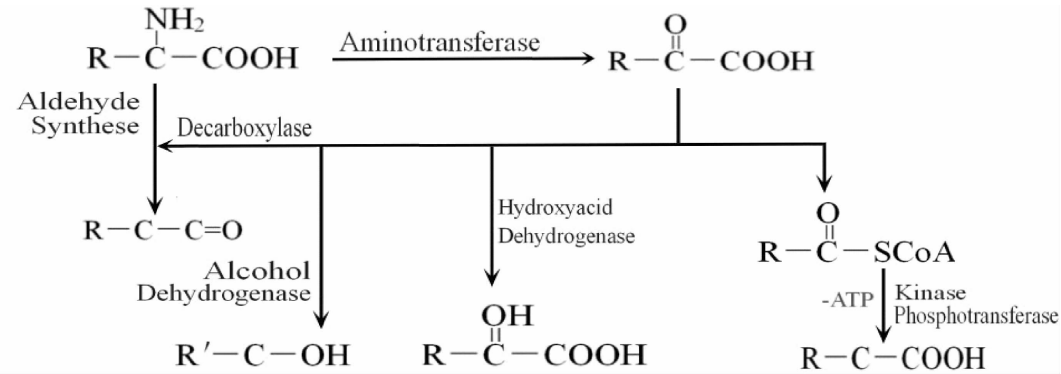

图 2　氨基酸产生香气的路径

3.3　糖类代谢途径

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糖,其中单糖、双糖和一些糖醇不但是果实风味的来源,同时也是果实香气的重要前体物质。糖的本质是多羟醛或多羟酮,这些小分子糖经 EMP 途径(Embden Meyerhof Parnas pathway)无氧条件下经糖激酶分解成丙酮酸,再在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pyruvate dehydrogenasecomplex)的催化下进行氧化脱羧反应生成乙酰辅酶 A。乙酰辅酶 A 有两条途径合成酯:一是在醇转酯酰酶(AAT)催化下生成乙酸某酯;另一个是在还原酶催化下先生成乙醇,再合成某酸乙酯,具体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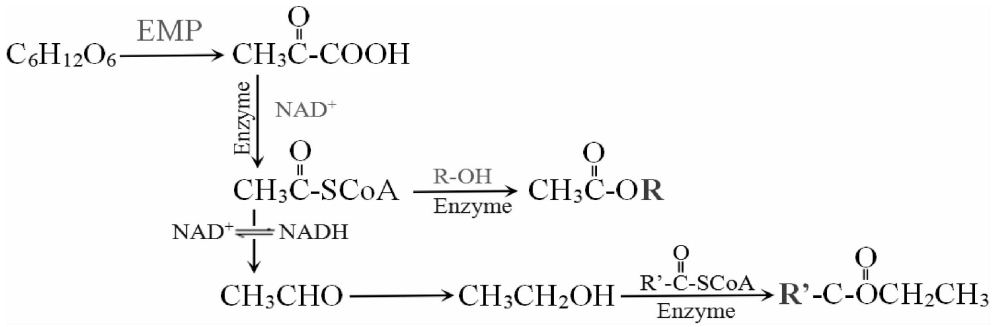

图 3　碳水化合物产生香气的路径(单糖)

4　展望

果实香气是反应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对品质的追求趋向完美,对消费水果(食品)追求趋向决定了水果产业的发展方向。因而,果实香气成了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从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果实香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气的种类和品种间果实香气的差异,果实特征性香气的确定,主要类别的香气物质代谢途径,果实成熟及其货架期、贮藏期果实香气成分及相关酶活性的变化等方面,而在如何通过传统的田间管理等人为手段精准地干预果实主代谢,进而影响次代谢的香气合成和释放,以及利用遗传工程、基因操作技术来改善果实的香气成分,调控果实香气的代谢,从而达到提高果实品质等方面研究较少。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分子育种等理论的不断完善,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了解果实香气代谢基因的信息,研究阐明果实香气代谢的关键酶基因的功能,达到对果实香气代谢的精准调控,是研究果实香气的必然趋势。

随着梨果产业的发展,梨品质提升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果实香气方面尤显突出。本文分析总结国内外梨果实香气研究的特点,以期给我国梨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香气问题提供一定的线索和启示。

参考文献:

[1]曹玉芬,赵德英. 当代梨[M].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6.

[2]李秀根,张绍铃. 世界梨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 中国果业信息,2006(11):1-5.

[3]USDA F A S. Fresh Deciduous Fruit: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Apples,Grapes,& Pears)[R]. 2017.

[4]肖泽文,王燕杰,胡小刚. 气相色谱技术及其发展[J]. 大学化学,2012,27(3):84 - 88.
[5]张富春,许乾丽. 中华称猴桃香气成分的研究[J]. 分析测试学报,1991,10(4):67.
[6]梁莲莉,韩琳,陈雪,等. 刺梨鲜果挥发性香气成分的研究[J]. 化学通报,1992(5):34 - 36.
[7]廖凤玲. "爱甘水"梨果实发育过程中香气合成及乙烯对其合成影响的探究[D]. 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4.
[8]巴金磊. 梨果实香气成分生物合成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D]. 扬州:扬州大学,2014.
[9]LI G,JIA H,LI J,et al. Emission of volatile esters and transcription of ethylene and aroma related genes during ripening of 'Pingxiangli' pear fruit (Pyrus ussuriensis Maxim)[J]. Scientia Horticulturae,2014,170:17 - 23.
[10]WEI S,TAO S,QIN G,et al.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reveals the candidate genes associated with aroma metabolites and emission of pear (Pyrus ussuriensis cv.)[J]. Scientia Horticulturae,2016,206:33 - 42.
[11]王龙,周鑫,盛蕾,等. 冷藏对南果梨酯类香气合成关键酶活性及蛋白表达的影响[J]. 食品科学,2017(9):207 - 212.
[12]MOYA - LEóN M A,VERGARA M,BRAVO C,et al. 1 - MCP treatment preserves aroma quality of 'Packham's Triumph' pears during long - term storage[J].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2006,42(2):185 - 197.
[13]K K,C P,E R. On - line gas chromatography combustion/pyrolysis 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ry (HRGC - C/P - IRMS) of major volatiles from pear fruit (Pyrus communis) and pear products[J]. Food Chemistry,2005,91(3):449 - 455.
[14]李国鹏. 中国梨果实挥发性物质鉴定及酯类物质生物合成相关基因表达的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12.
[15]张凤芳,马力. 同时蒸馏 - 萃取法(SDE)提取葱油及工艺优化[J]. 食品工业科技,2015(6):290 - 294.
[16]HONG J H,KHAN N,JAMILA N,et al.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Flavour Profiles of Citrus spp. Fruits by SDE - GC - MS and Enantiomeric Composition of Chiral Compounds by MDGC - MS[J]. Phytochemical Analysis,2017,28(5):392 - 403.
[17]BRUNNER G. Supercritical fluid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o food processing[J].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2005,67(1 - 2):21 - 33.
[18]STEFANO P,FABIO L,ANNA R.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as a preparative tool for strawberry aroma analysis[J].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15,16(9):555 - 559.
[19]LACASSIE E,DREYFUSS M F,DAGUET J L,et al. Multiresidue determination of pesticides in apples and pears by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J]. J Chromatogr A,1998,805(1 - 2):319 - 326.
[20]娄在祥. 超临界 CO_2 萃取法提取库尔勒香梨精油及其成分分析研究[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1(3):366 - 368.
[21]徐刚,史茗歌,吴明红,等. 固相微萃取的原理及应用[J]. 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68 - 373.
[22]GIANNETTI V,BOCCACCI MARIANI M,MANNINO P,et al. Volatile fraction analysis by HS - SPME/GC - MS and chemometric modeling for traceability of apples cultivated in the Northeast Italy[J]. Food Control,2017,78:215 - 221.
[23]CUEVAS F J,MORENO - ROJAS J M,RUIZ - MORENO M J. Assessing a traceability technique in fresh oranges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with an HS - SPME - GC - MS method. Towards a volatile characterisation of organic oranges[J]. Food Chemistry,2017,221:1930 - 1938.
[24]张涵,鲁周民,王锦涛,等. 4 种主要柑橘类香气成分比较[J]. 食品科学,2017,38(4):192 - 196.
[25]周立华,牟德华,李艳. 7 种小浆果香气物质的 GC - MS 检测与主成分分析[J]. 食品科学,2017(2):184 - 190.
[26]ZLATI E,ZADNIK V,FELLMAN J,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roma compounds in "Bartlett" pear in relation to harvest date,storage conditions,and shelf - life[J].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2016,117:71 - 80.
[27]CHEN J L,YAN S,FENG Z,et al. Changes in the volatile compounds and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Yali pear (Pyrus bertschneideri Reld) during storage[J]. Food Chemistry,2006,97(2):248 - 255.
[28]LI G. Characterization of aromatic volatile constituents in 11 Asian pear cultivar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species[J].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EARCH,2012,7(34).
[29]WEI S,QIN G,ZHANG H,et al. Calcium treatments promote the aroma volatiles emission of pear (Pyrus ussuriensis,'Nanguoli') fruit during post - harvest ripening process[J]. Scientia Horticulturae,2017,215:102 - 111.
[30]CONTRERAS C,TJELLSTR M H,BEAUDRY R M.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ee and esterified fatty acids and LOX - derived volatiles during ripening in apple[J].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2016,112:105 - 113.
[31]ZHANG C,CAO S,JIN Y,et al. Melon13 - lipoxygenase CmLOX18 may be involved in C6 volatiles biosynthesis in fruit[J]. Scientific Reports,2017(7):2816.
[32]ZHANG B,SHEN J,WEI W,et al. Expression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Aroma Formation Derived from the Fatty Acid Pathway during Peach Fruit Ripening[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2010,58(10):6157 - 6165.
[33]ZHANG L,SHEN Y,BU Q,et al. Effects of 1 - methylcyclopropene on the Metabolic Pathways of Aroma - Related Compounds in Nanguo Pear[J].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2014,38(4):1749 - 1758.
[34]HILDEBRANDT T M,NUNES NESI A,ARAúJO W L,et al. Amino Acid Catabolism in Plants[J]. Molecular Plant,2015,8(11):1563 - 1579.
[35]EL HADI M,ZHANG F,WU F,et al. Advances in Fruit Aroma Volatile Research[J]. Molecules,2013,18(7):8200 - 8229.
[36]PéREZ A G,OLíAS R,LUACES P,et al. Biosynthesis of Strawberry Aroma Compounds through Amino Acid Metabolism[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2002,50(14):4037 - 4042.
[37]LI Y,QI H,JIN Y,et al. Role of ethylene in biosynthetic pathway of related - aroma volatiles derived from amino acids in oriental sweet melons (Cucumis melo var. makuwa Makino)[J]. Scientia Horticulturae,2016,201:24 - 35.
[38]ONUEGBU N C,ADEDOKUN I I,KABUO N O,et al. Amino Acid Profile and Micronutrient Composition of the African Pear (Dacryodes edulis) Pulp[J]. Pakistan Journal of Nutrition,2011,10(6):555 - 557.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Review on the Aroma of Pear Fruit

ZHANG Jun, LI Jingj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roma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characteristic of pear frui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roma components of pear fruits are mainly secondary metabolites such as aldehydes, alcohols, and esters. The biological metabolism of these volatile compounds mainly includes fatty acid pathway, amino acid pathway, and sugar (monosaccharide) pathway. The key enzymes involved are mainly lipid oxygen, alcohol dehydrogenase, acyltransferase, etc. Since the study of the aroma components of pears in 1927, it has reached the genetic level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cise regulation of the aroma quality and variety improvement of pear fruits.

Key words: pear; aroma; biological pathway; enzyme gene

(上接第 118 页)

[4]刘成才.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叠合楼盖技术经济分析[J]. 中州大学学报,2008,25(6):119 - 121.
[5]周旺华. 现代混凝土叠合结构[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6]刘成才.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叠合板、连续叠合板试验研究与技术经济分析[D]. 郑州:郑州大学,2006.
[7]聂建国. 钢—混凝土叠合板组合梁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10):36 - 38.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hear Performance of Laminated Interface of Concrete Laminated Structure

LIU Chengca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shear performance of concrete laminated interfac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hear mechanism of the concrete laminated interface,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concrete strength, stirrup ratio, roughness, and span - depth ratio etc. of the shear performance of laminated interface.

Key words: laminated interface; shear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factors